

醴陵文史

第三辑

47256/22

醴陵文史

第三辑

(瓷业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省醴陵市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前 言

《醴陵文史》第三辑与读者见面了。这一辑专门刊载醴陵瓷业发展的史料，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醴瓷的历史和现状，供有兴趣了解和研究醴瓷发展史的人士参考。

醴陵瓷业，在我国瓷业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虽属后起，至今也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据史志记载，它始于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醴陵瓷业，原料蕴藏丰富，品种齐全，质量优良，工艺水平较高，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清末民初，醴陵釉下彩瓷曾参加过武汉、南洋劝业会，意大利、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等赛会，均获得一等金牌奖或最优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醴陵陶瓷企业的规模逐年扩大，生产持续发展，它已成为地方工业的重要支柱。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横向联合普遍开展，科研成果日益显著，名优产品与日俱增；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建筑、化工、高频、电器瓷从无到有；各类产品不断创新。醴陵瓷业已经有着良好的基础，必将向新的高度腾飞！

本辑收集的史料有限，远不能反映出醴瓷发展的全部历史和整个面貌。但是，我们希望：它能为读者了解醴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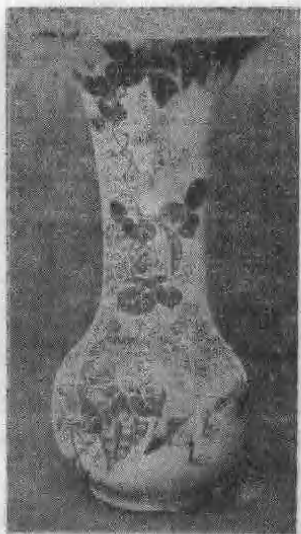
的艰难历程及其光辉前景有所帮助，并将激励人们为振兴醴陵瓷业献智出力。

我们在收集醴瓷史料的过程中，得到了湖南醴陵瓷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厂家、湖南省陶瓷研究所、醴陵电瓷厂、渌江电瓷电器厂、醴陵市经济委员会等单位，以及朱方义、吴铮、邓文贵、文汉民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对此深表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人力不足，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本辑内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专家读者予以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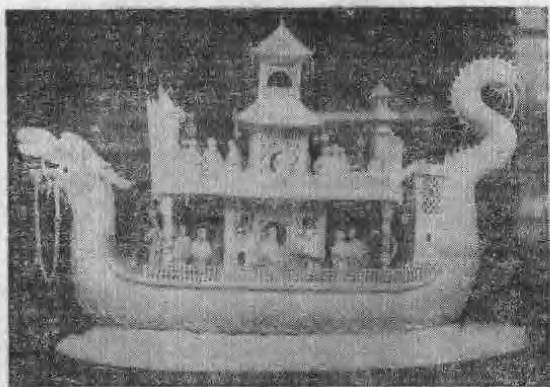
编 者

1986年11月



图为清末民初时期醴瓷参加国内南洋（南京）劝业会的
得奖产品之一。

（吕小平摄影）



图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献给国庆十周年产品——瓷雕龙船。系该所老艺人徐协和作。

（吕小平摄影）



图为民国时期
醴陵生产的釉下彩
花瓶

(吕小平摄影)

图为湖南
省群力瓷厂为
毛主席纪念堂
手工一次拉坯
成型的大花
缸。系彩绘工
程师李小平设
计。

(吕小平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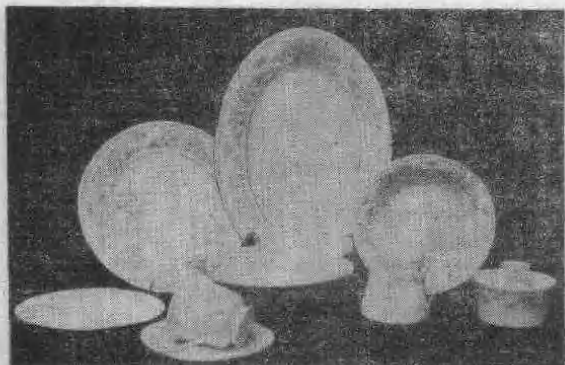
图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设计制成的大型瓷雕凤凰宫灯，这个宫灯构思巧妙，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此宫灯系工艺美术工程师邓文科设计，在雕刻技师唐锡怀的帮助下，由黄建明、张金秀两同志精心制作而成。荣获一九八六年湖南省新产品设计一等奖。

（陶瓷研究所提供）



（吕小平摄影）

图为湖南省醴陵国光瓷厂设计、生产的白玉牌四十五头西餐具，造型别致，装饰新颖，既有欧美风味，又具有强烈的东方民族色彩，专销美国市场。1984年荣获国家银质奖章。



— 图为醴陵永胜瓷厂生产的“醴陵牌”餐具，1984年获得国家银质奖。

(永胜瓷厂提供)



图为湖南省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首都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

(吕小平摄影)

目 录

前 言

醴陵瓷业11幅

醴陵瓷业的起源及其发展

- 醴陵瓷业的起源与现状……………周验昭 (1)
- 我所知道的醴陵瓷业一些大事……………文汉民 (6)
- 醴陵瓷业的历史光辉兼谈清末民初的
武汉、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巴拿马博览会
……………邓文科 (25)
- 建国前醴陵瓷业的经济关系……………刘建兴 (35)
- 醴陵瓷业发展阶段概述……………周验昭 (57)
- 醴陵瓷业复工促进委员会的始末……………龚广舜 (68)

瓷 | 工 — × — 业 | 运

- 一九二五年瓷业工人罢工的胜利
……………文汉民整理 (71)
- 牙祭神福肉 节日酒例钱……………文 峰 (75)

陶 瓷 人 物

- 略谈熊希龄对醴陵瓷业的贡献……………刘建兴 (81)
- 敬怀醴陵瓷业的一位宗师
吴寿祺先生……………邓文科 (102)
- 绘画技艺传后人 珍贵名画献国家
——忆瓷业老艺人唐汉初二、三事…文汉民 (110)
- 陶瓷雕刻名师——徐协和……………唐场怀整理 (115)

**醴私
瓷改
对造**

- 一九五六年私营瓷业实行公私合营概况
.....文汉民 (117)
- 醴陵瓷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建设瓷厂
.....吴 铮 (123)

**工 | 美
—○—
艺 | 术**

- 醴陵陶瓷工艺美术略谈.....林家湖 (130)
- 记几位陶瓷美术工程师二、三事.....文汉民 (135)

**醴
瓷
科
技**

- 建国三十多年来陶瓷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邓文贵 黄炳炎 (143)
- 略谈醴陵瓷业窑炉改造的经过.....王盛开 (154)
- 关于我和阳涤藩同志在醴陵一中合作研制金
水的回忆.....喻科盈 (160)
- 醴陵日月瓷园器成型工艺的变迁.....肖传瑛 (162)
- 关于研制滚压成型的经过.....曹卓明 (165)

- 瓷 管** 从事陶瓷工业企业管理的三十年.....朱方义 (167)
- 业 理** 我在群力二十年的粗略回顾.....吴 铮 (182)

- ◇**瓷土资源**◇ 醴陵陶瓷原料及其开采利用
.....黄炳炎 邓文贵 (193)

**醴镇
瓷企
乡业**

- 醴陵乡镇陶瓷发展概况.....市乡镇企业局 (208)
- 醴陵城关镇集体性瓷厂发展概况.....傅扬广 (212)
- 醴陵渌江高频瓷厂发展概况.....王芝明 (218)

陶瓷机械

- 日用瓷成型设备的发展
.....醴陵陶瓷机械厂 供稿 (221)

- 为毛主席、周总理和国家机关烧制瓷器
李维善 (223)
- 永驻春光的醴陵釉下彩瓷器.....文汉民 (232)
- 回顾国宴瓷的试制和生产.....李维善 (239)
- 银光辉映的醴陵出口瓷.....文汉民 (247)
- 创历史水平的大花瓶.....群力瓷厂厂志办 (249)
- 宋庆龄称赞醴陵瓷.....李维善 (252)
- 回顾赠缅甸礼品瓷的试制和生产...李维善 (254)

建国后醴陵瓷业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朱方义 (259)

- 醴陵国光瓷厂发展概况
国光瓷厂宣传科供稿 (269)
- 醴陵永胜瓷厂简况...永胜瓷厂办公室供稿 (276)
- 醴陵群力瓷厂发展概况
群力瓷厂厂志办供稿 (279)
- 醴陵星火瓷厂的历史和现状
星火瓷厂供稿 (290)
- 醴陵新民瓷厂发展概况.....新民瓷厂供稿 (296)
- 醴陵电瓷厂发展概况.....彭显福整理 (299)
- 醴陵渌江电瓷电器厂发展概况
醴陵渌江电瓷电器厂供稿 (306)

资 料	建国初期醴陵瓷业产销概况 瓷器销售 傅扬广 刘照乙 (312)
	醴瓷在美国市场 胡建球 (318)
	北洋军阀张宗昌对醴陵瓷业的破坏 陆承裕 (323)
	建国前醴陵细瓷业工厂和工人调查表 文汉民收集 (325)
	建国前醴陵细瓷业窑厂及搭装户一览表 文汉民收集 (327)
	醴陵土瓷窑厂一览表 文汉民收集 (330)
	建国后醴陵瓷业国营和集体厂家基本情况 一览表 彭增信收集 (333)
	建国后醴陵市乡镇瓷业厂家发展概况一览表 彭增信收集 (334)

醴陵瓷业的起源与现状

周 验 昭

我国瓷业起源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唐代是我国瓷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到了宋代出现了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五大名窑。明清两代景德镇成为我国瓷业的中心，对世界各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由此，我国被誉为“瓷器之国”，闻名于世。

醴陵瓷业是我国瓷业中一颗明珠，它起源于1729年（雍正七年）。据1948年出版的《醴陵县志》（以下简称县志）记载：“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内之汾山发现瓷泥，雍正七年向汾山寺僧智慧赁山采泥，创设瓷厂，并约其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二十余人共同组织，招工习传，遂为醴陵瓷业之嚆矢。其先师樊进德，明朝人，业瓷者，相传至今，汾山有樊公庙。自是汾山遂为瓷业中心区，渐次推广于赤竹岭、老鸦山、王仙观口……等处。”从我国瓷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醴陵瓷业当然只能算是“晚辈”，但距今也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亦堪称历史悠久，并且在本世纪初以来，曾蜚声中外，饮誉全球。

醴陵瓷业的产生，首先得益于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古老的瓷业生产所需资源，从原料（包括瓷土、黏泥、耐火泥等）到燃料（木柴）、动力（水力）、颜料（土墨）、捆扎材料（葛藤）等，醴陵无不具备。瓷土是瓷业生产的主要原料，醴陵最早开采的是洩山等地的瓷土，洩山瓷土质地良佳，所产瓷土，较为纯净，且系“瓷土露头宽由二十公尺到百余公尺不等”的露天矿，极易发现和开采。因此醴瓷首先产生于洩山并非偶然。现已发现全市有瓷土矿脉三十余条，均系石英斑岩风化，分布于东北两乡，从探明的矿藏量，如按目前全市每年所耗瓷土计算，尚可开采近八百年。

交通运输是产生和发展瓷业商品生产的先决条件。醴陵地处湘东，位萍、株之间，水运有渌江直达湘江入长江沿岸各埠。在本世纪前，醴陵尚未有铁路、公路，水运是醴瓷运输的主要渠道，正如《县志》所云：“土瓷多在乡间，土瓷出窑后，运到姜湾，客商云集采购，用民船装运出口。”本世纪初，县内有浙赣铁路通过与粤汉线相联，还有湘东铁路与醴浏铁路，联接浏阳、攸县、茶陵。公路有上海至昆明，北京至广州南北、东西两条国道交汇于市区，可谓四通八达。醴陵瓷业其所以持续两百多年而不衰，是与其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条件分不开的。

醴陵瓷业，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沧桑，从而奠定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成为目前我国八大主要产瓷区之一。据1985年统计，全市共有瓷厂145家（其中全民所有制15家，集体所有制130家，此外尚有部分个体户未统计在内），职工为二万三千余人。在这些企业中，湖南醴陵瓷业总公司，辖

八厂、一矿、四公司；职工万余人。1985年国家重点支持技术改造的大型骨干企业中，该公司被列为全国309个大型骨干企业之一。醴陵电瓷厂是我国五大电瓷厂之一，国光瓷厂是六好企业，是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荣获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列为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三十个试点单位之一。

醴陵瓷业具有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仅就醴陵瓷业总公司、醴陵电瓷厂、淅江电瓷电器厂等三个单位统计，就拥有固定资产10355万元，职工13740人，人均固定资产装备达7536元。在我国同类行业中其技术装备水平是较高的。

醴陵瓷业不仅在企业规模上具有大、中、小型相结合的企业群体，而且在企业结构上逐步形成了专业化协作，品种规格齐全的各类专业瓷厂。据1985年统计，全市145家瓷厂中，有日用瓷厂109家，电瓷厂8家，建筑瓷厂28家，分别生产各种日用瓷，高低压电瓷，建筑，卫生瓷，理化瓷，工艺美术瓷等。在生产结构上，从矿山开采、瓷泥加工成型、装窑烧成、彩绘装饰、包装运输、经营销售等整套生产环节，成龙配套；而且围绕发展瓷业生产，拥有科研设计，机械制造，人材培养，产品、技术开发……等整套机构，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陶瓷工业体系。由此，醴陵已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新型瓷城。

醴陵瓷业，无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内外市场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享有较高的声誉。1985年，全县日用瓷年产量达一亿八千万件，还生产了各种工业用瓷近两万吨，此外，还有各种工艺美术瓷等。这些产品不仅逐步满足了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并且逐步扩大了对国

际市场的出口，醴陵瓷业总公司，1984年对美出口瓷器的数量和换汇总额，在全国八大陶瓷产区中都名列第一。目前醴瓷正畅销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足迹遍世界。

醴陵瓷业，以其独有的特色著称于国内外。1979年以来，国光瓷厂的白玉餐具、厚胎餐具，永胜瓷厂的醴陵牌餐具均获国家银质奖章。1984年醴陵工艺美术瓷厂电动“七品芝麻官”，荣获全国旅游新产品一等奖。1985年该厂的“坐莲观音”、“女排夺冠”等新产品又获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奖。特别是醴陵釉下彩，更是我国瓷品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长期饮誉于国内外。早在本世纪初，醴陵瓷业在继承湖南唐代长沙窑独特的釉下彩的基础上，首创了独具一格釉下五彩名瓷。1909—1915年期间曾四次获得国内外的优质产品和一等金牌奖，特别是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醴陵出产的釉下五彩花瓶荣获金牌奖。1979年以来，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餐、茶具曾两度获得国家金牌奖。首都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等地，都是用的醴陵瓷器。国内的高级宾馆、饭店，如北京饭店、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南京的金陵，西藏的拉萨等一百余家高级宾馆饭店，都争相订购醴陵的瓷器。八十年代以来，醴陵瓷器又以质量好、款式新、花色多开始风靡欧美等高级市场，被称之为“醴陵玫瑰”（LILING—ROSE）。除了日用瓷外，醴陵电瓷厂的电瓷产品，从1970年开始，出口苏联、澳大利亚、北欧、东南亚、南北美洲等22个国家和地区。醴陵淅江电瓷电器厂试制成功的DC—4型直流超高压线路绝缘子被评

为水电部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两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醴陵瓷器产品由粗瓷到细瓷，由中低档到中高档，由单件到成套，由单一的日用瓷发展到高低压电瓷和各种工业用瓷；市场从内销到外销，从亚非拉到美澳加。目前，正在继续狠抓产品更新换代和质量升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以预料，醴陵瓷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改造步伐的加快，产品结构的变化，经营管理的改进，将会以一个更崭新的面貌、更迅速的步伐，跨上一个新的高度，为我国的瓷业发展作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周验昭同志系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

我所知道的醴陵瓷业一些大事

文 汉 民

1729年（雍正七年），醴陵始制土瓷。《醴陵县志》（1948年版）记载：“瓷土为醴邑特产。清雍正年间，有粤人插迁来醴者，始发现之于汾山，用制瓷器良佳。自是，汾山遂为瓷业中心区。”文斐《醴陵瓷业考》（1948年版）《醴陵县志》注）记述：“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之汾山发现瓷泥，雍正七年，向汾山寺僧智慧赁山开矿，创设瓷厂，并约其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二十余人，共同组织，招工传习，遂为醴陵瓷业之嚆矢。其先师樊进德，明朝人，业瓷者，每开窑必祀，相传至今，汾山有樊公庙。”王彦《醴陵瓷业调查》（1942年）记叙：“醴陵之产瓷始于雍正初年，当时有樊姓者，佚其名，江西南昌人，偶来醴陵，于汾山发现瓷泥，遂于中枫塘购地开设瓷窑。”

土瓷自雍正初年创制后，由于原料丰富，取之便利，发展很快。由汾山渐次推广于赤竹岭、老鸦山、王仙观口、大小林桥、瓦子山、漆家坳、严家冲、五十窑前、寨下、罗坪境、青泥湾、茶子山、塘山口等处。几年时间，山户由一、二家增加到四十余家。这时，土瓷生产，供不应求，客商不

先付款订货就买不到瓷器，后来，先付款订货成了惯例。是为醴陵土瓷生产发展的初盛时期。

1852年（清代咸丰二年），太平军道经湖南，军行所至，瓷品滞销。由于商不顾工，客商乘窑户困难之机，尽量压低订购货价，造成窑户仰鼻息于客商，遂陷入破产境地，土瓷生产开始衰落。

太平军起义失败后，土瓷销场复旺，有华昌公司集资十万，向窑户购销瓷品，改变了商不顾工的局面，窑厂随之又增至百余家。

清末，政局变乱迭起，瓷品销场又落，华昌虽几次派员出江游卖，仍不能扩大推销范围，未几，华昌公司倒闭，窑户亦重陷困境，土瓷生产又趋衰落。

民国初年，少数窑户为自救济，特发起组织土瓷维持会，并呈请建设厅拨得现款五千元，以资救济，然因机构不甚健全，经费有限，旋又解体。

1929年（民国十八年），大局又趋稳定，交通日益便利，瓷品销路畅通，一般瓷栈和华昌、美华等公司，又行先期付款订货，为窑户解决资金困难，窑户遂又恢复到百十余家。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由于日军侵扰，景瓷受阻，大后方需瓷日增，醴陵土瓷窑户发展到138家，有做坯车位2241个，工人4169人，产量达到8,362,000筒（每筒10个），产值以每千对筒（即二千筒）碗时价折算，共值2,090,500圆。是为土瓷的再兴时期。

醴陵瓷业，自1729年（清代雍正七年）创立后，到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因沿袭旧法，不求改进，历时176年，都只有土瓷生产。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官员熊希龄，东游日本，见其工业发达，瓷产精美，心窃慕之。回乡后，与醴陵文俊铎共赴浏山、东堡等地考察，并取其瓷泥远送日本试验，结果证明，可制优良瓷器。遂详拟万言呈文，呈请清政府湖广总督端方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改良醴陵瓷业。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批准熊氏呈文，拨库银一万八千两，派熊希龄会同醴陵县人文俊铎等于城北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堂一所，内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二班，招收学生共三百余人，除本省的师资外，还聘有日本技师安田乙吉、大凡理吉等五人为教员，由熊希龄自任监督。接着，熊氏招集商股五万元，就瓷业学堂前姜岭下创建湖南瓷业公司，熊希龄担任第一任总理，锐意改良，开设圆器厂、琢器厂、装置机械、广集人材，研制坯釉配方和能耐高温的釉下颜料，专制上等瓷器，十月，正式开工出瓷。从此以后，醴陵瓷业由乡村发展到城镇，由生产土瓷进步到细瓷。湖南之有细瓷亦从此开始。后来，又将单色釉下花提高到了釉下五彩的新水平。醴陵瓷业遂逐步发展成为继承湖南陶瓷优良传统工艺的后起之秀。

据百中《醴陵细瓷调查》记载：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后，到1910年（宣统二年）瓷业学堂改为瓷业艺徒班，原招速成班已毕业，多转入湖南瓷业公司从事细瓷生产；永久班停办，其未毕业生送湖南高等实业学

堂就读。1917年（民国六年）瓷业艺徒班停办，改为湖南窑业试验场，由湖南瓷业公司常先任场长，沈明扬任副场长，分设陶瓷、玻璃、土敏土等科，从事窑业研究试验工作，1918年（民国七年），湖南窑业试验场遭北兵蹂躏，场务停顿；到1920年（民国九年）湖南窑业试验场恢复，由沈明扬任场长，缩小范围，仅设陶瓷科，注重白陶试验；1924年（民国十三年）窑业试验场由于每月约七百元的经费不能发给，垫借甚巨，场长王昌经，拟具意见，呈由实业公司核准，一次发给现洋五千元，以二千元向湖南瓷业公司购置用余地皮，建筑工场，改研究试验为生产经营，窑业试验场更名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场。至此，以教学为主的湖南瓷业学堂改为以研究试验为主的湖南窑业试验场宣告结束。

据百中《醴陵细瓷调查》记述：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开办以来，专制上等瓷器，公司所出各品，上年武汉赛会，当年南洋（南京）赛会，均获奏奖一等第一名，得赏金牌，以示优异，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来醴陵贩运瓷器的络绎不绝。据王彦《醴陵瓷业调查》（1942年）中记述：湖南瓷业公司，经历数年，出品日精，其出品之精美者先后于上海、武汉、南洋、巴拿马等处博览会中，取得优等奖状。据传，熊氏并曾亲自携瓷入京，贡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熊氏所送醴产细瓷，目数视原所陈列之景德镇瓷，熊氏在旁俛会其意，‘恐将说出还是江西瓷好’，亟从容进言曰：‘江西瓷已有千百余年之历史，醴陵瓷仅数年之功耳。’慈禧太后不禁莞尔，卒以金牌赏之。亦是醴陵瓷产中一段佳话也。”

1911年（宣统三年），据《东方杂志》（1912年4月出版）第八卷第十号中记叙：意大利古都都朗开博览会。其奖励分为：卓绝奖、最优奖、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纪念奖等七个等级。江西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出品的瓷器，并驾齐驱地获得博览会的最优奖。

1913年（民国二年），据百中《醴陵细瓷调查》记载：湖南瓷业公司呈请湖南都督谭延闿氏核准，将公司所有产业估价135000元，作为商股，由湖南银行提拨钞币35000元为官股，改名为官商合办湖南瓷业公司，组织董事会，选举常先为公司经理。公司鉴于上品瓷的销路有限，开始注重生产普通瓷品。

1914年（民国三年）5月，醴陵大水成灾，文笔峰下商办博利制瓷公司遭水灾停办，湖南瓷业公司以二万串文收买，定名为湖南瓷业公司第二厂，本公司为第一厂。这年，由商人组股，在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醴陵等地设立湖南瓷业公司六个承销处。

1915年（民国四年），据《中国实业界》（1916年第四期）中记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竣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自1915年2月20日开幕至12月4日闭幕，历时十个月。“凡与会列邦之卓卓者，在太平洋东岸有中国、有日本……。中国此次赛会结果，其实获之优胜，以审查会之评奖言之，则中国得奖总数1200余枚，大奖章独占64，推为各国之冠。日本得奖总数1100余枚，而大奖章仅35枚。意大利、荷兰等各得大奖章20余枚。”又据《实业杂志》（1932年出版第一七二、一七三号合刊）记者

百中记述：“本年巴拿马运河成功，开博览会，湖南瓷业公司特制精品参加，获得优等奖牌。”笔者采访游德斌时，他说：“其父游先理绘制约二尺高的釉下彩百雀图花瓶就是巴拿马博览会获奖产品之一。”

1918年（民国七年），湖南瓷业公司机械设备，遭北兵捣毁，生产陷于停顿。

1920年（民国九年），据记者百中《醴陵细瓷调查》记载：湖南瓷业公司向长沙、常德等七家承销商店各借款四百元，合原来存款二百余元，集成三千元，以朱炯为经理，缩小范围，恢复生产。

1924年（民国十三年），据百中《醴陵细瓷调查》记载：湖南瓷业公司已还清借款，并盈余万余元，实业公司为扩大公司经营，加给资本五千元，改举谭哲为公司经理。又据王彦在《醴陵瓷业调查》中记述：这年醴陵细瓷厂已增至十余家。瓷业好转，但客商又施“放期展期”之法，以货多货少为“引滞”。“引”则货少价昂，但厂方无货；“滞”则价落，厂方争相出售，客商压价收购，形成挤卖之风，愈挤价愈落，厂方无奈，采取以次充好，降低出品成色，结果造成醴瓷在市场上以劣货目之，从而，加速了销场收缩，客商厂方，两受其伤。

1925年（民国十四年），瓷品滞销，湖南瓷业公司盈余全部亏损，且欠债约二万元，遂于秋前经营完全停顿。只好将两厂存坯抵债：第一厂存坯由债权人柴泥商自行购柴烧制，但成坯烧完的售价款仍未偿清债款；第二厂成坯，醴陵各公法团受债权人来往客商请托监视暂封存。这样，瓷业公

司的两厂都已倒闭。

1926年（民国十五年），工会成立，责令瓷业公司债权人筹款开工，否则须将厂屋交与工会。各债权人因而按债集股，与董事会订立租约，就第二厂开工生产，改名为新记湖南瓷业公司。

由以教学为主的瓷业学堂到以研究试验为主的窑业试验场，进而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成立以生产经营为主的模范窑业工场后，债务既未清偿，所积财政厅通知，复无款可领，至本年冬，又遭大水，以至无法维持，全部停业。

1927年（民国十六年），失业工人赴省向建设厅请愿，要求模范窑业工场开工，由厅核定计划，发给经费五千元，委徐健安为场长，恢复营业；瓷业公司第一厂自1925年（民国十四年）闲置，归模范窑业工场看管，已达二年，瓷业公司的失业工人曾多次赴省请愿，但一直未能恢复开工。

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设厅拨款二千元，修理瓷业公司第一厂厂屋，加筑大窑一座，合并到模范窑业工场。模范窑业工场并有瓷业公司第一厂后，又由建设厅加资二千元，合成资本约九千元，在技士向道继徐健安任场长后，努力经营，至年终结算，约盈利2500元。年终向道辞职，改委刘飞翰继任，又加发资本四千元，以扩展营业。

1929年（民国十八年）七月，改委黄殷尚继任，刘飞翰任期内亏损四千元。厅又加发资本13000元，由于黄也经营不力，到1930年（民国十九年）又亏损七、八千元。建设厅鉴于模范窑业工场连年经营失败，销场停滞，亏损严重，于10月奉建设厅令暂行停工，发款1500元为遣散工人用费。

1931年（民国二十年）2月，建设厅令撤销模范窑业工场会计主任，改整理委员为管理委员，并以原瓷业公司第一厂租与工人游先理经营，定名为民利公司。至此，由熊氏创立的官办醴陵瓷业，几经兴衰，终因“委任非人，开支浮滥，南票跌落，兵燹水灾，承销卡制，工商倾轧”等难以维持继续经营而倒闭了。优秀的瓷业彩绘技艺人员，也因失去了就艺依靠，有的转入湘绣，有的流落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因无法找到就业而以卖“字画”谋生。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优秀生吴寿祺，1929年离开醴陵到南京谋生几年后，于1935年回醴陵深居农村，弃艺从耕。名噪一时的醴陵釉下彩精品从此湮没无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镇瓷受阻，醴瓷畅销。据王彦《醴陵瓷业调查》记载：到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细瓷工厂由1935年的13家增加到46家，工场由77个增加到133个，从业人员由616人增加到3014人。全年烧窑1522次，每窑以时价5000元计算，全年产值7,660,000元。全县土瓷厂由1935年的105家，增加到138家，车位2241个，从业人员4155人，全年烧窑4169次，生产大小碗8,362,000筒（每筒10个），价值约2,090,500元。全县粗细瓷的年产量约十万担（折合一亿件左右）。这是建国前醴陵瓷业的全盛时期。

1941年，荣庆祥经营的日用瓷厂，由虞仕祥、任大章带领八个徒弟做出了一批300伏~6600伏针式瓷瓶，醴陵开始有了电瓷业。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是，不到两年，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捐税繁重，瓷业生产又一落千丈。细瓷厂先后于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和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倒闭和停工达89家，仅有七家细瓷厂勉强维持生产，数千工人失业，1949年瓷器的年产量下降到1499万件。

1946年12月4日，由李文彩、孙友余、张哲民、任中衍代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投资，与任大章合作办“中国电瓷厂”，1947年10月改厂名为“中华窑业厂”，1949年9月13日由戴凌翔代表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华窑业厂”，1950年6月23日改厂名为“湖南电瓷厂”，1951年8月改厂名为“醴陵电瓷厂”。

1949年7月25日，醴陵解放，26日，成立了醴陵县人民政府办事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18师政治部主任赵更生兼任主任，地下党县委书记孟树德兼副主任。

1949年8月1日，中共南下县委醴陵工作队到达醴陵，8月4日，正式成立中共醴陵县委员会和醴陵县人民政府；8月上旬成立醴陵县复工促进委员会；8月18日派李岳传、袁明辉等同志接管了伪县工会，同时成立醴陵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9月，通过政府和工会多方面做工作，刘祥记等比较开明的八家厂主带头开工，先后复工的粗瓷厂75家，就业工人1186人，细瓷厂20家，就业工人1200人。

1949年9月24日（农历己丑年八月初三日）《新湖南报》第二版以“政府多方宣导说服，醴陵瓷业复工生产，粗细瓷厂已开工者共95家为题，报导了醴陵瓷业复工生产的情

况。

1949年10月29日，县工会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据会议资料记载：细瓷复工开业的已有149家厂（场），从业人员2841人，日产大小碗为11200筒（每筒10个）；土瓷108家全部复工，从业人员1400人，日产大小碗32800筒。这年，虽然上半年有90%的工厂停工，仍产日用瓷1499万件，到年底，就业职工达3297人。

1950年春，农村减租退押波及城市工商资本家拍卖货物，抽走资金，抵交押规，籍故停业；加之胜利之初，人民购买力低，瓷器销不出去等种种原因，瓷厂纷纷申请停业。据县总工会档案资料记载：4月份经县工商科批准停业歇业的有34家，改组拆股的18家，申请停业歇业未获批准的88家。细瓷厂原开工的136家现只有31家开工，从业人员917人，失业的3438人；土瓷厂原开工的108家，从业人员2824人，现只有29家，从业人员700余人，失业的2100余人。使刚刚复工出现一点生机的醴陵瓷业，又急转直下地陷入了停业的困境。

1950年6月12日，面对停业失业的严重问题，由醴陵县政府工商科、建设科、民政科、镇公所、税务局、贸易公司、银行、总工会、工商联会等九个单位，共同组织醴陵县政府临时救济委员会，并选派张少隆为主任委员，解克锦、马骥为副主任委员，于6月16日正式开展救济失业工作。

1950年6月，据县总工会统计共有失业工人5428人。由政府拨救济粮九万斤，驻县部队二十一兵团捐献1200万元

(合现币1200元)，根据中央指示，捐献1%的实际工资作为救济失业工人的基金。通过组织156个失业工人修街道马路，每人每日伙食费7斤大米，共发大米8017.5斤；救济11家生产自救工厂的工人115人，共发大米9660斤；领救济粮的439人，工人本人10斤，家属5岁起5斤，发放粮10965斤，还乡生产的按里程人口计算发放救济粮。这样，总计付粮为33522市斤。

1951年3月底止，据县总工会工作总结中记载：全县在业职工人数为8840人。其中细瓷职工2893人，土瓷工人2522人，加上中华瓷业厂职工153人，瓷业合计已就业职工为5568人。这样，在1950年120多个厂相继复工后，到1951年已恢复到237厂，三千多失业工人全部就业了。并于1951年元月相应成立了醴陵县瓷业工会，建立了159个基层工会，发展会员4356人，工会有脱产干部12人，工会组织职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等工作。

1951年，醴陵县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瓷业生产与销售的管理工作，相应设立了以县长张厚为主任的醴陵县瓷器购销委员会。并组织土瓷和细瓷厂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成立瓷器产销联营机构，来推动全面复工后的瓷业生产。

1951年2月29日，在浏山古洞天召开浏、北、东全县土瓷业会议，成立醴陵县土瓷业产销社，公推耿补炎、余招佑为主产销社正副主任，并在姜湾新街46号门牌设立产销社办事机构，还在长沙、汉口、宜昌、广州等地设立托销点，广泛推销土瓷。随后，姜湾区29家细瓷厂组织圆器联营购销处；东门有10家细瓷厂组织琢器联销处；还有三班成立六联

销处，一联销处，及彩花红店成立十一联营处等开展推销细瓷的业务工作。这样，瓷业生产又开始出现打开销路的喜人局面。

1951年12月15日，由李润生、张勋业、刘锡威、胡雪棠等人作证立约：为上海义盛祥瓷庄经理姚浩泉、无锡兴昌瓷号经理姚锦昌、永全号经理王文斌、以及上海商人崔鹤鸣、姚福培和无锡商人姚菊昌等六人与我县土瓷窑厂、正记、忠记、改良瓷厂投资十亿元（合现币十万元），筹建民营窑业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劳力720人，后减核15人。这是瓷器打开销路后的喜人形势。

1951年12月22日，县长张厚亲笔签发了向长沙地区专员公署的请示文件称：“我县瓷器已打开了销路，今后各地来我县投资瓷业生产，更会增多，如不作统一的解决办法，扩大生产是有困难的。”从而，及时处理和解决了外地来醴投资瓷业的问题。

1952年2月25日，长沙地区专员公署对醴陵瓷业生产与管理作出了几项决定：主要内容为加强瓷器购销委员会的职权，有计划地指导生产和掌握瓷器价格；将原有木柴交易所，划归瓷器购销委员会领导，管理木柴交易，不许购户高价抢购和压价囤购；购销委员会成交的瓷器，木柴交易所成交的木柴，均得收交易金额0.5%的手续费，由购销委员会掌握累积，除作该机构经费外，专作瓷器改进与发展生产等开支，当地政府不得支作他用，专区亦不上提；马颈坳泥矿作为国营开采区，原开采泥户可继续开采，但须受国营统一管制，不够条件开采的户不批准开采。

1952年，醴陵瓷业，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先后有360户私营瓷厂和个体户复工（其中细瓷厂54家），组建9个生产合作社和147个生产合作小组。共有职工6189人，年生产日用瓷4664万件，比1949的1499万件增长两倍多，比1951年增长25%。

1953年，为了加强对城区瓷业的领导，由城关镇、县总工会、工业科、税务局、省土产公司醴陵瓷器公司、县工商联等六个单位联合组成领导小组，在姜湾设立了增产节约办公室，具体指导城区瓷业生产。瓷器公司对全县的瓷器生产实行统购包销，公司年初与厂家签订瓷器收购合同，在瓷厂资金处于困境的状况下，公司先付款后收货，连各厂所需瓷泥原料和松柴燃料也由公司垫款收购发至厂家。这年，国家预付给厂方的金额就达350余万元，全面扶植醴陵瓷业走向计划经济轨道。

这年，继1950年扩建和新建醴陵电瓷厂后，53年又在阳三石兴建地方国营醴陵瓷厂，从而，建立了电瓷和日用瓷的骨干企业。

1954年，为了探索经验，将私人经营的刘祥记瓷厂改组为公私合营醴陵建设瓷厂。次年，又将之同、日新、大公、泰丰等四厂改组为公私合营：之同、日新合并定名为公私合营醴陵湘醴瓷厂；大公、泰丰厂名未变。

1955年，醴陵陶瓷研究所建立，唯一健在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受聘入所，传艺育人。

1956年，醴陵对私营瓷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将31个社（组）和185户个体手工业全部并入

到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这样，城区138户合并为建设、劳动、力生、东平、协盛、华新、湘醴、光华（电瓷）等八个大户，共有从业人员2838人，全部资金925,931元；乡村区64户合并为15个大户，共有从业人员1790人，全部资金221,944元。32户土瓷生产合作社（组）的2792人，也就近并入公私合营企业。

这年，二月成立了由县人委会领导的醴陵瓷业公司；三月改属湘潭地区醴陵瓷器工业公司；四月，根据国务院（56）国四办习字第3号文件关于“原则上同意成立醴陵瓷业公司，统一管理醴陵瓷业”的批文，省工业厅请示省委同意，以原湘潭专区醴陵瓷器工业公司为基础改组成立湖南省醴陵瓷器公司，直属省工业厅领导。同时，不分经济类型，统一直接领导和管理醴陵瓷业生产，及与此相联系的瓷泥、陶画、陶瓷颜料等全部企业。

这年，5月，瓷器公司组织七个公司合营瓷厂完成了第三批120箱出口日用瓷器，揭开了醴陵生产成批出口瓷的历史一页。同时，根据农民要求消灭土瓷碗内沾脏洗不脱的无釉圈的建议，将所有土瓷逐年转产细瓷。这年，全县瓷业职工为8443人，完成产值11,142.71千元，完成日用细瓷产量56925.90千件，粗瓷39923.59千件，日用粗细瓷合计96849.49千件。完成电瓷产量2496.93吨；完成瓷泥产量19987.02吨。

1957年3月，中央轻工业部派出了以部长助理李人凤和技术司司长田银富为首的改窑领导小组，配合湖南省工业厅组织改窑工作组来到醴陵，具体帮助进行以煤和煤气代替松

柴烧瓷的改窑试点工作。醴陵有大小瓷窑120座，大多是傍山建筑逐级升高的阶级式柴窑。改窑是在原窑结构不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6月18日在建设瓷厂改造一座阶级柴窑用煤气试烧瓷器获得成功；9月和10月，用煤试烧粗瓷和细瓷的改窑工作也获得成功，随后，全县120座阶级柴窑完成了技术改造。1958年5月，国家轻工业部在醴陵召开全国改窑工作现场会，推广了醴陵改窑经验。

1958年，国家投资技术改造的基建费800万元，完成基建面积12万平方米。醴陵瓷器公司先后把20多个所属企业改建为国光、星火、永胜、力生、淅江电瓷厂、瓷泥矿，还组建了专门从事釉下彩生产的艺术瓷厂（后改名为群力瓷厂），新建了陶瓷机械厂，以及扩建和新建了醴陵电瓷厂，使醴陵瓷业逐步走向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从而，摆脱了千年来“粉碎靠水碓，干燥靠太阳，成型靠手工，烧成靠松柴”的落后局面。

这年，由于“以瓷代钢”的“左”的影响，日用瓷转产瓷质机械，日用瓷比1957年下降了5144万件，仅产日用瓷5918万件。

1958年2月10日，苏联杜廖夫颜料厂厂长玛罗卓娃，工程师维吉尔和全苏建筑陶瓷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副博士诺索娃等三位女专家来到醴陵考察瓷业。

1958年2月20日，苏联加里宁陶瓷厂厂长沙斯科、季米特洛夫瓷厂厂长格列曹夫、列宁格勒陶瓷研究所总工程师特米亚普金等三位专家来醴陵考察瓷业。

1958年3月19日至20日，越南经济代表团陈清渊、张中

四是博物部，五是教育专修科。”吴佩孚说：

“文史地部是研究文学、历史、地理的。《论语》上不是说，文学子游、子夏吗？数学理化部是研究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一类科学。中国古代很早就对数学有贡献。所说物理，我们原先说的叫格致。《大学》：致知在格物。英语都是学方言。《论语》：言语宰我，子贡他们都通方言。化学这门功课有问题，有的青年胡闹，做炸药、炸弹，伤害人命，好不好！博物是研究动物、植物、矿物、地质。

《大学》：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然的话，那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怎么行呢？教育专修科是对教与育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来研究，应该设专科。”吴佩孚不愧是秀才，言必提《四书》。

高铁民参事接着说，他这次到宜昌是衔教育部命令同武昌高师谈校长和学生代表四人前来晋谒“大帅”，正是为了武昌高师经费被财政税收部门停拨，致使高师陷于停顿，请大帅命令湖北省政府指令烟酒和印花两税局查照原案恢复拨给高师经费来完成铁民此行的任务，那就公私两感啦！吴佩孚说：“高兄，你还是

1959年6月，援建越南海阳瓷厂动工到1961年6月正式投产。醴陵派员参加了这一援建工作。

1964年，轻工业部对全国日用陶瓷工业提出了两赶（赶国内先进水平、赶国际先进水平），三消灭、（消灭亏损产品、消灭亏损企业、消灭低于历史水平的经济技术指标）的任务。醴陵瓷器公司的统一领导和组织，集中醴陵瓷业技艺精华，由醴陵群力瓷厂承担制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釉下彩瓷23万多件，被外国友人赞誉为“陶瓷艺术园里的明珠”。为国庆十五周年增添了光彩。

1964年12月，醴陵派员参加湖南省专家组开始对援建阿尔及利亚盖尔马日用瓷厂的考察和初步设计，1966年7月完成设计送阿审查。

1966年4月17日，日本访华产业代表团一行13人来到醴陵参观考察瓷业。

1968年上半年开始，到1970年上半年结束，为越南海洋瓷厂培训实习生26人，其中工程师2人，技术员3人，工人21人。（以上是根据当时参加培训实习生任彩绘教师的丁华汉回忆记录的）

1968年，醴陵陶瓷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年产20~30吨瓷用颜料车间。

1968年，醴陵瓷业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生产直线下降，据醴陵瓷器公司六个瓷厂一个瓷泥矿的统计，户户亏损，七个单位共亏损170万元，七个单位的总产值由1966年的1745万元下降到1968年的1681万元，六个瓷厂的总产量由1966年的6961万件下降到3820万件。

1972年，湖南轻工业研究所金水研究室和金水车间迁并醴陵陶瓷研究所，改建成为一个年产八至十万瓶金水车间。

1972年6月20日，以湖南为主援建的阿尔及利亚盖尔马日用陶瓷厂，由布迈丁主席剪彩投产后，到1978年底完成援建任务回国，醴陵曾派出以李维善、易美秋为组长的专家组赴阿进行技术援助。

1976年，醴陵群力瓷厂承担了毛主席纪念堂全部釉下彩瓷的制造任务，其中大花缸的直径为60公分，高42公分，由陈月发和周谷良两师徒首创大件手工拉坯一次成型的工艺新史。

1976年，醴陵陶瓷研究所首创国内瓷用钨金水代替铂金水的科研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9年，在全国质量奖评选中，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餐具茶具获得国家金质奖章；醴陵国光瓷厂生产的厚胎餐具获得国家银质奖章。

1979醴陵陶瓷研究所与醴陵陶瓷机械厂协作，首创国内半自动单色、丝网直接印花机的研制成果，获湖南省科技成果四等奖。

1981年底，醴陵42个社镇有25个社镇办瓷厂76个，共有职工5038人，总产值1599.69万元，占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的13.7%，生产各种日用瓷4143.65万件，其中出口瓷46.3万件，工业瓷1339吨，各种高低压电瓷3134吨。

1982年，全县有省属企业十家。其中：日用瓷厂六个；电瓷和电瓷电器厂各一个；瓷泥矿、陶瓷机械厂各一个，还有陶瓷研究所和陶瓷技工学校。县办陶瓷厂五个和瓷城机械

厂一个。以上18家全民职工15000余人。还有街道和乡镇办的陶瓷厂119家及花纸厂一个，生产人员8000余人。全县已有138家陶瓷企事业单位共有职工23000余人。当年工业产值为12,600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0.65%。日用瓷总产量18,116万件，占全省日用陶瓷总产的35.2%。约占全国的5%。其中出口瓷5480万件，占全省的40.82%，为全国的6.6%。

1983年，醴陵陶瓷机械厂，1972年将双刀旋坯改成双头滚压机后，一直畅销全国，被评为湖南省优质产品。

1984年，醴陵国光瓷厂生产的45头白玉西餐具又获得国家银质奖章，醴陵永胜瓷厂生产的45头醴陵牌餐具获得国家银质奖章。

1985年，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兰海棠64头餐具，在江苏宜兴全国质量奖评选中，被评为总分第一名，再度获得国家金质奖。

198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相应成立了湖南省醴陵瓷业总公司，下有八厂一矿和四个公司，共有职工10897人，固定资产为7369万元，流动资金1713万元。这年，工业总产值为6220万元，日用瓷总产量为8776万件，其中出口瓷2,734万件，换汇总额为847万美元。该公司已被列为全国309个大型骨干企业之一，是1985年国家重点支持技术改造的大型骨干企业。

1985年，湖南省醴陵陶瓷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邓文科编写的《醴陵釉下彩瓷》一书，由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醴陵瓷业的历史光辉

兼谈清末民初的武汉、南洋劝业会
和意大利、巴拿马博览会

邓文科

一、从粗到细的第一次飞跃

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瓷业始于清雍正年间。文斐^①著“醴陵瓷业考”云：“清初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之汾山发见瓷矿。雍正七年。向汾山寺僧智慧赁山采泥。创设瓷厂。并约其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二十余人共同组织。招生传习。遂为醴瓷之嚆矢”。嗣后，醴陵东、北二乡的赤竹岭、老鸦山、王仙观口、大小林桥、瓦子山、漆家坳、严家冲等地，亦逐渐推广制瓷，形成了以汾山为中心的醴邑瓷区；发展至光绪年间的全盛时期，全县有瓷厂四百八十多个。然而，从雍正己酉（1729年）到光绪丙午（1906年）的一七七年间，这些瓷厂均只能烧造粗瓷，其产品是以碗为大宗的釉下青花器。直至本世纪初叶，自熊希龄^②在醴陵姜湾倡设“醴陵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以后，醴陵瓷

业遂由乡村发展到城镇，由粗瓷发展到细瓷生产。

1906年由著名人士熊希龄倡设在醴陵姜湾的“湖南瓷业公司”，是当时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新式瓷厂^③，前七年属私股，1913年改为官商合办。该公司设有圆器厂、琢器厂和彩绘室、机械室、化验室、电气室等，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工艺较先进，制作严肃认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极为重视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因之广集人材，培育新秀，延请高手，热中研究。当时聘集在瓷业公司的彩绘艺人中，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加上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一些学员，其力量非常雄厚。那时之所以能够创造釉下五彩瓷器，并以这种瓷器为公司产品的主要特色，除学堂聘请有日本教师讲学外，上述这些美工力量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该公司一开办就主张弃旧图新，重在改良创造，因而而不满三年之久，成绩卓著，加之公司烧造的优质瓷器适应了清末民初“振兴实业，抵制洋货”的时宜，故醴陵细瓷一诞生，就像初放的香花，迎风吐蕊，芬芳四溢，几次参加国内外赛会均获得金质优奖。由粗瓷一跃为高级细瓷而驰名中外，实为醴陵瓷业的历史光辉。对此，除《醴陵县志》外，自清末至民国年间的一些报刊、实业文献中，均有不少记载，兹略举数例如下：

△“……自该公司开办以后，出品既极精良，形式花样又无不玲珑轻巧，较之前此式样，相隔不啻天壤，是以名声日隆，销额骤增至数十倍之多……。前年武汉赛会，去年南

洋赛会，均获奏奖一等第一名，得赏金牌以示优异。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湖南省瓷业进行始末记1911年4月16日《时报》）。

△“……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获得一等金牌之奏奖，以及武汉、马拿马、意大利等处先后赛会，均获得最优之荣誉”（游先理④：“醴陵官办瓷业史略”）。

△“清宣统庚戌年（1910年），瓷业学堂改为瓷业艺徒学堂，原招速成班已毕业，永久班停办，其未毕业学生送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瓷业公司开办以来，专制上等瓷器。本年参加南洋劝业会比赛，获优等奖牌。……民国四年巴拿马运河成功，开博览会，公司特制精品参加，获优等奖牌”（百中：“醴陵细瓷调查”）。

△“湖南醴陵于1907—1908年，创造高火性瓷器釉下颜料，制成多种多样的釉下瓷器。曾在本国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上参加竞赛，均获得一等荣誉奖章，名驰中外”（沈明扬⑤：《实用陶瓷颜料学》）。

△“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倡设湖南瓷业公司于北门外姜湾，用机器制造，锐意改良，成绩卓著。每年出品，岁值二十余万元，并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意大利等赛会上，均得优奖，名声日隆。当时销路，几与景德镇并驾齐驱”（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

二、几次国内外赛会的介绍

以上所节录之文献中，都分别谈及了武汉、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巴拿马博览会。究竟这些赛会是怎样一回事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于七十年代末，曾在湖南、上海、南京等几大图书馆、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下面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向大家作个扼要的介绍。

1. 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 武汉劝业会是我国首次萌芽状态的地方性赛会。自十八世纪末期法国京城开第一次工艺会以后，东西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为了繁荣商业而纷纷举行各种赛会，如英国于伦敦，法国于巴黎，德国于柏林，美国于纽约，奥国则于维也纳……，一国学一国，一国胜一国，逐渐盛行。我国东邻之日本，从一八七七年开第一次赛会算起，至一九〇九年（即武汉赛会那年）的三十余年间，就先后举办赛会五次之多。武汉劝业会，就是在当时世界各国赛会成风的影响下，由湖北地区官商所合办。因图奖励生产，助其实业进步，故曰“劝业奖进会”。会址在武昌平湖门，会期自宣统元年（1909）九月十五日至同年十月三十日闭会。陈设内容除湖北省的物产外，还设有直隶、上海、湖南等馆。当时湖南瓷业公司之瓷器赴赛武汉劝业会，经湖广总督部堂审定，获得第一等金质奖牌。赛会奖分五等：一等纯金；二等中心及“褒奖”二字金制，余为银质；三等纯银；四等正面包以银；五等纯白铜度银。此赛会为醴陵瓷器次年参加南洋劝业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南洋劝业会 南洋劝业会是我国几千年以来一次全国性的实业赛会。因清末称江苏以南沿海一带为“南洋”，又因我国当时的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不能称其为博览会，故名“南洋劝业会”，意在引起国民注重实业。会场设在江宁①紫竹林附近，自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开幕，展览六个月以

后闭会。此赛会是由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奏准朝廷，与宁、沪商界合资所举办。那时我国正是“工艺不竞，土货日绌，异货内流”之时，举办赛会是以“开通民智，振兴实业，抵制洋货”为其主要宗旨。

此赛会规模宏大，极为壮观。购地千亩，耗钱百万；规划及于全国，远而南洋华侨，外而东西友邦，亦复输运物品出赛。出品分二十四部，四四四类，计件百万；分设农业、医药、教育、工艺、武备、机械、美术、通运和京畿、暨南、参考等馆^①。此外，各省自建别馆计十四座。湘省除湖南馆外，又设湖南瓷业馆，专陈列醴陵之瓷器。开会之前，谣言纷起，一说异党会乘机起事，一说土匪将焚抢会场，人心惶惑。为此，当局调防营驻扎会外，遣兵舰戈游长江，另练临时巡警一百八十人，于会场内外分段巡查。又恰那年淫雨伤麦，米价陡昂，恐到会人多粮缺，故筹集巨款派员往江西、芜湖购运粮食，并电致广东采购洋米，分次运宁，设局平糶人心，藉以安定。至于防火、卫生、餐食等事，均备周全，使赛会能顺利开展。大会开幕，各色旗帜飘扬，“时当夏首，万物争新，内外宾旅，至者磨肩，馆院林立，广及十里，物以序陈，人颜载喜，环球电报，数且百万，欢谣载道，竞相传述，泱泱哉大国之雄风元臣之远略也”。^②

凡东西各国赛会，无不评议赏奖。南洋劝业会在展赛期间，延请人员研究，举行报告、座谈、评比会几十次之多；并颁发褒奖，以赏优胜。奖分六等：一等为奏奖，二等为超等文凭，三为优等文凭，四为功牌，五为金牌，六为银牌。当时醴陵的瓷器出赛此次盛会，荣获第一等之奏奖。

3. 意大利博览会 意大利博览会于一九一一年在意大利古都都朗举行，故又称都朗赛会。会场宏伟壮丽，与会者有欧、美、亚二十余国，属世界性之博览会。那时我国正值辛亥革命之年，然全国各省市仍纷纷赴赛，并荣获优奖两百多枚。此赛会奖分七等：一为卓绝奖，二为最优奖，三为优等奖，四为金牌奖，五为银牌奖，六为铜牌奖，七为纪念奖。湖南瓷业公司的瓷器获得此赛会的最优奖（二等）之荣誉。

4. 巴拿马赛会 巴拿马赛会是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之巨工告竣，于一九一五年二月至同年十二月，在太平洋西岸，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之旧金山所举行的一次“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美官商共耗资一千七百万美金之巨款，会场盖在其地港口，面积为六百二十五英亩（近中国四千亩），占金门海湾岸线一万五千英尺（近十华里长）。与会者三十多国。除会场设机械、工艺、制造、转运、教育、文艺、美术、矿产、农业、园艺、食品等二十个馆外，美国各州自建会亭和各国自建政府馆又五十多个。会场建筑宏奇，园地清雅，观会者十九兆数万人，实为世界空前之盛典。

此博览会设想于一九〇四年，一九一一年开始筹建，当年十月美国总统塔夫脱躬行兴工奠基典礼，一九一三年由美官方公布于世界各国，风声传播，中外宣腾。为征集物品出赛，我国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始，中央设专局（巴拿马赛会北京事务局），各省设协会。一九一四年各省协会先后开幕展览，随后审选包装，于同年冬分两次放洋，计赛品一千五百多吨。中国此次赴赛，为太平洋东岸之卓越者，物产之繁

富，出品之精美，入览者无不爽心悦目，同声称许，故得奖一千二百多枚（一为大奖章，二为名誉奖，三为金牌奖，四为银牌奖，五为铜牌奖，六为奖词）。

会场各馆，几乎都有湖南之赛品。湖南的器瓷分别陈列在工艺、美术两个馆。一九一四年下半年，北京事务局致函湖南醴陵瓷业公司征集出品，仅数月之光景，公司能踊跃赴赛，并荣获巴拿马赛会之优奖金牌，这决非临渴掘井之劳，而是几次参赛胜利之后，与基础之雄厚和制作热情更为高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述几次赛会之胜利，反映了当时瓷业公司的成就，标志着醴陵细瓷业第一个光辉时期。

三、历史上的光辉是前人之业绩。

在那群魔乱舞，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本来难以维持的醴陵瓷业，其作品却能四处赴赛获优奖，一跃于海内外蜚声称誉，其原因何在呢？除前所述那时瓷业公司强图改良，其宗旨正值时宜等因素外，最主要之点是该公司的产品优良，装饰精美；尤其是创造了釉下五彩新工艺所烧造的瓷器彩色缤纷，晶莹润泽，清雅明快而别具一格，因之在国内外产生了魅力，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一九一〇年南洋劝业日报一论者撰文称道：“……前年春，偶游湘中，见该省所出之釉下花瓷器，不仅青、红两种，且千门万类，各尽其长，不禁惊奇叫绝……。及至来会参观，见工艺、美术两馆，莫不有湖南之釉下花瓷器，其色泽之鲜明，绘画之精致，更较前进步，且有新发明。紫色黑色两种及釉下刷花，犹觉枚枝叶

叶，秀色可餐；把玩之余，令人不忍释手。及至该别馆，则琳琅满目，无一非釉下花瓷器。且陈列既多，而绘稿竟无一同者，实为异点”云云。此文是一篇目睹当时现实的记录，类似这样评述醴陵瓷器的文章，在清末民初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又何止一篇。可见那时釉下彩瓷的工艺水平之高，装饰效果之好和花色品种之丰富。从遗留下来的作品看，尽管那时的题材内容不及现在广泛，瓷质白度和色料品种也比不上今天的水平，但它的格调却显得雅典大方。所制花瓶等陈设瓷，造型庄重，画工老练，纹样潇洒，线条遒劲，色彩沉着，给人一种，淳朴的美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同清代后期我国那些繁缛堆砌、纤巧柔弱的釉上花瓷相比，是大不一样的。

历史上的光辉，是醴陵瓷业过去之荣誉，是前人所创之业绩。因此我们应当学习他们那种重视人才，热心研究，不甘落后的好传统和为瓷业、为民族争光的可贵精神；而决不是拿历史光辉来夸耀，也决不能以此而骄傲。

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醴陵瓷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如果把醴陵细瓷业在清末民初间的成就确认是第一个光辉时期，那么，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就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历程。然而，在新中国里，各行各业的发展是你追我赶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各兄弟产区在工艺上不断进步，在创作设计方面更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时候，回顾一下历史，叙述一下前人的业绩，也许能促进醴陵瓷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

注 释

①文斐，字牧希，醴陵东乡土步桥人，清附生。光绪乙巳年(1905)留学日本东京铁道学校，与焦达峰同学友善，共入同盟会。归国后，历任醴陵渌江中学监督、湖南铁道学堂教务长等职。民国三十二年卒于里第，葬入西山。所著“醴陵瓷业考”节载于《醴陵县志》民国版卷六食货志。

②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光绪壬辰科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二等参赞官、江苏及奉天农工商局局长、湖北交涉使、东三省财政监理官、东三省盐运使、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参议院参政、督办全国煤矿事宜、湖南宣慰使、平政院院长、湖南赈务督办、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国民政府服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见《最近中国人名录》)。

清光绪年间，熊希龄东游日本，见其工业发达，产瓷精美，心窃慕之。回乡后，为振兴湖南瓷业，于1905年四月杪，与醴邑文绅俊铎等人，束装共赴浏山、东堡等地进行考察。熊笔曰：“希龄此次往游浏山，与文绅等宣布德意，窑户工人皆恍然于新旧之利害，无不鼓舞同声。所经过之处……，围观延宽，络绎于途，似人心见解豁然贯通，实可为之因势利导也(节：“熊希龄禀请湖广总督端方设立瓷业公业呈文”)。通过实地调查，熊总结了当时粗瓷业存在的九个问题，弄清了发展湖南瓷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明确主张，为醴陵瓷业的发展和釉下彩瓷的创造，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

文俊铎，字代耕，醴陵东堡人，光绪辛卯科举人。1898年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文是积极的追随者。后因“戊戌变法”失败，文自是隐居不出，致力于桑梓要公。光绪丙午年，熊希龄创办“湖南瓷业学堂”于醴陵，文俊铎任该学堂监督。

③见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1963年版219页。

④游先理，原瓷业学堂速成班学生，1931年任醴陵瓷业民利公司经理。他与沈明扬等人，是几次赛会的亲身经历者。

⑤沈明扬，前系湖南轻工研究所工程师，于1964年病故。清末初入醴陵瓷业学堂，后于湖南高等实业学校毕业，1917—1924年，沈曾任湖南瓷业试验场副场长、场长及湖南瓷业公司技师等职。

⑥江宁即现在之南京；简称宁。

⑦暨南馆，即南洋群岛各华侨陈列馆；参考馆，即国外产品陈列馆。

⑧引自《南洋劝业会纪念册》第一辑序言。

⑨见《南洋劝业会研究报告书》第12—13页。

参 考 资 料

- 1.《醴陵县志》民国版卷一、卷六、卷九。
- 2.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
- 3.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
- 4.张廷海辑：《奏办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报告书》。
- 5.《南洋劝业会游记》宣统二年出版。
- 6.《南洋劝业会观会指南》宣统二年出版。
- 7.“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八卷十号。
- 8.“意大利万国博览会游记”《东方杂志》第三卷八号。
- 9.《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商务印书馆编。
- 10.《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第一、二册。
- 11.“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闭幕后之确情”《中华实业界》第四期。
- 12.《时报》和《中华实业界》、《东方杂志》、湖南《实业杂志》各期。

建国前醴陵瓷业的经济关系

刘 建 兴

醴陵瓷业，在我国瓷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算是后起之秀。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出版的《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瓷业始于清初雍正七年（1729年），当时有广东兴宁人廖仲威，于邑之洸山发现瓷泥矿，乃向洸山寺僧智慧租山采泥创设瓷厂。不过，关于醴陵瓷业的起源还存在另一种看法，即认为明朝末年醴陵就有人烧制粗瓷了，首创人为江西樊进德，始发地为王仙观口。除此之外，醴陵瓷业的起源，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可资考证。现今大多数文章中关于醴陵瓷业的起源，均引自《醴陵县志》，而县志又是以文斐的《醴陵瓷业考》一书为根据。至于文斐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则不得而知。从目前接触到的有限的资料来看，我们认为《醴陵县志》中的说法似乎可靠一些。

醴陵瓷业起源问题，说法不一，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从雍正七年到光绪期间的一百多年，关于醴陵瓷业问题，未见到文字记载，现今所有记述醴陵瓷业的文献资料，均出自光绪以至民国年间的人士所作的记载考证，如文斐、文俊铎、傅熊湘等人即是。时至今日，对前人已有的记述材料，

加以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系统归纳，使之成为博采众家之长、融诸材于一身的醴陵瓷业发展史，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了。

自雍正七年醴陵瓷业产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两个多世纪中，中国不仅结束了封建社会，而且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又经历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时期，醴陵瓷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是缓慢的，它长期以手工工具、手工劳动为主。从现有不完整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与这种生产力状况相联系，解放前的醴陵瓷业生产，长期存在着个体的商品生产关系。从清末开始，还出现了不完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又有官商合办的和纯私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个体的商品生产

生产瓷器的个体经济，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小商品经济。

关于醴陵瓷业中的小商品生产的情况，历史资料是极少的，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不过，从零散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察觉瓷业中的小商品生产，在解放前，始终都是存在的。它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从事瓷器生产全过程的个体户

瓷器生产的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练泥、制坯、烧窑、彩绘等几道工序。完成这些工序既需要有设备，又要求有技术，如练泥须要粉碎瓷泥的工具，制坯须要将瓷泥拉成瓷坯的手段，烧瓷须要有窑炉。有的工序，虽然不须要添置什么设备，但对技术和艺术的要求却较高。没有一定的艺术水

平，就不可能在瓷器上画出象样的山水、虫鱼、花草、人物来；掌握火候的技术不熟练，就烧制不出高质量的瓷器来。

上述情况决定，凡从事瓷器生产全过程的个体户，除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现有材料表明，这种个体户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产品的品种少、质量低。1941年王彦在《醴陵瓷业调查》一文中说：“醴陵产瓷，始于雍正初，……不数年，扩展至数十家，但均系碗、碟、坛、罐等粗瓷。”

（《湖南省经济丛刊之十》）粗瓷又称土瓷，它与细瓷相比，瓷泥原料含杂质多些，做工技术低些，所费资金少些，每道工序的分工不明显，而且只有釉上青花一个品种。更重要的是，粗瓷器皿作好坯后没有匣钵盛着，而是直接置于柴窑中烧，因此，产量不多，质量较低，销路也不广。

第二、发展速度慢、起伏大。从清雍正年间至民国三十二年土瓷生产个体户概况是：清雍正年间（1729～1735年）40多户，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100多户，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480多户（产量20万担），民国十八年（1929年）100多户，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30多户，（产量10万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18户，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数十户。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醴陵个体户生产土瓷的最盛时期是清光绪十八年，即甲午战争前夕。同时，在这二百多年中，个体土瓷生产的发展速度不仅很缓慢，而且有较大的起伏性，它在一定时期内上升较快，由100多户增至近500户，过一个时期，又降到100多户甚至几十户。

第三、既有少量雇工，又受商人盘剥。经营瓷业生产全过程的个体户，由于从练泥到出成品，工序很多，技术复杂，任何一家一户都承担不下制作的全部工作。仅烧窑一项，据统计，一窑土瓷须连续烧火几十个小时，要三至四人送柴入窑，还要一至二人劈柴。解放前夕，县城姜湾的八个个体户中，全都雇有四至十个工人。

有点剥削，是否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呢？不能这样认识。因为这种雇有帮工的个体户，家中的主要成员一般都参加技术性强、对生产瓷器起关键作用的劳动。同时，这种个体户雇工并不多，剥削量也不大，不能算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分子。

雇用帮手的瓷业个体户，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它一方面在生产中雇工，无偿占有少量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里，却又受商人盘剥。

生产和流通（狭义的交流，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其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或流通。但是，交换也反作用于生产。醴陵土瓷个体户生产的盛衰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瓷器市场的影响。因为个体户生产的瓷器是商品，都必须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使瓷器转化成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再生产瓷器所必须的泥、釉、颜料、松柴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再生产顺利进行。可是，醴陵瓷业的个体户，多数分布在农村，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本小力薄，他们生产的瓷器，自销相当困难，一般都是直接将产品卖给专做瓷器生意的商人，再由商人运到市场上去出售。

当时，收购瓷器的商人不少，十九世纪下半叶，曾出现了作瓷器生意的专业公司——华昌公司和美兰公司。据记载：“华昌公司，集资数十万，向窑户自由购销产品。”后来，“客商纠同行组美兰公司，与华昌为敌，互相竞争。”在市场繁荣、销售顺畅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多先付款，后提货。”即提前向个体户交钱定货，等待瓷器销售旺季到来时再取货。反之，当市场不景气时，“客商则停止先付钱”，而且“又议定在付钱时，先定价，并压低价格。”这种欺压盘剥之法，个体户却无力反抗，只好逆来顺受。“结果，窑户日陷困境，濒于破产。”（以上均摘自王彦的《醴陵瓷业调查》）

二、专业个体户

所谓专业个体户，就是专门从事瓷器生产某一道工序的劳动者家庭。

随着瓷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细瓷产品的出现和逐步增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醴陵就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瓷器生产某一道工序的个体户。这些人中，有的是失了业的瓷业技术工人，有的人是本钱少，自己没有能力建窑、烧窑，更不可能单独经营瓷器生产的全过程。但是，这些人一般都具有做坯、制釉、绘画等一两项专门技艺，为了维持生活或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他们便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发展自营的专业户。

这种自营的专业个体户，当时主要有两种形式：

1. “搭烧户”。“搭烧户”的意思是：会做坯的技工，各自在家里做成各种瓷坯，然后向拥有瓷窑的窑主租一块窑

位，将瓷坯置入租到的窑中烧成瓷器。《县志》曰：“附近技工单独制，家中妇孺老弱同工作，出品附厂家窑中烧，谓之“搭烧户”。“搭烧户”租到窑主的窑位后，“匣钵、装窑、出窑一律自理。……窑位只能租用前三级，每级宽一尺，专烧小器用，后七级则每级宽六尺，烧大器用，不出租。”（王彦《醴陵瓷业调查》）据《县志》记载：1944年在商会登记的窑厂是49家，而集中在县城一带的“搭烧户”却有100多家，500多人。1940年的产值约150万元左右，占全县细瓷年总产值的20%上下。

2.“彩花红店”。“彩花红店”是“一般瓷店或陶画工人买进土、细瓷白胎后，搞绘画题词，并入红窑烧之。”

（王彦《醴陵瓷业调查》）也就是说，它是专门从事彩绘的专业户，据1940年统计，这种专业户在县城姜湾一带就有77家，165人，年营业额近49万元。

官商合办的资本主义生产

醴陵的瓷业，除长期存在大量的个体商品生产关系外，到清朝末年，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现有材料看，醴陵瓷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时间上，不仅比本地其他工业的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得晚，而且也晚于同行业的景德镇。在内容上，也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一方面它的生产力不发达，另一方面它的封建性还相当浓厚，我们把它称之为不发达、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这种不发达、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类型：官商合办的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官商合办

是醴陵瓷业中最早产生的一种资本主义关系。它的集中代表就是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醴陵姜湾成立的“湖南瓷业公司”。

一、“湖南瓷业公司”是怎样产生的？

瓷业公司是醴陵瓷器生产的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它成立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有些材料说是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有些材料说是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前后相差一年）。这个公司是由清朝四品官、湖南省凤凰县的熊希龄倡导创办的。它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

光绪末期，也就是二十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为了高额垄断利润，必然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早在帝国主义形成以前几十年就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大物博的中国，当然更是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一块肥肉。在这个时期内，它们大量向我国倾销洋货，从1873~1903年，洋货进口总值由103万元增至503万元，增长了近四倍；进口商品的种类也大增，除洋铁、洋钉、洋油、洋灰等等外，从中国学到制瓷技术而制作的西洋瓷器也打进来了，瓷器发源地中国的瓷业市场，竟有逐步被帝国主义挤占的危险。

为什么从中国学到制瓷技术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瓷器，能压倒古老的中国瓷器呢？根本原因是它们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依靠这些优势，它们在瓷器生产中，用机器练瓷泥、做瓷坯，以代替笨重的手工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用化学方法调配釉药、颜料，以提高产品

质量。因此，它们生产的瓷器，堪称价廉物美。可是，“查醴陵瓷业从前本极粗笨，仅能制造极粗泥碗，一与陶器无异，其销场亦仅销及各穷乡僻壤为止，而省城不与焉。”（1911年4月16日《时报》刊载的《湘省瓷业进行始末记》）。

醴陵的瓷器，在二十世纪初期，不仅被外国资本主义排挤，而且大大落后于景德镇，甚至赶不上江西的萍乡瓷。

“因江西萍乡，……近又雇佣景德镇工人两名，加工制造，比醴陵稍精，故醴陵贸易遂为所夺，日见减色。”（《中国近代工业史》第三辑第350页）醴陵瓷业“倘再因循不改，恐将此粗货一宗，亦将尽归萍乡商人之手，数千人所仰赖之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同上）

以上情况说明，二十世纪初期，醴陵瓷业已经陷入极端穷条境地。然而醴陵瓷土的蕴藏量却很丰富，土质也较好，瓷土产地较多，遍布东、北、西三乡。怎样才能利用和发挥醴陵瓷土丰富的优势，生产出价廉物美的瓷器来呢？唯一途径是采用先进设备，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瓷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有大量资金购买机器、雇请技师，而瓷业的个体“各窑户资本不足，每家田财不过数百串钱，难以延请上等工人、制造新式”（《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50页），更无力量添置先进设备。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光绪末年，熊希龄便“呈请湘抚端方，筹措善后库银一万八千两，创办瓷业学校于醴陵。”不久，又“招足股本五万元，组织湖南瓷业有限公司。”（《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47页）从此，湖南瓷业公司便应运而生了。

二、湖南瓷业公司的概况和发展过程。

瓷业公司成立之初，完全是私人资本。《湖南地理志》记载：“湖南瓷业公司，熊氏所发起，初属完全商股，后始加入官股，股本儿达50余万元。”1919年11月3日长沙《大公报》载：“公司的资本系由各巨商富绅招股而来的，……先后股东约百余人。”它主要采用登报招股的办法，逐步增加其资本。

瓷业公司开办时，“由熊希龄任总理，其设备有园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验室等……。”（1934年12月24日《晨报》）“雇日本技师，用机器制造。”（《湖南地理志》）同时，除将瓷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派到公司服务外，还雇请景德镇瓷工师傅授艺。“以瓷校生徒，入厂制造，又招集景德镇瓷工，教授镇瓷琢器……有工人约二千名。”（傅熊湘著《乡土志》）此外，公司还在长沙、湘潭、衡阳、益阳、常德、醴陵等地设置了六个承销处，垄断瓷器销售业务。

一年以后（即1907年），熊希龄辞去公司总理职务，出任奉天财政正监理官，到东北当官去了。“总理一席，即经公举营口大清银行总理直隶后补道罗怡继任（作者注：即罗惠章）（1911年4月16日《时报》的《湘省瓷业进行始末记》）“因罗绅惠章，所占的股份居过半数，那时就推罗为总办，沈象乾为坐办。”（1919年11月3日《大公报》）但是，由于罗管理不善，“又任用非人，致开支浮滥，仅一年，净欠大清银行债银十六万余两，罗氏去职，以龙璋继之。”（见1934年12月24日《晨报》、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47～357页）。

龙璋于1910年上任以后，对公司进行了整顿，瓷器生产又日趋繁荣。1911年4月16日《时报》报导说：“龙接办后，以该公司销场日广，而原有各窑及各工厂均不敷展布，所出物品恒不能应多数买主之取求。”正在这时，趁熊希龄回乡之便，乃召开股东扩大会，拟新招股洋80万元，增加资本，扩大生产。根据股东大会决议，“龙即一面大兴土木，新建工房四十余间，加造新式瓷窑一座，就近购置地皮四千方丈，并新雇工人一百多名。”（同上）

为了确保公司增加资本，扩大生产，在决定新招股东的同时，熊希龄还“以各国工业均由国家补助，得以日渐发达”为由，遂要求满清政府每年“补助该公司银一万两，以资津贴。”（1911年4月16日《时报》）但时值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不定，以上扩股和资助的两项要求，都未能成为现实，因而瓷业公司被陷入困境。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公司便发生了变化，一说是：“此时湖南实业厅长刘承烈出来维持，并参进公股10万元，改名官商合办湖南醴陵瓷业有限公司，复举常少璜任厂长。”（1919年11月3日《长沙大公报》），另一说是：

“民国二年，经省议会议决，由省库拨付十三万七千五百元，合银十万两，将该公司股票扫数收买，名为官商合办，实际已无商股，由前实业司司长刘承烈自任总理，并组织董事会。”（1934年12月24日《晨报》）以上两种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一个认为是政府“参进公股10万元”，使瓷业公司成为官商合办企业；一个则认为是政府拨银十万两，“将该公司股票扫数收买”，使瓷业公司成了纯粹的官办企业，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原来全系商股的瓷业公司，辛亥革命后，新添了官股成分。瓷业公司渗入官股以后，“经理二年，颇收成效。”（1919年11月3日《长沙大公报》的《省城窑业调查记》）资本计四十余万元，厂屋七百余间，有模型、辘轳、制坯、和泥、上彩等分厂（即车间）四十个，工人六七百名，正窑三座，每窑高一丈，宽一丈五，深约三丈多，窑之四周为抛物线形窑门，约宽一尺多，另还有洋窑二座。所产瓷器销往湘、鄂、苏、皖、汴鲁等省（《中华实业丛报》第15期《记事》1914年7版孟幼庵《醴陵瓷业工厂调查记》）。

但是，好景不长，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军阀张敬尧部张宗昌、李传业的军队，经过醴陵，到处烧杀，次年《大公报》报导说：公司“仅仅留下一块地基而已。”1920年12月25日《大公报》报导的更为具体：“所有窑炉、机械、瓷器、物料、器具概受损失，共计值洋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三元。此外流动资金，因蒙币值影响，消灭殆尽，数达一万余金……。”至此，“该公司乃整个倒闭。”（1934年12月24日《晨报》）。

面对这一局势，公司只好将所属二厂分别租给私人生产，以暂敷残局。第一厂派朱眉为理事，暂由各承销商垫款买柴专烧瓷坯；第二厂则由常先（少璜）组办，每窑收租金十四块银洋（1920年12月25日《大公报》）。

七年后的1926年，各债权人与湖南瓷业公司董事会订租约，租公司第一场开业，名曰“新纪湘瓷公司”。1931年，原瓷业学堂学生、公司工人“游先理、胡绍斌、谭克如、吴

家邦、文星楼等，乃集资四、五千元，向建厅承租第二厂为利民公司。”（1941年1月王彦《醴陵瓷业调查》）从此，官商合办或官办的瓷业公司，变成了官有私办或出租企业了，一个成了几个。

以上瓷业公司的发展概况说明，瓷业公司成立二十年来所走的路程是曲折的：商办（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官商合办或官办——官有私办。总之，公司中的私人所有成份是逐步减少的，最后完全被国家所有取代。

三、瓷业公司的性质和作用

瓷业公司虽然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它的成立毕竟标志着醴陵瓷业的生产关系产生了新的因素——资本主义。瓷器生产除小商品生产外，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瓷业公司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股份公司，生产资料开始时属一些资本家所有，年终按股份大小分红，1913年转为官办后，那个时候的“官府”，不再是满清皇朝，而是中华民国了，不过在当时，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还远未形成，官办的瓷业公司既不是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所有，也不是如恩格斯说的“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资本家”所有。但是，它“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18页）另外，瓷业公司雇佣工人的数量不是少数几个，而是少则几百多达二千人，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公司生产的根本目的。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优越于小私有制。瓷业公司这个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使瓷器面目焕然一新。公司除设备齐全、分工较细、用机置制作和用化学方法分析测定原料外，还很注意广集人才、延请高手、培养新秀，很重视研究和改进技术，当时湖南地区不少书画能人和瓷业学校毕业的学生，纷纷被聘请和输送到公司服务，形成了一支较雄厚的技术力量。

先进设备和精湛技术相结合，醴陵瓷器很快就出现了两方面的巨大飞跃：

首先，从粗瓷产品飞跃到细瓷产品。自雍正己丑（1729年）到光绪丙午（1905年）的近一百八十年间，醴陵的所有瓷业生产户都只能烧制粗瓷，产品多系大小碗碟，人称这种瓷器“与陶器无异。”公司成立后，很快改变了这一落后局面，使醴陵第一次生产出了细瓷产品。粗瓷和细瓷虽只一字之差，但却有重大差别：在质量方面，细瓷品质极优于粗瓷，主要在于烧窑以前，瓷坯被装入由耐火材料制成的匣钵中，再放置窑内间接煅烧，既免烟尘污染，瓷器上下左右之间也不致互相粘连损坏。在品种方面，粗瓷因设备技术落后，“仅能制造极粗泥碗。”而细瓷种类繁多，一般有园器、琢器、模型、辘轳四类，园器指碗、碟、杯、羹之类；琢器指坛、壶、帽筒、饭匙之类；模型指人物、飞禽、走兽等工艺美术品；辘轳指杯、缸之类。

其次，从釉下青花飞跃到釉下五彩。瓷器的质量，除有粗细之分外，还有彩绘水平高低之别。粗瓷细瓷好比人才，彩绘图画则有如打扮，傅熊湘说：“三分人才，七分打扮，

瓷之良否，视釉明暗。”（《乡土志》）彩绘艺术如何，对瓷器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

在瓷器上绘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烧好了的瓷器上绘画，谓之釉上彩；釉下彩即在瓷坯上先绘画，再上釉，后入窑烧。开始时的釉下彩属单色的釉下青花，“早在唐代就已开始了青花瓷器的制作。”

（《中国陶瓷史》第342页）青花瓷器的出现，是工艺上的一大进展。它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白底兰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十四世纪前后，青花瓷器的制作在景德镇就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誉满全球。1907~1908年，湖南瓷业公司成立不久，则进一步发展了釉下彩色瓷器。

湖南瓷业公司生产的釉下五彩细瓷产品，画工精美，彩色缤纷，晶莹润泽，清雅明快。1910年南洋《劝业日报》称道：“前年春，偶游湘中，见该县所出之釉下花瓷器，不仅青红两种，且千门万类，各尽其长，不禁惊奇叫绝……。及至来会参观，见工艺、美术两馆，莫不有湖南之釉下花瓷器，其色泽之鲜明，绘画之精致，更较前进步，且有新发明。”（《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部丁第12~13页）瓷业公司以这些优质产品，先后参加1909年在湖北武汉举行的地方性的劝业奖进会，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实业赛会——南洋劝业会，1911年在意大利古都都朗举办的意大利博览会，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分别获得第一金质奖牌、第一等之奏奖、最优奖和优奖金牌。从此，醴陵瓷器名扬中外，“于是中外皆知有醴瓷

矣。”（傅熊湘《乡土志》）同时，“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1911年4月16日《时报》）。

湖南瓷业公司最后固然倒闭了，但它给醴陵瓷业经济播下了资本主义的种子，并促使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醴陵瓷业中产生和发展，从而带动了全县的瓷器生产。

私人资本主义生产

醴陵瓷业中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湖南瓷业公司的影响下出现的。它始于宣统二年（1910年），当时的民间商人集资办厂，生产细瓷。官商合办的瓷业公司倒闭后，它又逐步有所发展，作为瓷业中的一种经济成份，一直存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

一、私人瓷厂的发展概况。

私人瓷厂以生产细瓷为主，这类瓷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末民初至抗战前夕，是为发展初期。当时私人资本开办的工厂中，一般有泥库一个、制坯工场三间、仓库一个、瓷窑一座，另加一个伙房。每个制坯工场有工人八名，分别从事做坯、印坯、利坯、挖坯、装坯、修坯、上釉、打杂等各种劳动。一座窑则须要三十多人（一天三班，一班须四人烧火、二人劈柴、二人做坯、一人制釉、一人做饭。）民国四至十九年（1915~1930年），全县制坯工场142个，做坯工人1136名，其他窑工、匣工、杂工等约200多人，共计1400多人。这个数字说明，当时私人资本的做量少，瓷厂的规模也小，瓷窑不过八、九座。另外，瓷厂

还分布得很散，除县城东区、姜湾外，远离县城的青泥湾、汾山、涑口等地也有。

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私人瓷业公司发展到了17家77厂，其中姜湾9家、城东2家、汾山3家、涑口3家；瓷窑增加到30座，工人增至6160名。著名的有新记、厚德、楚利、九如、改良、德山、舜业、和记、中和、民利等公司。

〔王彦《醴陵瓷业调查》民国二十九年（1940）12月〕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为醴陵瓷业的繁荣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各省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内迁，有钱的官僚、富户等纷纷逃到内地。一时西南地区的人口骤增，购买力大大提高，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很快。日用瓷器（如餐具、茶具等）是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但是景德镇被日寇占领，内地对瓷器的需求，基本上靠醴陵供应。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醴陵瓷业则于抗战中期（1940年左右）获得了空前发展。较有名的大瓷厂有裕华、模范、民利、阜南、新盛祥等，瓷厂规模扩大了，细瓷窑发展到80多座，技工8048人，间接为瓷器生产服务的劳动者达一万二三千人。年产细瓷十万担，年产值土瓷计209万元，细瓷计766万元。（①1940年12月王彦《醴陵瓷业调查》，②1958年《醴陵的瓷业》）

第三阶段：抗战胜利至醴陵解放（1945年9月～1949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迁到内地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及逃难者，陆续返回江浙一带，著名瓷都景德镇逐渐恢复生产。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一次背信弃义发动了内战，从此醴陵瓷业乃

由兴盛走向凋零，发展很缓慢。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全县细瓷厂达79家，但到1949年初，仅增加17家，与抗战时期相比，1949年的瓷窑数虽由80多座增至480余座，但就业工人却由8000多减至2500名左右。

二、私人瓷厂的特点。

私人瓷厂与官商合办的瓷业公司比较，二者具有共性，如皆拥有资本，厂主经理和职工之间的关系都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均实行工资制，生产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剩余价值等。总之，二者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但是，私人瓷厂比起官商合办或官有商办的瓷业公司来，却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1. 在生产方面，它的生产技术还停留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前面曾经说过，由熊希龄倡导创办的瓷业公司，聘请了几位日本技师，进口了一些机械设备，在主要工序上实行了机器生产。可是，私人瓷厂的生产，只不过是较大规模协作基础上的手工操作，即资本家把具有不同手艺的劳动者联合在他的瓷厂里，实行分工协作，用手工共同生产瓷器。在那里，加工瓷土靠碓舂水淘，成型制坯靠人力辘轳，烧窑靠手塞柴禾入窑，厂房简陋破旧，工艺原始落后。

为什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技术还赶不上二十世纪初期的瓷业公司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私人瓷厂没有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权机关在经济上的资助，也就是它没有官办因素，所以，每个瓷厂的资本量微薄，生产规模狭小。据有关资料统计，解放前夕，没有一个私人瓷厂建有十个窑的，雇佣50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在

85家中也只有9个，仅占10%，拥有1000万元法币独资经营的工厂只一家。更重要的是，当时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程度。1946年4月，一个银元可折合法币2128元，但是，两年多后的1948年8月一个银元折合法币则猛升至452.6万元（《编辑工作手册》第210页）这个资本量与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相比，虽然力量是薄弱得多的。因为瓷业公司开办时拥有的十万元资本，都是硬通货（从国外流入，在国内流通的银元），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值钱无比。

2.在资本家的成分和资本的来源方面，湖南瓷业公司开办时，“资本系由各巨商富绅招股而来。”（1919年11月3日《大公报》）如拥有一万元的大股东袁伯葵，就是袁树勋的大少爷。又如占公司股份的一半、曾一度任公司总办的罗惠章，原来就是一位绅士，由这些巨商富绅积聚的资本，本身就是剥削所得，就是能为股东们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然而，私人瓷厂厂主的成分大不相同，根据对96家厂主的调查，其中竟有53户系工人出身，由劳动者转化来的，占全体厂主的55%；纯属商人办厂者仅9户，所占比例还不及10%。这个情况说明，一方面每个瓷厂的资本量不可能很大；另一方面，这些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并非剥削收入，而是劳动所得。

3.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瓷业公司一般只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但是，在私人瓷厂中，除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外，还有封建性的行会、帮派关系。

行会本是封建社会的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小商品经

济的利益和防止竞争而建立的封建性组织，它是按行业组织的。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行规，明确规定了产品的数量、质量、价格、劳动时间等等，参加行会的手工业者都必须严格遵守。在行会内还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分师傅（行东）、帮工、学徒等三个等级。行会也是保证行东进行剥削的一个组织。这种行会制度，在中国从七世纪唐代起就产生了，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夕。醴陵的私人瓷厂，虽属资本主义性质，但它保留有细瓷窑业同业公会、细瓷商业同业公会等组织。

这些公会以维护全体瓷业职工的利益为名，实际上是代表厂主利益、为厂主利益服务的组织。资本家利用公会组织，强制工人牺牲自身利益，甘居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所以，它与建国后的工会组织，有本质区别。比如1947年8月17日，细瓷窑业同业公会制订了一个“劳资合作分资办法草案”，共十五条。其中第八条规定：“劳资双方所得成品，以百分法比例分配，劳方得30%，资方得70%。”第十二条规定：“劳方工资，务候瓷器出售后方可给领，不得要求资方垫给或贷款。”

醴陵瓷业中，除行会组织外，还长期存在带地方色彩的帮派对立——醴陵帮和江西帮。醴陵瓷器的历史晚于江西。醴陵的制瓷技术，据说也是由江西人传授的。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还曾“招集景德镇瓷工，教授镇瓷琢器。”（傅熊湘《醴陵乡土志》）

但是，“江西景德镇私规最严，不准工人用于他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50～354页）即使景德镇的工人受雇于外省，也抱团成帮，实行技术保密。久而久

之，醴陵瓷业中的景德镇工人便和本地职工形成了两个帮派——江西帮和醴陵帮。在这两帮中，后者人多，前者人少；后者的制瓷技术却逊于前者。于是，江西帮工人则利用技术优势，采取垄断和保密措施，阻挠醴陵瓷器质量的提高。如“传景德镇承办御窑，可用红绿彩色，他省不准仿办，故醴陵瓷业者不敢设法改良。”（同上）很明显，这种帮派不利于改进瓷业技术，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相反，倒有可能使资本家利用这两帮的矛盾，以加强剥削。

4.在工人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方面，一般是两种形式同时并存。

①工资制。雇佣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是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在醴陵瓷业中，工人劳动力价值除勤杂等工种实行计时工资外，技术工人多采取计件工资形式。抗战时期称之为“以货计值”。“做工画工按板计酬，一板0.2元，每板大碗28只、中碗32只、小碗36只，一天约可做6~10板，日工资为1.2~2元（王彦1940年12月《醴陵瓷业调查》）由于瓷器品种极其复杂，既有园器、琢器、鲜花器等等之分，在园器、琢器、鲜花器内部又各有许多品种，所以，瓷器行业的工资非常复杂。

1946年印刷的《瓷谱》关于《醴细瓷业协议规程》基本上是谈工资的文件，共42条，每条还有不少细则，试举二例说明：

（一）烧窑工的工资是“每烧一次，包满包出，工食洋15元，每元加0.16元，合计每次窑工食洋17.4元。……烧窑时如系三节在厂做工，可在厂餐食、节酒。”

(二) 做匣钵的工资是，大器匣钵工价每担240文，小器匣钵工价每担260文。

在计件工资中，除货币形式外，还有采取实物形式的。拥有资本最多的“协圣”瓷厂，直至三大改造前，还实行以碗计酬的实物工资。这种工资称之为“长窑”工资。即“以作一千板坯给多少筒碗作工资”或者“以伙食津贴为名，每作24板坯为一个伙食位子（一个伙食伙子给多少筒碗）。如未完成一个伙食位子，则伙数扣除。”〔县档案馆(54)042〕工人按做坯多少领取碗作为工资，然后按当时市价将碗折成钱，转化成货币工资。

(2) 节日“酒例”制。这实际是工资外的津贴。它不定量，有时多，有时少；有的厂多，有的厂少；但每个工厂在每年旧历逢年过节时总是照例不可缺少。中国旧历的节气颇多，几乎月月有节，因此，差不多月月有“酒例”。二月工厂开工、三月清明、五月端午、七月中元、八月中伏、九月重阳、十月冬至、十二月停工日等都有“酒例”。（瓷厂一般是一、二、腊月停工，因冬天泥冻、手冷，不能做瓷坯）“酒例”的形式也不少；有的送实物如油盐等；有的请吃饭、吃点心；有的送红包（红纸包钱），一人一份。下面是几个工厂和工种的“酒例”，（《瓷谱》醴陵瓷业协议规程）

(一) 琢器厂工人例规，共九次：

第一、伙食公司备办：油一斤，盐一斤四两，菜900文（10=1分），初一、十五神福肉，每次四两。

第二、开工时，红包钱每人400文，另备瓜子、酒、面

等，菜随点，二人一盆。

第三、清明节，酒钱每人400文。

第四、端午节，在公司者，酒席、包子、粽子、盐蛋等，不在公司者，酒菜钱每人五角。

第五、七月中元节，每人酒钱五角。

第六、八月中秋节，每人酒钱五角，四角头月饼半斤。

第七、九月重阳节，每人酒钱40文。

第八、十月冬至，每人酒钱40文。

第九、十二月停工或阳历年关时，每人猪肉十二两（一斤十六两），酒钱60文。

（二）园器厂各节“酒例”：

1.大酒钱每人200文；

2.小酒钱每人40文；

3.面钱每人200文；

4.红包钱每人100文。

以上各种“酒例”，带有封建色彩，七月中元节俗称“鬼节”，家家户户给死去的亲属烧纸钱。这时，工厂则给工人津贴，以表示资本家对工人家庭的关怀，这种小恩小惠，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笼络人心、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作用，有助于资本家扩大生产，增加利润。所以，“酒例”制是资本主义瓷业工资制的必要补充，一直保留到社会主义改造前夕。

醴陵瓷业发展阶段概述

周 驗 昭

醴陵瓷业创始迄今，大抵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729~1905年，共约一百七十五年，为醴陵粗瓷（又称土瓷）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其特点是发展缓慢、平稳，持续时间长。最盛时期为1892~1904年，产量达到八千多万件。

第二阶段：1906~1956年，共约五十年，为细瓷的产生，粗、细瓷并存和发展时期。发展的特点是曲折起伏变化很大，最盛时期为1943年，粗、细瓷生产共达一亿件左右。

第三阶段：1957~1978年，共约二十年，为产品以细代粗，由单一到多种，由内销转向外销的时期。发展特点是起伏变化大，发展速度慢。最高产量年为1957年，日用瓷达一亿一千另六十二万件。

第四阶段：1979~1986年，共约七年，为产品由中低档向中高档发展，外销由亚、非、拉走向美、澳、加时期。发展特点是产品发展速度和产品质量持续稳定上升，最高产量年为1985年，日用瓷产量达一亿八千一百五十七万件。

这四个阶段的情况大抵反映了醴陵瓷业由粗到细、由低档到高档不断发展的过程。而醴陵瓷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又是经历过三个大的台阶，逐级上升的。我们称这三大台阶为醴陵瓷业发展的三大历史转折点。

第一次历史转折是醴陵瓷业由封建社会的小商品经济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的转折。

从1840年以后，我国经济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过渡。醴陵瓷业生产中的这种转折是以1906年湖南瓷业公司的出现为标志的，它比全国社会经济的转变约迟六十五年，但它确是标志着醴陵瓷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质的飞跃。在此以前，即光绪十八、九年以来，醴瓷虽然出现过生产的最盛时期，年产量达八千余万件，但从产品质量看仍然是粗瓷生产，从生产方式看仍然是手工业方式，从生产关系看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小商品生产，顶多也只不过出现过部分的以简单协作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总之，它只表现为产量的增加，并没有出现生产上的质的飞跃。只有到了1906年湖南瓷业公司出现以后，醴瓷才出现质的腾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官商合办的股份公司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标志着醴陵瓷业中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素的出现，打破了自1729—1905年这长达一百七十五年小商品经济的统一局面。在这种股份公司的影响下，醴陵瓷业中不断出现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已成为醴陵瓷业中占主要地位的经济形式。无论是官商合办的资本主义还是私人资本主义，对于小商品经济关系来说，无疑

都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进步。

第二，湖南瓷业公司一开始就大量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采用科学方法来改造瓷业生产技术，出现了先进的生产力，改变了过去一百七十五年来长期土法相沿的手工生产和“备本经验，但凭运气”的盲目状态。湖南瓷业公司在引进日本和景德镇窑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改造的阶级窑，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七十余座。阶级窑是粗瓷转为细瓷的关键设备，它的广泛推广与使用，为发展醴陵细瓷生产奠定了坚实的技术设备基础。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进步，必然带来产品质量的提高。湖南瓷业公司一开始就生产细瓷，打破醴陵长期只能生产粗瓷的局面，进行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开创了醴陵生产细瓷的先声。在尔后的短短几年中，公司首创了釉下五彩这种举世无双的拳头产品，并于1909、1910、1911、1915年先后四次在国内外赛会上获金牌优质奖，醴陵瓷业由此驰名中外，一跃面居世界先进行列。这一飞跃应当说是醴瓷爬过了一个坡度很陡的台阶，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光荣和骄傲。

第四，从1729~1905年中，醴陵瓷业生产主要是在以浏山为中心的东、北各乡村之间，湖南瓷业公司出现，瓷业生产转到以县城姜湾为中心，为后来醴陵瓷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交通备件。

一九〇六年前后醴陵瓷业发展的显著变化和主要区别对照表：

项 目	1729~1905 (共175年)	1906~1956 (共50年)
生产力水平	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	出现以半机械化的大生产、手工生产仍占统治地位。
生产关系性质	小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出现了简单协作的手工工场。	出现了官商合办股份公司形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小商品经济仍有大量存在。
产 地	主要以浏山为中心，分布于东、北各乡的农村。	主要以县城姜湾为中心，部份分布在农村。
产 品	粗瓷的产生和发展	细瓷的产生和发展，粗细瓷并存。

上述情况说明了湖南瓷业公司于1906年出现的重大意义。虽然它只是瓷业经济中的经营形式之一，不是醴陵瓷业的全部经营形式；但是，它一方面集中代表了先进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又对醴陵瓷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当然，把它的出现看作重大的历史、社会、经济转折，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湖南瓷业公司这种股份公司的经济形式，在建国前的醴陵瓷业发展史中仅仅是一株独苗，并没有得到推广与发展，而且公司本身也因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外遭水灾、兵灾的干扰而短命夭折；就是在它影响下出现的私人资本主义，其实力也是很微弱的。

其次，湖南瓷业公司引进日本的机械设备和科学的生产方法，也仅限于公司内部，不仅是当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就是那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因为资金不足和人才缺乏等原

因而无法推广与使用，因此，除公司外，整个醴陵瓷业中仍然是手工生产占统治地位，这种局面一直到1957年以后，才基本结束。

第三，公司出现后的细瓷生产，虽然不断得到发展，但在1957年以前并没有取代粗瓷，而且在相当时期内，粗瓷还占有很大比重。据有关资料记载，粗瓷生产从1919~1927年时期为很盛时期，全县共300多厂，从业人员一万一千余人^①。到1935年，全县粗瓷产值约八十至九十万元，细瓷产值百万元，粗、细瓷产值基本持平。^②只是到了1940年，全县粗瓷产值为209万元，细瓷产值为760元，细瓷生产才取得在醴陵瓷业中的支配地位。^③

第二次大的转折是由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的过渡。

1906年以后，醴陵瓷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官商合办的股份资本，一种是私人资本。官商合办的股份资本包括官商合办、官办、官办私营等几种形式，到1926年，实际就已名存实亡了，1931年完全倒闭。此后醴陵瓷业中主要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小商品经济。建国后，经过合作化、公私合营和经济改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人资本和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了。

1956年成立湖南省醴陵瓷器工业公司，是这一转折的主要标志。因为它不仅标志醴陵瓷业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根本转变，而且也标志着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的过渡。从此醴陵全县的整个瓷业均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生产按统一计划进行，产品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物资统

调统配，劳动工资统分统配，即所谓几统一。因此，在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的同时，实质上也就完成了由商品经济行产品经济的过渡。它是醴陵瓷业发展史上第二次实质性的重大转折。

这一次重大转折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生产关系上来看，主要是所有制结构的根本变化，由建国后形成起来的多种经济成分（国营、私人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转变为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从而在醴陵瓷业中，不仅完全消灭了私有制经济，而且集体经济也经过改组消灭了，国家所有制经济成为醴陵瓷业中唯一的经济形式。这当然是醴陵瓷业经济发展史上一次非常突出的重大变革。从1906年出现在醴陵瓷业中的资本主义，其寿命为50年，到1956年就全部消灭了。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成立的湖南省醴陵瓷器工业公司，对醴陵瓷业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完成了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的过渡。

第二，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推动了醴陵瓷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设备是生产为重要因素之一。生产技术设备的改进与提高，在这个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燃料，以煤代柴的改革；一是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半机械化。

以煤代柴的改革，是醴陵瓷业生产发展上的一项重大技术改革。从1729到1957年，长达近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中，醴陵瓷业生产的燃料全部是松柴。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瓷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松柴的需要量也越

来越多。据有关同志测算，1957年全县120座阶级窑，每年需要松柴1.6亿斤，从外省、县收购来的松柴多的每天有十多火车皮。燃料问题不解决，不仅醴陵瓷业生产的扩大受到限制，就连当时生产需要的松柴量也无法维持，更主要的是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贻害子孙后代。因此，以煤代柴势在必行。以煤代柴以后，不仅节约了大量有用木材，而且烧窑时间比原来烧柴的时间缩短30—50%，燃料费比烧柴减少了一半，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这是醴陵瓷业在生产技术上一项重大的质的飞跃。

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来说，1906年湖南瓷业公司引进日本机械设备，开创了醴陵瓷业技术改革的先声；但当时只限于资本雄厚的瓷业公司内部，并且为时不久。在醴陵整个瓷业中普遍地、全面地进行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那是在1956年湖南省醴陵瓷器公司成立以后的事情。从此，醴陵瓷业建立在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近代技术基础上，由手工生产为主转到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结束了从1726年以来近二百三十年的瓷业古老的传统的“四靠”局面（所谓“四靠”，即粉碎靠水力，干燥靠太阳，成型靠手工，烧成靠松柴）。这种技术改造，如果从1906年湖南瓷业公司开始算起，到1957年前后共历半个世纪，才算真正完成。这种比较全面彻底的技术改造，没有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很难完成的。

第三，完成了产品由粗到细、以细代粗升级换代的根本转变。

醴陵瓷业从1906年后，开始出现细瓷，经历了半个世纪

的粗细生产并存的局面，到1956年以后，才算彻底转到生产细瓷的轨道上来，才算完成了由粗到细的产品升级换代。这无疑是产品质量提高的侧面表明醴陵瓷业的重大飞跃。

与此同时，也完成了产品结构由单一到多种的变化，除了主要生产日用瓷外，还生产电瓷、建筑、卫生、理化等多种工业用瓷，和工艺美术瓷等；由此，产品市场也开始由国内走向国外，由内销转外销①1956年完成了建国后首批出口瓷器216万件的任务。

1956~1957年前后醴陵瓷业生产的显著变化及其主要区别对比表。

项 目	1906~1956 (共约五十年)	1957年以后
生产关系性质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	以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的产品经济。
生产力水平	1906~1926年瓷业公司内部存在过半机械化的生产，但全县瓷业仍然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	全县瓷业生产才转到以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基础上来，以手工劳动为主转到以机械化为主的轨道，从根本上结束“四靠”的传统生产方法。
产 品 质 量	产生了细瓷、粗细瓷生产同时并存五十年。釉下彩由名噪一时到逐渐消失。	完成了产品由粗到细，以细代粗升级换代，产品结构由单一变多种，产品市场由内销转向外销，恢复发展釉下彩。

第二次转折对醴陵瓷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所有制的改造过于单一化，不仅个体经济过早地消灭了，

就连集体所有制也一扫而光。1957年后，只有国家所有制的一种形式了，同时由于管理过于集中统一，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限制，再加上分配上的大锅饭与平均主义，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这就决定着醴陵瓷业中必须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三次大的历史转折是从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醴陵瓷业在回顾总结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开始逐步由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以1979年1月再度恢复和成立的湖南醴陵瓷器工业公司为起点的^①。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与再演，它既不同于建国前醴陵瓷业历史上那种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也不同于建国后1957年以前那种私有制经济占绝大多数的商品经济。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毫无疑义，这一转变是醴陵瓷业经济发展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转折与飞跃。

这一次转变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生产关系上，主要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由1957年以来形成的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经济向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的转变。所谓多种经济形式，在醴陵瓷业中，主要有三种：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据1985年醴陵统计局的资料，全县共有瓷业企业145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5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30家，少量的个体所有制企业未统计在内。在经济管理

体制上，由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向专业化协作和横向经济联合的企业群体过渡。

第二，在生产技术设备上，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先后引进日本的隧道窑和练泥机等近代化的技术设备，并建立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醴陵石膏粉厂。

第三，从产品上看，全县日用瓷产量稳定上升。在产品质量上，由中低档向中高档发展，产品由单件为主向配套产品方向发展，国外市场由以亚非拉为主转向以美澳加等高级产品市场为主。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革新和改造的进行，醴陵瓷业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综上所述，醴陵瓷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受瓷业本身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所支配。但是二百五十七年的历史证明，醴陵瓷业的发展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不仅在建国以前是如此，就是建国以后也不例外。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醴陵瓷业发展的起伏曲折，盛衰浮沉，使瓷业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产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1729~1850年（雍正七年到道光末年）共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醴陵瓷业发展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平稳的逐步扩大的，特别嘉庆以后，逐步扩大到全县东北各乡。

1851~1861（咸丰年间）醴陵瓷业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战争的影响，交通受阻，出现生产的衰落时期；

1906~1926年为细瓷产生发展时期，其间经过民国三年

(1914年)的水灾,民国七年(1918年)的兵灾,及1928—1929年的衰落;

1940~1943年为细瓷生产的最盛时期;

1944~1945年由于日寇侵占醴陵,1947~1949年由于内战影响醴瓷两度衰落;

1958~1962年,由于以瓷代钢的生产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瓷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

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产又大幅度下降;

1974年由于“左”的影响生产受阻;

1978年以后,瓷业生产才逐步稳定上升。

〔注〕

①醴陵县档案馆,轻工局1951年度1号档案《醴陵土瓷情况》记载“民国八年至十六年为最盛时期,全县共计324厂,工友11000余人……。”

县档案馆,工商科1950年6号档案记载:“土瓷最高产量是1927—1928年有窑户342户,……从业人员14000多人。”

②《北京日报》1935年5月25日《中国近代工业史料》

③王彦,1940年《醴陵瓷业的调查》

建国前醴陵也曾有很少量出口,但为时不久,数量不多。

④1956年成立的瓷业公司到1984年已撤销。

醴陵瓷业复工促进委员会的始末

龚 广 舜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由于重庆、武汉等地的瓷器庄客没有来醴订货，销路不畅，银根很紧，加上部分瓷业生产的厂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不能积极设法克服困难、继续生产，以致不少瓷厂纷纷停产。大量瓷业工人失业，生活十分困难。

七月二十五日，醴陵解放。八月初，醴陵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党和政府为了安定社会秩序，解决工人生活困难，积极推动瓷业恢复生产。首先，由副县长赵志钧找地下党城区负责人李岳传商量有关恢复瓷业生产的问题，并责成李岳传放手发动群众，成立相应机构，及早恢复瓷业生产，李是一九四八年九月来渌江陶瓷职业学校任教的，因为我当经理的渌江瓷厂就在学校范围之内，与我接触较多，且在迎解活动中，李曾要我配合他在姜湾一带组织过护校、护厂的联防工作。李岳传在接受了组织瓷业恢复生产的任务之后，就找程炳生（工人，大革命时期任过工人纠察队长，地下党员）、陈卓民（细瓷工人，地下党员）、彭步青（陶画工人，地下党员）和我（当时是瓷业同业公会负责人，也是李所发展的

《解放军之友》的成员）等人，共同研究了发动瓷业恢复生产的步骤和办法，大致内容是：一、成立“醴陵县瓷业复工促进委员会”；二、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三、争取政府支持，积极恢复生产；四、加强对外联系，广泛打开销路。

意见统一之后，大家分头串连发动，并于八月八日左右（确切日期记不清了）召开了有部分瓷业工人和厂家代表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首先由李岳传讲明了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意义和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接着由大家发言讨论，与会人员一致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愿意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最后，选举产生了“醴陵县瓷业复工促进委员会”。委员会由李岳传任主任，龚广舜（厂家代表）、陈卓民（工人代表）任副主任；程炳生、刘伯钧、马佑元、帅万驾、胡雪棠、彭步青、李才彤、肖元策、文心接、刘学陶、刘伯祥、吴瑞扬、屈惠涛等为委员。会后，又按地区分别成立了八个分会：东门为一分会，姜湾为二分会，黄泥坳为三分会，中和为四分会，邓家渡为五分会，汾山为六分会，青泥湾为七分会，渌口（包括雷打石）为八分会。分会的主任大多由县复工委会委员兼任。

八月中旬，李岳传和陈卓民两同志根据党的调配，接管了旧总工会，成立醴陵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组各行各业基层工会，全面促进各行业恢复生产的工作去了，瓷业复工委员会的担子，全部由我担起来，我和其他委员主要是与醴陵县瓷业工会筹备委员会的陈明喜、黎光东等主要干部配合，分工下到八个分会，边摸底、边宣传、边发动复

工。到一九四九年年底为止，先后复工生产的细瓷、土瓷厂家共约五、六十家，拥有从业职工四千多人。

开始复工生产时，困难是不少的。主要是依靠人民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政府通过有关部门给特别困难的厂家贷款贷粮，扶持其生产，另一方面，人民政府还对失业工人赈济粮食，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困难，并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细瓷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自救。因此，在瓷业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复工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讲了不少的话，跑了不少的路，但主要还只能说是起了一个桥梁作用。

全面复工生产以后，由于劳资双方的努力，生产得到了发展，产品不断增加。到一九五〇年春，面临的问题是：1. 如何向外地打开销路，搞活流通，以免除产品滞销甚至停产的危险；2. 如何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以增强醴陵瓷器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瓷业生产，及时地采取措施，积极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一是由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科长张步升出面发动和组织了由龚广舜任主任、黎光东任副主任的“醴陵县瓷业联合运输推销社”，解决流通问题；二是经地委批准、县委指定杨亦痴（地下党员）为主任、黄经智、龚广舜、黎光东、黄阳生四人为干事，成立“醴陵县瓷业改进委员会”，负责革新生产技术搞好彩绘加工、改进瓷器包装、减少运输破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有了“醴陵县瓷业联合运输推销社”和“醴陵县瓷业改进委员会”两个组织之后，“醴陵县瓷业复工委员会”就算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自然消逝了。

一九二五年醴陵瓷业工人罢工的胜利

一九二四年冬，中共安源地委派汪泽楷同志来醴陵发展党的组织。汪泽楷是醴陵栗山坝人，他以醴陵县立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在醴陵先后发展了孙小山、冯佑村、李石溪、王力天等十多人入党，建立了中共醴陵第一个党支部——醴陵特别支部，由李石溪任支部书记，直属安源地委领导。

一九二五年春，汪泽楷同志在建立醴陵党组织的同时，便和从安源矿工子弟学校回来的教员易足三着手改组被反动势力所把持的旧工会。首先是在县城的关圣殿等处办起了三所工人夜校，党组织派周振汉、汪泽嘉担任夜校教员，帮助工人学文化，教导工人要为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和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学习，团结奋斗；其次是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发展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工人党员，成立了县城第一个工人党支部，由工人党员王鹿鸣任支部书记。接着成立了县工会，选举汪泽楷为会长。从此，各行各业的工人中都有党员宣讲革命道理，使工人认识到新工会是团结工人自己的力量为本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解放而奋斗的组织。从而，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人运动蓬勃地

开展起来了。

过去，劳资闹纠纷，双方都得请地方上的境董来调解。新的瓷业工会成立之前，劳资双方闹纠纷，打官司共62起，每次总是瓷业工人吃亏收场。瓷业工人对此编了一首打油诗：“十分苦楚庚戌年，做工难得几文钱，减去挑价加伙食，两头挨打无处言。”（减去挑价加伙食：意思是大瓷做坯，以每挑板坯计算工价，减去挑价即减少工人的工资收入；加伙食：土瓷工人的伙食自负，加伙食即资方把物价上涨的负担加重在工人身上。减去挑架加伙食，工人叫两头挨打。）

这年，端午节前，由于油、盐、米等基本生活物价上涨，铜币贬值，工资不合理，工人生活日益艰难，资方借故解雇和开除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时，土瓷工会负责人傅道桂召集各工会支部负责人共计20多人，以学武术为名，到汾山古洞天开会。讨论制订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压迫等具体方案。在工资方面，提出“以良三、良大每一千对筒（每筒十只）碗洋150元为工价计算基数。做坯工资则每一挑板坯（良三碗坯42只，良大碗坯39只）洋为0.517元，碗价超出基数150元后，则见十加三，碗价低于基数不减做坯工资。按基数计算到每挑板后尚剩余洋0.003元，就不好再分配，而以每烧窑一次由资方给每个职工泡一杯细茶。在改善待遇方面提出：规定每窑必祀的神福肉六斤四两，白酒四斤，豆腐四块，每十次神福另加一次神福计算。工人吃神福肉有两种：一种是每烧一次窑，每间肉一斤；另一种是每烧一次窑，按每一百板坯计肉一斤。在改善工人伙食方面规

定：每人每月按照9.5合升子45升大米、油六两、盐一斤（以上三项在工人工资中扣除），柴炭菜金每月由资方支付。

细瓷成立了中共姜湾党支部，易瑞芹任党支部书记。细瓷工会由易瑞芹、童炳生、瞿培冬等同志负责，他们借早晨在西山红拂墓、姜湾寨子岭做体操运动之机，召集工人代表杨龙兴、魏元斌、何新元、李仲山等开会研究加工资、改善待遇，提的具体方案是：在工资方面，细瓷圆器每千板坯工价银24两为基数。其中：办泥打杂三两二钱；做坯三两二钱；印坯三两二钱；利坯五两六钱；挖坯四两；釉坯四两八钱。共计银24两。琢器以件计工价，分为釉上和釉下两种做坯工作。在改善待遇方面提出：每人每月9.5合升子大米45升、油一斤、盐一斤四两，菜金由原来的320文增加为720文（兼空位者照发），每人每次神福肉四两，圆器每月三次（初一、初十、二十）；琢器每月两次（初一、十五）。还制定了由资方负担的节日例规钱：三月清明580文；四月磨刀80文；五月端阳一串零六十文；六月轮工40文；七月中元歇、起手440文；九月重阳40文；十月轮工磨刀80文；十一月冬至40文；二月过年100文。

土瓷和细瓷工会，都作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具体方案后，便分别召开劳资协商会议，通过多次协商，由于资方对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态度异常生硬。于是，土瓷总工会按照工人代表会议的决定，立即通知各工会支部，全面组织开展罢工斗争。

细瓷由工会负责人易瑞芹等组织工人开展全面罢工斗争。当时，细瓷共有九个厂，共计职工927人。统一规定，以

各厂贴上白纸条都不得上班做事，白纸条贴出后，罢工开始了。每天晚上工会纠察队到各厂检查，一次发现龙生右上班做事，纠察队抄了架上的坯，对龙生右进行教育。罢工斗争，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土瓷和细瓷全面进行罢工斗争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终于使资方不得不接受县工会、县公署、县党部的调解，通过协商，土瓷和细瓷的资方接受了劳方所提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全部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通过这次罢工斗争，土瓷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三分之一，细瓷工人的工资也相应得到了增加，瓷业工人终于冲破了过去那种有苦无处申诉的沉闷空气而扬眉吐气了。

1925年（民国十四年）5月20日出版的《苦力旬刊》第九期，对醴陵瓷业工人这次罢工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满怀激情作了记述：“醴陵瓷业工人六千余人，反对工头刻扣工资伙食，并要求加工资，罢工二十三天，大获胜利。”

（文汉民整理）

牙祭神福肉，节日酒例钱

文 峰

建国前，陶瓷生产全靠手工，天阴雨雪，市场旺淡，都可给工人造成失业或短期歇业的痛苦处境。如黄瓜上市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货品滞销，多数窑厂减少雇工，致使部分工人失业。醴陵瓷业工人称这个时节为“黄瓜瘟”。秋天天气晴朗，五谷丰登，正是瓷货销场的旺季，这时的陶瓷工人抢天时，起早贪黑，晚上点燃桐油灯，在豆粒大的灯光下，拼命做坯。醴陵瓷业工人称之为“夜打登州”。这种情况给陶瓷工人带来了工作不稳定，起手又歇手的艰难处境。陶瓷工人把这种生活处境编成顺口溜和打油诗。现各举一例以供读者。

顺口溜云：

正月欢欢喜喜，二月冒得米，
三月餐办餐，四月难过关，
五月没奈何，六月望扮禾，
七月换来谷，八月饿得哭，
重阳夜战来，十月又难挨，

立冬小阳春，三九更难经；
一年做到头，陶工难抬头！

打油诗云：

回想旧社会，瓷工苦连绵；
做到两头黑，难得几文钱。
坯房是卧房，睡的冒脚床；①
吃的无娘菜，光饭淘米汤；
穿的钉补衫，盖的一铺筋。②
无钱娶妻室，孤独打单身；
病了医无钱，痛苦咬床弦。
三节踏板苦，年关苦连天。③
今天忧明天，天天受熬煎！

解放前，陶瓷工人由于工资低，工作无保障，更没有什么劳保福利，生活十分困苦。他们为了争生存，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结果争得了打牙祭吃神福肉和节日酒例钱等福利。这点所谓福利当然微不足道，但是这都是工人用解血换来的。据传说，牙祭本是一位圆器工人的绰号，后人不知其真名实姓。瓷业历来圆器工人的工资和生活待遇比琢器工人低。为了争取改善圆器工人的生活待遇，牙祭为首组织了圆器工人要求老闆每月发三次肉，每人每次四两。为这事，工人与厂主闹到了官府。厂主威胁牙祭说：“你牙祭不要脑壳，我就给圆器工人发肉吃！”牙祭正气凛然地回答说：“只要我这个脑壳能换来圆器工人有肉吃，我就不要这个脑

壳！……。”这就是“牙祭断头，后人享福”这句显示瓷业工人沿袭吃神福肉的话的由来。但吃神福肉始于何时则无法考证。建国前，瓷厂打神福时，工人腰围白长条手巾，先盛一碗肉放在晒架上，祭祀牙祭后才开始就餐。所以吃神福肉又叫打牙祭。

瓷业工人在长期争生存、争改善生活的斗争中还争得了节日酒例钱。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湘东各县手工艺品调查》中的记述，醴陵瓷业有分工种吃神福肉和节日酒例钱的例规，并一直沿袭到建国初期。

圆器厂工人的例规：

1、自开工之日起，所有工人伙食，除厂方备办米炭外，每月每人油一斤，盐一斤四两，水菜钱九百文，如有兼空位者（即一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岗位），另给食米一斤米。

2、各厂自开工之日起，每月给工人发神福肉三次，分初一、初十、二十，每人每次发肉四两；兼空位者照份按价结算。

3、三月初一开工酒例：每人发大福钱200文（现为二角），小酒钱40文（现为四分，以下类推），面条钱200文，起手红包钱100文，共540文；又清明节小酒钱40文。

4、四月初一磨刀酒例：每人发小酒钱40文；又二十六日轮工酒例钱40文。

五月蒲师酒例：每人每位歌手酒例钱40文，歌手红包钱100文，大酒钱200文，面钱200文，共580文；又盐蛋、粽子、包子各二只。端午节那天厂方还得备席：计角肉、杂豆干、南粉等五大碗，黄瓜、韭菜、大蒜、蛋汤等四小碗，外

加雄黄酒。凡兼空位的除本人在厂餐食者外，不另邀外人代替赴席，本人不食也不另补。如厂方与工人相商，彼此同意不办酒席者，每人（包括兼位照算）发大酒钱200文，小酒钱40文，面钱200文，歇手酒钱40文，红包钱100文，包子钱100文，粽子钱40文，盐蛋钱160文，雄黄酒钱200文，合计一串零六十文。

6、六月二十六日轮工酒例：每人发小酒钱40文。

7、七月中元酒例：每人发起歇手酒钱40文，红包钱100文，大酒钱200文，面钱200文，共计540文。外无他项费用。

8、八月中秋酒例：每人发大酒钱200文，四个月饼（半斤），起歇手酒钱40文，面钱200文。外无他项费用。

9、九月重阳酒例：每人发40文。

10、十月初一，每人发磨刀酒例钱40文；二十六日发轮工酒例钱40文。

11、十一月冬至，每人发小酒钱40文。

12、十二月停工时，每人发歇手酒例钱40文，又肉12两，小酒钱60文。（此酒肉于停工时或阳历元旦时发给，但以一次为限）。

琢器厂工人例规：

1、各厂自开工之日起，所有各工人伙食由厂方备办米炭外，每人每月油一斤，盐一斤四两，小菜钱900文，初一、十五神福肉，每人每次四两。

2、开工时规定：每人红包钱400文，并由厂方准备瓜子酒面等项，其菜随点，二人共一盆。

3、清明节规定每人发酒钱400文。

4、端阳节在厂餐食者，例同圆器厂；不在厂餐食者发给酒菜洋五角。起手面酒钱与开工时同，但无红包酒钱。

5、七月中元节酒席每人折发洋五角，起手面酒例钱与开工时同，惟无红包酒钱。

6、八月中秋节酒席，每人折发洋五角，又四个月饼（半斤），其他同端午、中元节。

7、九月重阳每人酒钱40文。

8、十月冬至每人酒钱40文。

9、十二月停工时或阳历年关时每人发肉12两，酒钱60文。

装坯工人的例规：

1、自开工之日起，所有伙食、神福、节日例规等酒例与圆器厂同一规定。

2、装小器规定九折，钵子以二十八只为一担，边子钵以三十二只为一担；如遇三厘烧坯以加倍扣算（但空十厘无算）。

3、下窑坯工价：小器脱胎每担规定70文，其余晶器、小花器，每担规定60文，大器计二白、四大器每千板下窑坯规定4200文，灰器每千板下窑坯规定二串九百文；均以一串一百文折成申洋一元扣算。

4、大器装复火土匣钱每日每位一串文，坯堆灰器每月二串文，均以戊申洋扣算。

装小器插模令者，每挑计100只，津补时值元6钱40文。

烧窑工人的例规：

八间阶级大窑，每窑烧一次，规定工食洋15元（抗日战争前加一成六，实数为17.4元，战后现除食费为20元）。外无红包酒例油盐米菜等津贴；烧窑时如遇三节则可在厂餐宴。

注：

①冒脚床，指工人没有宿舍，晚上白天在生产的坯房用木板、圆钵、砖头铺行铺睡觉。

②盖的一铺筋，指盖的被子没有被单的破烂棉絮和秆。

③磨板，指厂主在端午节、十月轮工节辞退工人叫磨板。

略谈熊希龄对醴陵瓷业的贡献

刘建兴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与永顺王翰林，为近百年中湘西希有的两翰林”。^①熊与康有为极友善，参加过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政变失败被罢官，宣统初复晋升为四品卿衔，还先后当过湖北交涉使、东北盐运使和财政监理官等。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与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窃国，出任过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并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组织所谓“人才内阁”，任国务总理，一时为袁世凯所利用。蒋介石窃取政权后，除担任过蒋政府脉务委员会委员外，“其他官职概行辞卸，仅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办理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事宜。虽政府屡邀出山，君以既安于社会事业，不愿再问政治为辞……。”^②总之，熊希龄在学识上比较渊博，是当时湖南省的大知识分子，他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颇有一些名气。

熊希龄对醴陵瓷业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为什么会热心于醴陵瓷业？他对醴陵瓷业作过哪些有价值的分析？他对振兴醴陵瓷业又提出过哪些值得赞许的主张？他的主张对

醴陵瓷业有什么促进作用？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了解醴陵瓷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很有必要的。

熊希龄热心于醴陵瓷业的原因

熊希龄这样一位颇负盛名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对醴陵瓷业的发展会感兴趣呢？有人说，熊希龄是湖南人，醴陵隶属湖南，熊希龄关心湖南经济，必然会注意到醴陵的瓷业。当然，乡土观念不无关系，但我们认为，这决不是主要的。如果熊希龄的乡土观念很重，那末，他所创办的慈幼院等慈善事业，就不会设在北京，只会出现在湘西。

从很少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熊希龄热心于醴陵瓷业，有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

熊希龄是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本身既具有旧知识分子动摇性的弱点，同时也有着知识分子敏感性的特点。当他参加戊戌政变失败，被罢官后，他便回到了湖南老家。既然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他于是开始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企图通过办资本主义企业来振兴国家。但是，到底开办什么企业，他脑子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促使他致力于瓷业开发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下列两条：

一条是，出访日本时受到的启发。颇受慈禧太后宠信的原湖广总督端方，^③奉命于1905年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预备回国搞君主立宪来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熊希龄被老上司端方看中，也随其出国跑了一趟。在访问中，他发现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China），“支那”一词包含了“瓷器”这个意思。中国者，瓷器的发源地也。日本的瓷业

技术，就是从中国学到手的。从此，熊希龄脑子里办实业的念头，开始有了具体对象——瓷业经济。

另一条是，对醴陵瓷业生产的实地考察，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光绪末年，醴陵大学士文俊铎^①，发现醴陵的瓷土质佳产富，而瓷土制品却很粗陋。为了广开销路，以振兴醴瓷，他曾独自搞试验，改良制瓷方法，并借拜谒熊希龄的机会，一方面将试制成的新产品送熊氏鉴赏，另一方面则在熊氏面前大力宣传开发醴陵瓷器生产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了熊希龄在醴陵兴办瓷业的兴趣。在文俊铎的感染下，熊、文二人一道，亲来醴陵县的洴山、东堡等处，进行了实地调查，由此而坚定了他开发醴陵瓷业的决心和信心。

基于此，熊希龄于1905年7月，写下了《稟请湖广总督端方设立瓷业公司呈文》（以下简称《呈文》，全文附后）。在《呈文》的开头，熊希龄就说明了他之所以要求开发醴陵瓷业是因为醴陵的瓷土资源丰富，瓷器生产有基础。他说：“查醴陵瓷土最富，产地最多。如洴山、赤脚岭、青泥湾、老鸦山、茶子山、唐山口、邓家渡等，共有七处，……”仅洴山一处，就有“窑户六十余家，每家年出瓷器价值洋三千余元，六十余家共二十余万元。合其他六处统计，该县共年产瓷器洋三、四十余万元，实为大宗入款。”所以，“醴陵瓷器一宗，近夫国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而且“略有把握”。

熊希龄是怎样分析醴陵瓷业状况的

经过实地调查，熊希龄对醴陵瓷业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

分析，既分析了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又把醴陵瓷业和日本瓷业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

熊希龄认为，醴陵的瓷土资源虽然丰富，产地也不少。可是，“惟瓷器粗陋，仅供下级贫民购买。”^⑥而且，近年以来土货滞销，价格大跌。以前一筒（十个）粗花大碗，在本地卖80文钱，运到汉口卖100文钱；但到光绪末年时，在本地只能卖68文钱，运至汉口也只能卖80文钱，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运输商人在收购瓷器进行议价时，还要打个八折。这样一来，“窑户仰屋而嗟，工人辍业以待。”“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一言以蔽之曰：“瓷业情形危险。”^⑦

造成醴陵瓷业肖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熊希龄在《呈文》中列举了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技术和设备落后。首先，瓷土杂质很多，挖掘出来的瓷土，没有能够很好的筛洗，每百斤瓷土，一般只用水冲洗掉一二成，剩下的土质很粗。其次，釉药质量也很低，调釉药的原料，是一些烧尽的糠灰。糠灰和釉药掺和后，变成了黑泥。将这种黑泥涂在用粗瓷土制成的器皿上，烧出来的瓷器色均带青，而鲜洁白。”^⑧除釉药外，绘画用的石墨也不是上等的，故瓷器“所烧之色甚暗。”^⑨而“由景德镇购得釉药一块，施之醴陵土质制成器皿，色极洁白，与景德镇窑无异。”^⑩再次，瓷窑式样很旧，百余年一贯制。熊希龄将醴陵的瓷窑与日本瓷窑作了一个比较，发现醴陵窑比日本窑有三大差距：一是窑层低，盛瓷器量少。“日本每窑八穴、九穴……高至六七尺”而“醴陵窑仅五穴或六穴，高不及六尺。”^⑪二是费燃料，烧日本窑时，点燃第一穴的柴火

后，就会自动逐级燃烧到第九穴。“柴料由第一穴燃起，以徐达于第九穴。”^⑩而醴陵窑却做不到，各穴的柴料必须分别点燃、分别增添。“柴料于各穴陆续增加。”^⑪三是无匣钵。日本窑“所烧之器均用炼土制成之皿或四柱盛之。”^⑫器与器之间互不相碰，使瓷器质量得以保证；而醴陵窑的“瓷器每十个层累一套，无盛之者。”^⑬这就是说，每件瓷器周围，没有任何保护物，势必大大影响瓷器的质量。最后，手法粗笨，工艺守旧，和景德镇的技术相比，差之甚远。比如，从事瓷器生产不久的江西萍乡县，由于“雇佣景德镇工人两名，加工制造，比醴陵稍精，故醴陵贸易遂为所奔奔（奔奔”两字疑为“夺字”之谈）日见减色。”^⑭

第二，资金不足。要提高技术，改进设备，没有大量资金是不行的。因为资金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是，醴陵从事瓷器生产的，基本上是小商品生产者。“各窑户资本不足，每家田（“田”字疑为“费”字之误）财不过数百串钱，难以延请上等工人，制造新式。”^⑮当然，更买不起先进的机器设备了。醴陵的瓷器生产者，不仅缺乏改进技术、增添设备的资金，有时，由于成品卖不出去，价值暂时实现不了，资金周转不灵，甚至还需“向运商预贷一二月购货之钱。”^⑯在这种情况下，运输商人便趁机放高利贷。大敲竹杠，即使经过斗争，窑户仍“吃亏尚巨。”^⑰

第三、管理混乱。在手工业的工场里，劳动定额只强调数量，没有质量标准。“工价以器之多少为定，故工人贪多贪速。”^⑱至于各瓷业户之间的生产，就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间，是不可能

实行计划管理的。)瓷业生产的无计划性，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瓷土的开发乱七八糟。瓷土是制作瓷器的基本原料，它分布在全县的许多平原、丘陵和高山地带，有的质量高有的则含杂质多；有的浮在表面，有的则埋藏在深处；有的蕴藏量丰富，有的则较贫瘠。各个窑户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瓷土毫无规则，率开争挖浮土，捷足先得，未能深入，故多杂以黄泥等。”^②其次，烧窑用的木柴也是胡乱砍伐，结果，“近窑之山，薪木砍伐净尽。”^③窑户所需燃料，不得不到远离产区的外地去购买，待运回来以后，“其价极昂，故瓷器成本因之加重。”^④

由于以上一些原因，醴陵生产的瓷器，物不美，价不廉，竞争力低，销路不畅。面对这种状况，熊希龄颇有感慨地说：“倘再因循不改，将恐此粗货一宗，亦将尽归萍乡商人之手。数千人所仰赖的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⑤至于细瓷，则更无力抵制外国货的输入了。

熊希龄在分析醴陵瓷业的落后状况及其原因的同时，在与景德镇瓷和日本瓷的比较中，也充分注意到了醴陵瓷业还有几大优势。

和景德镇相比，醴陵的地理位置优越，它离两广和云贵川诸省都比景德镇近一些。这些省份所需的瓷器较多，醴陵的瓷器送去销售，肯定比景德镇瓷器的运费要少、损耗低。如果注意改进技术，醴陵瓷器的价格必然会比景德镇的便宜，从而这几个省就可成为醴陵瓷器的广阔市场。

“与日本瓷业相比，我之成本尤轻。”^⑥为什么呢？熊希龄讲了两条原因：一是醴陵的瓷土成本比日本的便宜几

倍。在日本，经过洗净的瓷土，每一百斤需中国钱币960文，而洗净后的醴陵瓷土，每一百斤只需成本120文。“若照日本洗法，亦不过加倍，而只至二三百文，较彼每百斤需钱960文相去甚远矣。”^⑤。二是醴陵瓷业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比日本的低廉得多。日本瓷业工人的日工资，折合中国银元是每人三角或五角，即345文或575文（一个银元可换1150文钱），画工加倍，每人六角至一元。即690文至1150文。而中国制瓷工人的日工资不过270文，精细画工的工资也只402文，分别比日本的工资低一倍以上。

既然日本瓷业的成本很高，且“均仿中国式”，^⑥但是，为什么日本一年内输入到我国的瓷器竟达银洋近六十万元？为什么日本的瓷器，“近年专运北方奉天、直隶等省。销路极大”^⑦呢？熊希龄认为主要原因是：日本资本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在瓷器上画着中国消费者喜欢的各种“吉利花样之物”^⑧适销对路。他们即使以“粗糙之器”，也可“得我重价也”。^⑨

所以，熊希龄认为，只要发挥醴陵瓷业“成本最省，运本最轻”^⑩的优势，“其必然抵制输入可无疑矣。”

熊希龄发展醴陵瓷业的基本主张

在对醴陵瓷业作了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熊希龄还明确地提出了振兴醴陵瓷业的途径。

一、兴办学校，培养人材。

醴陵瓷业落后的原因很多，关键还是技术水平低。技术改进不了，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质量好、成本低的瓷器

就不容易生产出来。总之，积极提高瓷业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发展醴陵瓷业生产的根本前提。

怎么提高瓷业工人的技术水平呢？熊希龄认为“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他在《呈文》中的第一个主张，就是“立学堂”，抓人材培养。熊希龄办瓷业学校的主张，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要以培养目标为依据，对学生进行专业化的现代科学教育。醴陵的土瓷，长期处于个体商品经济状态中，专业分工不细，清朝同治以前，从制坯到彩绘，都是一个人承担。后来，分工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适应当时产品质量提高的要求。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熊希龄建议在瓷业学校中，应设置辘轳、模型、陶画、窑务各科，对学生进行分工更细的专业技术教育，以便迅速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熊希龄还强调这种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学校，除必须具备各种专业机械设备外，还应该设置展有各国新式瓷器的“标本陈列室”，供学生“仿造用”，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谋改良”的能力。可见，熊希龄开办学校、教育学生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瓷业科学知识的、掌握制瓷专业技术的、并有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材。

其次，在学制的设置上，学校教育既要注意提高，又要重视普及，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加快人材培养。为此，熊希龄主张瓷业学校分设两科——速成科和永久科。“速成科”属于短期训练班性质，对象是熟练工人，“由各窑户中挑熟练工作者数十人为速成科。”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在职的熟练技

工进行半年短期培训，提高他们对本职工作的“烂熟”程度，以满足当时瓷业生产中技术力量严重缺乏的迫切需要。

“永久科”属于长期的正规教育性质，学制四年，对象是有点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由“各窑户中之子弟，择其年在十五岁以内，文理清顺者为永久科”，培养年轻的具有较高制瓷科学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以适应醴陵瓷业日后打入国际市场的长远要求。

再次，在师资来源上，由于醴陵制瓷技术落后，文化水平低下，办一个既有速成科又有永久科的瓷业学校，靠自己的师资是远远满足不了要求的。为了尽快培养人才，在瓷业学堂中，熊希龄自兼校长，文俊铎任监督兼历史、语文教员，常先任教务长兼理化教员，沈明熙任庶务长兼算术教员。关于制瓷技术课程，熊希龄则明确提出了“延请外国技师”^⑧来传授的主张。由于熊希龄的倡议，1906年学校创办时，就从日本聘请到安田吉任图画卫生科教员，图画工人大凡里吉、模型工八里安太郎、辘轳工松井弥三郎、窑务工松布兵七等任实习教员。^⑨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技术师资为什么不从邻省江西景德镇解决呢？这是因为“江西景德镇私规最严，不准工人用于他省，又俗传景德镇承办御窑，可用红绿颜色，他省不准仿办。”^⑩这就是说，当时的景德镇，对外技术封锁非常严密，不大可能从那里聘请到师资。

二、成立股份公司

振兴醴陵瓷业，在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同时，熊希龄在《呈文》中还提出了“设公司”的主张，即成立瓷业股份公

司。如果说办学校是利用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折光作用的话，那末，设公司则是改变瓷业生产关系的重大措施。

如前所述，醴陵瓷业从雍正到光绪末期的近二百年中，都是以小商品经济为特征的个体手工业。他们因循守旧，本小利微，既缺乏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更没有添置新设备的经济条件。怎样改变这种小商品的个体生产关系呢？众所周知，小商品生产者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发生两极分化的。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产生，是一个很缓慢、很漫长的过程。在当时醴陵瓷业生产者之间的分化现象还不明显，如果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小商品生产的分化中自发产生，醴陵瓷业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输入到醴陵瓷业生产中来。

股份公司是以股票形式联合起来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集中的重要形式。它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股份公司不仅大大优越于小商品生产，而且比个别资本推动的生产力也大得多。熊希龄注意到了股份公司这一新生事物，明确主张在醴陵也搞个瓷业股份公司。资本从何而来呢？《呈文》中说，由他等“招商承办，集资三万元即成立。”不久，他一方面通过《长沙日报》登载筹组瓷业公司的广告，公开招股；另一方面，还派专人到上海、长沙等地游说，当面向有关官僚富豪募集。由于以上措施，不到一年时间，瓷业公司的资本就达十万元，大大超过了熊希龄原来的打算。

以瓷业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后，没有也不可能消灭瓷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个体窑户。因为熊希龄倡导创办的瓷业公司，规模毕竟有限，它不可能垄断醴陵瓷器生产的全部；同时，它也没有必要把众多的个体窑户全部吃掉，这些个体窑户不仅不是公司的对手，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威胁，而且还有可能补充公司的不足。于是，这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态，既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就势必会发生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熊希龄预见到了，在《呈文》中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熊希龄把这种办法叫做“均利”；“均利”的意思就是说，要使公司的资本家和个体窑户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合理的经济利益。

靠什么来实现“均利”呢？熊希龄建议采取“次第交换之法”，所谓“次第交换之法”，就是指瓷业公司和个体窑户这两种经济成分，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年份实行分工。比如：开始头两年，公司生产细瓷，个体窑户继续从事土瓷生产；两年以后，个体窑户可以逐步生产一部分细瓷，而公司则“专制西式各器，抵制外货之输入。”^⑤五年以后，“各窑户如有进步，能仿西式”^⑥的话，也可以从事西式器皿之生产，而公司则“精益求精，专求制造输出各国之品。”^⑦这种交换之法一举数得：既可以保证两种经济成分的利益，又能促进整个瓷器生产技术的逐步提高；既可以抵制帝国主义又对我国的商品输出，又能扩大醴陵瓷业产品的市场。

三、选择厂址

熊希龄除提出了培养人才和建股份公司的主张外，还把瓷业公司厂址的选择问题单独提了出来。瓷业公司建立在什

么地方比较合适呢？从表面上看，这好象仅仅是一个地区问题，其实远非如此，因为厂址的选择，关系到瓷器的成本、价值和竞争力的高低。对此，熊希龄在《呈文》中说：“近窑之山，薪木砍伐净尽，所用柴料，购之远方，其价极昂，故瓷器成本日之加重。”因而，减少燃料运输费用，是为当时降低醴陵瓷器成本的主要环节。

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减少运费、降低成本呢？熊希龄认为，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选择厂址是一条重要途径。他经过实地考察，首先否定了把公司设在盛产瓷土的浏山一带。他认为，一方面“醴陵浏山距县城25里，虽道路平坦，然购采柴料极难，加以脚力价复增昂。”^③即不仅买柴难，而且运费贵，很不合算；另一方面，在浏山制成瓷器后，则先须用人力运至县城，然后从县城装船输出外销。这样一来，不仅产品的运费高昂，而且瓷器易碎，经过辗转装运，势必提高破损率。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熊希龄决定将瓷业公司建在县城附近的姜湾。^④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今天看来，也有重要意义。姜湾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首先，它紧靠渌江江边，渌水是湘江的支流，全长160余公里，航运业比较发达；同时，姜湾离株萍铁路也很近，仅七八华里距离。

（株萍铁路是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盛宣怀为了解决萍乡煤运到武汉的困难而奏准修建的，1900年开工，1906年1月全线正式通车。）在姜湾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建立公司，既“易于采购柴料，省去运费”^⑤，即省去了由县城把收购的薪柴运到二三十里外浏山的运费，又对“制成之器上船亦甚便也”^⑥，即就地生产，就地装船、装车，有利于减少成

品运费，降低破损率而且能缩短流通时间；另外，还为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创造了条件，因为公司“即滨河，学堂需用机械不难登岸。”③

瓷业公司建在姜湾，唯一不足之处就是离瓷土资源的产地较远，将瓷土从产地运到姜湾，也需要费用。但是，熊希龄认为，这并不会增加运费。因为如果公司设在汾山，必须将产品运到姜湾装船，现在公司建在姜湾，等于“以运碗之脚力改为运土，二者费亦相等。”④最后还是节省下了运柴薪的费用。不仅如此，熊希龄还主张“于汾山设一条泥厂，将土制净，再运姜湾。”⑤即将瓷土在产地加工后再外运，这样做“尤为省费。”⑥

四、引进外国设备

熊希龄主张从国外购买先进设备和新式产品，“如水簸场之除水器，调制室的椭圆皿、成型机、素地土捏机、釉药粉碎机、原料粉碎机、湿式材料粉碎机……以及锅炉等件，皆须备置。”⑦除此之外，他还要开辟一个“标本陈列室”，“须将各国新式瓷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买。”目的是“以便仿造”，⑧使醴陵的瓷器生产迅速摆脱落后局面，并打入国际市场，“求能为中国收回利权⑨。”

关于开办和常经费，熊希龄主张从两条途径解决：一是“提拨公款，以资商办。”⑩即先借公款垫支，而后从厘金局抽取的瓷器税收中弥补；二是从株萍铁路的票价收入中找出路。他很赞赏日本从汽车、电车的乘客票价中加收税额的办法，并建议将这种办法移植到株萍铁路上来，因为这条铁路是专为运煤而修建的，如果也照日本通行的税利，从每个乘

客的票费中“加抽数文，由铁路局代收。^⑥”这样既保证了铁路收入，又解决了瓷业学校的常年经费开支，实为一举两全。

根据熊希龄的主张及其具体实践，不难看出，他从“实业救国”的观点出发，通过提高生产力（如引进先进技术，培养技术人才等等）和相应地改变生产关系（变个体手工业的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确途径，对促进醴陵瓷业的发展，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回顾这些主张和实践，对于探索醴陵瓷业发展的轨迹，吸取前人创办和管理企业的有益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

（刘建兴同志系北京师范学院教授）

注：

①②《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08页；《中华现代名人录》第366页；《湖南的西北角》李震一著；《民国名人图鉴》杨家骆著。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98页。

④《醴陵县志》1947年版。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熊希龄奏清湖广总督方设立瓷业公司呈文》。

②《瓷业学堂速成班文凭》光绪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④姜海，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县志记载，三国时期，刘备的将领姜维，曾在醴陵驻兵，后人为了纪念他，乃将县城北面新淦江的姜岭称之为姜海。

湖南熊常庶希齡上前端抚方 考察醴陵瓷业书

窃查醴陵瓷土最富，产地甚多，如汾山、赤足岭，青泥湾、老鸦山、茶子山、唐山口、邓家渡等共有七处，而以汾山之土质为良。山又分上中下三段，窑户六十余家。每家年出瓷器价值洋三千余元，六十余家共二十余万元。合他六处统计，该县共岁产瓷产洋三四十余万元，实为大宗入款。唯瓷器粗陋，仅供下级贫民购用。近年以来，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推求其故，厥有权因：

一、各窑户资本不足，每家田财不过数百串钱，难以延请上等工人制造新式；

二、采取瓷土毫无规则，率皆争挖浮土，捷足先得，未能深入，故多杂以黄泥等质；

三、瓷土未能漂细，每石百斤只用水洗去一二成，所留八成实余粗点；

四、工价以器之多少为定，故工人贪多贪速，手法粗笨。又因价廉不能购用上等石墨绘画，所烧之色甚暗；

五、釉药以糠灰调和变成黑泥，故烧出瓷器色均带青而鲜洁白；

六、近窑之山，薪木砍伐净尽，所用柴料购之远方，其价极昂，故瓷器成本因之加重；

七、窑户因无资本，必向运商预贷一二月购货之钱，运商借此抑勒，每洋一元作价一千二百余文。后因滋讼乃改为每洋一元作价一千一百一十五文，窑户吃亏尚巨；

八、江西景德镇私规最严，不准工人雇于他省，又俗传景德镇承办御窑，可用红绿彩色，他省不准仿办，故醴陵瓷业者无敢设法改良；

九、因江西萍乡现亦有瓷土窑山，制成器皿销售汉口，近又雇用景德镇工人二名加工制造，比醴陵稍精，故醴陵贸易遂为所夺，日见减色。

以上类种困难，瓷业殊形危险。从前粗花大碗，每十个成本售钱八十文，运至汉口售钱一百文者，今则醴陵跌至六十八文，运至汉口跌至八十文。而运商复于议价时以洋元兑交，每洋作价钱一千一百一十五文，货看低次者又于实价扣成八折。窑户仰屋而嗟，工人辍业以待，倘再因循不改，将恐此租赁一宗，亦将尽归萍乡商人之手。数千人所仰赖之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

希龄此次游往汾山，与文绅等宣布德意，窑户工人皆恍然于新旧之利害，无不鼓舞同声。所经过之处，难黍欢迎，围观延览，络绎于途，似人心见解豁然贯通，实可为之因势利导也。惟就希龄在日本所考察之瓷业，与醴陵两相比较，其不同者有二：一窑式，日本每窑八穴或九穴，而柴料由第

一穴燃起，以徐达于第九六。高至六七尺。所烧之器，均用炼土制成之皿或四柱盛之。醴陵窑仅五穴或六穴，高不及二尺。柴料于各穴陆续增加，瓷器每十个层累一套无盛之者。二釉药，日本有先上釉而后画者，为栗田烧；有先画而后上釉者，为普通烧。然其本地谓初次用土制成之器，必先入窑烧至四点钟，取出绘查方上釉也。醴陵则画与釉均只一次，并无分为两次入窑者，以此不同之故。希龄虽携带日本釉药颜料至彼试验，尚未出窑，不悉能否合法？所幸该山窑户有廖姓者，近由景镇购得釉药一块，施之醴陵土质制成器皿，色极洁白，与景镇窑无异，不过器式稍粗，由于工年之钝，而其瓷质可以造画造色，固确有把握也。此种瓷业若能发达，不独大湖以南销场甚广，而西通云贵，南入粤西，皆将为我市场，比购之数千里之景镇为廉，且与日本瓷业相较，我之成本尤轻。盖瓷器重在土质人工，日本漂净之泥，每百贯中得纯土四十贯，每纯土一贯价钱六仙，合中国钱六十文。每贯百两，十六贯为百斤，合值中国钱九百六十文。醴陵为山瓷土，均系朝产，而由民人承租，名为顶户。各窑户又向顶户租用，每辘轳一具，年收租钱一千文。不论取土之多少，可谓极贱。又据窑户估算，每原土一担，约需工本钱三十六文，漂净后纯土一担，约需工本钱一百二十文。若照日本漂法，亦不过加倍而止至二三百文，较彼每百斤需钱九百六十文相距甚远矣。又日本人工，上等工资每人每日工钱五角，次则三角，画工加倍。醴陵工人成素坯者以挑计算，每挑大碗二十八个，中碗二十二个，小碗三十八个，每人每日可成六挑，每挑工钱四十五文，中小各碗以此递加，是尽

一日之力，亦只得工钱二百七十文。今改为细瓷，不过所成挑数较少耳，价则如故也。画工粗者每挑工钱十文或二十文，稍细者每挑工钱六十七文，每碗平均摊算，仅值画工钱二文数厘，易以新法，自当加倍。总之比日本为最廉也。前阅日本明治三十六年关税册，载该国输出售于我国之瓷器，约值洋五十五万九千五百九十六元。又亲见濠户窑厂所制青花小碗，均仿中国器式，近年专运北方奉天直隶等省，销场极大，故景德镇瓷利为其减夺。华人不知美术中拙，喜用吉利花样之物，故彼以粗糙之器，而得我重价也。我若有成本最省运本最轻之货。其必能抵制输入可无疑矣。

惟考察既有把握，则办法须有次第。一立学堂，即照前日条陈办理。盖醴陵瓷工虽多可者，然其心手不灵，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烂熟，且釉漆若何调制，杂质若何涤净，均须教习试验，日求精美。二设公司，此须由龄等招商承办，集资本三万元即能成立。因醴陵窑户均无殷实之家，成本不足则难言进步，必先设公司以为之倡，股额可留一成为该县绅商及各窑户之入股者。三择地，醴陵洑山距县城二十五里，虽道路平坦，然购采柴料极难，加以脚力价复增昂。又制成之碗运至姜湾（离县城五里，滨临小河），每石大碗十六同，每同力钱六文八毫，每石力钱一百零八文八毫。今就地势，必须将各学堂公司建设姜湾地方，易于购采柴料，省去运费。且即以运碗之脚力，改为运土费亦相等。另于洑山设一漂泥厂，将土制净，再运姜湾，尤为省费。且地既滨河，学堂需用机械不难登岸，制成之器上船亦甚便也。四均利，学堂既设，宜于各窑户中挑烂熟工作者数十人为速成科，又

于各窑户工人中之子弟，择其年在十五岁以内文理清顺者为永久科，学成之后听其各回本厂，自谋改良。惟公司资本既巨，则不免近于专科，今请分为次第交换之法，醴陵现在所制粗瓷器皿便于贫民购用，不能概行改为细工，初二年内，学生技尚未熟，只能模仿景德镇之式，公司亦须就与本国相宜，而便于人民嗜好者参酌制造。迨各学生学成，回窑改烧景式，则公司专制西式各器，抵制外货之输入，使各窑户得以余利。至五年之内，各窑户如有进步，能做西式，则公司即精益求精，专求制造输出各国之品，如日本森村组、西京锦光山，大阪藪明山工场办法，或能为中国收回利权，此其成效，当在五年后矣。如此交换之法，既可羽翼各窑户，使之逐渐改良，无失其固有之利，而公司学堂对于人民亦无负开化之责任也。

惟学堂延访外国技师，经费甚巨，必须先为筹措的款，乃克有济。兹请分为两项，一日开办之款。查此项学堂机械，如水箕场之除水器，调制室之橢圆皿成形机，素坯土捏机，釉药粉碎器，原料粉碎器，湿式材料粉碎器，机械运动辘轳，石膏型室之小物，压榨成形机，以及锅炉等件，皆须备置。其尤要者，则为标本陈列室，须将各国新式瓷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办，以便仿造。又建筑学堂及实习工场，亦与他项学堂不同，约需经费银一万七八千金，须请提拨公款，以资商办。查醴陵现在粗瓷，每年出数至少以三十万串钱计之，照厘局抽厘例，每碗价钱五十文，抽厘钱一文二毫，每百文应抽钱二文四毫，合计当有七千二百余串之入窑。业款若衰，即此亦不足恃，倘改良制成精器，所收厘金

必有二三倍于此者，公家此后所获之益可预卜也。今即由公款提拨一万七八千金，无异民间之贷借，五年以外本利加收矣。二日常年之款，一醴陵姜湾向有碗行，由文张两姓请领牙帖，近为运商所持，时生齟齬，该姓有自愿缴为学生经费，每年提二百串文为该两姓帖弗之意。惟醴陵窑户值此难之时，若再抽取行用，实所不忍。拟为变通办法，暂于运商所定洋价一千一百五十文之内，提出一十五文缴归学堂，作为常年经费。候后瓷器改良，窑户运商公平交易，将所勒定洋价议销，再改由牙行抽取行用，即将此一十五文罢免。二醴陵自设萍潭铁路以来，不知者以为此埠必日见兴盛，实则铁路以技翰并设，交通最多，收利最产，小民沾益亦最均。若仅于僻壤建一枝路，只便开矿而已，本地人民实无所益。醴陵自此铁路兴办，购去地皮约值租谷二万余石，每年即少此收获之利息。又从前萍煤多用醴陵小船装至湘潭，约有数百千号。今株洲既通铁道，此项船只顿失生业，苟非速将工艺振兴，不足以救此困苦。查日本因有战事，新增税课，有所谓通行税者，系于汽车、汽船、电车之乘客票价中加收税额，定为三等，二百里以上者，一等洋五角，二等洋二角五分，三等钱四十文。二百里未滿者，一等洋四角，二等洋二角，三等钱三十文。百里未滿者，一等洋二角，二等洋一角，三等钱二十文。五十里未滿者，一等钱五十文，二等钱三十文。三等钱十文。日本每里合中国六里，萍潭铁路即为日本五十里之未滿者。昨闻由萍乡至醴陵一路，每月所收乘客票费约数千元。株洲告成，每月统计可入洋一万余元。查此路专为运煤而设，搭客所入乃其格外赢余，而此中乘客又多醴民，拟请仿照日本通行税则，每乘

客票费按照等级加抽数文，由铁路局代收，每月解为陶器学校常年经费，以弥补本地人民所失之利，而铁路亦可长资保护之益，实为一举两会。况此路均由本国公款建设，自有主权，与芦汉之贷洋款者不同，加收经费并无从中难阻。拟请由钧产据情咨达铁路大臣立案施行，以昭永久。谨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黄炳炎抄录

注：一、此文原载《东方杂志》第十一期，光绪乙巳年十一月版。同年七月九日，《时报》全文刊载。文中标点，系抄者所加。

二、据考证：一九〇五年春，熊希龄随湖南巡抚端方出国考察宪政，见日本产瓷精美，心窃慕之。为振兴实业，与县人文俊铎于四月抄束装前往汾山考察。此文系考察后所撰。

敬怀醴陵瓷业的一位宗师

吴 寿 祺 先 生

邓 文 科

享年89高龄的醴陵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长辞我们已整整十一个春秋了。在他谢世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委托我写了一幅“恩师永别，技艺长存”的挽联。这简单的八个字，仅仅是表达我们的悼念之心，还远远不能当作是对他老人家的全面评价。因为吴老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好老师，把他毕生学到的技艺交给了后辈，更值得讴歌的是，他为醴陵瓷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为人品德方面也是后人可师的。今天，笔者应《醴陵文史》编者之约，在匆忙中写点吴老给我的突出感受，以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

吴老一生与醴瓷共命运

大家知道，醴陵瓷业在250多年前就开始烧造粗瓷，但生产细瓷和釉下五彩瓷器却只有80年的历史。清光绪年间，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界著名人士熊希龄，为了振兴湖南瓷业，探索新的制瓷工艺，以抵制洋货的输入，曾多次赴日

本考察，后来又在醴陵东乡生产粗瓷的汾山等地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通过这些活动，使他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醴陵瓷土最富，产地甚多，交通便利，具有发展湖南瓷业的优厚条件。可是在瓷工素质和制造工艺上讲，却又是非常落后的。于是他向当时的湖广总督端方呈文，提出了“一立学堂，二设公司”这样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在办学的问题上，并确定了一个富有经验的施教方案，即在各窑户中挑选娴熟的工人数十人为速成科，在窑户的工人子弟中择其年在十五岁以内而又文理清顺者为永久科。学成后，听其各回本厂自谋改良。

当时的吴寿祺，还是一个不满20岁正在汾山粗瓷厂当学徒的小伙子，在熊希龄的积极倡导下，于1906年春，他考入了设在醴陵姜湾的“醴陵瓷业学堂”图画速成班。由于他自幼聪慧，具有美术天赋，加之能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时获得优等文凭，并分派在当年兴办的“湖南瓷业公司”任职，从事陶画工作。那时的瓷业公司正是锐意改良，兴旺发达，其产品蜚声中外之际，而吴寿祺也正在风华正茂的成长中。清末民初间，醴陵瓷器参加国内外几次赛会均先后荣获金质奖牌，吴寿祺则是这些赛品的制作者之一。那时醴陵瓷器（特别是釉下五彩瓷器）之所以驰名中外，吴寿祺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名师巨匠，无疑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群魔乱舞的旧中国，民族工业始终难以生存。到1930年前后，随着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以及一些商办瓷厂的相继倒闭，醴陵瓷业就进入了极其衰落的境地。在那些岁月里，艺人们只好散之四方谋生，吴寿祺也就

漂流在南京度日。1935年的时候，在中华大地一片哀声中，他离别了南京回醴，从此弃艺归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返陶瓷艺苑，以他的饱满热情和发挥着几乎失传的技艺大放异彩，为醴陵瓷业作出了百世流芳的贡献。

综上所述，吴寿祺的一生，是与醴瓷共命运的，他是随着醴陵细瓷业的兴盛而成长，也是随着醴陵细瓷业的衰落而四处漂流，最后又是随着醴陵瓷业的恢复发展而重见天日。他这几十年的陶艺生涯，紧紧融会在醴陵瓷业的兴衰中。老人生前常常回忆和感到高兴的是，他伴随着醴陵瓷业熬过了难眠的长夜，送走了黑暗中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春光明媚的瓷城曙天。

宗师逢盛世 贡献独特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民族工业日益兴盛，醴陵瓷业也就象枯木逢春一样获得了新生。到1954年，为了继承我国陶瓷艺术的优良传统，恢复醴陵釉下彩瓷这一名贵产品的烧制，当时的醴陵瓷业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醴陵釉下彩瓷在建国前整整20年停止了生产，以至缺乏传授技艺的人才。在那时势召唤英雄的时刻通过调查访问，才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一位在旧社会失业还家务农20年的釉下彩老艺人吴寿祺先生，这时他已经是年近古稀而幸存的老人了。吴老先生被请出来之后，先是担任一般的美术教学工作，1955年调入刚成立的陶瓷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老人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精神焕发，谦逊

勤奋，把自己毕生的技艺交给了后辈。通过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美术训练班等方式进行教学，技艺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茁壮成长。这样就使醴陵釉下彩瓷这一枝灿烂之花在春风吹拂中更溢芬芳，重新博得了国内外人民的赞誉。

经过30多年来的恢复发展，无论在生产工艺、制作规模、题材内容、装饰手法、艺术水平以及色料品种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从制作规模上讲，自六十年代以来，不仅醴陵地区有专门生产釉下彩瓷的群力瓷厂，而且国光、星火、永胜、新民和本省其它地区的建湘、洪江、界牌、新湘等瓷厂以及众多的乡镇企业都有所发展，使湖南成了“釉下彩瓷之乡”。在恢复发展的过程中，吴老先生直接间接培养出来的彩绘设计人员又用自己的实践丰富了这一传统的装饰工艺，因而创造了各种形式风格的装饰技法，使之呈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并不断发扬光大。昔日的一粒种子换来了今天的满园春色，这是吴寿祺先生在新中国这个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重大而独特的贡献。这贡献将永远载入醴陵瓷业史册而为后人歌颂，吴寿祺这个名字和他所传授的技艺，也必将一道永生。

铁骨双勾 功力深厚

吴寿祺先生之所以为醴陵瓷业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称得上是时势召唤出来的杰出人物，是有着多种因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怀技者恰逢其时，是因为他学得了一身濒于失传的本领，掌握了釉下五彩的全部制作工艺，具有深厚的功底，在线描方面更是遐迩闻名。

只要对中国美术素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线条是我国民族美术的造型基础和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因此釉下五彩非常讲究线条的运用。传统的釉下工艺最主要的装饰技法就是勾线分水（分水即填色），故前辈艺人在坯上勾线都体现了很高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吴寿祺为了适应这一工艺的需要，从十多岁开始，终生精勤不倦地进行了实践的锻炼，所以他的釉下双勾具有很深的根底。1963年，先生向全国美协交了一张白描花卉，当年就被吸收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线洗炼圆健，造型结构严谨，既不浮薄，也不矫揉造作，并做到了劲中求柔，柔中求刚正。欣赏他的作品，除了得到美的享受外，还能体味到作者的耐力与意志和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气派。先生喜欢将铁线描和钉头鼠尾描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根据画面的需要，有时采用笔法均匀，线型始终如一铁线描，有时则用“钉之头，鼠之尾”的笔意。这种钉头鼠尾描落笔顿挫，压力在线的始端，中锋行笔，由重到轻，收笔像鼠尾那样细健，使人感到刚中寓秀。特别值得介绍的是，他的线在纹样造型时，善用程式化的方法构成，多样而易于统一，繁杂而不失条理，带有较浓的图案趣味。可见他的笔下不仅体现了一般的绘画法则，同时也符合了装饰艺术的规律，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健康淳朴的情怀。

白描是我国一种深受群众喜欢的绘画形式，吴寿祺先生的白描格调不低不俗，同样有“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之美。从他的大量白描作品看，先生最爱描绘月季、荷花、牵牛、百合、豆蔻、水仙、芙蓉、海棠、绣球、菊花、萱草、虞美人等花卉。每当我们欣赏他的这些作品时，总感到百看

不厌，韵味无穷，不知老人的线条和别具一格的花卉造型怎么会有这样长久的魅力。尽管从白描的角度要求还嫌线条变化不多，且令人有入规矩而未能大胆跳出规矩之憾意，但从线条的圆厚、骨力、秀健、洗炼和装饰美等方面讲，恐怕一般画家也是难以企及的。更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吴老晚年的线也只有聚点处的模糊，而没有腕衰乏力颤抖之迹，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诚然，吴寿祺先生的功力，并不只在勾勒上，在整个传统釉下五彩和釉上新彩的装饰技法中，无论构图设色和勾、填、点、刷等方面，都具有高深的造诣；在釉下彩瓷制作工艺中，对于处理坯釉、烧成和色料，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篇幅不可拉得太长，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

勤奋俭朴 谦逊为人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在工艺美术界，是非常注重人品的。只有技艺精湛而又人格高尚的人，才能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吴寿祺先生之所以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重，除前所述外，还值得研究的是在一个“德”字上。为了介绍吴老的美德，这里不打算过多地讲大道理，只是从一些不是惊人的“小事”中去探求他的美好心灵。

从1955年8月起，吴老先生一直是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一位著名的老艺人。1966年元月的一天，研究所有三喜盈门，一是吴老光荣退休，二是他的八十大寿，三是建所十周年。当时的所领导为了庆祝这个日子，表彰吴寿祺先生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举行了一次较隆重的聚会，并展出了先生的

画稿几百幅。在那次会上，不少职工（特别是吴老的学生们）纷纷发表感想，一致表示要学习吴老师的优秀品质和在事业上精勤不息的可贵精神，从而更好地为祖国作贡献。吴老本人也十分感动地说：“我活到八十岁，自古以来，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有今天的情况”。

在会上，有的还以题词庆贺，有的则用画幅祝寿。如当时的群力瓷厂就以党政工团的名义赠送了一幅《长寿图》，画的是两只长尾寿带鸟栖在松树上，并题曰：“……它要求于人类的甚少，给与人类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名曰颂松树，实则赞吴师。吴老师的确是这样，他在教学上海人不倦，在技艺上精益求精，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克勤克俭，在待人接物方面又是那样的慈祥、诚恳、谦逊，这不是人人都容易做到的。可是他要求于人民的却又总是那样的简单和不足时也知足。在六十年代的困难日子里，研究所的领导多次在会上正式宣布：老艺人不必按时上下班，雨、雪天可以不上班。而吴老却认为是特殊。在他退休前的任何时候，莫说上下班按时，就连开会、学习也从不迟到早退。他说：“只要能做到的，应尽我之责”。尤其令人不好理解的是，每次发给他的奖金他次次不肯接受，总是真心实意的送还单位，使得有识者无不敬佩。他有一次对我们说：“一个人起码要做到三不，工作不懒惰，生活不奢侈，待人不虚伪”。他还常对他的女儿和他的艺徒们说：“为人要不贪污、不腐化、不做坏事”。所以他在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他的女儿现在是个出色的经济工作干部，也一直遵循着父亲的遗训而廉洁奉公的对待人民。

关于吴老的为人就简于上述，仅从这样一些平凡的事例中就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而又不尚空谈的高贵品质和纯洁的思想光辉。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吴寿祺先生为醴陵瓷业所作的贡献和他的才与德，这篇短文是难以尽言的。还有很多值得称颂和学习的事迹，就只好留给熟知他的人们在阅读时去补充好了。笔者今天写的这些，仍然不是对吴老的全面评述，而是作为他的学生对老师的一种敬重和怀念。不妥之处，恳祈读者赐教。

附吴寿祺传略

吴寿祺，字官翰，清光绪丙戌年(1886)十二月生，醴陵北乡八步桥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毕业于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图画速成班。毕业后，在醴陵、长沙两地从事釉上釉下陶瓷彩绘工作。1928年受聘于南京旧中央陶瓷试验场画釉下彩八年，嗣后失业还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年8月起，一直在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工作。1966年元月退休回家，1975年9月病故，终年89岁。

老人生前为陶瓷研究所技师、湖南省文联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醴陵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委员和省、县人民代表。

绘画技艺传后人 珍贵名画献国家

——忆瓷业老艺人唐汉初二、三事

文 汉 民

1956年，我在醴陵瓷业公司工作时就结识了瓷业名艺人唐汉初同志，他是湘潭县人，生于1914年3月29日一个贫民的家里。他以赤子之心，为恢复和发展醴陵釉下彩传统艺术，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85年10月19日在醴陵群力瓷厂病逝。

唐汉初三岁失去了父亲，十三岁便在一家瓷器店就艺学画。由于他聪颖好学，广交艺友，勤奋苦练，彩绘技艺日益精进，遂逐步刻苦磨练成为瓷业界的彩绘名师。但是，在旧社会技艺得不到重视，为了谋生，他先后辗转于醴陵、湘潭、邵阳、雷打石及湘北宜昌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在醴陵陶瓷研究所和醴陵群力瓷厂从事釉下彩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由于他思想进步，年老心红，1974年12月退休，但人退休工作 and 思想没有退休，仍继续从事设计和带徒授艺，为企业、为国家争做贡献。1979年光荣入党，并被选为醴陵县第七届

高望重而又事必躬亲的老校长主持校务，自然会推动全盘去兢兢业业地工作。可遗憾的是来自经费方面的掣肘，迫使谈校长愤然离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老校长上任前，县政府许诺的尽力维持教育经费的话，到他上任以后都落了空，不仅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薪和伙食得不到保证，甚至连学生的伙食（当时制度，凡师范生都是公费伙食），也得不到保证，事务主任陈俊成三日两头去向校长告急。如说：“我以私人名义已向省银行、县银行、县商会等单位和肖垣记、赵明记等大商号贷了款，以济燃眉，可是目前又有断炊之虞……”谈老听了，非常恼火，也三日两头地往县府跑，想求得解决。可每次都是县长亲自出面软拖糊哄面出门了事。

有一次是四月分，谈校长气极了跑到县府财政科，找到该科长贺大俊，问他们到底是说的话，还是放的屁！还举棍要打贺，贺见事不祥，溜之大吉，县长熊迪民出来又把他请到县长室坐下，敷衍说：“给您解决……”可仍然还是几句空话。到了五月分，当时政府对经费依然没有解决，谈老也懒得写什么辞呈，就叫

他想起了十几年前王震同志来厂视察时说过的一番话：“岳阳楼是古今中外的名胜，能不能把它搬到瓷器上去？”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向厂领导提出了到岳阳桥去写生搞创作的意愿。厂领导积极支持。就在1978年的12月，他带着易炳萱、张震、彭云坤等三个徒弟，迎着凛冽的寒风，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阳楼，经过细心观察、择角度，开始了写生创作，用了整整四天时间，素描“岳阳楼”的初稿已跃然纸上。回厂后，他拿着“岳阳楼”画面初稿，虚心征求彩绘工艺师李小年等同志的意见，又经过十多次的反复修改后，再交给李小年同志换样定稿，装饰成套餐、茶具，同时，在其他各工序同志的通力协作下，以古今名胜为题材的“天下岳阳楼”，终于以釉下彩饰的形式，搬到了瓷器上，继承了传统工艺的技法，实现了王震副总理的期望。“岳阳楼”画面的创作成功，是唐汉初同志晚年的艺术珍品。四十五头釉下彩“岳阳楼”康乐餐具的画面装饰，突破了传统的山水构图，采用松竹梅图案边花和郁郁葱葱的暗柳作衬托，岳阳楼端庄高耸，与湖中君山遥遥相望，湖上的轻舟风帆，远近主从，动静显影，点缀得淋漓尽致，把洞庭佳景和那“衔远山，吞长江”的磅礴气势巧妙地再现于瓷表，见者无不赞许为“瓷艺新秀”。1979年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出时，深受外商欢迎，四十五头釉下彩康乐餐具，一次订货一千套，它的换汇率比同类产品提高40%以上。

设计立意新 瓷像留千古

1958年，组建专门从事釉下彩瓷生产的醴陵艺术瓷厂

（后改名为醴陵群力瓷厂），他由醴陵陶瓷研究所抽调该厂从事釉下彩设计工作。1959年，醴陵群力瓷厂承担了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等全部国家用瓷的生产任务。他为国家三馆用瓷设计的画面有：运用深绿、浅绿描绘的勾子莲装饰工人体育馆使用的折边形中餐具；运用深绿、浅绿和玛瑙红描绘的三色茱装饰民族文化宫使用的折边形中餐具、成套餐具的画面设计，构图简练，色彩艳丽，活泼明快，给人以柔和舒畅的感受。1964年，醴陵群力瓷厂承担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全部国家用瓷的生产任务、唐汉初同志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瓷设计了釉下彩蝴蝶花装饰莲子形成套茶具和胜利杯，蝴蝶花的构思，主题突出，那饱满的花头，粗犷的花叶，鲜艳的色彩，显得生动活泼，被人们誉为不可多得的釉下彩瓷中的珍品。

任弼时同志在八宝山的遗像，是江西景德镇一家瓷厂制作的釉下彩色瓷像，天长日久，颜色变灰了，弼时同志的亲属林一新找景德镇瓷厂的同志商量，要求制作弼时同志的釉下彩瓷像，要黑白的，不要釉上和彩色的，得到的答复是制作不了，林一新同志又请福建的一些瓷厂制作也未成功。1975年林一新同志来到醴陵群力瓷厂，同老艺人唐汉初谈及此事，唐说：在六十年代初，我曾为湖南省主席程潜画过釉上黑白瓷板像，但是釉下瓷板头像从来没有作过，不过既然釉下能画画，就能画头像。但有个问题，釉下颜色要经过1300℃以上的高温烧制，难度是很大的，伟人的头像，出了次品，像损坏了，怎么处理呢？所以过去想开展这项业务，又顾虑重重。林一新同志说，不要紧，我只要两个好一点的

釉下头像，出了废品次品我全部包下来。群力瓷厂党组织对绘制国家领导人的釉下瓷像很重视，专门召开厂党委会研究决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接受下来了，由老艺人唐汉初全心全意绘制头像，老工人李雪清刻苦试制瓷板，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长约70公分，宽42公分的釉下瓷板头像，终于试制成功了，看起来，非常逼真，比照片显得更有光泽和更加清亮。1977年，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日子里，唐汉初和工人们又制作了毛主席釉下黑白头像，1978年，他们又制作了周总理、朱总司令的釉下黑白头像。

釉下彩瓷板头像绘制成功，为陶瓷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唐汉初无限感慨地说：要是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能制作釉下瓷板像，那么，今天我们就能看到秦皇汉武和历代劳动人民的真容了。可惜千古风流人物的面貌都是后人凭想象画出来的。如今，初步探索解决了绘制釉下瓷板头像这个难题，是有很大大意义的，照片和画像，迟早要变色，而釉下瓷板头像，那就会千年不变样，万年不褪色。如果把这个领域再打开些，恐怕外国人也会喜爱自己或自己亲人的釉下瓷板头像，这将是一门值得关注和继续探索的艺术事业。

陶瓷雕刻名师——徐协和

徐协和（1904——1966），原名徐喜仔，别名徐薰，江西丰城北坑人。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其父是当地的煤矿工人。他读过四年私塾，十四岁到景德镇蔡永茂瓷店学徒五年。出师后，由于国内战事此复彼起，局势动荡不定，他历经坎坷，曾参加过农民自卫军，党的地下组织，还到上海王光华陶瓷制造厂、陶瓷标准公司任过工程师、顾问等职。他出于生活所迫，为私营瓷店帮过工，自办过小作坊。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极不安定。

建国后，1952年11月由中南工业部函江西陶瓷专科学校，他作为能烧能烤能设计受聘来湖南湘潭中南电瓷厂，1953年调到醴陵电瓷厂。1955年组建醴陵陶瓷研究所，他被调入研究所工作。1958年提升为技师，随后任过县政协委员，先后还被评为瓷器公司和县的劳动模范。

徐老在陶瓷研究所工作期间，创作设计了大量的瓷雕作品。他为北京“三馆瓷”、人民大会堂湖南休息厅的陈设瓷做过设计工作。同时，还为醴陵培养了一批陶瓷雕刻人材，其中突出的有唐锡怀、汤声群、李顺枚、徐前雨等。

徐老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陶瓷艺术家，对于雕刻中的刻、堆、镂、捏、塑的技法，他不但运用娴熟，而且对泥釉的配

制、工艺制作、产品的烧烤，掌握较全面。他一生中作品甚多，他的得意之作有龙船、捏雕荷叶草虫、双层镂空云鹤球等。其中，龙船是他的最佳作品，这一作品综合了雕刻中的刻、镂、捏、塑、镶几种主要技法，船上的楼台亭阁，空灵轻巧；平台朱栏飞檐，钟铃巧挂；花窗上的纹饰细如发丝；船锚索链环环相扣；龙首上的眼睛、舌头频频摇动，真可说是活龙活现，乃世间瓷雕稀有的珍品。

徐老在陶瓷研究所工作只有十年，他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艺术遗产。湖南能有如此精致的雕刻艺术瓷，是徐老直接培植的结果，可以说他给湖南艺术陶瓷增添了一朵新花。

（唐锡怀整理）

一九五六年对私营瓷业实行公私

合 营 概 况

文 汉 民

一九五六年，醴陵对私营瓷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改造工作采取先城市后农村、大厂带小厂、由点到面的方法步骤进行。整个改造工作大体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开办训练班，成立工作队；第二步是宣讲政策，落实改造规划；第三步是由点到面，搞好清查核实资产工作。改造过程，自始至终坚持贯彻了和平改造的“赎买”方针政策，并明确规定了不准“追、挤、挖”底财，对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划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

改造工作是在充分利用原有设备，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原则下，根据生产上的协作依从关系，技术力量的合理使用，既便利统一管理又便于全行业的改造，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将公私合营包进来、把个体手工业带进去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即将醴陵31个社（组）和185户个体手工业全部并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这样，原城区138户合并合营为：建设、劳动、力生、东平、协

盛、湘醴、华新及光华瓷厂等八个大户，乡村区原66户合并合营为：裕兴、元裕和、正兴和、长岭湾、严裕和、严家冲、渌口镇、禽盛、付永昌、黄家湾、顺昌、同丰祥、昌记、建民、德昌等15个生产工区。

城区138户合并合营为八个大户共有从业人员2838人，全部资金925,931元。八大户的组成情况是：

一、建设瓷厂：由20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288人，资金65,317元。

由天顺、建中、吴贤记、球记、生顺、同力、黄忠记、朱家海、刘云记、张德记、游克章、邓喜记、谭子祥等19户合并到原公私合营建设瓷厂。

二、劳动瓷厂：由15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348人，全部资金179,883元。

由精勤、洪胜、衡利、劳动、杨和昌、屈涛记、义胜祥、危中堂、和平、李人伦、明联、群和、生顺、永信、联兴等15户组成。

三、力生瓷厂：由20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403人，全部资金54,421元。

由原力生、协力、协裕、松茂和、烈军工厂、泰和、贤生记、朱正记、宏兴、新华、新协和、郭玉记、联益、唐贤记、付昌记、王友记、彭庚记、张声记、李武记、周庆裕等20户组成。

四、东平瓷厂：由七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75人，全部资金54,304元。

由原安平、东联、三班、自救、陶益、联兴、同意、程

明记等七户组成。

五、协盛瓷厂：由11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399人，全部资金174,872元。

由原协盛、协昌、瑞记、福利、新生活、吕干丰、谢兴记、老华昌、建民、忠羹、原昌等11户组成。

六、光华电瓷厂：由13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25人，全部资金113,199元。

由原光华、东亚、一联厂、华成、精益、工联、复华、新兴、业精、易锡记、利华、裕群、华德等13户组成。

七、华兴瓷厂：由29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581人，全部资金136,992元。

由华兴、太丰、复顺、集中、大中、民主、易生记、王玉记、吴茹记、张云记、傅明新、黎培记、谭德记、胡秋生、华昌、陈明记、友联、民森记、华益、江隆记、肖声记、陈华记、刘寿记、王萼记、朱开记、长来、陆友记、个体挑花工共29户组成。

八、湘醴瓷厂：由23户组成，共有从业人员519人，全部资金141,943元。

由民生、杨玉长、程云记、益丰、裕昌、厚昌、胡钧记、徐永泰、顺利、曹金记、（个体手工业）郭模记、湘记、工谊、西联、新成、徐元泰、利民、周汉记、新新、郭汉文、傅尧凤、易根等22户与原公私合营湘醴瓷厂组成。

乡村区66户合并合营为15个大户，共有从业人员1790人，全部资金221,944元，其组成情况是：

一、裕兴瓷厂生产区：由七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

168人,全部资金6,858元。

由原裕兴、集合、新力、合兴、协力、长兴记、湘记（自救）等七户组成。

二、元裕和瓷厂生产区：由八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43人，全部资金9,972元。

由元裕和、元福盛、更新、汤乾胜、协合、顺民、合益、乾大生等八户组成。

三、正兴和生产区：由七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215人，全部资金29,915元。

由原正兴和、正兴祥、共荣、同彬、裕庆昌、和平（自救）、永盛（自救）等七户组成。

四、长岭湾瓷器生产区：由五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07人，全部资金15,401元。

由原合利、全兴顺、长兴、忠海记、新祥顺等五户组成。

五、严裕和瓷器生产区：由严裕和、建生二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73人，全部资金2,884元。

六、淶口镇瓷器生产区：由原建设、新宜二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49人，全部资金16,735人。

七、严家冲瓷器生产区：由原胡天顺、胡顺生、耿炎兴、罗合兴等四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06人，全部资金11,527元。

八、翥盛瓷器生产区：由原翥盛、新兴、合胜、民安、聚胜、沈昌祥、陈新裕等七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49人，全部资金14,492元。

九、傅永昌瓷器生产区：由原傅永昌、江莲记、梁同兴、正生祥、同兴、陈福文、王协盛等七户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69人，全部资金21,749元。

十、董家湾瓷器生产区、由四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05人，全部资金14,125元。由原福和顺、肖按记、福兴顺、罗文生等四户组成。

十一、邓家渡顺昌瓷厂生产区：由顺昌单独一户组成，有从业人员41人。

十二、同丰祥瓷厂生产区：由三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87人，全部资金4,949元。由原同丰祥、同和裕、李正记三户组成。

十三、庙前垅昌记瓷厂生产区：由昌记单独一户组成，有从业人员48人。

十四、建民瓷厂生产区：由二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110人，全部资金36,036元。由原建民、建新二户组成。

十五、德昌瓷厂生产区：由六户合并组成，共有从业人员220人，全部资金37,303元。由原阳乾胜、彭复胜、同兴、生产合记、德昌、新记等六户组成。

改造工作，自始至终贯彻了和平改造的“赎买”方针政策，并明确规定了不准“追、挤、挖”底财，对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划分应宜宽不宜严的原则，虽然在进入清估工作的初期有的工作干部在代表会上公开号召资本家把底财拿出来投入企业，争取安排；有的清估人员对一张好一点的桌子也不同意留给资本家自己用等执行政策过左的冲击下，造成了一时不必要的紧张气氛和怕斗、怕财产归公、怕淘汰、怕

不安排、怕没房子住等思想疑虑，但都在经过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复评工作中，疑虑得到了澄清，错的得到了纠正，全行业公私合营了，资方人员和职工群众一起，兴高彩烈，敲锣打鼓放鞭爆，庆祝私改工作的伟大胜利。

经过经济改组，合并合营，使人员、财物、产供销在一定的规模下集中统一，有计划地发展瓷业生产，在中央的关怀重视下，经国务院批准，相应成立了湖南省醴陵瓷业公司，统一领导和管理醴陵的瓷业生产。1956年醴陵产日用瓷九千六百八十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件，比1949年增长了近六倍，并试制出口瓷器获得成功，完成了首批二百一十六万件日用出口瓷任务。

1956年11月，中央轻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陶瓷专业会议，进行新产品展览评比，醴陵参加展出的新产品有15件被评为优秀产品，为这次会议被评上优秀产品的50%。特别是被评为优秀的釉下花新产品，受到了中央首长和各兄弟瓷区代表的好评。精工釉下花的胜利盅，经过几次改进柄子和盖子的造型后，胜利盅的型体特别优美，后来成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使用的名贵珍品。

醴陵瓷业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建设瓷厂

吴 铮

解放后，醴陵瓷业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扶植下，到一九五二年先后恢复了大小瓷厂360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瓷厂与国营土产公司签订了瓷器产品收购合同。同时，国家投资350万元，使醴陵瓷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一九五二年，日用瓷产量达到4664万件，比一九四九年的1499万件增加了3165万件；产值379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111万元增加了268万元。

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醴陵瓷业也迈开了重点建厂的步伐，国家投资在阳三石兴建地方国营醴陵瓷厂，同时，国家对瓷器产品实行了统购包销，使醴陵瓷业逐步走向了计划生产的轨道。

一九五四年，县委决定抽调我和刘建成、宋锡锋、杨大春等同志组成城区私改工作队，选择私营刘祥记瓷厂为合营的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探索经验。祥记瓷厂座落醴陵城关镇姜湾寨子岭下（现力生瓷厂厂址）及姜湾上正街刘伯祥住宅内的一个琢器生产组等两处地方。私营经理刘伯祥系醴陵县工商联委员、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是私营企

业中较开明的工商业者。他第一个带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走公私合营的道路。这个厂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一万八千元，全厂职工共七十七人，七间的阶级窑一座，半边厂棚的园器厂两个组、琢器一个组，鉴定室和仓库一栋。釉料匣钵等辅助原材料，则多是临时购用。主要生产园琢二器，如罗汤、三大、乔壶、中坛等产品，而且是白胎产品向外销售，利润微薄。同时，生产靠手工操作，工艺落后，加工靠淘缸和粗捅，干燥靠太阳，烧成靠松柴，因此，生产力低下，质量亦无保证。

刘祥记瓷厂在县人委工作队的帮助下，于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经醴陵县人民委员会正式批准为醴陵瓷业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命名为公私合营醴陵建设瓷厂，人民政府并任命刘伯祥为私方经理，吴铮为公方副经理，其他从业人员照原不变。随后，一些私营企业都纷纷要求合营，故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被批准并入六户私营企业、十户个体，共一百九十八人。同年九月十五日，又将细瓷社一工场的一百八十六人合并进厂，这样全厂共有职工五百一十四人，管理人员三十五人（其中资方从业人员九人）。

公私合营建设瓷厂的建立，迈开了醴陵瓷业对私改造的第一步。为了尽快改善以往私营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端正经营思想，提高生产效率，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教育职工树立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认真对待产品质量，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力求降低成本。同时，加强了技术管理措施，建立健全提高产品质量的各项规章制度。

其次，抓生产的成龙配套。十月公私合营，十一月就增

加了一个彩绘加工组（包括烤花）。这个彩绘组是从各私营厂、挑选技术较高的十五名骨干组成的，他们是：唐运科、何波、刘福生、王德和、任昌远、李丕尉、张孝花、肖家栋、孙先水、廖福生、李舒明、廖玉若、李寿耆（故）、彭鸣皋（故）、黄志高（故）从而，改变了过去只生产白瓷不加工花瓷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第三，加强辅助工序的配套，扩大做釉和匣钵生产。将姜湾洲上柴水泥公司的匣釉自救生产组并入我厂后，由原来只生产灰釉增加了长石釉的生产，提高了瓷器产品的白度，扩大了釉的销路，增加了盈利。灰釉成本轻，但带青绿色，白度不够好。灰釉的配方是由汾山香炉坡及西山塘釉泥、与用石灰谷壳制成的灰浆料分别粉碎后，再经过淘洗，按比例配兑，其配合比例有以下五种：

一号釉：	釉泥浆	90%	灰浆	10%
二号釉：	釉泥浆	88.89%	灰浆	11.11%
三号釉：	釉泥浆	83.33	灰浆	16.67%
四号釉：	釉泥浆	75%	灰浆	25%
五号釉：	釉泥浆	66.66%	灰浆	33.34%

长石釉是以长石为主配入石英、白云石、方解石、釉泥等原料制成。白度较好。当时我厂石釉的配比是：

望城长石40%，望城石英30%，醴陵西山塘泥20%，醴陵冷水坑泥10%。

合营前的匣钵是依靠购进，经常出现有坯无钵装的现象。合营后，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器匣钵由匣釉班的机压生产，小器匣钵由并入的个具户陈云记生产，这样不仅保

证了本厂的需要量，而且还能向外供应。我厂所生产匣钵的原料，主要是用醴陵东乡冷水坑的镁质耐火粘土。当时的配方是：大器匣钵，冷水坑生料60%，熟料40%；小器匣钵，冷水坑生料占55%以下，熟料占45%以上。粉碎粒度比例：75目占66%，16目的占34%左右。按照当时阶级柴窑的温度，匣钵使用的次数，一般大器匣钵为10—20次；小器匣钵为5—9次。自从合营后，自己生产匣钵，使生产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大大减少了倒窑现象，保证了生产的顺利发展。

第四，组织个体户烧搭火，做到平衡生产。由于阶级窑的温度不均匀，每间窑前后温度相差140℃，一般相差80—100℃，表上与脚下的温度也相差50℃—60℃。因此，必须根据各间火位温度的不同去安排不同坯釉配方的坯件。我厂的坯釉为适应上述特点，配制出了三种坯料和五种釉料，保证了生产的需要。为了加速窑炉的周转，提高设备利用率，组织了厂外个体户签订搭火合同，以补本厂坯件的不足。

第五，组织和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技术革新，不断降低成本。烧窑工人陈华来等人创造了阶级柴窑“勤丢薄烧”的先进操作法，做到“两快”、“两利用”，即投柴快、塞火眼快；利用柴皮烧空壳（打冷火）、利用白砖代替松柴塞火孔，防止冷风进窑，避免墙下产品发黄的毛病产生，这样每月可以节约塞火眼燃料12,750斤。“勤丢薄烧”的先进操作方法推广后，由原来每次窑烧柴66,640斤减少到54,112斤，每次窑节省12,533斤；时间由原来的81个小时缩短为72个小时，减少9个小时。按照当时每月五次窑计算，可节约松柴

急务矣。近来海内缀学之士，多注意及此，或别立新法，或参酌成规，分途并进，用力甚勤；究之尚属研究之时期，殊乏适宜之系统，以至各馆分目，互有歧异。本馆中文图书，向分新科学及旧籍两部陈列。其分类方法，为免闭门造车难期合辙起见，凡新科学书，照杜威十类法已编成第一期目录，及增刊第二期目录各一册；旧籍则自民国十三年依四库例分经史子集四大类，丛书别为一类，已编成目录五册。嗣后逐年增购者，帙盈数万，而本馆经费支绌，财力人力，两感困难。不得已，仅抄录临时草目，暂资应用。惟是日积月累，管理诸多不便。上年增刊新科学书目既成，锡恩复率同馆员李君匡辅，柯君晴岚勉将本馆所有旧籍，一律重新编订。其分类法，总则仍依前例，子目则参用十类法，条分缕晰，伸缩自如。计历年添购新编者三万余册、旧藏改编者五万余册，阅时一纪，工作告竣。于是本馆新旧中文图书目录秩然俱备。虽学识简陋，难云完善，两于管理运用，庶较便利。以后陆续添购之书，既可随时依类孱入卡片目录之类，更无散见之虞。俟全国图书馆分类之法规规定统一后，本馆以此为

万担松柴。

不断改进成型方法。醴陵日用瓷器的传统生产流程工序很复杂、圆琢器大致分为手工揉泥、拉坯、印坯、干燥、修模、捧坯、利坯、洗水、注嘴把、粘接、上釉、挖坯、打兰边、装坯等十四个工序，还有很多辅助工序，从坯到瓷共有五十多个工序。这些工种完全保持了过去传统的手工操作方法。因此产量低，质量不稳定，产品规格也不一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职工们不断探索技术革新的途径。根据当时日用瓷生产手工量大的特点，使用手摇木质辘轳车，脚踏辘轳车和电动一轴带多机的辘轳车，（即旋坯、利坯、挖坯等单机）；并学习了外厂的注浆方法。采用上述这些土洋结合的生产工具代替手工操作，对当时合营企业的生产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不仅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而且使产量成倍增长。随后，又制订了严格的操作规程，保证了产品规格的一致，并规定不在工作岗位上锉刀，防止铁屑混入泥料。在操作中，贯彻清洁措施，控制泥料坯而夹带杂质灰尘，做到拉坯要匀，压坯要稳，拿坯要轻，放坯要平等由粗到细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使质量很快获得了提高。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切实提高产品质量，还制定了生产管理的十项措施。

由于私改政策在这个厂得到了落实，起到了示范作用，广大工商业者纷纷主动申请合营，从而促进了醴陵瓷业对私改造的进程。

①公私合营建设瓷厂的十项生产管理制度：

第一，作好原料选购，进厂分级堆放，保证原料质量；

第二，严格原料四六配方，过秤配料，一丝不苟，

第三，加强各工序管理责任制度，认真克服只顾个人利益，不管国家损失、只图易于生产不顾产品质量等违犯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的不良行为，

第四，增加增坯料陈腐时间，陈腐期一个月；

第五，严格半成品质量检查制度，贯彻自检互检、毛病脚压脚、毛病不过脚的制度；

第六，实行缺陷到人，按窑分间分边出窑计分的责任制；

第七，提高坯体质量，贯彻土匡响匡双沾浆的方法；

第八，加强技术研究，发挥集体智慧，积极推行“群医会诊”的方法；

第九、健全生产会议制度，每周星期三是全厂的生产例会时间；

第十，加强对职工的业余技术培训，建立了每月三个晚上有重点的组织职工进行技术学习。学习时采取技术讲座或技术表演等形式，帮助职工提高技术水平。

醴陵陶瓷工艺美术略谈

林家湖

醴陵瓷业，从十八世纪初（清雍正七年）于沔山创设瓷厂，发展至现在已经历了鼎盛和衰败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陶瓷工艺美术也随着不同时期而发展变化。就我所知略谈陶瓷工艺美术的发展概况。

粗瓷的简易美术装饰

雍正七年至光绪年间是粗瓷生产的漫长时间，共约延续了一百七十多年。最初是手工作坊，生产方式与制陶相似，拉坯成器，装烧不用匣钵。制泥、成型、画坯、装烧均系手工操作。碗类装饰多为口部一道兰色边线，到十九世纪中期，工艺上逐步改为制泥用水碓，拉坯、画坯、装烧分工作业。产品由碗类发展到多样品种，如烛台、油灯、缸、罐等日用瓷。装饰上由单一的色边进而以自然界的云、水景象装饰，并且在碗脚部位增加一道色边。这种简练的装饰运用了粗、细线条交叉，富有流动感。尔后，又运用植物作纹样，如鸡爪梨、松球、荷花、菊花等组成对称式连续文样，比之云、水纹样又进了一步。清末民初，油灯、烛台产品绘有

“天官赐福”，坛罐绘有“吉祥如意”。

我于1951年在浏山古洞天附近的土瓷厂，见有一个土坛，画面上绘有两种不同兰色的纹样，问其作法：深色是张公岭（山名）所产的灰块石（钴矿石）含千分之四的钴，浅色掺有一点釉泥，所以有深浅。可见粗瓷装饰，不仅纹样有进步，而且色彩上也有很大提高。粗瓷装饰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己创造的，为了追求生活中的美，运用了自然界植物组成纹样，美化产品。这种民间工艺美术是代代相传发展的，其中有不少的能工巧匠，可惜毫无记载。

细瓷诞生后的工艺美术

醴陵细瓷创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创办公立“湖南瓷业学堂”到集股成立“湖南瓷业公司”，后改为官商合办直至1918年，该公司下设十二个厂，由陶、鞭、模增设园器、琢器，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它的兴盛时期虽只有十多年，却是醴陵由粗瓷发展到细瓷的一大转折。这十多年间为陶瓷制造的多个工序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陶瓷美术方面，运用唐代长沙窑烧造的铜、铁金属氧化物在瓷胎釉中显出绿、褐的发色原理，经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终于掌握了这些金属氧化物在高温中的变化，并创造性地以钴、铬、铁配制高温黑色、钛、锌配制的黄色、钴、铬配制的兰、绿色和用赤金配制的玛瑙红色，虽在高温中还不够稳定，但突破了单色釉下彩局面，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效果，首创多色釉下五彩。

综上所述，从1909年至1915年，先后参加武汉、南洋劝

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荣获一等奖或金牌奖，前后七年得奖之多，可说是盛况空前，由此看出，醴陵细瓷工艺精良、陶瓷装饰的高超艺术，是醴陵瓷业史上的一次飞跃。

釉质方面，沿用粗瓷特点（白黑泛青）以浏山釉泥掺以稻谷糠壳（含石英）、熟石灰（含钙）配成青透明釉料，烧后釉面莹润透明，与高温色彩协调，富有韵味的装饰效果。

美工方面，从瓷业学堂开始，就注重招聘名艺美工。这段时期著名美工有张逢年、彭筱琴、陈直生、栗谷生、黎立生、徐德生、徐南庭、苏龙、黄俊、李鄂云、郑家明等人。他们当中有以人物见长，有以山水见长，有以花鸟见长，有以工笔花鸟见长。有的是以画画为职业的。如张逢年、彭筱琴、陈直生等，他们是著名湘绣画师，又是陶瓷装饰工艺的画师。上述画师对醴陵釉下五彩装饰上都贡献了各自的才华。在工艺上运用了双勾（白描）、平涂（上色），以后改为混水，风格上类似国画的工笔画法，和没骨画法，以表达中国瓷器装饰特色。影材上有人物山水、走兽、花鸟、图案装饰等。综上所述，瓷业公司创制的釉下五彩是画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醴陵瓷业的历史光辉。

“瓷司”倒闭后至建国前的陶瓷美术

自1918年（民国七年）拥有资金达五十万银元的湖南瓷业公司遭北洋军阀烧毁后，即结束了这一历史盛况。

1919年（民国八年）国民党政府开办“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又于民国十六年亦倒闭，从此釉下彩瓷停滞，艺人流散各方，釉下技艺濒于失传。

1930年前后，本地商人又陆续集资办厂，集中于县城中和一带，私建窑厂达八十余座。1944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由于日军入侵及内战，醴陵瓷业一蹶不振，仅存者只剩几十家小厂。

这个时期的工艺美术，基本上是手工绘制釉上彩，其中又划分粗彩、细彩和新彩。粗彩专画“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民间称“红花碗”）、“四季”（即春牡、夏荷、秋菊、冬梅，民间称“红绿碗”）。细彩是指一般装饰较为精细的花鸟、人物、山水等。当时以张勋业开办的“之同”陶画社、易瑞琴开设的最多瓷店、集资办的天工瓷店及邹一顺瓷店是醴陵有一定水平的彩瓷店，其中最多瓷店的易瑞琴是彭筱琴的学生，在国画及陶画装饰上都有较高的技艺，后来易的学徒以杨亦痴、彭步清、李玉栋等人较好，天工瓷店有美术教师汤漫等人。这几家瓷店比其他加工商店技艺装饰水平要高，创作不少新的釉上风格。此外，还得提一提江西人对醴瓷的影响，由于醴陵紧靠江西，相互联系密切。江西瓷艺历史长，在清朝办瓷业学堂时就请来江西师傅，尔后陆续来醴陵谋生定居者不断增加，到四十年代醴陵瓷业界几乎形成了江西邦，在琢器方面全由他们控制。在陶瓷美术方面，江西有名的粉彩也传入醴陵。青花中的龟边器先可器等，都是景德镇的传统画面，对醴陵陶瓷工艺美术均有一定影响。据吴寿祺老人说：釉下五彩的上色开始是平涂，效果不好，然后吸取江西师傅画青花的混水方法，效果好得多，烧后的颜色平整光洁。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江西人对于醴陵瓷业无论在成型工艺或者陶瓷工艺美术都作过一定贡献。

建国后的陶瓷美术

建国以后，醴陵瓷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陶瓷美术方面，为尽快恢复失传已久的釉下五彩，我和邓文科等同志经过几个月的查访，终于在醴陵乡村找到了唯一幸存的七十高龄老艺人吴寿祺。经领导同意将吴老请上来担任陶瓷研究所技师，传授釉下五彩技艺；经举办美术训练班，从而使釉下彩得到恢复。1956年又招收一批青年，采取专业培训发展新生力量。经两年左右的研制试验，1955年釉下彩瓷首展于长沙，1958年又赴北京展览，均获得参观者好评。由于在京展出深得人们珍爱，国庆十周年和十五周年用瓷均为醴陵承制。醴瓷先后在法国、瑞士、西德、日本、美国、罗马尼亚、朝鲜、巴基斯坦等国家展出，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

醴陵瓷业从恢复到发展的三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陶瓷美术设计与制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装饰艺术，创造了多种形式装饰与不同风格，使釉下彩艺术呈现出具有时代性的崭新面貌。无论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法、高温色料、品种及艺术水平方面都超过了历史水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陶瓷美术又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有的陈设瓷、日用瓷外，创造了大型挂盘、花瓶、陶瓷壁画及喷砂雕刻新工艺。群力瓷厂釉下彩餐具获国家颁发金质奖，国光瓷厂、永胜瓷厂产品获银质奖。陶瓷研究所在1964年更换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饰陈列瓷获国家奖金面千元。仅1980年至1986年醴陵陶瓷美术瓷共获轻工部颁二、三等奖五个。这些充分体现了陶瓷美术的日益兴盛。

记几位陶瓷美术工程师二、三事

文 汉 民

醴陵瓷业，在二百五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人才辈出，推动着醴陵瓷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里，就我所知道的，走成材之路，为发展陶瓷工艺美术，特别是恢复发展湖南陶瓷优秀传统釉下彩艺术，潜心奋进的几位陶瓷美术工程师，分别记叙如下：

湖南省醴陵陶瓷研究所原设计室主任，陶瓷美术工程师林家湖，系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湖南省陶瓷美术学会副理事长、株洲市文联委员、醴陵市文联副主席和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1950年，林家湖在县艺联负责人刘正伦、张石顽和县工商联办事处主任许伯秋等同志的支持下，举办了陶瓷工人业余美术训练班，除本人外还聘请了杨卓湖、潘树棠等中学美术教师和彩绘艺人吴寿祺、丁华汉、邓文科任教。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坚持办到1957年，共办了13期，使300多名陶瓷工人先后得到了轮训。

1955年，他调到研究所后，向所领导推荐釉下彩老前辈吴寿祺，建议将吴老招聘到所里从事恢复釉下彩研究工作

和传授技艺。所领导研究后同意他的建议，并要他去办理此事。其实，他原来并不认识吴老。还是1953年春，他为合作社收购松柴时，听见一位送柴的农民说：“我们那里的寿公比你们画的好得多。”一打听才知吴老住在板杉乡八步桥，年近古稀，身体健旺。林便多次去信请吴老出来到美训班任教，但未见回着。他便步行三十多里到他家去请，第一次吴老仍未答应，第二次又步行到他家里，说明请他进城指点和看看陶画情况，吴老才答应出来了。吴老进城后被他挽留在美训班任教，一直到招聘入所。吴老入所后，在林的建议下，所里招收了一批15岁以下的高小毕业生由吴老带徒授艺，培训釉下彩的新生力量和从事釉下彩的研究工作。为了普及和提高釉下彩，在瓷器公司的重视下，所里派出林家湖等艺人先后到洪江、界牌、新化、建湘、新民、国光、星火、永胜等厂传授釉下彩绘技艺。

1956年，他采用点写方法，在长石釉的坯上画芦雁，用刷花的刷毛再刷上不同厚薄的长石釉，进行在长石釉釉坯上绘制釉下彩的试验，发现了釉厚的朦色，釉薄的显色清晰，得出了在长石釉的坯体上绘画釉下彩如何再上釉的技术问题，又在唐汉初等艺人的配合下，终于将传统的釉下彩绘，由泥坯烧一次，画坯烧一次，再上釉入窑烧成的三烧制，改革为在长石釉的素坯上绘制釉下彩，再上釉入窑烧成的两烧制获得成功。解决了釉下彩大生产烧制周期长的难题，这就为降低釉下彩产品成本作出了贡献。

吴老传授的釉下用色知识，全是原色。林家湖运用釉上配色知识，以釉、泥、色釉，长石、石英掺色进行试验，总

总结出原釉与长石釉泥料与金属氧化物发生变化的不同处理，配兑出20多种不同的综合复色，并运用釉上绿基，经20多次试验，成功地配制成釉下新品种“海兰”。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瓷装饰的画面全是这种“海兰”色。他还与江桂荣合作，配制出矾砒黄、银灰等色，填补了釉下色彩的空白。

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设计绘制了釉下彩蝴蝶花装饰胜利盅；为北京体育馆设计绘制了釉下彩葡萄花茶具；以及为北京军事博物馆设计绘制了釉下彩双菊装饰莲子茶具。

1964年的国庆十五周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绘制了釉下彩梅竹茶具、天安门城楼使用的釉下彩玉兰花茶具，以及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绘制了直径为一米的釉下彩春景大挂盘；人大大会堂国宴餐具的器型也是他和王德和、陈扬龙等共同修改的集体创作。还进行了国画创作和编写资料画册。1953年他画的《春花》三种参加全省青年美展得三等奖；1956年他画的《春意浓》参加湘潭地区美展得二等奖；1957年他画的《茶花》参加全省美展后由省中山图书馆收购珍藏；1982年他画的《八哥迎春》参加全美展并由《湖南画报》第二期选登；1986年他画的《柳鸭图》、《迎槐》参加株洲市美展并由《株洲日报》选登。

醴陵陶瓷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邓文科，系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全国陶瓷美术学会会员、湖南美学学会第一届理事、省陶瓷美协理事、醴陵市文联委员。他自幼学艺，曾从事釉上粗彩、新彩、粉彩装饰，三十多年来专研制釉下彩瓷。在专业撰述和教学方面亦颇有建树。

他以陶瓷工艺美术见长，国画也有较深的功底。1957年他创作的国画《一丈红》曾参加湖南省首届美展，并获得三等奖。1979年他创作的国画《桃花鸡》又获得省陶瓷界美展的一等奖。

三十多年来，他设计了大量的画面（少量的器型）和绘制了较多精工产品，参加了国内外的各种展览，为恢复发展醴陵釉下彩瓷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用瓷的设计工作，现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大挂盘画面就是他1979年设计和绘制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大花缸造型，也是经他最后修改确定的。在设计创作中有四件作品（包括国画）获得省级奖励；有一件书法作品参加了省书法作品展览；1985年“湖湘书赛”获三等奖；1986年又获株洲市书法比赛二等奖。还有十多件作品被省级以上报刊、专辑发表采用。

一九八五年他设计的大型瓷雕宫灯，曾在《湖南日报》《中国陶瓷》等刊物上发表，《人民日报》和湖南的几个电台都进行了报导。并获得了一九八六年湖南省新产品评比的一等奖。

他写的《醴陵釉下彩瓷》一书，由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他和邓白教授合写的《中国陶瓷全集》醴陵窑分册解说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起草的《彩瓷、彩绘工人技术标准》七九年由轻工部编印执行。陆续在各种刊物和资料上撰写的有《釉上陶瓷颜料的性能与使用》，《谈学习白描花卉》，《醴陵瓷业的历史光辉》等。此外，他六十年代还在业余美术训练班、职工夜校和醴陵轻工技校担任过好些学期的专业教学和语文教学。

醴陵国光瓷厂陶瓷彩绘工程师汤清海，他是响应党的干部下放锻炼号召，1958年由广州美术学院来醴陵陶瓷研究所锻炼的大学毕业生。锻炼期满后，被留下筹办美术班。由于他热心瓷业，在醴陵瓷业界连续工作了二十八年。

汤清海在醴陵陶瓷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担任设计和试制工作。工作中他积极研究釉下现代人物和写意花鸟技法，醴陵原来虽有写意花鸟的表现，但多是草色和红色绿叶两类，技法较单调，至于釉下现代五彩人物画则尚未出现。汤清海经过几个月的探索，并得到温月斌同志混水的配合，精心绘画的列宁、普希金、鲁迅、齐白石等釉下彩头像小挂盘，效果很好。曾选两件参加了1959年在醴陵召开的全国陶瓷会议上展出，受到好评。釉下五彩写意花鸟和五彩人物的出现，使国画技法溢于瓷表，这对以后醴陵釉下写意花鸟和釉下五彩人物的表现技艺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与瓷艺名师林家湖、邓文科、丁华汉、唐汉初等，切磋技艺，在试验和设计上表现的基本功上借鉴了他们的经验，受益非浅。

1959年，湖南省轻工业学校醴陵分校创办于姜湾上正街。次年，又在分校内创立湖南省陶瓷技工学校，两校均开设了美术专业班。汤清海任教美术专业，精心编绘了“工笔画鸟”“鸟、类画谱”、“传统人物画谱”以及山水、色彩、构图、素描等多种教学讲义和画册。他在教学工作中，不计报酬地年复一年为瓷业职工夜技上美术课、编讲义。因而，1966年春被湘潭地区总工会评为“业余教育的一面红旗”，会上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在轻工分校和技校的十年教学工作中，他为湖南陶瓷美术界培养了数以百计的艺术人才。在教学之余，还进行

了国画创作。他创作的国画《水来啦》参加了全国十省联展，年画《醴陵二号插秧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0年，轻分校和陶技校下马，汤清海调醴陵国光瓷厂工作，曾先后到长沙清水塘、浏阳文家市、醴陵先农坛，以及酃县等地参加历史画的创作。1972年，他所创作的“贫下中农好医生”、“深入调查到山村”等国画。均在《湖南日报》、《湘江文艺》、《湖南画报》上发表，并先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由厂部宣传科调试制车间担任设计工作，他所设计的五十公分玉米花瓶，至今仍受国内外人士的欢迎，一直被外交部订为礼品瓷之一。他所画和设计的仿古钟瓶、薄胎碗，以及釉下三峡风光咖啡具，先后参加了出国展览。1973年，他设计的釉下蜜桃图案咖啡具，成为国光瓷厂第一次成套成批出口的釉下产品。设计的墨釉白兰花装饰产品被选登在《中国工艺品》画册，釉下枇杷挂盘和釉下花瓶被选入中国与日本合编的《中国陶瓷》画册上刊出。1957年设计的三十五公分凤尾瓶被外交部选为邓小平副主席访日的礼品瓷，同年，赴北京外交部参加了邓副主席出国的礼品的鉴定评比工作。

1981年，他担任全省陶瓷行业职称评定考核工作，负责美术专业的考核和评定职称。湖南省陶瓷美术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理事长，也是全国陶瓷美术学会的理事，在美术界被选为文联委员，又被选为株洲政协委员。一九八五年十月，荣调湘潭市齐白石纪念馆任副馆长。

醴陵群力瓷厂彩绘工程师了华汉，他从小就随父苦学技艺。1951年他随父进入了本县陶画合营处工作，在醴陵美术界杨卓湘老师讲授绘画理论和技法表演启发下，学习进步更

快。1955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成立，举办了醴陵瓷业陶画职工业余美术训练班，他参加了首届学习。1956年为培养技术人材，领导上选调他到陶瓷研究所工作，使他有了更好的学习机会，并任聘他担任职工业余美术班的辅导。调到陶瓷研究所后，他认真学习吴寿祺老艺人的釉下彩双勾画法，同时领导上分配他参加首批恢复和发展醴陵釉下彩的任务。在发展釉下彩工作中，他运用釉上彩的接色方法移植于釉下彩获得了成功，并绘制釉下彩草虫花面增添了釉下彩的内容。1958年为了扩大醴陵釉下彩的生产，领导上又决定调他到艺术瓷厂（现群力瓷厂）作为技术骨干并担任设计和培训工作。1959年，厂里接受了生产首都三馆（即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用瓷的任务，他参加了设计工作。审定设计稿件时，由他设计的月季花面被采用装饰军事博物馆的茶具，同时还由他担任军事博物馆的青花牡蛎花面餐具的推稿放样任务。

1964年，群力瓷厂承担了首都人民大会堂用瓷的生产任务，他参加了设计工作。他设计的釉下彩兰草花面经鉴定采用为国庆十五周年主席团用瓷茶具的花面。1965年群力瓷厂为了扩大釉下彩瓷生产，满足国内外的需要，厂领导号召设计人员创作一种中餐具花面，并要求成本低、质量高。他精心构思，在运用传统装饰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有独自创新的兰色海棠圈条边花的中餐具花面。该设计既适合厂里广大新老彩绘工人手工操作的生产条件，又具备厂领导提出的要求，投产后深受欢迎。1985年，在全国宜兴陶瓷会议评比中兰海棠釉下彩中餐具获得国家金牌奖。1966年，他被调到湖南省轻工业厅产品设计公司工作。在省陶玻公司一次设计人员

会上，公司副经理巢丰鑫同志介绍港澳盛行一种黑色的玫瑰花瓷销量很大。我国出口陶瓷产品中许多都是由加拿大商人引进此花面订货生产，他号召我省广大陶瓷美术设计人员大胆创新，设计一种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黑色玫瑰花面去取代进口花面。他想，历史上我国陶瓷在世界就享有盛名，发展到今天我国出口陶瓷怎么还要外商来样，这是我们设计人员不光彩的事。经过反复思索，精心设计，终于设计出了一种黑色的玫瑰花，花面形象完全具有我国民族的特色，艺术效果高于进口来样。生产样品选送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时深受许多外商欢迎，自后投入大批生产，并普及到全国一些产瓷地区。

1968年，由于省级厅局机构的调整，他又调回了群力瓷厂。回厂不到半年，当越南陶瓷实习生来醴陵永胜瓷厂实习时，又被调去担任彩绘培训工作。两年之后，越南实习生学习期满回国，再次调回群力瓷厂担任彩绘设计。1973年，组织上派他到阿尔及利亚担任技术外援任务。在阿尔及利亚担任工作近三年时间，为我国援建的瓷厂培训了近50名陶瓷釉上彩绘工人，而且为该厂还培训了三名手工彩绘设计人员。1984年7月至1985年9月，根据中国轻工业时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突尼斯技术组一行八人，在突尼斯瓷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技术劳务。丁华汉工程师再次出国到突尼斯担任陶瓷技术合作任务。在该新建瓷厂条件不够好的情况下，所担任的一年合同期内，他为该厂设计出六十多个具有突尼斯民族风格的彩瓷画面，因而得到该厂董事长的赏识。1985年，圆满地完成了突尼斯技术援外任务，回到了群力瓷厂，仍然承担一家礼品用瓷和大批生产订货产品的设计任务。

建国三十多年来 陶瓷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邓文贵 黄炳炎

以釉下彩瓷为代表的醴陵瓷器，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发展，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不少珍品，在国内外博览展出中，深得中外人民赞誉。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横向联合的发展，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建筑瓷、化工瓷、卫生瓷、高频瓷、陈设艺术瓷都从小到大得到全面发展。在这段时期内日用瓷发展尤为迅速，以醴陵瓷业总公司所属五家主要出口瓷厂为例，“六五”期间，产品在升级换代中实现了三个战略转变，即：产品由以中低档为主转变到以高中档为主；国际市场由以第三世界为主转变到以美、加、澳为主；品种由以单件为主转变到以成套瓷为主。1985年所产2734万件出口瓷中，名优产品占40%。“六五”期间创汇六千一百九十八万美元，占全省陶瓷创汇总额的50%左右。

醴陵瓷业有今天这个好形势，与瓷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分不开的。

一、原料的开发利用

醴陵因天赋地质条件，燕山前期酸性岩浆岩活动频繁，围绕板杉花岗岩体，在其边缘和外接触带生成三十多条花岗岩斑岩岩脉，这些脉岩在有利地段风化剥蚀，形成瓷土。在浏山、老鸦山、马颈坳、长坡、干冲等地，此类瓷土矿藏丰富、质地较好。两百多年来，我们的先人凭其传统经验，就地采掘，就地制瓷。直到建国初期，各厂所用瓷泥，仍局限于过去老矿点，盲目采掘，没有合理开发利用。为了提高生产力，扩大原料使用范围，掌握成分变化规律，建立陶瓷原料基地。从1956年开始，省陶瓷研究所组织科技人员对醴陵东北乡的瓷土矿和匣泥逐个进行了普查评价，全面分析其化学组成及窑业工艺性能。这次普查，也为各厂按化学组成要求进行坯、釉配方，提供了技术数据。1958年到六十年代初期，省地质局402队、415队对马颈坳、长坡、干冲等瓷土矿，冷水坑、庵堂坡、横山岭、八里坳等镁质耐火粘土矿进行了普查勘探，并提出了相应的地质报告。接着省陶瓷研究所又对其他七十多个矿点进行了踏勘取样，并于1962年写出《醴陵陶瓷原料志》，对醴陵陶瓷资源第一次作出了系统的资料总结。在此基础上，醴陵瓷器公司分别于1963年和1970年对马颈坳、干冲两矿区正式设计并建设年产五万吨和两万吨生产能力的露采场。从此，醴陵结束了几百年来乱采乱掘瓷泥的局面，开始了陶瓷原料有计划地、科学地半机械化开采。

1956年，醴陵瓷器开始出口外销。由于外商对产品外观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醴陵本地原料铝低、硅高、铁多，难以生产出白度较高的出口产品。为了找寻新的原料基地，从1958年开始，对全省陶瓷资源开展了广泛调查，特别是对湘东、湘中、湘南主要花岗岩体周围如慕阜山、九疑山、衡山、大义山、达摩山、金井等处周围的陶瓷原料矿山；调查更为仔细。对重点矿区如衡阳界牌、衡山东湖、长沙晋家山、溆浦黄茅园、新化杨家山、新宁大石板等地的高岭矿，攸县、衡山、耒阳、常宁、汨罗、望城等地的瓷土矿，平江、岳阳、临湘、华容、湘乡、长沙、兰山、新宁等地的长石、石英矿，湘潭、溆浦、宁乡、辰溪、邵东、祁东等地的耐火粘土矿，以及其他几处的白云石、方解石、萤石、石膏、磷灰石、膨润土矿都作过系统理化分析、矿物鉴定和小型试验，有的还作过工业试验，为我省上述矿山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如此广泛普查、探测的基础上，编印了《湖南陶瓷原料调查》一书。

二、坯釉配方的改进和研究

不断改进陶瓷坯釉配方，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五十年代初期，醴陵生产的瓷器，均系阶级柴窑烧成的。其细瓷坯料，沿用传统的四六配方，即东乡泥干60%，北乡瓷土40%。所用釉料，均为石灰碱釉，即用石灰拌和谷壳经煅烧、磨细制成的灰浆，与用浏山香炉玻釉石制成加浆料兑兑而成。随着内销转出口，传统坯釉配方所生产的瓷器，在白度、透明度、光泽度、釉面硬度和热稳定性等方面，与国际市场的要求，不相适应。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从1957年开

始，便引进外地原料，增加坯料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改石灰釉为长石釉，先后研制出90、91、97、98号等四种不同烧成温度的长石釉，在各出口瓷厂推广应用。1959年，国庆十周年，醴陵瓷器开始进入首都北京。为成批生产高质量的“三馆”（即北京工人文化宫、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馆）用瓷和人大大会堂用瓷，曾研制成功98号坯料，与此同时还研制成功有232号、406号出口瓷坯料。1964年，为庆祝国庆十五周年，中南海、天安门等处国家用瓷和人民大会堂所需国宴餐具以及外交部礼品用瓷，均要求醴陵供货。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省陶瓷研究所与群力瓷厂通力合作，选用洪江大球高岭土等优质原料，筛选出359、371号坯料和178号釉料配方，烧制成17万余件完全符合国家要求的瓷器，这批产品无论是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七十年代以来，省陶瓷研究所的科技人员，随着科研设备的不断充实，开始对长石质瓷坯、釉的理论组成和显微结构进行分析研究。1975年，他们对国光、群力、永胜、力生和长沙建湘瓷厂五个主要出口企业的坯、釉配方和成品进行了系统检测，并且用电子显微镜、X衍射仪等现代检测手段对坯、釉物质成分和产品的显微结构进行了探索。这对醴瓷来说，是内在质量的研究进入微观的首次尝试。他们在实际检测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五个出口瓷厂坯釉配方及产品质量调查》、《日用瓷釉面的显微结构》、《烧成温度对日用瓷釉及其基本性能的影响》等论文。这次理论结合实际的陶瓷科学研究活动对改进各瓷厂坯、釉配方，加强工艺控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科学依据。

八十年代以来，为开拓陶瓷新材质，扩大原料利用范围，对高硅瓷、铁炆器进行了配方试验，都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为提高醴陵瓷器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瓷器的釉面质量，国光、群力瓷厂，正在与陶瓷研究所合作研究软质瓷和硬质瓷新釉料。

三、制瓷工艺和设备的改进

建国初期，各厂日用瓷仍沿袭传统工艺，采取水碓粉碎、陶洗制泥、拉坯或模坯成型、自然干燥、阶级柴窑烧成等手段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劳动强度大，生产率低。1954年，醴陵瓷厂新建，开始实行机械制泥、旋坯成型、烘房干燥、煤烧倒焰窑烧成，大大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给各瓷厂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1957年，醴陵各瓷厂有阶级窑120座，每年耗松柴约八千万斤，这不但不利于封山育林，而且松柴来泥也日感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轻工部曾派部长助理李人凤等同志来醴陵，与瓷器公司和省陶瓷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起，研究柴窑改煤窑。经过一年的努力，反复多次改进，终于在原窑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添设燃煤炉栅和简易烟囱，将全部阶级柴窑改造成烧煤，从此，醴陵瓷业结束了烧柴的历史。尔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其阶级煤窑又逐渐被倒焰窑所代替。1967年，永胜瓷厂引进日本设备，开始用油烧隧道窑本烧和隧道锦窑烤花。醴陵新民瓷厂自行设计的我省第一条煤烧隧道窑也于同年6月试烧成功。从此，醴陵瓷器烧成逐步实现了以隧道窑为主。随着窑炉的改进，烧成所需的窑具——匣钵与垫

并也在不断改进和发展。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各瓷厂将生坯并改为熟坯饼，使其由过去只能使用一次，提高到数十次至上百次，节约了大量瓷泥。1983年，国光瓷厂开始使用碳化硅坯饼，使用次数进一步提高。各厂所用的匣钵，到六十年代初期，仍是按传统经验，以镁质粘土为原料制成。由于此种匣钵（特别是大型匣钵）的热稳定欠佳，难以达到由于日用瓷烧成条件的改变和温度不断提高的要求，故从1963年开始，省陶瓷研究所着手研究一种硅铝镁质匣钵，曾与国光瓷厂共同进行人工合成莫来石——堇青石匣钵试验，于1979年获得成功。1984年，为适用高温快烧的要求，省陶瓷研究所又研究出一种引入石英玻璃为填料的新匣钵，此种匣钵不但有较高的荷重软化点，在1400℃—1440℃的高温下不变形，而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能适应高温快烧，使用次数比一般铝土匣钵高五倍以上。

在成型方面，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改用旋坯或注浆，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手工拉坯和模坯，不仅提高了工效，而且促进了产品质量显著上升，尤以薄胎注浆产品更为别致，具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水平。到七十年代，又全面推广滚压成型、鱼盘旋坯、壶类产品旋坯新工艺，并将室式烘房改为链式干燥机，与滚压机连成半自动流水线进行生产。成型所用的石膏模型，长期以来，沿用人工炒制的熟石膏注制，不仅机械强度低，使用寿命短，特别是由于炒制石膏模的设备简陋、操作时粉尘浓度大，严重污染环境，危害职工的身体健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83年省陶研所与醴陵瓷业公司一起研究，自行设计，新建成一个采

取机械蒸煮新工艺的专厂，制取 α —型半水石膏供各瓷厂使用，注制的石膏模具，强度提高一倍以上。由于整个工艺过程全部在密封条件下进行，彻底解决了粉尘威胁，此项成果获省科研重大成果三等奖。

彩绘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艺改革，1957年，将釉下彩传统三烧制改为两烧制。批量生产的产品，改皮印印线代替手工描线。“分水”操作，在传统填平水的基础上，创造了分浓淡、罩色、接色等几种“分水”新技法，使其彩色变化自然。绘画题材，过去多为花卉，而现在是博采万物，无所不有。由于彩饰技法多样，颜色处理不一，艺术效果也丰富多彩。现在的醴陵釉下彩，既有绚丽的五彩，素雅的兰彩，柔和的淡彩，清爽的白彩，还有赭彩、绿彩等单色彩以及釉下彩描金等，从而使釉下彩的装饰艺术，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四、装饰材料的改进与提高

金水、颜料、贴花纸、色釉、电光水等，是美化陶瓷产品的主要装饰材料。三十多年来，随着日用陶瓷生产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升级换代，新的装饰材料和装饰方法也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

建国前，我国瓷用金水全靠进口。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金水供应紧张。为了打破这一困境，1951年原湘江工矿公司所属醴陵瓷业公司组织一中化学教师喻科盈同志和公司职工欧阳迪凡同志开展黄金水试验。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用金首饰做原材料熔于王水，再添加各种有机溶

剂，但制出的黄金水因不耐温，附着力差等原因而无法用于生产。后经过上百次实验，终于发现了金属铍作添加剂，可解决耐温和附着性问题，于1951年10月正式制成我国第一批瓷用黄金水，1953年因机构变迁，转入湖南省工业试验所成批生产。1958年由湖南轻工研究所接管生产后，又于1965年研制成功白金水（俗称银水），为我国金水生产在品种上又填补了一项空白。1972年上级决定金水转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生产以后，该所装饰材料研究室的同志，为继续提高金水质量、增加品种、促使产品系列化，并随着生产的发展使之不断升级换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先后研究出钨金水、磨光金、无光金、金花纸用金膏、无黄金的白金水等新品种。

金水在不断提高第一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1974年为适用薄膜花纸烤烧工艺要求，改进溶剂原料，研究出与薄膜花纸一起烤烧而不冲金的薄膜金水。1977年，在金水生产中又用高温樟油取代了第一代金水中主要溶剂原料——对人体有害的硝基苯，从此，广大生产金水和使用金水工人解除了苯毒的威胁。1979年，通过金水生产的改进，解决了我国金水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西德迪高砂金水主要技术差距——沉淀问题，使第三代黄金水放置两年以上而基本上无沉淀。1985年在全国五家金水质量评比中，醴陵生产的金水以91分的成绩夺得第一名，同年九月被轻工部评为部优产品。现在由省陶瓷研究所生产的各种金水，按国家分配指令，供全国14个省市的出口陶瓷厂使用。

瓷用颜料方面，建国前，醴陵瓷业制造颜料者共有四

家，所产釉上釉下颜料还远销江西和广东等省。建国以后，醴陵陶画生产合作社所属颜料工场，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进，提高了发色效果。省陶瓷研究所成立以后，该所加强了对釉上釉下颜料的研制。如釉下颜料，先后研制成功的新品种有浅绿、水绿、钛黄、姹黄、桔黄、桃红、铝红、海兰、青松绿、苔绿、鲜黑、白色、菜色等十余种，除大红外，各种基本色料品种俱全。其中桃红、海兰、桔黄、青松绿的显色效果最佳，在国内外都达到了较高水平。釉上颜料在改进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多个新品种，如特西赤、浓黄、深兰、兰绿、辣椒红，涩口釉等，其中浓黄和深兰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了提高颜料的适用性和稳定性，各种颜料品种也不断升级换代，为釉下艳黑。五十年代第一代产品是以钴、铬、铁为发色剂，因烧成温度高其发色效果不够稳定。六十年代研究出以五氧化二钒为发色剂的第二代产品，虽发色效果有所提高，但直接使用易产生落坑的缺陷。尔后于1976年在钒黑的基础上加上稀土元素为稳色剂，生产出第三代产品——稀土黑。由于此种颜料呈色较稳定，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种黑色。又如釉下黄，六十年代以前以钛为发色剂，由于钛黄不适应还原气氛烧成的要求，又先后研制成钒铬黄、钒铈黄、钒铈黄等新品种，其发色效果和耐温程度均逐步提高。为丰富釉下彩绘的色彩效果，1978年，省陶瓷研究所筛选釉下复色配方204个，分别用四种坯料，六种釉料，在多种窑炉上进行烧成试验，制成了一套完整的釉下色标，为调配釉下复合色料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还于1981年，研制出18种釉上丝网印颜料，填补了我省丝印颜料生产的空

白。

为了提高釉下彩绘的生产效率，省陶瓷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研究釉下贴花，曾采取石印方法试制，于1962年取得初步成效。随后又进行胶版印刷试验，因其印刷的颜料膜层较薄，色彩难以稳定。1971年，醴陵群力瓷厂，改用丝网印刷，终于获得成功。由于丝网印花纸发色稳定，且工艺简便，故问世后迅速在省内外得到推广。1980年为满足醴陵国光瓷厂对美国米卡沙公司出口成套餐、茶具的需要，省陶瓷研究所研制成功薄膜金花纸。1984年在金花纸的基础上，又研制成功色金套印花纸，从而简化了彩贴和烤烧工艺，节约了能源，用此种色金套印花纸装饰的振兴杯独具一格，深受用户欢迎。

颜色釉是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方法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建国前醴陵瓷器色釉品种不多，仅窑兰、窑绿、乌金等数种。建国后，省陶瓷研究所、星火瓷厂、新民瓷厂等厂家，在不断提高传统色釉的同时，先后研制和仿制成功的新品种达20多种，如钢红、铁红、锰红、竹青、粉青、萍果绿、苔绿、橄榄绿、松竹绿、桔黄、象牙黄、茄紫、黑里红、茶叶以及各种不同品种的结晶釉、大理石釉、斑状花釉等，用这些色釉装饰的日用陶瓷、艺术瓷、建筑陶瓷以及电瓷等产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

综上所述，醴陵瓷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由于工艺操作不断革新，促进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比建国初期显著提高。据醴陵瓷业总公司1985年统计，日用瓷一级品率平均达到66.50%，比1957年15.72%提高三倍多。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323元，比1957年1336元亦提高三倍多。但应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继续努力，虚心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发扬艰苦创新的革命精神，为把醴陵瓷业建成祖国的重要陶瓷基地、完整的陶瓷出口基地和向现代化进军的基地而奋斗。

略谈醴陵瓷业窑炉改造的经过

王 盛 开

我是一个烧窑工人出身的瓷业窑炉工程师，对醴陵瓷业窑炉改造有过亲身经历，现就醴陵瓷业窑炉改造的经过作个简略的回忆，以供有利于此者参考。

建国前醴陵瓷业窑炉概况

1948年前后，醴陵细瓷厂家共96户（包括合资和独资），均为有窑炉的厂户。不过其中有少数厂户是两户或三户合窑，共有窑炉67座。

细瓷厂户分布在东乡的大水湾、老鸦山、汾山的荷莲塘、新庵、东堡，东门外的三刀石，以及姜湾、寨子岭、黄泥坳、文笔峰、中和、王家老屋、仙源桥、邓家渡、青泥湾等16处。

粗瓷厂家（包括合资和独资）共有110户，有窑炉103座，均系阶级窑。粗瓷厂分布在汾山、北乡、东乡及青泥湾等处。

当时的窑型类别有镇窑、日本式窑、阶级窑。镇窑：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窑底是平的，一个烟囱，窑内最高点四

点九米，全长十至十五米。日本式窑：依山而上，每座窑四至七间不等，每间内是平的，前后一样宽，长度不超过三米，前后间窑底相差70厘米，最后一间设有三至四个烟囱，最高点三米。阶级窑：也是依山而上，每窑四至十三间不等，阶梯形窑底，前低后高，长度不超过三米，窑棚是飘形。尾间窑墙后设有三至四个烟囱，窑内最高点四米。

建国后瓷业窑炉改造的经过

1949年7月，醴陵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多数厂家采取生产自救或合作社形式，陆续恢复了生产。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薪柴需要量迅速增长，迫切需要解决以煤代柴问题。

1951年，醴陵电瓷厂新建了两座倒焰式圆窑，燃料以烟块煤为主。这是醴陵以煤作燃料烧电瓷之始。

1953年，姜岭上恒昌瓷厂厂主李雪钦，请四川回来探亲的侄儿邓宗普建了一座小型方窑，第一次烧了两天两晚还未成瓷；第二次姜湾洲上廖春生又烧了一次，同样未成功。接着，在姜湾新街游先理的柴坪边又建了一座窑，与上述情况一样，均告失败。

同年，地方国营醴陵瓷厂，在阳三石火车站对面新建厂房并建了三座倒焰式圆窑，开始试用煤烧日用瓷。这三厘窑是由从山西请来的王庚戌工程师设计的，由湘潭工程公司第三工区承建，1955年2月建成投产。当时，瓷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由于销路未打开，利润微薄，资金周转慢，因此，窑炉只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

1956年春，省工业厅研究所召集有关人员到省开会，研究柴窑改煤窑问题。会后，醴陵陶瓷研究所的刘代再、陈华来二同志将该所阶级窑第二间改作烧煤，有极少数产品烧成，但颜色不够理想，这是以煤代柴烧窑的初见成效。

1956年下半年，成立了醴陵瓷器公司。公司领导要我承担窑炉改造任务，并拨款七千元在醴陵瓷厂建造了一座四间阶级窑，以煤代柴烧成了瓷器。

1957年3月，轻工业部派部长助理李人凤等六人前来醴陵开展改窑试点工作。省工业厅也派沈明扬所长和刘树铭、常续和工程师等四人协助开展此项工作，连续搞了三至四年土法制煤汽代柴烧窑试验。同年，在劳动瓷厂选择了一座未用的六间阶级窑，改直接烧煤，窑青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折正率，并稳步提高到百分之八十，达到了花钱少、见效快的目的。

后来，土法煤汽烧窑也有一定进展。开始使用山西大同煤，后来山西煤供应紧张，只能使用本省烟煤。当时，省工业厅规定，新建瓷厂不建煤汽窑不投资。因此，我们新建二工业瓷厂也建了一座多室式16间煤汽窑，烧了一次仅六间部分成了瓷。但由于燃料耗费大、成本高，不久拆除了。这样，土法煤汽窑从1957年开始至1963年没落，历时七年。

1957年，星火瓷厂（原为第二出口瓷厂）由陈敬如师傅建了独立式阶级窑一座。独立式（即只有一间）的内部与阶级窑相同，烧的瓷器比土法煤汽窑好，产品质量可与阶级式煤窑比美，只是燃料消耗比阶级式煤窑大。后来，星火瓷厂建了五座，第一出口瓷厂（现醴陵国光瓷厂）建了两座，泉

联瓷厂建了两座，这样共有10座独立式阶级窑。当时，泉联瓷厂独立窑每次可烧三大700筒（每筒10个），等于28立方米，小器约10立方米，共计38立方米，烧成需70多个小时，耗煤30吨，成瓷合格率很低。星火瓷厂阶级窑七间也需烧20天，耗煤60余吨，窑内容积为140立方米，成瓷合格率较高。阶级式煤窑从1956年开始至1983年没落，历时二十七年。

1958年，烤花马蹄炉也改为以白煤代松柴，即改间歇式为连续式烤花炉。开始用白煤作成煤饼，后改烧散烟煤，燃料成本降低了。

同年，土瓷窑也进行了改煤代柴。土瓷厂因资金困难，用白砖作炉条用。白砖是一种镁质耐火材料，也有用铸铁炉条的，均告失败。原因是土瓷历来不用匣钵装烧，烧煤的灰尘杂质落在产品上，与表面釉屑粘在一起，加上土瓷本来就粗糙，通过燃烧后即使成了瓷，也是粗糙不堪，很不美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粗瓷也改用匣钵装烧，叫做改匣瓷。虽然表面没有煤灰了，但碗中央砂川还在，质量很差，价格低廉，是个赔本生意。在当地政府和瓷业公司的领导下，开始撤厂并厂，部分工人调入细瓷厂或工业瓷厂工作。

1959年4月，我们曾统计过一次窑炉数字，醴陵当时12家瓷厂共有窑炉133座（未使用的不在内），其中土法煤汽窑16条，阶级式煤窑45条，圆窑19座，方窑42座，独立式窑10座，多室式窑一座。从此，以煤代柴的改窑工作基本结束。这是醴陵瓷业史上一大改革。

以煤代柴的工作基本结束后，随着陶瓷工业的发展，又开始窑炉结构的改造和燃料的更换。1965年4月，全国陶瓷专

业会议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当时由于醴陵瓷业公司已撤销，省硅酸盐公司通知省属陶瓷日用瓷厂各派厂长一人参加会议，我和省公司经理一起参加了会议。我省到会代表见到山东绝大多数厂家都是采用隧道窑，陶器也是隧道窑烧成，制坯是机械化，坯体是蒸汽干燥，大家感到从此可以使成形车间捧坯工人从笨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为了减轻窑炉工人的繁重体力劳动，避免出窑时在高温中工作，很有必要把阶级式煤窑和圆窑改造成半自动化的隧道窑。会议讨论期间，南方各瓷厂建议轻工部积极投资进行窑炉改造，同时，建议组织技术力量，到山东进行隧道窑还原焰的试验工作。轻工部采纳了这些建议，拟定拨款四万元，并派出工程技术人员于同年六月到山东淄博市瓷厂试验烧还原焰。醴陵选派了瓷业各工序技术人员六人参加试验工作组，并运去了40吨熟泥和10吨水釉。参加淄博试验的人员，在集中学习讨论后，分省组织人员采用自己带来的泥釉进行具体的试验操作。我省六人克服各种困难反复试烧，最后两窑成品合格率达80%以上，使醴陵泥釉在隧道窑烧还原焰试验中获得成功。

1966年，轻工部拨款五十万元资助醴陵瓷业窑炉改造。瓷业公司派我在新民瓷厂进行试点。从隧道窑设计到烧成瓷只花了二百七十天时间，1967年6月正式移交给工厂正式生产。这是我省瓷业烧煤隧道窑之始。接着，力生瓷厂、星火瓷厂也建造了隧道窑。后来，国光瓷厂几十座倒焰方、圆窑全部拆光，改建成隧道窑。

1966年，建陵第二工业瓷厂由国家引进了日本油烧隧道

窑、蒸汽链式干燥机、双头压坯机、真空注浆机等技术和设备。油烧隧道式素烧窑、隧道式烤花窑，燃料系重油，烟囱不冒烟，只有锅炉烟囱冒白烟，减轻了烧窑工人的劳动强度，这对发展醴陵瓷业起了积极作用。油窑不污染环境，而且产品质量很稳定，较早搞油烧隧道窑的都改变了生产面貌。但由于我国油料是出口的主要产品，现在要压缩用油，提出以煤取代油烧瓷。二十多年来，醴陵油烧隧道窑发展也快，目前已有14条油窑烧瓷，一条油素烧窑，14条烤花窑，年耗重油三万五千余吨。醴陵瓷业还有电烤花瓷炉近70座，以电作燃料烤花，破损低、质量高。

附带还说说耐火材料的发展过程。1966年引进的日本隧道窑，耐火材料也是从日本运来的。日本窑1967年开始生产，1969年因高温带下塌，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当时领导找我设法解决。我大胆采用本地耐火石砌高温带，获得了成功，从中也吸取不少使用耐火石的经验。至1986年6月止，全县已有112条新建或改建的耐火石窑，所用耐火石都是我市东堡、栗山两厂矿生产的。这里的耐火石使用寿命高达十二年之久，比国际耐火材料寿命高得多，而且所需材料在我市是取之不尽的天然耐火材料。如果将河南产的高铝砖，用于隧道窑高温带，其寿命不到两年。星火瓷厂原用铝铬渣砖，寿命不到二十个月，最后还是使用耐火石才稳定。耐火石价格便宜，每条窑高温带用耐火石能节约造价三万元。耐火石在多孔窑上使用效果亦很好，也在继续推广使用。

关于我和阳涤藩同志在醴陵一中 合作研制金水的回忆

喻科盈

一九四九年七月，醴陵和平解放，腐败的反动政府被摧毁，黑暗的旧社会过去了，新中国诞生了，我特别高兴。当时我在醴陵一中教化学课，爱国热忱激励我兢兢业业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为培养人才作贡献。

一九五一年六月某日，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罗才冈同志把我请去，亲切地说：“我国瓷器上用的金水是从美国进口的，现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们要自己制造金水抵制美货。阳涤藩同志试验了很长时间没有成功，他有一定的基础。醴陵瓷业公司的经理陈作民同志介绍要他和你合作，你北京大学是学化学，教化学经验丰富，请你出来与他合作试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可以成功的。”我听了非常乐意接受了这项任务，认为这是为国争光的大事，我要把制金水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

要研制金水，弥补祖国的空白，困难是很多的。我当时担任全校高、初中的化学课，每周三十课时，只好白天上课，晚上实验。没有原料，学校供药品，我自己献出了金戒指，并且自费托人去上海买少量的钱，学校还专门建了一间简易实验室，为了便于实验 还为我在实验室旁建了两间简

易宿舍。我和阳涤藩同志从一九五一年夏开始研制。天气炎热，炉火烤炙，还有含毒药品的薰蒸，弄得嗓子发哑，眼睛发红，特别是对铋铈合金的研究经常熬到深夜，有时是通宵达旦。通过查阅国内外的资料，经过三个月的反复实验，发现了“铋铈合金及铈的有机化合物”是制成金水的关键性技术。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试制成功了。随即在国营醴陵瓷业公司建立金水室开始成批量生产，供用户使用，质量符合陶瓷装饰要求，在金水生产中，陈志纯、贺泉清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新湖南报》报导了我们研制金水成功的消息。根据当时的奖励制度，公司要发给我们一万元奖金，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有困难，婉言谢绝了。当地一些小资本家听说金水研制成功，蜂拥而至，有的用金条、有的用银元来向我买金水，我断然拒绝了。当时阳涤藩同志家庭生活困难，我想出售一点金水给他过春节，但考虑这样做影响不好，只好自己借钱给他过年。

金水研制成功，我和涤藩同志没有要国家分文报酬。一九五三年我被调到湖南省工业厅专门负责制金水。制金水的经验由中南财委介绍到中央财委后，立即召开了有人民银行、外贸、海关等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决定由国家大力支持进行大批量金水生产，供全国瓷业使用。更重要的是决定立即停止进口金水，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外汇。

事隔三十余年，回忆起来，深感党和人民给我们荣誉远远超过了我的微薄贡献，今年七十九岁了，虽然退休在家，我还要在有生之年，争取余热生辉。

（喻科璽口述、刘正伦记录整理）

醴陵日用瓷园器成型工艺的变迁

肖传瑛

醴陵瓷业始于清雍正年间，以釉下青花粗瓷（土瓷）为主。1906年设立湖南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学堂，引进日本设备，聘请日本教师，开办了模型、辘轳、图画三个班，培训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以后湖南瓷业公司赴景德镇聘请了园器、琢器、匣钵、烧窑等工种的技师八十位来醴陵传授技艺，醴陵瓷业便形成了“园琢二器，模辘图三班”的日用细瓷成型工艺系统。使醴陵瓷业由粗瓷进入细瓷，并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釉下五彩细瓷，为醴陵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模型”是以石膏模塑性泥料模印成型。以生产人物、飞禽、走兽等陈设瓷，香炉花钵以及异型浮刁壶类，奶罐、皂盒等器皿为主。

“辘轳”以生产（带盖）深杯、小型壶类、痰盂、花瓶等产品为主。成型设备简陋，以杂木车盘（对径70—80公分），逆时钟方向手工搅动旋转，右手执型板（架木）左手在坯体外拉坯成型。其工艺流程是：打杂（即制泥）、揉泥、做水坯、自然干燥、修坯、上釉、取底釉、做垫饼，一

人完成。

“图画”包括釉上、釉下手工彩绘并自调颜料色釉，釉上贴花等。

园器、琢器基本上是景德镇的传统工艺。分工比辘轳细一些。如圆器的成型工艺流程是：打杂（即制泥）做坯、印坯（第一次印坯，稍干后再套坯）、利坯（第一次粗利）、荡内釉、修坯（第二次精修）、纳外水、浸外釉、挖坯、辞釉（即挖脚后上底釉）。成型设备也简陋。做坯、利坯、挖坯都是用杂木车盘（对径约1.5公尺），木棍手工搅动。与辘轳不同之处是顺时钟旋转，左手执型板（俗通坯张子、瓷质的右手在坯体外拉坯成型。泥料含水量高于辘轳成型的（辘轳成型水份约25~26%，圆器成型水份约26~27%）。车盘底面中心固定有瓷质钵形“顶子碗”，围绕顶子碗装有四根长木条，长约1.5公尺，下部用瓷质园形“荡箍”联结，套在木质立柱上，“顶子碗”与立柱表尖接触，减少车盘旋转时的摩擦阻力，“纳脚”则保证车盘旋转时平稳。园器生产碗、盘等日用瓷，在生产过程中按技术难易，分成脱胎器（包括正德器、罗汉器、荷叶器、折边器等），二白釉（锅器）、先可器（釉下青花先器、可器）。

以上这一工艺系统，都十分讲究手工技艺，师徒关系紧密，封建行会的规矩森严保守，这恐怕也是造成陶瓷行业技术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师徒技艺相传，墨守这一传统的工艺格局。

建国后，醴陵瓷业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1952年地方国营醴陵瓷厂成立，旧的传统手工操作已不适应生产发展

的需要了，1955年便派出了荣庆祥、韩建国、李文虎等同志赴北京大华瓷厂学习，不久又派出王启春、李炎清、彭丹桂等同志赴沈阳肇新陶瓷厂学习，并聘请了大华瓷厂、肇新瓷厂的技师来醴陵指导，开始采用真空练泥机、单刀旋坯陶机、精坯机代替手工揉泥、拉坯利坯的改革，1956年在全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带动下，醴陵各私营瓷厂走上了公私合营，光华电瓷厂与醴陵瓷厂合并，由日用陶转为电瓷生产。1958年年底至1959年元月，醴陵瓷厂的韩建国、吴升隆、王启春、谭义犹、李炎清、刘德钧、彭丹桂、王启连、周克吉等三十多位同志调醴陵一出口瓷厂（现国光瓷厂），进一步完善了单刀旋坯，精坯、施内釉、浸外釉、取底釉等一系列工艺改革。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手工操作为半机械化生产。这是继1906年醴陵由粗瓷进入细瓷工艺改革后又一次重大的成型工艺改革。

六十年代初，据报导国外在研制日用陶瓷“罗拉”成型新工艺。1965年我和曹卓明、钟庆余、罗达芳等同志在国光瓷厂、省轻工业厅领导的支持下，开展了滚压成型工艺的试验，经过一年多的试验摸索，获得了成功。1966年4月被评选为中南区“双革”成果展览项目。以后又经过刘德钧、袁隆谊、谭义犹等同志的进一步完善，滚压成型在国光瓷厂率先推广生产，在型刀旋坯成型工艺的基础上，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关于研制“滚压成型”的经过

曹卓明

1964年下半年，外贸部科技司一位领导同志在醴陵瓷器公司作报告，谈到国外在研制一种新的日用陶瓷成型工艺，叫“罗拉”成型。我国虽数次派代表团出国考察，提出要了解此项工艺，均被拒绝。

1965年4月，肖传瑛同志和我商量并提出申请，由副厂长刘佑禄同志及办公室主任肖敦训同志安排肖传瑛同志和我从事“罗拉”成型的研究工作，参加的还有钟庆余、罗达芳同志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从用石膏制滚头模型到锡制滚头、铜制滚头……等，在单刀旋坯机及双刀旋坯机上进行试验，解决了滚头设计、确立工艺数据、割边方法、差速度选择、机械设计的技术数据、电加热和温度控制方法等技术问题，1965年10月初步获得成功。制成的产品明显减少了变形和针孔缺陷，提高了产品的光泽度和规整度，提高了半成品的干燥强度，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一级品率，显示出这一成型工艺的优越性。当时，省轻工业厅长薛瑞同志来厂看到此项新工艺制成的产品，极为重视，要求厂里必须继续抓好此项工作，即派工程师向公权协助工作，向工程师和我去

湘潭轻工机械厂解决机械加工问题。

我们根据此项工艺是滚头在坯体上滚动和压延成型，遂订名为“滚压成型”并上报，此后滚压成型的名称便正式在国内使用。

1966年初，省轻工厅指定我厂“滚压成型项目参加中南局在广州举办的“双革”展览会。我厂于同年四月份派肖传瑛、曹卓明、钟庆明、朱玳兰、刘彦宇等同志送样机去广州，安装调试好以后，留下刘彦宇、朱玳兰同志担任讲解员。这是我国的第一台滚压成型机。

广州“双革”展览会后，全国各主要产瓷区均先后来我厂参观和索取技术资料，我们接待过的有湖南建湘瓷厂、江西景德镇陶瓷公司及所属厂、辽宁陶瓷公司及所属厂、唐山、山东、广东等地的瓷厂，使这项技术成果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事陶瓷工业企业管理的三十年

朱方义

一、走向瓷业

一九五五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深入贯彻，在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在城市，经过建国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了新的形势。为了摸索对私营瓷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六月间，中共醴陵县委派我担任公方代表，对私营之同、日新两瓷厂进行公私合营，我接受任务后，即带领工作组前往中和街之同瓷厂。由于我在县总工会工作期间，经常向职工工作报告，又举办了几期冬训班，即利用冬闲季节培训瓷业工人中的党、团员，班、组长和工会积极分子。因而对工人比较熟悉，加以当时工人渴望实行公私合营如同农民渴望土地改革一样，因此，对我的到来，都表示热烈欢迎，使我深深感到必须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劲头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洪流中去。

二、从头学起

来到之同，我们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除了学习国务院公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和有关方针政策外，还学习了建设瓷厂实行公私合营的经验。因而，在县委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政造任务，成立了公私合营湘醴瓷厂。但企业管理则比实行公私合营复杂得多，更需要努力学习，我除了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经验、学习地方国营醴陵瓷厂和公私合营建设瓷厂的管理经验外，特别注意了在实践中向工人群众学习，向之同，日新两厂的私方人员学习，当时省工业厅厅长翁徐文、付厅长杨第甫、薛瑞、瓷器公司经理孟宪文王林卿等同志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可以称得上“循循善诱”，特别是轻工业部部长助理李人凤同志、省工业厅人事处长杨翘同志来厂蹲点期间，以平等的态度采取探讨的方式用大量的调查资料分析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解决的办法，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使我获益非浅，如李人凤同志指出：公私合营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变了，由雇佣劳动者变成了企业的主人，因而必须搞好企业的民主管理。在他的教育下，加上客观上管理干部少，自己又不熟悉瓷业生产，因而依靠群众管理企业的思想是比较坚定的。实践证明：越是坚定地依靠工人，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积极性就越高，主人翁责任感就越强。如当时的“责任脚压脚，毛病不过脚，废品回头找主人”产品质量到人的责任制和破坏登记表便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这套办法，直到现在也是完全适

用的。

公私合营后，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大发扬但也有少数职工产生“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思想，为此，当时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搞了定员定额，加强了定额管理，建立了原始纪录。整顿了劳动纪律，进行了工资改革，把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落实到日常到日常生产和彻彻到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上来。

又如瓷业生产的特点是：“生在泥上，死在窑上”，这两道工序带来的产品缺陷是大面积的，如同农业的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决定企业的兴衰存亡。按照这个观点，从而，加强了泥釉的加工管理和烧炼的质量管理。

还有使瓷业生产不断前进，必须搞好瓷业的技术改造，改变“粉碎靠水力，干坯靠太阳，成型靠手工，烧成靠松柴”的靠天吃饭的“四靠”局面，改变瓷业工人“轱辘车下千滴血，半边棚里受折磨”的劳动条件。因而使技术改造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实行公私合营后，怎样充分发挥私方人员的作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使他们有职有权，也是领导经常帮助教育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方面处理得比较好。付厂长刘励生（原之同瓷厂经理）贺雨生（原日新瓷厂经理）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合营之初，未设股室，贺雨生分管生产调度，技术、安全、原料采购，还要“请散子”，（当时没有机动工，工人病了要到农村去请瓷业失业工人来暂时抵班）刘励生分管计划安排、产品销售物资进厂过秤验收等，与现在庞

大的科室机构比较起来，他们的工作量是大的，工作效率也是高的。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初，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实践，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瓷业生产和企业管理虽未造乎堂奥，但总算是初步踏上了门阶。正当不断学习，循序渐进的时候，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使企业管理受到了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政治挂帅的作用，否定尊重科学技术，遵守规定制度的必要性。实践证明，政治工作必须与经济工作紧密结合，为经济工作服务，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业务工作和具体的生产技术。二是强调党委大权独揽，削弱了以厂长为首的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形成一切书记说了算，造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再加上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高指标等，因而使瓷业生产出现了曲折，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三、动荡中的起伏

一九六四年，我被派到原第一出口瓷厂（即现在的国光瓷厂）担任付厂长，分管生产。当时经过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后，企业管理秩序逐步恢复正常，特别是中共中央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企业管理工作更加有章可循了。当时厂中产品质量低劣，经研究决定按照《七十条》的精神，从学习部颁标准入手，全面整顿质量管理，从而生产迅速回升，一九六五年完成产值七百三十四万元，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

产品一级品率由一九六三年百分之十二点七一到一九六四年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二五，一九六五年达百分之五十三，出口合格率由一九六三年百分之五十三点一四到一九六四年为百分之六十六点五七，一九六五年达百分之八十二点八六，实现利润由一九六三年一百八十六点四五万元到一九六四年为一百九十五点二万元，一九六五年为二百五十五万元，创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

正当全厂职工满怀信心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中华大地，大破坏的浪潮席卷全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所谓红卫兵进厂了，他们闯进厂里，直奔车间，看到我们生产大批量出口的五头角碗，说这个多角形的碗，有十二个角，象征着国民党的党旗，不但要将坯子全部打掉，还要追查为此设计的“现行反革命”，闹得厂里一时天昏地暗，使多年畅销东南亚地区的五头角碗被迫停产。有一种花面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是才子佳人，属于“四旧”应该破除，使这个畅销中、近东的花面也被迫停止了生产。搞得技术设计人员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经过红卫兵“点火”，厂里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就燃烧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对各级领导炮打、火烧，接着在“夺权”和“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各类山头都在国光瓷厂垒起。在“革命大批判”中，工业《七十条》被批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被批成资产阶级的管卡压，造成生产指挥瘫痪，制度松懈，纪律松弛，企业处于无管理状态。正当当

时工人中流行的顺口溜所说的，“八点上班九点到，坐在车间开玩笑，不管生产好不好，到了月终拿钞票。”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冲击下，工业总产值由一九六五年七百三十四万元到一九六六年降为六百五十五万元，一九六七年降为五百一十四万元，一九六八年降为三百一十七万元。实现利润由一九六五年的二百五十五万元到一九六六年为一百三十九万元，一九六七年为十一万元，一九六八年亏损七十七万元。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强调了整顿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七大制度，严格考核八大指标，强调了出口产品质量和经济核算，经过整顿，企业又出现了转机，到一九七三年产值又回升到一千零九十三万元，利润又回升到一百八十五万元，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又兴起，造反派的大字报又铺天盖地而来，二月一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上海港务局的一张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接着在工厂中“要当工厂的主人，不做定额的奴隶”、

“要当工厂的主人，不做规章制度的奴隶”的大字报也相继出现，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冲击波，使企业管理重新陷入混乱，生产急转直下。产值由一九七三年一千零九十三万元下降到八百四十二万元，利润由一九七三年一百八十五万元下降到一九七四年的十二万元。

经过两起两落从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一个真理：“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①任何否定管理的说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四、新的转折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以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于三月五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九号文件）狠抓企业整顿。这一年，中共湘潭地委调整了国光瓷厂的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坚决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精神，强调政治上抓扶正压邪，组织上抓班子建设，生产上抓质量第一，管理上抓责任到人，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使产品产量、质量，物质消耗，设备保养，安全卫生的责任落实到了人，全厂出现了心齐、风正、有干劲的新局面，这一年实现利润一百二十万元，为一九七四年的十点九倍，产品质量由省内第八位跃居第一位。

一九七六年，正当邓小平同志狠抓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又在全国掀起，我们当时在厂里，虽然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谈不上自觉抵制，但从前几年动荡中的起伏以及一九七五年的实际效果，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大家认识到，不管刮来什么风，坚持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总不会错，企业再不能乱了。基于这个认识，党委作出了“关于排除干扰的十条规定”，广大职工自觉地抵制了外界的串联，坚守生产岗位，全厂上下，继续坚持前面所说的“四抓”，企业管理，秩序井然。因而一九七六年，厂里生产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实现了“两个全超”，即全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面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实现利润达到二百八十二万元。这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国光瓷厂也因此成了全国陶瓷行业工业学大庆的排头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更加理直气壮地抓整顿，由恢复性整顿转向建设性整顿，从而使生产蒸蒸日上，一年胜过一年，以实现利润为例，一九七七年达三百五十四万元，一九七八年上升到四百三十六万元，一九七九年达五百零三万元，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五年中，出口瓷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成本平均每年下降百分之六九五，利润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五年的利润总和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并厂以后到一九七四年十八年总和的一点三三倍。

五、一化三制

一九七八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探索企业管理的路子，我到管理基础较好的二车间和班组管理较强的二车间八组摸索经验，从总结他们的经验入手，发现车间八组生产连年创新纪录，班产过万件，产品质量“三过九十”

（即成坯率，一级品率，出口合格率都超过百分之九十；除了有一支较强的班组骨干队伍，有较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在班组管理上他们做到了“八有”，即有明确的质量标准，有先进合理的定额，有科学的工艺参数，有完善的操作规程，有详细的原始记录，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有严格的考核制度，有合理的奖惩办法。对二车间的管理，主要是严格要求，不但重视产品质量标准，还重视工作质量标准，有健全的经济责任制，经济核算制和经济奖惩制，我把他们的经验

拨一万五千元。该校请愿学生等以来京日久，牺牲甚大。北庭敷衍牵延，已成惯性。若欲坐候解决，徒费宝贵时光，深为不值。不得已只有力请财部，速筹本年七月后经费，以便回校上课。一面仍照阁议之决案，请鄂当局，承认按月在湖北烟酒税项下领取一万八千元。刻闻十一日该团向财政部严重交涉，坐部索款，已得到印花税十万元，作为该校二月经费担保品。现正将此种抵押品，向各处借款，不日可望借到四五万元。眼前必勉强可以救济，加之前月五日，在教部门首，被凶警欧伤事，屡欲依法起诉，惩办首凶，均以有人前来嫁谢遽尔迟迟。十二日午后三时余，警察总监殷（鸿寿）氏，又特派代表二人，亲到教部，向该团道歉，并予慰问。请愿团处此横乱时代，深恐拖延时日，徒耗光阴，故拟于十四日上午搭车回校。举留京干事十余人，在京结束一切，刻闻已派代表向各界致谢其历来援助之盛意云云。

民国日报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工作效率的有效措施，也是进行评优选模的重要依据。

（二）经济责任制

在恢复性整顿中，实行“责任五到人”的岗位责任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能反映提高经济效益的全面要求，且适应范围也只限于直接生产工人，为了在全厂范围内实行经济责任制，我们将八大技术经济指标层层分解成若干小指标，叫做指标分解分管。首先在厂部从横向分解到科室，如品种产量产值由生产计划部门负责，工资总额、定员定额、劳动生产率指标由劳动工资部门负责，储备定额消耗定额、储备资金、销售收入由供销部门负责，成本、利润、资金周转期指标由财务部门负责等等。又按纵向将指标分解到车间班组和个人，为了搞好纵横协作，除了明确承包指标层层保证实现外，还要明确协作任务。使企业的劳力流，物资流，资金流做到流向合理，环节畅通，通过指标分解，越分越细，形成宝塔形，如分解到车间科室的指标有三百八十六个分解到班组的小指标有五百五十五个，分解到个人的指标达八千七百三十二个，其中质量指标分解到人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采取了“反分法”即把产品缺陷率指标分解到人，叫做产品缺陷责任到人，按照部颁标准规定，出口瓷生产中有斑点、落渣、变形等二十七种缺陷，要严加控制，但每件瓷器要经过六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同时有几人甚至几十人操作，要分清产品缺陷是谁产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培训了一支缺陷分析队伍，经过大量调查实验分析，制订了成瓷分析办法，作为分析产生缺陷的责任的依据，如碗类变型，有三角形，多角形、扁形，（也叫

一字形)产生三角形的责任在出模工序,产生多角形的责任在旋、筑,工序,产生一字形的责任在装坯工序,这本缺陷分析法,实质上是日用细瓷的质量管理法。但这只能从技术上分析到工序,同一工序找到个人的责任就需要从管理上采取措施,我们采取分品种,分车、分边装烧的办法,对半成品按照成型工艺流程分甲带、乙带(按传送带分或甲盘、乙盘(按转盘分)以红、兰颜色标记之。但这种办法对同一工序超过两个人的责任便不好划分,如粘接壶咀壶把,一个小组五个人操作,五个人混在一起吃大锅饭无法解决。后来工人们开动脑筋,利用壶把内侧的排气孔的位置不同,(这个气孔在非显见面,既不影响美观,也不影响使用价值)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中间五个位置区分五人的产品,产品烧出来后,发现缺陷、就可以按气孔位置查清到个人的责任。由于产品缺陷责任到人,每月谁的缺陷多,谁的缺陷少,都可以出榜公布,排成名次,按质计奖,谁精工细作,谁粗制滥造,一目了然,由过去的突击检查打坯子变为常规管理,管得更严更细更轻松了。工人们说:过去责任不到人,好坏分不清,互相都埋怨,指标完不成,如今责任到了人,功过能分清,大家一条心,质量有保证。

(三) 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工作,在国光瓷厂,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一定的基础,但经过十年浩劫,把经济核算也作为利润挂帅批掉了,在企业整顿中,我们不得不再从基础工作抓起。定额管理是经济核算的标尺,除了劳动定额外,我们将常耗的一千零四十四种物资制订先进合理的消耗定额,并全部落实到

人。为了做到既保证物资供应，又压缩储备资金，我们制订了四千零三十八种物资的储备定额。通过抓住劳动定额，消耗定额，储备定额，费用定额和质量管理，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保持着投入小，产出大的良性循环。原始记录是企业全部经济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是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我们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配合计量考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记录和报表制度，坚持天天记录，环环记录，全厂每天要记四万六千个数据。这就为考核经济责任和经济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开展经济核算中，建立了以专业核算为主体以群众为基础的核算体系，搞好厂部车间班组三级核算，特别是班组核算，它既是厂部、车间经济核算的基础，又是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当家理财的有效活动形式。班组核算员是由群众推荐，厂部任命，并进行专业培训的，根据其工作质量，分三等按月给予一定的奖金，这样班组经济核算员既有政治荣誉感，又有专业责任心，成为实行“一化三制”的主力军，也成了企业管理人才的后备队伍，很多年轻的企业管理人员都是从经济核算员中提拔的。

经济活动分析是巩固经济核算制提高核算水平的重要一环，除了纵向的三级核算三级分析外，还有横向的专业分析，通过分析，总结成绩和经验，揭露矛盾找差距，使经济责任制不断完善，核算水平不断提高。

（四）经济奖惩制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实行利润留成，为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做到责、权、利紧密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

科学地利用奖金、克服平均主义，使经济奖惩制能有效地推动标准化和经济责任制经济核算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我们取消了基本奖，实行超额奖，按照指标分解分管承担责任的大小和经济效益的高低，按标准考核评奖，按照责任大小确定奖励系数，按考核数据算奖。为了保证同企业经营成果紧密挂钩，实行联利计奖，水涨船高。

实践证明“一化三制”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的活动统一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上来，有利于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形式，由于标准、责任、考核、奖惩到了人，因而不论工厂人多人少，都可以实行有效的管理，相反，如果工作无标准，职责不明确，考核不严细，奖惩不分明，即使几个人的小厂也会形成“三个和尚冒水吃”的局面。

“一化三制”使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扎根到班组，扎根于群众，因而具有生命力。如果没有“八有”的班组，则“一化三制”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意义。它始于班组，终于班组，不断循环往复，使班组管理和基础工作不断巩固并不断提到高一级的程度。

“一化三制”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机地把经济责任、经济效果、经济利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企业做到职责分明，好坏分明，奖罚分明，解决了企业管理的大锅饭。一九七九年我在出席国务院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轻工业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经验介绍。省委党校和湘潭地委干校先后多次邀请去讲课。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专门作出了“关于推广醴陵国

光瓷厂经营管理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一化三制、八有”的经验，体现了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的结合，责、权、利的结合，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结合，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的结合，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七月十七日《湖南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切实加强企业经营管理”的社论，并在此同时在国光瓷厂召开了全省工交企业经营管理现场会。这一年还出席了国务院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

六、三多三不三取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分析国内外市场情况及世界陶瓷生产之间竞争剧烈的趋势之后，认识到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企业的转轨变型。根据用户至上的原则，我们在经营决策上提出了“三多三不三取胜”的方针，即在开拓市场上做到多市场渠道、多门数档次，多花色品种，在争取客户上做到品种多不怕，批量少不嫌，难度大不推，在竞争中做到产品以新取胜，质量以优取胜，交货以快取胜。运用这一方针，瞄准美国市场，同日本展开竞争。在企业内部，一方面提高产品由单件到成套，由中低档到中高档，从而使销售市场由亚、非、拉扩展到美、澳、加，在外贸的配合下，争得了美国几家大客户如THC公司、米卡莎公司，天山公司等。单件换汇额由十三美分提高到四十美分，米卡莎的高档西餐具每件平均达六十美分，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外汇，供应THC公司的厚胎餐具和供应米卡莎公司的白玉餐具先后荣获国家银质奖章。

七、继续学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光瓷厂的经营管理，出现了质的飞跃，但这只能是同过去进行纵比，为了提高认识，开扩眼界，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国家经委通知我出席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年会，听取了许多专家学者如华罗庚，刘源张等同志发表的演说和论文，一九八一年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组织了第一批中国厂长访日代表团，由六个厂的厂长组成，即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国棉十七厂，南京机床厂，天津制鞋厂，福建闽东电机厂和国光瓷厂。通过两次出席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年会及赴日访问，使我茅塞顿开、深深感到学然后知不足，特别是在赴日访问中，不但看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现代化管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日本在组织经济起飞中，特别重视现代的人际关系，这三者的紧密结合，是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值得我们借鉴。

我在群力二十年的粗略回顾

吴 铮

一九五八年，我从醴陵公私合营建设瓷厂调任新建的第一出口瓷厂生产付厂长，以边基建边生产的方式艰苦工作了近四年后，一九六一年调醴陵瓷业公司福利科工作。一九六三年又由醴陵瓷业公司调醴陵群力瓷厂（原艺术瓷厂）任生产副厂长，一直工作到现在。二十多年来，我在群力，可谓甘苦备赏，回首往事，颇多值得记述的，但限于篇幅，现只书几件大事。

继承和发展醴陵釉下彩

釉下五彩瓷器是醴陵瓷业的名优产品，具有五彩缤纷、晶莹润泽、永不褪色的特点。它的工艺技法相当精致巧妙，其画面色彩具有水分感和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看得见摸不着，美中藏秀，媚而不俗。它的实用价值也高，能耐酸碱腐蚀，不含铅镉等有毒物质，花纹色彩永不脱落。国际上早已把釉下彩瓷誉为东方陶瓷艺苑的明珠。醴陵釉下五彩瓷器，曾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就荣获金牌奖。一九五八年醴陵瓷器公司为了继承和发

展釉下彩，决定成立地方国营醴陵艺术瓷厂，一九六五年改为群力瓷厂，继承和发展这一民族传统工艺。现在群力已成为生产釉下五彩高级细瓷的专业厂家。釉下彩瓷不仅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产物，而且是人们重要的生活用具，甚至是高档享受用具。现在群力瓷厂的釉下彩产品犹如春花怒放，开遍国内外，已为国内二十七个省市宾馆酒店采用，并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年产量已增长到六百多万件，仍然供不应求。

人大瓷任务的完成

为庆祝伟大国庆十五周年，一九六三年冬国家交给群力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赶制二十二万件人民大会堂的用瓷。这是党中央和人民大会堂领导对醴陵瓷业的支持和信任。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湖南省委、省轻工业厅、地县委和公司领导的重视和各兄弟厂的支援，特别是陶瓷研究所和本厂全体干部职工们的努力，如期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计交去五十六个器型，十二个花面，二十二万三千九百一十三件瓷器，其中国宴餐具十四万六千零三六件，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一八；便宴餐具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七件，占百分之六点零七；高级便饭餐具四百二十八件占百分之零点一九；茶具五万三千二百二十八件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七六；其它如烟灰缸，咖啡具等一万零六百二十四件。占百分之四点九，人大瓷的当时产值计划数四十万元，实际完成产值四十八万七千八百元，为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九五，一级品率达三十六点零四，比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七。这二十多万件人

大瓷全系釉下彩产品，具有美观大方，造型适用，瓷质细腻釉面光滑，白度达七十五度以上等特色。根据大会堂灯光效果布局国宴餐具用上了青兰色调，置于白桌布上产生色彩的强烈的对比，新颖沉着、厚重。这次任务的完成促进了我厂生产技术的全面提高，生产形势由此开始兴旺。

生产人大瓷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产品数量大，质量要求高而时间十分紧迫，四月份还处于准备和练兵阶段，怎么办呢？

首先说说成型。按开始的打算，依靠手工做坯去完成，需要二十个园琢二器的手工生产小组，两年才能完成十六万八千件，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困难的一环。二十个生产组的车间，就生产厂房面积而言，都无法容纳，而且全瓷业中也挑选不到二十个手工组技术较高的工人，成套组合。这时旋坯工人韩建国（现任付总工程师）提出将所有大小园形盘类产品由手工转为旋坯成型。厂领导支持和采纳了这个意见。本来二十八公分，三十公分的戈盘，原手工拉坯每天班产只有二百件，改为旋坯后每天班产四百五十件，百分之八十的成坯率。二十八公分大号汤钵原手工做坯只能日产十五件，改为旋坯后日产达一百二十件。如用手工生产汤钵需要七个月才能完成，而旋坯后只十二天完成了任务。茶具四万件八月份才穿插全面铺开，过去认为非手工成型不可，由于改旋坯后，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如期交上了任务。在开始练兵阶段也碰到了不少难题，如胜利盅、连子杯改旋坯后，开始的一级品率只有百分之三；可是经过多次的改进操作和出模垫圈等措施，一级品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不但质量上超

过了手工生产，而且产量提高十倍以上。

其次，谈谈彩绘，在整个人大瓷任务中，釉下彩绘的工作最为繁重、仅以国宴餐具来说，按花面设计要求原计算手工画线就需要三百余人工作一百多天，才能完成。经过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以皮印印线代替手工画线，连续战斗七个昼夜就完成了任务。而且克服了线条不匀和颜色厚薄不匀的毛病。

边线断缺，也是彩绘工序一个严重的质量问题，经过革新多次，采用两次打边线即画前打一次铅笔线，画后再打一次颜色边线，很快克服了这一缺陷。

茶具中的松树画面绘画工作量最大，当时全瓷业又只有六位彩绘老工人擅长画松树，而且每个人画法笔调不一。如以个人手工画（每个松树画面有四千七百五十笔）计算，需画二十年，而且花面色度都不会一样。面对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由吴景林等同志在陶瓷研究所的配合下，大胆革新创造，改用釉下贴花，日产一百多件，从而保证了任务的完成。由于依靠群众开展技术革新，改进工艺，生产效率提高了，任务也按时完成了。

第三，谈谈技术管理。由于加强了技术管理，严肃规格化、标准化观念，克服旧的习惯势力、经验主义，积极推行兰图卡具，保证了人大瓷的质量。胜利中的差距由原百分之零点二降低为百分之零点零五，十一点五公分汤碗差距由原二至三毫米减少到一点五毫米。彩绘车间规格化后，克服了配兑颜色水凭经验估计的非科学态度，设立了专人管理颜色，克服了过去那种“原料配方不过秤、颜色好坏信天碰”

的现象。做到配方有数据，比例精确，从而克服了画面颜色深浅不匀的弊病。窑炉车间通过建立和健全制度，坚持看火焰加煤、按煤质拉风等操作，促进了窑青质量上升，克服了满窑打马虎抢时间，出窑乱堆码的混乱现象。加强原料加工中的技术管理更是头一关，由于我们重视了这一关，所以制泥过程中出现了八个“一样”。

- 1.精工选料像淘金一样
- 2.泥釉配方过磅如配药方一样
- 3.清洁卫生像船上一样
- 4.生熟泥分级堆放像百货公司商品陈列一样。
- 5.消灭杂质如消灭敌人一样
- 6.闲人免入像战场放哨一样
- 7.严格除子屑像站岗一样
- 8.练泥水份准确像时针一样。

技术管理还要注意适应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各班组必须有严明的岗位责任制，按照这个制度来对照和检查自己的工作，尤其不放松质量事故的分析。原来存在有“出了事人人有份，不出事个个平安”的现象。生产人大瓷做到不吃大锅饭，质量到人。由于这些制度的建立，责任心加强了，有效地促进了质量的提高。

第四、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人大瓷任务的完成。如烧成方面，因厂房基建未完成，窑炉设备不够仅有一百零三立方米容积的方窑两座。如按六天一次窑的周转，无法完成任务。窑炉工人意识到任务的重大，时间的紧迫，为加速窑子周转，他们坚持快速烧成。装坯执行了严

格操作规程，使落砂缺陷由百分之四十降低到百分之四，形成了人人为人大瓷而努力，个个为人大瓷争光献计。彩绘车间杨大钧同志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该车间在人大瓷生产中连续三次自动增加定额，由原日产三千二百一十件增长为四千五百三十二件车间的缺陷由原百分之九点二五降为百分之二以下。

大花缸的深厚情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委托湖南省委安排纪念堂大花缸等用瓷的制作任务，省委把这项光荣任务交给了群力瓷厂。要求制作的产品有釉下花缸、茶具等共计一千零九十一件，其中，釉下大花缸十二个，（对径六十公分，高四十二公分），大号方肩壶二十件，托二十件，连子杯六十四件，托六十四件，大号胜利盅四百零四件，托四百零四件，园烟缸一百零二件。产品要求庄严肃穆、美观大方、万里无云，独具一格，而且要做到七个一致、八不准：即大小一致，高矮一致，重量一致，颜色一致，线条一致，花型部位一致，白度一致；不准有变形，不准有黑点、不准现毛孔，不准有节缝、不准有釉子，不准有釉面不光，不准有灰砂，不准有擦伤。群力瓷厂党委和全厂职工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深切怀念，对党中央无限热爱，衷心拥护的心情，在陶瓷研究所的配合下组成了制作毛主席纪念堂用瓷领导小组，集中全厂和研究所三十名设计人员投入了设计工作，集中群众智慧精心设计出六十多种器型和画面的图案。设计人员在设计构思中感到这次制作

的花缸将要放到毛主席遗体的两旁，为世界人民所瞻仰，必须设计出象征着湖南人民日夜守护毛主席，形影不离毛主席的深情厚意。因此在技艺上不但要反映湖南陶瓷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新水平，而且要反映出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世界，建立新中国，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大好形势，展示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光芒万丈。大家不约而同地联想到毛主席所写“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光辉诗句，决心采用芙蓉花为主要题材，精心设计了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构图芙蓉画面。这个设计得到了指挥部的赞许。

李小年同志以芙蓉花为题材创作的图案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花缸的器型是李小年同志以毛主席生前亲手为我们湖南陶瓷示意的盖水杯（胜利盅）的造型为基础，作为大花缸的设计依据，采用了胜利盅造型的简练稳实，朴素大方的基本特点，除缸边外，缸的身躯仍保持着胜利盅外型的基本面貌，记录着毛主席生前对我们湖南陶瓷的关心，意义更为深远。

大花缸的制作是由陈月发同志和他的徒弟周谷良为主，采用整体成型，一次拉坯的方法，丝毫不见接缝。这是历史上一项从未见过的高超瓷业手工技艺。

彩绘工人创造了双人配合分水新工艺。每个大花缸要分多种颜色水一千多笔。他们非常细心操作，创造了大花缸内外达两平方米的面积，无斑点、无掉砂、无压釉、无色脏、无变形的高难质量。这种兰色芙蓉花图案的大花缸，摆在纪念堂更显得庄严雅致，晶莹剔透，既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又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那朵朵芙蓉花有的如朝阳盛开，有的似含

苞待放，象征着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些设计博得中外观众的高度评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

釉下彩瓷百花争艳的春天

十年动乱之时，釉下彩又遭禁锢。库内古装产品，硬说“封资修”气味太浓，尽被打碎；工艺美术人员稍不注意就被戴上“丑化英雄人物”、“丑化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大家束手束脚，不敢创新，题材范围越来越窄狭，画面越来越单调。“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思想得解放，釉下彩瓷又日新月异，山水虫鱼，飞禽走兽，古今人物又都入了画，从此釉下彩的品种增多，题材广泛，构图新颖，色调丰富，使用的复色颜料由过去的十多种发展到数十种。

老艺人唐汉初等设计人员想起了十年前王震同志来醴陵群力视察时曾提出，江西的滕王阁能有人移植到画面上，岳阳楼是古今中外名胜古迹，而又在湖南，能不能把它搬到醴陵釉下彩画面上去。王震同志的话引起了设计人员的遐想，一九七八年冬唐老师带领三名学徒冒着严寒前往岳阳楼写生，精心设计出了“岳阳楼”花面，用于出口瓷四十五头餐具上，高温烧成后，显得格外晶莹润泽、舒畅自然。一九七九年广州交易会上岳阳楼四十五头釉下彩餐茶具，初露锋芒，南斯拉夫、加拿大和港澳同胞一次订货七百套餐具；紧接着美国华明公司成交六十五万件的总数中，岳阳楼画面占十五万件。成批量投产后也受到国内一些宾馆采用。

满花瓶是群力瓷厂的一种传统产品，六十年代已有黑底

满花装饰。老艺人孙根生和工艺美术人员表术凡、雇澄清、雇青山老中青三结合，努力钻研，大胆摸索，不但试制出兰底满花瓶，还把满花运用到日用瓷餐具上。有一种带盖的汤钵，钵体上面的七个空间，点缀着十四朵菊花，二十一朵水仙花七朵牡丹花，四十余朵丁香花，红、黄、兰、白相衬，绿叶紫藤相扶，满花的钵盖如合上，活像一盆盛开的鲜花，仿佛香气扑面而来。这种满花花彩瓷在全省陶瓷工艺美术鉴定会上评为优秀产品。一九八三年这套九十二头的满花餐具又在北京“全国出口商品生产基业专厂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被誉为品质优良的出口产品，受到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的高度赞誉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并荣获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荣誉证书。这种釉下满花产品，不仅成为出口商品，而且被选为人民大会堂的高级国宴餐具，同年五月二十九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宴请德国社会民主等勃兰特主席时，还特意向客人作了介绍。

我厂丁华汉工程师设计的那套釉下兰海棠餐具从一九六四年设计投产到现在，二十多年盛销不衰，长产不停。这一画面是怎样孕育出来的呢？图案题材首先选择青海棠，是表示釉下彩瓷器在建国前沉默了二十几年，严冬肃杀，濒于失传，新中国的建立才给他带来欣欣向荣的春天。选色为兰色衬托白瓷更洁白。简洁明朗有时代的精神，波浪式二元连续构图的传统手法，实于民族特色。一九八五年在全国陶瓷产品质量评比会上这一产品得分最高，荣获金牌荣誉证书。

中国女排赠球的勉励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女子排球队给群力瓷厂送来了排球。袁伟民教练在球上写道，“中国女子排球队敬赠”，全体队员都签上了名字。女排姑娘为什么对群力瓷厂有特殊的感情呢？一九八一年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群力前任书记彭月泉同志代表全厂将一个雄狮花瓶。专程送到北京表示祝贺，受到了女排全体队员的热情接待。这个花瓶以古松瀑布为背景，画面突出雄狮，彩绘用笔数万画，纤豪毕观，维妙维肖，显示出东方巨狮威武传神，再配上“电闪金毛跨五色，雄狮怒吼震千山”的诗句，寓意深刻，恰到好处。因而女排姑娘们爱不释手，谁都想争着摆设在自己的寝室里，最后由袁伟民教练“裁决”，一个宿舍轮流放一周，就这样新老交替传下来了，所以中国女排姑娘赠球祝贺群力瓷厂釉下彩的重大贡献。女排姑娘们还说：“你们的釉下彩瓷远销五大洲，获得了金质奖章，为社会主义祖国赢得了荣誉。你们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继续拼搏，振兴中华，为国争光。”

釉下彩绘制人头像

任弼时同志在八宝山的遗像，是江西景德镇一家瓷厂制作的釉上彩色瓷像。天长日久，颜色发灰了。任弼时同志的亲属林一新同志一九七五年来到醴陵群力瓷厂，要求绘制永不褪色的釉下黑白头像。老艺人唐汉初精心绘制釉下彩黑白头像，老工人李雪清刻苦试制瓷板，前后近一年的时间，终

于绘制成七十公分长，四十二公分宽的釉下黑白头像。这可以说是陶瓷史上的一项创举，从此，开创了人物头像千年不变样，万年不褪色的陶瓷艺术新成果。任弼时同志亲属陈琼英同志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特从北京写来感谢信。

两次荣获金质奖章

群力瓷厂自继承和发展釉下彩以来，他们的釉下彩餐茶具在六十年代就成为国内优秀名牌产品。职工们并不因此满足，而是继续攻关。他们说前人能在国际上打响，后人也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而在丰富画面器型和提高内在质量方面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餐具造型新颖，装饰淡雅，瓷面洁白如玉，花纹晶莹润泽，内在质量超过国家标准，白度透明度吸水率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品畅销国内外。因此，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全国第二次质量月活动中，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餐具荣获国家金质奖章。正由于群力的职工们为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敢攀高峰为创造优质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旬结束的全国陶瓷产品质量评比会上，六十四头兰海棠中餐具获得总分第一名，被授予金牌奖荣誉证书。

醴陵陶瓷原料及其开采利用

黄炳炎 邓文贵

久负盛名的“瓷城”醴陵，是我国主要陶瓷产区之一，瓷土资源极为丰富，为发展陶瓷工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一、陶瓷原料的分布

醴陵位于湘赣边区罗霄山脉的北段，水陆交通方便。境内东北两乡，盛产瓷土。淦江上游两侧及南乡大障至马恋一带，盛产耐火粘土。城南之石门塘至龙华山一带，盛产耐酸陶器用粘土。此外，在栗山坝、东堡、白兔潭、潘家冲等地，还有脉石英、硅土、方解石、莹石、硅质耐火砂岩等原料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陶瓷工业的发展，先后由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四〇二、四〇六队做过勘探调查。现据有关资料，结合历史上开采利用等情况，分别叙述如后。

（一）瓷土

瓷土乃醴陵之主要矿产。其分布范围，从地质区域角度

看，主要分布在板杉花岗岩体的外围及其边缘带，大致围绕板杉花岗岩体作弧形展布；从地理位置上看，主要分布在市区东北部，即马颈坳、大林、老鸦山、湧山、板杉铺、黄獭嘴、仙霞等地，以马颈坳矿区规模最大。

矿体母岩系印支期石英斑岩、花岗斑岩、流纹状石英斑岩等岩脉或小岩株。矿床则是由上述岩石在有利地段经长期的地下水及物理、化学作用形成的。在成因上属古风化壳原生硬质瓷土矿床或风化残积型瓷土矿床。

矿体形态和规模，亦受母岩影响。在风化完全地段，矿体之形态和规模，均与母岩形态和规模相一致，多呈似层状、脉状。岩脉宽一般5—20米，最宽处达100米以上，脉长300—700米，最长达2公里以上。风化不完全地段，矿体则呈不规则的藕节状、透镜状，形态和规模均小于原岩。矿化深度亦受母岩的岩性、构造发育程度、地貌、水文等因素的制约，一般风化深度为20—30米，最深者为50米左右。

矿石化学成分的特点是硅高铝低，一般含 SiO_2 75%左右， Al_2O_3 18%左右， Fe_2O_3 0.7—1%。其矿物组成，以石英、高岭石为主，少量伊利石、水云母、残余长石、黄铁矿等。马颈坳矿石中，还发现含稀有金属铌，但含量低未达到工业要求。

现按历史上开采地域划分的十二个矿区，分别叙述其概况。

1. 马颈坳矿区

矿区位于王仙下垌村。区内有花岗斑岩和流纹状石英斑岩脉侵入。因上述两种成矿母岩分别为两次岩浆活动的产

物，故风化成矿后相应产生粗粒和细粒两种矿石。矿体呈似层状，长约100米，宽约800米，风化深度约30米。矿石外观呈灰白色、灰黄色，显微鳞片状或显微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硬度4—5，比重2.64—2.68，塑性中等。

矿床规模为大型，储量丰富。由于该矿地质构造简单，水文条件良好，矿体裸露，适宜露天开采。

2. 大林矿区

该矿区位于大林、东堡两乡之间，从东堡乡土埠桥村的墨然塘起，至大林村的杨树冲、小林桥一带，均有矿脉出露。成矿母岩亦为花岗斑岩和流纹状石英斑岩，矿床成因与马颈坳矿相同。矿石外观呈灰白色、灰黄色，主要矿物为石英、高岭石、水云母。矿区内以墨然矿点水文地质条件最好，适宜露天开采。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即为醴陵电瓷厂的原料基地。

3. 老鸦山矿区

矿区位于大林乡老鸦山、葫芦塘至碗棚湾一带，范围很广。区内有两条由石英斑岩和花岗岩风化形成的矿脉，共有九个矿点，走向北西，延伸长度一般为250米，最长达2700米。宽7—20米，最宽达70米。矿化深度，一般为5—10米，最深为15米。其中以纱帽崑和烂泥坡矿点的泥质最佳。矿物成分为高岭石、水云母、石英和少量黄铁矿。由于大部分矿点的表土复盖较厚，历史上多为窿道开采。

4. 汾山矿区

汾山是醴陵瓷业始创地，位于东堡乡之西北。区内有四条流纹状石英斑岩脉充填于板溪群加榜组板岩的裂隙中，倾

向北东，倾角 $40-50^{\circ}$ 。矿脉走向呈弧形分布，北起青山岭之茶坡里，经甌皮岭、汾山、大顺、仙源，南至新庵一带。矿体延伸长度 $150-2707$ 米不等，最大宽度为 36.8 米，垂直风化深度最达 20 米。瓷土外观多呈灰白色或浅黄色，粉砂泥质结构。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水云母、石英，也含有少量黄铁矿等杂质。在历史上开采十多处矿点中，以大坳上、甌皮岭、王家排等矿点的泥质最佳，其化学成分， SiO_2 为 70% 左右， Al_2O_3 为 20% 左右， Fe_2O_3 $0.6-0.7\%$ ， $\text{K}_2\text{O} + \text{Na}_2\text{O}$ 小于 2% 。

5. 长坡矿区

矿区位于板杉乡竹花山和茶子山村。区内共发现有两条流纹状石英斑岩脉浸入板杉铺花岗岩体南东边缘带，走向北西，倾角 $40-80^{\circ}$ ，脉宽 $2-20$ 米，脉长 $150-1300$ 米。矿体形状不规则，一般呈藕节状或巢状。可采深度一般为 13 米，般大为 50 米。其中以长坡矿脉延伸最长，北起黄龙桥，南至义山冲。瓷土外观呈灰白色，土块状，解理面有树枝状花纹。矿物成分主要为高岭石、水云母和石英，含少量黄铁矿和电气石。平均化学成分： SiO_2 $73-75\%$ ， Al_2O_3 $16-18\%$ ， Fe_2O_3 0.8% 左右。

该矿于一九六三年进行勘探，矿床规模为小型中段的矿石已基本采完，剩下的多为未风化完全的硬矿，目前仍未利用。

6. 板杉铺矿区

区内共发现有流纹状石英斑岩和花岗伟晶岩脉四条。走向西北，脉宽分别为 $1-3$ 米和 $20-30$ 米，脉长 $320-1620$

百一十八人。兴建西院三层楼教室与自习室各一栋。学校中有《国学匡林》、《半月周刊》、《教育丛报》。《江汉潮》、《党灯》、《学光》、《越光》、《苏讯》等学术刊物杂志，有《文学会》、《梁园读书会》、《教哲学会》等团体。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四十九岁
二月 辞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职务。
回教育部任视学原职，携眷入京，兼任北京大学生物教员。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五十五岁
教育部南迁，淡不往，就任北京大学文牍。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五十八岁
辞去北京大学文牍，携眷回兴山故里，在汉登舟待发宜昌时，经李书城、何成浚等挚意挽留，留汉寓居。

八月十日 就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到职后不久，即成立“湖北省立图书馆图书选购委员会”。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六十一岁
二月 湖北省立图书馆建筑新馆舍。
聘请社会名流李书城、张难先、沈祖荣等

纹状石英斑岩脉侵入体。走向北西。矿体延长一般为100—200米，最长800米。风化深度一般为5—18米，最大为20—30米。共有九个矿点，其中以张家弄子的泥质为佳，仅次于乌石冲泥。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与干冲相似。

9. 长岭湾矿区

矿区位于黄獭嘴乡政府之东北，区内有一条流纹状石英斑岩脉侵入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中。岩脉呈南北走向，向东倾斜，倾角 42° — 61° ，最大宽度为20米，延伸长度达1800米，风化深度最大为10米。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与干冲相似。矿石类型有硬质和软质两种，以后者质量为优。

10. 炉佛岭矿区

矿区位于官庄乡炉佛岭村和枫林市乡唐家坳村境内。区内有四条流纹状石英斑岩脉侵入体，倾向北东。脉宽0.8—10米，延伸长度为1350—2200米不等，风化深度一般为5—8米，最深为17米。其中以炉佛冲至小雷公冲之矿体质量为优， Al_2O_3 17—20%， Fe_2O_3 0.8—1.1%。矿物组成与干冲相似。

11. 长冲矿区

矿区位于仙霞乡所属五支地、溪水、杉仙店、赵家墩村一带。区内共发现有十一条流纹状石英斑岩脉侵入体，倾向南西，倾角 50° — 85° 。脉宽一般为4—5米，最宽为8米，延伸长750—1300米，风化深度平均为25米。矿石呈灰白色、桃红色或浅黄，粉砂泥质结构。共有十三个矿点，其中以杨家冲、张家冲、易家冲等矿点泥质为佳， Al_2O_3 17—20%， Fe_2O_3 0.7—1%

12、青泥湾矿区

矿区位于新阳乡所属青泥村和陈家湾村。历史上开采之矿点共有十三处，其中以麻子坡开采时间最长。根据开采的情况，其矿体宽度一般为4—6米。瓷土多呈灰白色，粉砂泥质结构。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与长冲相似。其他矿点如黄沙冲、横冲里、葫芦坡、苏家坡、乃至仙霞乡所属之铁芦冲，均未正式开采，资源保护尚好。

此外，在市区西北之石子岭，亦发现有瓷土矿体，矿石外貌与马颈坳相似。由于 SiO_2 含量高达78%左右， Al_2O_3 含量低于15%， Fe_2O_3 含量在1%以上，因而未正式开采使用。

(二) 耐火粘土

耐火粘土也是陶瓷工业的主要原料之一，在醴陵境内亦很丰富，常用于制造匣钵和耐火砖。按化学组成区分，有镁质粘土和铝质粘土两种。

1. 镁质粘土

此种粘土矿床，主要分布于渌江上游河漕两岸之丘陵地带，各有一翼矿脉，断续出现。其东南翼，南起渌江乡之玉屏山，经柘头洲、鲤鱼山、杨家山至富里乡之横山岭，并延伸至江西省萍乡之峡山口，其西北翼，西起板杉乡之五华庙，经拓塘坪、王仙、庵堂坡、冷水坑、仙石、落星湖、雷家塘、灶背冲、铁山坡、延伸至浏阳县所属之金刚、坳下棚、永和等地。

上述地段之镁质粘土矿床，均呈层状产于二叠系栖霞组地层，常与灰岩共生，富含海相动物化石。厚度一般为1—

4米，个别地段达5—8米，层位均较稳定。粘土外观多呈浅灰、褐灰、黑灰、少数为灰白色。比重2.41—2.64，硬度1—2。按风化程度区分，有页片状粘土和鳞片状土两种，前者俗称柔泥，质软细腻，手触有滑感，可塑性很强，干燥强度大；后者俗称糙泥，手触亦有滑感，但塑性较差。两种粘土的矿物组成，均以滑石为主，次为富镁蒙脱石及少量的绿泥石和伊利石。其化学成分一般为： SiO_2 63—67%， MgO 17—26%， Fe_2O_3 0.3—0.7%。

根据历年开采使用的情况，以冷水坑、横山冷两处矿点的泥质最优。两处粘土虽耐火度不高，一般为1520—1620°度，但荷重软化温度均在1430°度以上，高于瓷器烧成温度，故适宜制造碗类产品的匣钵（制造杯类、盘类等产品的匣钵，因器型大，热稳定性较差，故使用次数低）。其软质柔泥，还可代替滑石配制釉料，以改善釉浆的悬浮性，降低釉料的成熟温度。五华庙和拓塘坪所产的镁质粘土，因成分不稳定，不宜制造匣钵。

2. 铝质耐火粘土

铝质耐火粘土矿床，主要分布在马恋乡和大障乡境内。在马恋垅、井冲、斋江、汪家垅、申明、柞子塘、江边铺、璠石等村，均发现有矿点。矿体呈层状产于二叠系地层，大部分地段表土较薄，适宜露天开采。粘土颜色呈浅灰、深灰或黑灰色，致密土块状，手触有滑感。比重2.69—2.73，可塑性较强，干燥强度大。其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和伊利石，含少量的褐铁矿和黄铁矿。其化学成分是： SiO_2 44—58%， Al_2O_3 28—38%， Fe_2O_3 1.5—2%。其中以马恋垅泥

质最佳、开采时间最长，早在清道光年间，就曾利用此处粘土烧制砂罐。由于该矿所产粘土铝含量高，耐火度大于1700℃，目前主要用于制造耐火材料。

此外，在市郊之八里场，还发现有焦宝石，外观呈灰白色，微密硬块块， Al_2O_3 含量40%左右。因储量不大，目前尚未开采利用。

(三) 陶土

陶土是制造陶器和砖器的主要原料，主要分布于市郊淶江乡之石门口和石成金，延伸至孙家湾乡的道姑岭和龙华山一带。矿体产于朱罗系煤层上部，呈层状。已开采的矿点有黎家冲、茅坡、洪家冲、道姑岭等处，其中以道姑岭矿点开采时间最长。矿石有软质、硬质两种，软质粘土多呈灰白色或灰黑色，泥质细腻，手触有滑感，可塑性较强，干燥强度大。硬质粘土，多呈灰白色或灰黑色，致密块状，俗称煤夹石，粉碎后亦可利用，塑性中等。两种粘土的化学组成为： SiO_2 65—70%， Al_2O_3 18—22%， Fe_2O_3 0.5—1%。烧结温度一般在1250℃度左右。因属沉积粘土，一般含有0.5%左右的 TiO_2 ，故烧后颜色灰白。其精选矿可作电瓷坯料的结合剂，烧制耐酸陶器，其耐酸度可达98—99%。

(四) 其他原料

1. 脉石英

境内已发现脉石英矿点三处，其中有两处分布在栗山坝乡的攸坞村和栗山坝村，矿体赋存于石炭系页岩中。位于攸坞村长富冲的脉石英，走向北东、倾向330°，倾角80—85°，脉长300余米，宽2—5米，最宽达10米。矿石呈乳白

色，油脂光泽，隐晶质结构，块状构造。质量较佳者， SiO_2 含量大于98%， Fe_2O_3 含量小于0.15%，符合陶瓷生产的技术要求。

另一条脉石英矿，位于八步桥乡湾江村之雷鼓岭至大雪冲。矿体赋存于板杉花岗岩体内呈脉状。矿石为乳白色，隐晶质，块状结构，质地一般，含有片状白云母，储量也不大，尚未开采利用。

此外，在枫林市乡西南面，还有两条石英脉。一条东起黄獭嘴，西至蒋家桥；另一条东起大湾，西经长乐村延伸至株洲县境内。因质量一般，亦未开采利用。

2. 硅土

矿区位于栗山坝乡冷水村，于七十年代中期发现。一九八〇年由冶金二三八地质队进行了详细勘探，证明储量丰富，具有中型规模。

矿体赋存于泥盆系石灰岩地层之上，共有四个块段，断续分布在山坡两侧。硅土颜色洁白，质地较纯，含 SiO_2 98—99%， Fe_2O_3 0.1—0.4%。矿体因受强烈风化，颗粒细小，小于0.2毫米的原矿占83%，属原生风化残积矿床。由于该矿水文地质条件良好，适宜露天开采，已被当地乡镇企业开发，供冶金部门用作高温炉体砌泥和制造硅砖，但陶瓷工业尚未正式利用。

3. 石英砂岩

石英砂岩又称白泡石，本市东堡乡樟壤村和栗山坝乡冷水村均有发现。矿体系粘土质砂岩，粉砂泥质结构，块状构造，属沉积胶结矿床。东堡砂岩呈浅黄色或桃红色，栗山坝砂岩呈

灰白色，有黑褐色斑点。据测定：东堡砂岩之矿物成分为：石英约83%，石英岩屑和硅质岩屑2—3%，白云石1—2%，鳞片状粘土矿物12%，含少量黄铁矿和电气石，其耐火度为1590—1670℃，荷重软化温度1550—1580℃，可作窑炉耐火材料。

4. 方解石

方解石是陶瓷工业熔剂原料之一，市内尚未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方解石矿床，只是在白兔潭乡的轿岭、栗山坝乡的大石寺、马恋乡的弹子坑、贺家桥乡的玛琥等地发现有规模很小的矿点，且均见于石灰岩的裂缝或洞穴中。其中轿岭矿点稍具规模，厚度一米多。矿石质量颇佳，外观呈乳白色，玻璃光泽，块状构造，菱面体解理完全，品位符合陶瓷工业的使用要求。

5. 萤石

萤石又称氟石，常与铅锌矿共生。市内潘家冲铅锌矿有大量出产。矿石呈浅绿色，具有透明性，块状构造，硬度4，比重3.03。其矿物组成是，萤石占90%，含铁矿物很少，质量较好，可作陶瓷釉料的助熔原料。

二、各种陶瓷原料的开发利用

（一）建国前的开采利用情况

据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醴陵县志》记载，醴陵瓷业始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至光绪末叶，经过170余年的发展，全县共有窑户480余家，广泛分布在汾山、赤足岭、老鸦山、大林桥、王仙、漆家坳、严家冲、寨下、罗坪境、

茶子山以及青泥湾等地。就瓷泥矿点附近之泉流处，建造水碓，砌筑窑炉，沿袭传统手工操作，就地取泥，就地烧制的方式进行生产。在此时期所出之产品，均系日用粗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开始生产日用细瓷。从此，全县瓷业生产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但至一九四九年乡间出产的瓷器，仍占全县总产量的70—80%。所需瓷泥的开采，一般视其矿床的赋存条件而定，凡矿石出露之处，均为露天作业，在表土复盖较厚的地段，则以窿道开采。因其地权绝大部分为地主阶级占有，或属宗族祀会、庙宇管辖，所以各处矿山，多由窑户向山主租赁取泥，或由山主雇工开采。所挖瓷泥，均用水碓粉碎，再经淘洗，去其粗粒，原矿的利用率（回收率）一般为40—60%。由于采泥毫无规划，到处开坑设道，弃难图易，见矿挖矿，因此，对资源的破坏极其严重，某些窿道开采的地段，仅采出储量之半数，甚至不到三分之一。如在汾山和老鸦山一带，其窿道塌陷之痕迹到处可见。尤其是矿山的安全设施很差，塌伤压死人命事故，屡见不鲜。

制瓷所需的釉料，除湖南瓷业公司所制的上等细瓷部分施以长石釉外，其普通细瓷和粗瓷均上灰釉。此种灰釉（即石灰碱釉），系用釉泥浆配入谷壳和石灰烧制的灰浆。釉泥取自汾山香炉坡和麻坡两地，其泥含 K_2O 、 Na_2O 4—5%，经粉碎和石磨磨细后，再进行淘洗，原矿利用率一般为80—90%，石灰则由萍乡猴子石供应。

装烧细瓷所需之匣钵，最初用冷水坑镁质粘土制成，后来逐渐发展，采用白兔潭灶背冲和富里乡横山岭等地的镁质

粘土，按不同比例配合使用。由于冷水坑矿区的表土复盖较厚，故自光绪末年起，一直采取窿道开采。而灶背冲和横山岭两矿区，则以露天采矿为主。为降低细瓷烧成费用，约从三十年代中期起，曾利用县城北郊寨子岭下之红泥制造匣钵。由于此种红泥含钾钠和铁质矿物较多，耐火度不高，所制匣钵只适宜装入阶级窑每间的尾行，故用量不大。

（二）建国后的矿山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醴陵瓷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各种陶瓷原料用量日益增加、为了加强对全县陶瓷原料开采的管理，一九五六年醴陵瓷器工业公司成立时，即将三家瓷泥、釉泥、匣泥生产合作社，洩山瓷泥合作生产组，以及六家瓷泥联销组，改组合并为醴陵瓷泥矿，矿部设在王仙登仙台，并按地理条件结合历史上开采的情况，分别在马颈坳、洩山、大林、老鸦山、长坡、长冲以及冷水坑等地设立工区，实行统一管理，计划供应。是年全矿有职工380余人，年产瓷泥32,700余吨，其中东乡泥干（原矿经过粉碎、淘洗）约2万吨。

一九八五年大跃进，醴陵瓷业掀起了以技术改造为中心的现代工厂的建设。由手工操作方式的分散生产，一跃为半机械化的集中制造，全面推广机械制泥、制釉，旋坯成型和煤窑烧成。为了建立原料基地，适应生产发展的新形势，至一九六四年，先后承省地质局四〇二队、四〇六队和四一五队，分别对马颈坳、长坡、干冲三个瓷泥矿区，以及庵堂坡、玉屏山两个镁质粘土矿点进行了勘探。与此同时，还对洩山、老鸦山、周家岭、长岭湾、炉佛岭、长冲等

地瓷泥矿，以及冷水坑、雷家塘、灶背冲等地的镁质粘土矿，进行了踏查和普查。经过持续七年的地质工作，对醴陵的瓷泥矿床和镁质粘土矿床作了基本了解，特别是对马颈坳、干冲、长坡等矿区的工作，做得较细。如马颈坳矿区，钻孔13个，打浅井十二个，槽探石方达800余立方米，取样527个，全面进行了化学分析，获得了可靠的储量数据，于一九六〇年元月正式提出勘探报告。一九六三年，醴陵瓷泥矿正式设计为年产5万吨矿石的生产矿区，到一九八五年止，累计开采量约130余万吨。干冲矿区于一九六四年进行勘探，次年结束。随后根据勘探资料进行露采设计，分段剥离表土。一九七〇年露采场正式投产，年产能力为二万吨。

由于马颈坳和干冲两个露采矿区采取机械化钻孔，爆破采掘，矿车运输，开采条件显著改善，劳动强度比手工挖掘大为降低。其实物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人年产矿石300余吨。所采矿石，坚持分级选矿，分级进行粉碎加工，逐步提高了原矿的利用率。除含铁较多的废矿外，干冲瓷泥原矿的利用率达95%以上，马颈坳矿石加工泥干的回收率，由过去的30%提高到50%以上。近年来，国光等瓷厂通过调整配方，改用马颈坳瓷石与高岭土配料，又进一步提高了原矿的利用率。特别是加强了矿山的安全管理，自七十年代以来，基本上未发生死亡事故。

（三）目前原料供应和矿山开采的现状

八十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醴陵瓷业蒸蒸日上。通过企业整顿，加强科学实验，不断

更新设备和改进工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乡镇企业的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劳动生产率逐年递增。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的需要,在原有以生产中低档日用瓷为主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高档成套餐茶具,大型高压电瓷、高频瓷、理化陶瓷以及特种工业陶瓷等新品种。由于产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对各种原料的使用要求,也有所改变。按照一九八五年全市各种陶瓷和耐火材料的总产量估算,全年共需各种陶瓷原料和耐火粘土约17万吨,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原料由外地供给,而本地的瓷土、硅土以及耐火粘土等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由于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涉及到振兴醴陵陶瓷工业的长远利益。因此,应引起工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工矿企业的重视。为了合理利用本地资源,建议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本市非金属矿产资源特别是瓷土资源,加强科学实验,以便合理开采利用,把资源优势变为产品优势,促进醴陵瓷业的更大发展。

醴陵乡镇陶瓷发展概况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醴陵为扩大瓷业生产范围，由集中城市生产转入农村，采取“一放四帮”（即下放产品，帮技术、帮管理、帮设备、帮资金）扶持兴办乡镇（原为社队，下同）瓷厂。为扶持乡镇瓷业生产，国家先后投资和无息贷款四十九万五千元；信用贷款一百二十万元；省属瓷厂支援资金一十三万五千元；各项总计金额达一百八十三万元。此外，十个省属瓷业厂矿支援各种制瓷设备四十六台（件），扩散各种日用瓷和电瓷产品五十一种，帮助培训技术力量三百一十五人。

醴陵乡镇瓷业是产，原集中在东北两乡和城郊一带。随着乡镇工副业的不断发展，西、南乡一带也兴办了一批瓷厂。七十年代初期，有不少新办瓷厂，由于没有从市场需要出发盲目生产利润较高的创尔环、马鞍环、阶梯环等工业瓷，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严重亏损，教训极为深刻。后来，在省属瓷厂的定点帮助下，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增加适销对路的花色品种，由原来生产土瓷发展生产细瓷、艺术瓷、建筑瓷、电瓷等。如胜利瓷厂的罗汤、八步桥瓷厂的金中杯、前进瓷厂的七吋英碗和浦口瓷厂的五吋英碗等，都成为市场供不应求的畅销产品。近几年

来，乡镇瓷业生产通过调整和整顿，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截至一九八四年底止，全市四十二个乡镇共有瓷厂九十三个，陶器厂四十个，在厂职工八千〇七十一人；年产日用瓷四千三百九十万件，日用陶四百四十八点三五万件，工业瓷二千二百二十六吨，工业陶一百五十一万二万件，电瓷七千八百〇五吨，马赛克四万七千二百六十四平方，工艺瓷五十四点四万件，坩埚二百万只，总产值达二千九百九十二万二千七百元，其历年发展情况详见列表。

醴陵乡镇瓷业生产已初具规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全市一十一个乡四十八个矿点开采瓷泥，储量一亿吨以上。七十六个乡（镇）村瓷厂共有厂房二百八十九栋，面积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平方米，固定资产一千一百四十四万元，流动资金四百〇四万元，各种制瓷机械设备五百二十八台件。据全市一百三十三个陶瓷厂统计，共有技术骨干四百多名，其中正式授技术职称有四十名，内有助理工程师五名，还有各种工序的熟练工人三千八百多名，占陶瓷企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为发展我市乡镇企业奠定了较好的技术基础。

近几年来，由于企业经营管理逐步完善，岗位责任制普遍建立，基本改变了过去那种“吃大锅饭”的状况，各企业均出现了钻技术、抓质量、降成本、创名牌的热潮。到一九八五年止，有仙霞瓷厂生产的“仙霞牌 $\phi 76$ 矩鞍型瓷质填料”、黄沙瓷厂生产的“钟鼓牌 $\phi 25$ 矩鞍型瓷质填料”、茶山瓷厂生产的“茶山牌碳硫专用坩埚”均获部优质产品奖，五里牌工艺美术瓷厂的大号电动七品芝麻官、女排夺魁、座

莲观音荣获全国旅游产品金杯奖和部优秀新产品奖。(附乡镇瓷业历年发展情况统计表及乡镇工艺美术瓷发展情况统计表)

(市乡镇企业局供稿)

乡镇瓷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年 份	企 业 个 数	职 工 人 数	总产值(万元)
1973	50	1560	322.05
1974	33	1825	397.06
1975	52	2488	537.70
1976	51	2784	568
1977	77	3050	877.27
1978	61	2853	672.51
1979	85	4736	1639.41
1980	94	4835	1534.36
1981	76	5038	1599.69
1982	84	5521	1611.04
1983	109	6095	1935.86
1984	133	8071	2992.27

乡镇工艺美术瓷发展情况统计表

年 份	职 工 人 数		产 量(万件)		产 值(万元)	
	总人数	其中 技术员	总产量	其中出口	总产值	其中出口
1980	105	11	41.5	0.1121	80	4.64
1981	121	11	52.5	0.9575	38	6.66
1982	76	13	20.6	14.7	25	18.2
1983	182	18	187.71	10.52	86.5	15.2
1984	383	20	54.4	12.78	66.72	8.6

醴陵城关镇集体性瓷厂的发展概况

傅 扬 广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党和政府对醴陵瓷业的发展采取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政策，全城有大、小厂和组、店一百四十余家。那时，瓷器生产厂、陶画加工组、瓷器彩绘和修补破瓷的组、店，遍及现在的新胜、姜湾、车顿桥、中和等四个居委会，形成一条长约三华里的瓷器生产街道，真是满目琳琅。一九五六年，陶瓷生产厂、组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道路，原遍设在街道巷里的瓷器生产厂、组，合并为七个生产厂和两个陶画加工厂，从事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这段时间，街道的瓷业小集体和个体加工组、店，再也看不见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由县工商联三十六名家属，自筹资金，自带门板、凳子，在胜利居委会（现大礼堂隔壁）办起了一个瓷器彩绘小组。职工积极性很高，办厂的管理人员也得力，经济效益较高。为了加强领导，一九六四年元月将这个组划归城关镇人民政府领导，不久将组址搬迁到姜湾新街（现在的理化瓷厂），以生产低压电瓷的西令和电瓷夹子为主，兼搞彩绘加工。厂名改为“城关瓷厂”，这算是第一个集

体性小瓷厂的再次出现。

一九六五年，城关镇又在新胜街的鲁班庙内办起了另一家城关工业瓷厂（即现在的城关高压电瓷厂）。此后，各居委会也先后办起了低压电瓷的瓷夹生产厂和陶画加工小组。从七十年代起，郊区的烈士塔、丁家坊、上洲等大队，也相继办起了瓷厂。发展势头实在喜人，使一些平日闲居家里的居民和郊区大队的剩余劳力陆续得到了安排。直到一九八五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全镇共办起了十二个集体小瓷厂，十一个瓷器彩绘加工组。生产的品种有高低压电瓷、工业用瓷、日用瓷、理化瓷、建筑陶瓷等各种规格的瓷件，为发展醴陵瓷业生产开辟了新的渠道。

集体性瓷厂为发展醴陵瓷业生产起到了增枝添叶的作用。

六十年代以前，醴陵瓷业产品主要是两大类，即日用瓷和高压电瓷。而集体小瓷厂办起来后，它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加之享有真正的自主权，对社会需要的生产适应性强，社会上需要什么，它可以生产什么。因为它的固定资产不多，大型设备少，具有“船小调头快”的优点，在生产上它可以拾遗补缺。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国家暂时失去了生产“理化瓷”的基地。“理化瓷”是专供实验室的化学用瓷。唐山停产，化学瓷在市场上供应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由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北京东方红炼油厂、长岭炼油厂等单位组成一个小组，到江西、湖南找生产化学瓷工厂。当时，他们找到了城关瓷厂（现理化瓷厂前身）定点试

产。该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邱祥云同志对此很重视，把这项任务当作为国家分忧的大事，立即指定厂里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潘先泰（现为助理工程师）、罗永秋（现为助理工程师）、游世昌、殷迪纯等四人组成研制班子，于一九七六年底开始研制。面对如此艰巨的研制任务，他们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共配制八十七个坯料和二十九个釉料配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五月拿出了试制产品，经长岭炼油厂和北京东方红炼油厂鉴定合格。同年十月份，由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召开了有湖南地质局、冶金研究所、长岭炼油厂、东方红炼油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东海、南海舰队等单位参加的鉴定订货会议。会议确定城关瓷厂为石油化工部化学瓷定点生产厂，并接受全国四十多家石油冶金企业的订货。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南京分公司又确定城关瓷厂生产的化学瓷作为国家唯一出口的生产基地。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同年十月份将城关瓷厂的厂名改为醴陵县理化瓷厂（所有制的性质没有变）。化学瓷的生产，为醴陵瓷业生产发展增加了一个新品种，同时也为醴陵瓷器出口增加了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化学瓷主要包括各种规格的高、中、低坩埚，如罗加坩埚、自由膨胀系数坩埚、挥发性坩埚、严密坩埚、细孔坩埚等等，还有各种规格的元皿，如半球蒸发皿、带皿蒸发皿、方皿等，以及各种规格的燃烧舟、燃烧管、布氏漏斗、比色板、泥三角染色缸、乳钵等五十多个品种和一千二百多种规格。化学瓷出口，国家指定由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南京分公司一家经销，而生产基地全国只此一家。出口化学瓷由南京

口岸公司申请国家注册的商标为“铁锚牌”。因为理化瓷厂是化学瓷出口的唯一生产厂家，一九八四年由中国进出口公司江苏分公司致函湖南省计委，由省计委归口，划归省陶玻公司计划管理，并负责该厂的主要原材料的供应，保证了生产的发展。现在，化学瓷远销到了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该厂从一九七七年投产到一九八五年止，九年时间共生产了化学瓷达一千六百二十多万件，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出口到一九八五年止，七年时间外销了七百万件以上，为国家创外汇七十多万美元。化学瓷除出口外还向国内各石油、冶金、科研等单位提供了近千万件的化学瓷器。

为适应城乡基本建设的需要，一九八〇年城关镇人民政府又开始筹建了西山建筑陶瓷厂。当时，县知青办为了解决返城知青的安置，拨了返城知青安置费一十五点六万元，省、地劳动部门贷了生产周转资金六十万元，镇人民政府投资二十五万元，银行贷款四十二万元，在河西大队的一个山头上征地六万七千平方米，建造了五千六百平方米厂房的建筑陶瓷厂。建筑陶瓷质量要求很高，为了解决研制问题，镇人民政府决定从理化瓷厂抽调出助理工程师潘先泰承担这一研制任务。从一九八一年元月开始研制，共搞了五十六个坯料配方和一十二个釉料配方的研制工作，一九八二年六月份开始试产。坯料配方是采用现在城关高压电瓷厂助理工程师陈树斌同志研制的一个31号配方，釉料配方是采用潘先泰和理化瓷厂阳伟平（助理工程师）共同研制的12号乳浊釉配方，就此投产了。为了完善这一科研项目，湖南省科委拔出了科研经费两万元，支持厂里的科研工作。由于各级领导的

重视与支持，一九八四年四月，建筑陶瓷厂得以很快正式投产，当年生产了建筑陶瓷板近八万平方米。由于厂领导与科研人员的大胆设想，经与一些具有陶瓷彩绘专长的老师傅一起研制，在瓷板上绘上花卉、山水、人物，由几块、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瓷板拼凑成为锦屏瓷板画，很快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这一艺术陶瓷釉面砖产品，一九八四年五月荣获了全国建筑科技成果“金牌奖”。现在大的有用上千块陶板作画的，外地到醴陵要求加工彩陶画板的顾客络绎不绝。建筑陶瓷厂投产仅四年时间，共产陶板约四十万平方米，盈利四十九点五万元（包括知青厂免税部分）。

西山建筑陶瓷厂投产以后，烈士塔大队也相继建成了内外墙装饰建筑瓷质材料“马赛克”厂和内墙面砖厂，年产量均在一十万平方米左右。

在日用瓷生产日益发达，大量需要釉下釉上瓷用花纸时，姜湾居委会得到省陶瓷研究所的支持，于一九七八年筹集资金一十六万元，办起了一个瓷用花纸厂（一九八六年改为镇办），部分解决了醴陵瓷业花纸的供应问题，但还远远满足不了需要量，尚须提高生产能力。

几年来，城关的集体性瓷厂和陶画彩绘厂发展速度之快，就业人员之多，门类品种之齐，质量之稳定，经济效益之好，都是令人可喜的。

首先，安排了待业人员，增加了居民和郊农的收入。集体瓷厂办起来以后，共安排了一千九百四十七人（其中返城知青三百多人）就业。一九八五年工资总额达一百六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二元，人年均收入达八百四十九点四四元，其

经济收入维持了近万人的生活。

第二，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有的还为国家创了外汇。集体小瓷厂生产的门类、品种多，据一九八五年年报统计，生产品种近三百个，工业瓷、日用瓷年产量达五千万件以上，高、低压电瓷年产量达四千六百三十三点二九吨，建筑陶板、“马赛克”年总产量三十万平方米，增加了社会产品，有的还填补了国家的空白。

第三，向国家贡献了税金，为集体增加了积累。这些集体性瓷厂和加工彩绘组，一九八五年的总产值达一千一百五十七万元，年创税利二百一十六点四万元，其中向国家贡献税金为一百二十九点七万元，为集体增加积累达八十六点七万元，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第四，锻炼培养了瓷业技术人才。几年来，这些集体性瓷厂培养造就了一批技术和管理人员，据统计，培养了泥釉配方、成型工艺和烧成检验人员共六百八十五人，占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一；熟悉瓷业管理的二百五十六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一十三点一四。一九八五年，通过考核，成绩及格被晋升为瓷业助理工程师或技师职称的有一十人，技术员职称的有一十七人。

现在，这些集体性小瓷厂越办管理经验越丰富，越办职工的技术越熟练，越办视野越宽广，越办成果越显著，展望未来，前途无限。

醴陵渌江高频瓷厂发展概况

王 芝 明

一九六四年，下放的瓷业行家汤花斌、杨开林为首，组织十二位职员，三十六名工人，组成陶画加工厂。一九五六年，在中和街王家老屋建厂，专搞彩绘加工。一九六八年，迁至姜湾铁路坑，由渌江陶画加工厂改名为渌江工业瓷厂。同年，由于株洲市红卫电机修理厂急需特种陶瓷件做电铬铁发热元件的绝缘瓷体，由我厂承制。当时采用石膏模注浆，经无数次试验仍不合理想。我们决心开展特种陶瓷生产，于同年十月，派陈圣平、刘维忠同志赴苏州、上海等地的特种陶瓷厂参观学习。回来后，便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研制生产高频瓷的生产设施。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高频瓷终于在我厂用机械加工成功了。日产量比醴陵传统使用的石膏模注浆效率提高到二十倍。为了进一步提高高频瓷生产的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我厂又派陈圣平、王芝明、周序斌、肖秋兰、袁光南、陈国秋、喻大泉、周细群等同志先后三次赴苏州高频瓷厂学习，对各工序流程进行了全面学习。回厂后，我厂便成为独具一定技术水平的高频瓷专业生产厂家。一九七一年，为了适应生产环境，厂地又迁至永胜瓷厂的渌江陶画加

工厂，改名为淶江高频瓷厂。

当时，我厂只有一个车间，专生产高频瓷，占地面积不到一百平方米。

在加速四化建设中，遵循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精神，再次将一个支部分为两个厂，并分别任命邹华光、邱长霞、袁光南、周序斌等主持工作。

当时，由于全国电木梳大量上马，我厂供应管子质量仍然存在问题。产量不高，用户一等就是个把月，有时是上十家在等货。区乡党委有鉴及此，乃派区税务部门大力给予支持，派张长庚、区工业办主任黄圣德、乡工业办主任林建湘等分别主持过锅炉、成型车间工作，添置了设备，由一台挤箴机增加到四台，由日产三千支，提高到二万四千支，总产值由不到一万元增加到三万元以上。由于干部职工共同努力，当年便夺得了产值八十余万元，利润三十七万元。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再次充实领导力量，曾任命曾龙卫、陈圣平分别担任书记、厂长。根据当时我厂价格偏高，交货不及时等问题，因此，对企业内部进行了管理改革：由过去外加工模具改为本厂添置设备，自己加工设备；由原材料靠外购，改为自制原材料；由过去单一挤制产品添置了热压设备，共二十套。还进行了闸刀开关组装生产出厂。对所有产品，进行过三次调价，并且做到了质量“三包”。产品已畅销上海、广州、湛江、西安、柳州等地；部分发热元件产品还远销新疆及全国各地。

由于各类产品规格、不同性能的配套瓷件，保证了质量，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部颁标准和优干部标。（一九七五年

和一九八二年，株洲市红卫电机厂及长沙电铬铁厂，使用我厂瓷件产品装配各种规格的电铬铁产品，荣获第一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一九八三年，我厂荣获省社企局优秀产品称号。

随着技术和产品的不断更新，我厂生产的各种用途的特种陶瓷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铬铁、电木梳、家用电器中的电炒锅、电饭锅、电热器具、闸刀开关、电冰箱等绝缘瓷件及半透明氧化铝陶瓷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瓷）是高压钠灯管的最好材料，同时也是电子器件、熔炉零件及原子能装置中要耐高温、耐腐蚀、高绝缘部件的良好材料。这些瓷件，已于一九八四年试制，一九八五年投产，年产量可达一百万件。全厂产值已上升到三百万元，利润三十万元。

现我厂已有职工二百一十三人，拥有固定资产一百二十万元，厂房占地面积五千平方，其中建筑面积四千平方。目前已能生产滑石质瓷，75Al₂O₃质瓷和半透明氧化铝陶瓷（又称99.97%瓷）等二百多个品种，年产量一千三百四十八万八千多件，总产值一百八十多万元。从建厂以来，共创利润一百八十万元，上交国家利润九十二万元。

目前，我厂主要生产国防、电子、机械、轻纺及化工等工业电瓷产品中使用的高频瓷配件。

日用瓷成型设备的发展

醴陵是全国八大瓷区之一。建国前，由于工业落后，瓷器成型均为手工，后发展到用辘轳机。一九五四年对瓷改造后，始出现202型单刀成型机。一九五八年，湖南省轻工业厅在醴陵市渌江乡福建围村地段兴建湖南省醴陵陶瓷机械厂。一九六三年起，醴陵日用瓷成型设备由湖南省醴陵陶瓷机械厂制造，不仅更新了醴陵各瓷厂设备，而且开始向省外销售，目前已销向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占有一定优势。一九八四年，有207—1B滚压成型机、GY—250转盘成型机、GY—400单头滚压成型机出口泰国。

一九六〇年，我厂开始制造202型单刀旋坯机、203型单刀精坯机。

一九六五年，设计、试制成功了206双刀旋坯机，成型功效比202型单刀成型机提高4—5倍。

一九七〇年，以群力瓷厂进口日本的双刀旋坯机为样机，设计、试制成功了207—1B双刀旋坯机，结构和外观比206双刀旋坯机前进了一大步。

一九七二年，又将207—1双刀旋坯机的双刀改为滚压头，成为现在仍畅销全国的207—1B双头滚压机，在成型工艺上又提高了一步。此机适应于口径 $\phi 175\text{mm}$ 以内的碗、

盘、盘类成型。并于一九八三年被评为省级优质产品。

一九七七年，为满足瓷厂生产口径 $\phi 175\text{ mm}$ 以上产品成型的需要，又设计、试制成功了Gy—250转盘成型机。该机适应于高度 130 mm 以下，口径 $\phi 203—229\text{ mm}$ 的碗、盘类成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轻工业部委托湖南省轻工业局主持，在试用厂—国光瓷厂通过鉴定合格。

一九七九年，又设计、制造成功Gy—100H深杯双头滚压机。该机适应于高度 100 mm ，口径 $\phi 50—100\text{ mm}$ 的杯类及碗类阳模成型，改杯类（如胜利杯等）由注浆成型为滚压成型，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填补了我国杯类滚压成型的空白。该机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轻工业部委托湖南省轻工业局主持，在国光瓷厂进行了试用鉴定合格。

一九八三年，湖南省醴陵陶瓷机械厂为提高匣钵的使用寿命，又设计、试制成功了Gy—400单头滚压机。该机适应于直径 $350—400\text{ mm}$ ，高度 120 mm 的匣钵成型，填补了我国匣钵滚压、成型的空白。

（醴陵陶瓷机械厂办公室供稿）

为毛主席、周总理和国家机关 烧制瓷器

李维馨

一九五八年，醴陵承担了为毛主席试制瓷器的光荣任务。这批产品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称赞。后又奉命试制了首都十大建筑的部分用瓷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瓷。醴陵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试制的茶杯得到了周总理的赞许。为此我们又根据人民大会堂的意见，特地为周总理烧制了专用茶杯。下面是有关完成这些试制任务的情况。

一、为毛主席试制茶杯及餐具瓷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到瓷器公司，要我们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盖杯），这个任务由醴陵陶瓷研究所承担。来人带来了一个延安使用过的、上下一般大的桶形茶杯。这个茶杯无花、无盖、瓷质粗糙、颜色灰白^①。省委要求在样杯的基础上改矮、扩大、加盖，并要求用最快的时间试制出样品。我当时担任研究所所长，接受任务后即组织设计试制。在两个多月时间内，连续试制了六种

造型试样，先后四次送长沙鉴定。六月二十日，当时担任醴陵瓷器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的王林卿接长沙电话，说毛主席对我们试制的茶杯很满意，省委指示尽快赶制四十个，白的二十个，花的二十个，并要求七月五日前送省委。这时我们才知道试制的杯子是给毛主席用的，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王林卿说要给杯子取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幸福杯、跃进杯、解放杯、胜利杯……。最后确定一个有双关意义的名字：胜利杯，它象征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也寓意这次试制工作的胜利。这就是后来大量生产的“胜利杯”名字的由来。

胜利杯的试制时间前后只有两个多月，每送长沙审查一次回来又修改一次，每次周期只有十几天。研究所试制工场全体职工劲头十足，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特别是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试制工场主任，一九五九年晋升为工程师的梁六奎同志，每次修改他都亲自画草图，亲自动手改。定型后的胜利杯比来样改矮了、加大了，不是上下一般大，而是底部略为内收，杯身呈现流畅的线条，增加了杯盖，手柄也改粗了，柄与杯身间距较大。^②使用舒适，而且杯底带釉。传统瓷器的底是无釉的，显得粗糙，容易擦破桌面。在试制过程中，梁六奎等动脑筋，将底足分为内外两半，外面一半带釉，内而一半向上挖去三毫米。烧时用手工特制的凸边泥饼托住底足内沿装烧，这样，保留了外足釉层，保证了底足光滑，达到了既适应又美观的要求。这一任务按省委要求的时间提前三天完成，于七月二日送到了省委，这一次送去六十件，其中釉下花三十件，白的三十件，杯底特制了有“湖南

醴陵”字样加一个和平鸽标志的釉上西赤红底印。八月十九日又根据省委通知补送了六十件。从此毛主席正式使用了醴陵的胜利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醴陵陶瓷研究所和醴陵群力瓷厂又多次承担为毛主席试制餐具瓷的光荣任务。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省委接待处肖更如同志到醴陵陶瓷研究所，下达了省委书记万达关于为毛主席试制釉下彩餐具和烟缸的指示。研究所按时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省委接待处肖更如，携带省委信件到群力瓷厂订制了一千二百一十件大小碗和各种盘类产品，全部釉下装饰，不论盘碗，一律带盖。群力瓷厂于当年八月底全部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省轻工厅王汉平厅长和省委接待处肖更如处长又来到醴陵陶瓷研究所布置为毛主席试制带盖鱼盘。这种鱼盘取唐山的折边形式和景德镇的加深鱼盘形式制成，分大号、二号两种，一律加盖，经几次送样修改，这批产品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底完成。计送北京四十二厘米大鱼盘三十件，四十厘米二号鱼盘三十件，各带盖五件，又增加了十五点五厘米浅形三大碗八十件。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四日，省委书记张平化又亲自布置省工交办给醴陵群力瓷厂下达为毛主席承制了薄胎碗四十件，内外均有釉下花装饰，又盖杯四十件。这些任务均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

二、国务院秘书长称赞醴陵瓷器与“三销瓷”的生产

为了庆祝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首都北京从一九

五八年四季度起，开始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宏伟建筑的建设。一九五九年元月中旬我和醴陵瓷器公司王林卿去轻工部参加十大建筑内部及家具、瓷器供货会议。元月十九日晚，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在中南海听取了有关十大建筑所需地毯、家具、瓷器生产任务落实情况的汇报。十大建筑筹备处负责人，部分省、市代表近二百人参加了会议。轻工部分管瓷器的金明昭专车把醴陵、福建、景德镇的领导一起接到中南海参加了会议。当时醴陵瓷器在北京还是鲜为人知的，会上没有一个单位提出要醴陵瓷器，都要景德镇的。任务大，时间紧，景德镇承接不了。齐秘书长事先知道了这些情况，在讲话中强调十大建筑所用家具、瓷器要多种多样，不能千篇一律。中国这么大，要把各个地区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拿来。他指着醴陵的展品说（在现场临时搞了一个小型瓷器样品展览），那边一桌瓷器是醴陵的，我看就有独特风格，使用单位是外行，毛主席还是用的醴陵茶杯呀！秘书长这么一说，醴陵立即受到了重视。会后就有各大建筑的人员纷纷找醴陵代表洽谈。后来十大建筑的解放军博物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三大建筑全部订了醴陵瓷器共五万多件。这一任务由醴陵陶瓷研究所、艺术瓷厂（现在的群力瓷厂）承担。从设计试制到投产，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如质如量完成了。这就是醴陵瓷业工人平常所说的“三馆瓷”任务。

三、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瓷的试制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北京小石桥人大大会堂招待所举行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饰和瓷器审

查鉴定会。我参加了这次鉴定会，湖南还有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省手管局工程师夏纪慎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人大大会堂筹备处负责人董俊峰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冀平对醴陵送去瓷器样品画面不甚满意。这已经是若干次鉴定会了，而且距国庆节时间也不多了，再定不下来将严重影响进度，大家都很着急。这时我将随身携带的一只釉下彩蝴蝶花画面的杯子给大家看。刘冀平看了非常高兴，说这个画面好，湖南厅的茶具就用这个画面。他问“为什么样品中没有送这个画面呢？”蝴蝶花画面是醴陵艺术瓷厂老艺人唐汉初（已病故）设计的，在醴陵鉴定时，我和李昌鄂都很欣赏这个画面，但送省审查时没有通过，说是野草闲花不能登大雅之堂。省里既然没有通过，谁还敢冒违反领导决定的罪名再送北京呢？所以正式送审的样品中没有蝴蝶花画面。在此之前，我已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多次审查鉴定会，深知人民大会堂对瓷器的装饰画面要求明朗、淡雅，构图要简洁。而唐汉初同志设计的蝴蝶花画面达到了这个效果。所以随身携带了这个蝴蝶花画面的莲子杯去参加会议，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又可以避免违反省领导决定之嫌，果然不出所料。在会上就确定了湖南厅茶具画面用釉下蝴蝶花装饰。在同一会上，刘冀平副局长指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盖杯还没有落实，现在送来的式样和画面均不理想（样品是另一个产区送的），要求重新设计试制。湖南当时没有试制主席台杯子的任务，选送去的样品也就没有专为主席台设计的盖杯。会上，我告诉刘局长说：“我带了一个盖杯，放在轻工学院，我认为造型试样很好，去年还为毛主席特制了一批，是否拿来看看。

刘冀平立即同意并派他的专车让我从白堆子轻工学院取来了，刘见到杯子后高兴地说：“就这个式样，就这个式样”又说：“是的，毛主席用的就是这种杯子。”主席台就用这个式样的杯子好，画面也使用蝴蝶花另加一个杯托，赶快赶制三百套。”刘局长一槌定音，结果在国庆十周年的光辉节日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全部用上了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的釉下彩蝴蝶花胜利杯。杯子上的蝴蝶花画面是由醴陵陶瓷研究所设计室主任、彩绘工程师林家湖同志根据北京审定意见，参照唐汉初设计的小杯子画面进行修改放大的。蝴蝶花采用黄、绿颜色为主，点缀了一点红色花蕊，构图疏密有致，使画面清晰淡雅，加上瓷质洁白又是釉下，画面与瓷质相互辉映，给人一种非常明快舒畅之感。至今二十多年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还是用的这种盖杯。其间由醴陵陶瓷研究所和醴陵群力瓷厂补充更新了若干次，但造型和画面至今未变。

在这次小石桥审查鉴定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当刘冀平拿着胜利杯仔细端详时，他说：“我见过毛主席自己画过一个这种式样的杯子，好象就是这个。”七月十三日，我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找刘冀平副局长。当时中央领导对凡是来自基层的人员特别热情，事先我打了电话给他，说有事找他，在约定的时间内他已在办公室等我了。我开门见山问刘局长，前天你说见到毛主席画过一个杯子的稿子是否能找到。他见我背了照相机，知道了我的心情，随即在办公室给东南海管理处的赖大哥（处长）打电话，问对方说毛主席曾画过一个杯子，好象当

时你也在场，现在醴陵瓷器厂的同志想看看这个稿子，是否能找到。对方在电话里答复说，有这回事，有这回事，当时没有保留，可能找不到了。我回湖南后汇报了这件事，不过这件事后来被人们传讹了，说胜利杯是毛主席设计的，胜利杯的名字也是毛主席取的，省委和醴陵陶瓷研究所还保留了毛主席设计的稿子等。实际情况就是刘冀平副局长说的以上那些。研究所没有见到毛主席画的稿子，也更谈不上保留稿子，胜利杯名字也不是毛主席取的。

四、周总理喜欢胜利杯，並表扬人民大会堂工作作得细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总理全面视察了人民大会堂的室内布置。当总理看到主席台上瓷质洁白、画面雅致清新的茶杯时，非常满意。根据当时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的意见，主席台三百套茶杯都在画面的右下方烧制了一个有顺序号的圆形红色印章。总理在视察中对此特别高兴，当场表扬了人民大会堂董处长，说这个号编的好，工作作得细，想得周到。一九五九年底，根据人民大会堂的意见，醴陵陶瓷研究所又为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增加了三百套胜利杯，并根据周总理卫生长的意见，增订了五十套为周总理接待外宾专用的茶杯，也编了一个一至五十号的红色顺序号印章，印章为方形，以示区别于主席台的方形印章。后来，群力瓷厂又为大会堂试制了一批松树画面的胜利杯，画面是该厂老工人吴景林设计并采用高温釉下黑色颜料试制而成的。松树树干遒劲有力，挺拔向上，树枝婀娜多姿，象长臂伸向左方，加上密密层层针叶，画面显得苍劲有力而又富于强

烈的生命感。这种画面，开始用手工绘制，其中点画针叶即达三千多笔，生产效率很低。后经醴陵陶瓷研究所李丕雄等改用釉下贴花新工艺，才满足人民大会堂数量的需要。周总理对松树画面的胜利杯也非常喜欢。据人民大会堂的意见，又专为周总理试制了五十个松树画面的胜利杯。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省轻化工厅副厅长薛瑞接有关领导指示，亲自布置醴陵陶瓷研究所为国务院赶制一百个胜利杯。分别用蝴蝶花与松树画面装饰，并要求采用红色方形印章编01至50号，要求元旦以前派专人送到国务院。当时虽然没有说明是给周总理特制的，但我们清楚，因为只有给周总理用的杯子是方形印章编号。大家心里明白，日夜赶制，从出模种——制模——成型——彩绘——烧制，前后只花了半个月时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研究所李仁义同志专程送北京，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派专车从北京车站直接接到中南海，并告诉李仁义说，这批胜利杯是总理接待外宾用的，总理特别喜欢这种杯子，原来的打坏了不少，现在等着要用。一九六六年元月三日，国务院派专车将李仁义接到中南海怀仁堂招待看戏，并将李安排在总理后面靠近的位置。李仁义回到醴陵后，向同志们高兴地汇报了送茶杯进京的感受，说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碗古佬”，今天也能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怀仁堂看戏，而且坐在周总理附近。只有解放了，瓷业工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无限的光荣和幸福。

据原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后来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董俊峰一九七七年向醴陵同志介绍，总理喜欢使用醴陵瓷器，从一九五九年起一直到去世，都是用的醴陵瓷

器。有一位意大利记者为周总理拍摄过一帧坐在沙发椅上的半身彩色照片。记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特意将总理身边杯子上的松树画面对准了镜头。总理逝世后，这幅珍贵照片在国内外发行最多，流传最广。总理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尽风霜，顽强奋斗到最后一息。总理热爱松树，松树也正象征着总理的伟大性格。

注：

①来样杯子规格是对径7cm，高12cm。

②定型的胜利杯规格是口径8.5cm，足径5.8cm，桶高9.8cm，带盖全高13cm，杯把中心间距2.5cm。

永驻春光的醴陵釉下彩瓷器

文 汉 民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人们真的无计留春么？否，许多能工巧匠就曾艺术的形式留住春色。在我国驰名中外的湖南醴陵群力瓷厂所生产的瑰丽多彩的瓷器上，那盛开着一一种永不衰败的釉下彩花，就是这样永驻春光香飘千古的艺术珍品。如果说我国是瓷器的故乡，那么，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瓷器则是我国瓷器中一颗鲜艳夺目的明珠。这种富有地方色彩和独具一格的名瓷，是继承湖南陶瓷优秀传统艺术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

釉下彩和釉上彩不同。釉上彩花，开在瓷器的釉面上，彩绘颜料面上呈显出各种鲜艳色彩；釉下彩花，开在瓷釉下面，彩绘颜料在摄氏一千三百度以上的高温中烧练成功，彩花看得见却摸不着，画面色彩从一层透明的釉里面显露出来，显得晶莹润泽，有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清新典雅，光彩照人。

釉下彩花，由于有一层透明薄釉覆盖保护，在使用中不会被磨损，也耐酸碱侵蚀，因而，具有永不脱落或变色的优点。

国际市场上对瓷器的铅溶出量控制很严，一般要求不超过百万分之七。釉下彩花，经过摄氏一千三百度以上的高温烧制，不需要含铅量较高的熔剂来帮助发色，加上有釉层的覆盖，因此，没有铅毒的危害。据香港标准试验中心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对醴陵群力瓷厂的釉下彩九吋红花盘进行检验的结果是：样品不含铅；样品不含镉。这就充分说明了它是使用卫生和美观耐用的最理想的彩色瓷器。

釉下彩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光彩夺目的古瓷中，有一种壶类产品的咀下，运用釉下褐彩写上“天下有名”、“天下第一”的款式，可见当时是十分名贵的。现在，许多国外的博物馆里都珍藏着这种古瓷。但是，这些釉下彩瓷出产在我国何时何地，过去一直找不到有关文献的记载来作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学家和文物工作者在五十年代离长沙五十华里的瓦渣坪，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古窑遗址，因为在长沙附近，所以定名为长沙窑。经过探方挖掘，挖出碗、杯、壶、罐、香炉、雕塑艺术品等多种多样的釉下彩瓷器，也有褐绿彩绘等。经考证鉴定：“这些产品的制造时代是晚唐时期。这才使我们得知釉下彩创始于唐代的长沙窑。

一千多年以来，长沙窑首创的具有独特风格的釉下花瓷，以釉下褐色、绿色、土墨彩绘装饰产品，这在瓷业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种别具一格的釉下彩新工艺，相传至今，在醴陵得到了不断发展和提高。醴陵釉下彩瓷，历史悠久。二百五十多年前醴陵就有了瓷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官员熊希龄在醴陵创化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红，公司，进行现代瓷业生产，继承长沙窑瓷器的传统工艺，发

展了釉下彩瓷，将单色釉下花提高到了釉下五彩的新水平。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五年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曾多次参加国内武汉赛会和南洋劝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等世界博览会，分别获得清廷金牌奖和国外博览会一等金牌奖，同时，名扬中外，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称。醴陵瓷业发展有二百多座窑和六千多从业人员，产品行销长沙沿岸各埠。同江西景德镇一起成为长江流域的两大陶瓷生产中心，成为我国著名瓷城之一。但是，由于政局多变和内乱外患的摧残而好景不长，名噪一时的釉下彩瓷几乎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醴陵釉下彩瓷才又枯木逢春。

一九五五年，醴陵陶瓷研究所建立后，请来彩绘名师，从事培养釉下彩的新生力量和釉下彩的研究工作。一九五七年，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釉下彩薄胎瓷获得成功，它一问世，就显示了它的艺术魅力，生产的咖啡具、酒具等釉下彩薄胎瓷精品，具有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特点，受到好评，还为国家制造了出国礼品釉下彩瓷器。现任醴陵群力瓷厂彩绘工程师的丁华汉同志，大胆创新，移釉上粉彩的接色方法，用于釉下彩花面中，能在同一花叶中，有红有绿，有深有浅，使釉下彩花增强了老、嫩、明、暗的生机勃勃的真实效果。他以草虫为题材精心绘制的一套方肩茶具，至今在醴陵陶瓷研究所陈列着。由于技艺人员的奋发努力，釉下彩花，蓓蕾初绽，芳香飘逸。

为了加速釉下彩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八年，在醴陵瓷业公司的统筹规划下，从陶瓷研究所抽调一批优秀技术人员和从各瓷厂选调一批优秀工人，组建了从事釉下彩瓷生产的

醴陵艺术瓷厂（后改为醴陵群力瓷厂）。翌年，这个厂就为北京三馆（即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和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生产了全部国家用瓷三万多件。在三馆瓷的试制生产中，由于用手工勾画线条的技术要求高，而当时能勾画线条的技艺人员少，艺人们共同研究，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创造了皮印线条代替釉下彩绘手工勾画线条的传统技法，使釉下彩绘手工艺术与皮印线条相结合，提高工效四、五十倍，为釉下彩的大批量生产迈出了一大步。三馆瓷的画面有：运用深、浅绿、纹样活泼和色彩柔和的勾子莲，以及运用深绿、浅绿和玛瑙红，构图新颖，色彩雅艳的三色花等装饰的折边形中餐；具有构图简练、色彩淡雅的兰草花和花头饱满、花叶粗犷、神情并茂、色彩清秀的蝴蝶花装饰的莲子形茶具和胜利杯等。这些产品的造型优美，瓷质晶莹，花色雅致。色调由原来的五种发展到二十多种，失传二十多年的釉下彩传统工艺，重吐芬芳，美化生活。

一九六四年，轻工业部对全国日用陶瓷工业提出了“两赶”（赶国内先进水平，赶国际先进水平）、“三消灭”

（消灭亏损产品、亏损企业、低于历史平水的技术指标）的任务后，醴陵群力瓷厂，集中技艺精华，经过再接再厉，造出了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的釉下彩瓷器。这些产品的造型设计和彩绘装饰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那玉体晶莹的瓷质，淡雅清新的花纹，在华灯照耀下，举杯祝酒，酒映花红，花印酒，栩栩如生，釉下彩花，引人入胜。外国朋友啧啧赞誉为“东方艺术的精华的陶瓷艺术园里的明珠。”璀璨夺目，光华照人，为国庆十五年增添了光彩。到国庆三十五周

年仍不失为一流水平，经国家决定，继续使用。

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后，醴陵群力瓷厂生产了联合国用瓷，那取象梅竹的釉下彩花，青竹玉立，红梅吐艳，诗情画意，溢于瓷表，登于联合国。

一九七九年，在全国质量鼓评选中，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餐具、茶具获得第一枚金质奖章。以名胜古迹为题材的四十五头“岳阳楼”康乐餐具，采用松竹梅图案边花和郁郁葱葱的时作衬托，突出了“衔远山、吞长江”的磅礴气势，画中的楼台亭阁和湖上的轻舟风帆，远近主从，动静显影，舒畅自然，见者都赞许为“瓷艺新秀”。这个厂在荣获第一枚金质奖章后，百尺竿头，要求精进，又新增一百多个花色品种。其中新设计的团风华玲餐具，器型挺拔秀丽，画面以天青色的图案花纹衬托，由成对的风凰组成一个完整圆圈，围绕在洁白的牡丹周围，大有“风凰迷恋舞，牡丹笑颜开，雨过天青色，一一作将来”之妙。从而，获得了轻工业部一九八〇年度器型、画面设计一等奖；一九八二年，六十五头团凤釉下彩华玲餐具，获得国家优秀新产品奖。

一九八三年，在无锡召开的全国陶瓷会议上，在新产品评比中，釉下彩盘石牡蛎台灯花瓶获得优秀产品二等奖。三十公分釉下彩挂盘获得三等奖，九十二头釉下彩满花中餐具获得对外经济贸易部优秀新产品荣誉证书；釉下彩白兰餐具获得国家经委优秀产品金龙等。

一九八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旅游产品展览评比中釉下彩笔峰花瓶获得二等奖。

一九八五年，在江苏宜兴全国陶瓷行业质量评比中六十

四头釉下彩兰海棠中餐具获得餐具类总分第一名。从而，夺得了第二枚金质奖章。还有二十七头兰底釉下彩满花中餐具获得总分第五名；二十七公分釉下彩芙蓉花钵和四十公分釉下彩（似曾相识）排盘获得经工业部优胜产品奖。

在我国陶瓷史上，醴陵群力瓷厂还有两项创举的创制。一九七七年的广州春交会曾经展出了一对大花瓶，陈列在陶瓷展览厅里，高二点二三米，直径零点五八米，重九十公斤，瓶上绘花卉、松鹤，是釉下彩莲子花瓶。由于这是我国首次试制成功，而且是一次注浆成型的大件，颇能吸引观众，曾轰动一时，引得外商和旅游者争赴醴陵参观，据一九七九年十月的统计，先后有十三批之多。他们对琳琅满目的釉下彩瓷器选购的兴趣很浓，单是加拿大客商就选购了艺术瓷和配套餐具、茶具等三百三十六件，价值二万七千九百六十八元。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国家向群力瓷厂投资共八百万元，引进丝网漏花机、鱼盘塑压成型、烧成自动控制等先进设备。同时，全面推广滚压成型和阳模成型，改善烘房干燥条件，提高模具和匣钵的质量；采用高频震动筛、高磁场吸铁机、不锈钢练泥机，提高泥釉料的纯洁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技术装备素质。在拥有从釉下颜料、花纸、模具、匣钵等自行设计制造和相应成套的生产手段的基础上，使釉下彩瓷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迈进世界的先进水平。

由于釉下彩是在高温下烧成，所以，工艺远较釉上彩复杂，不仅在素烧坯上绘画困难，特别是所用颜料，与釉上花的颜料完全不同，要经过高温下的化学作用成色，烧制也就困难得多了。长沙窑釉下花仅有三个单色，到醴陵初创时

期，也只有深绿、海碧、茶色、玛瑙、艳墨等五种。现在，经过醴陵陶瓷研究所的努力，已研制出浅绿、海兰、桃红、铭红、钛黄、釉下白等二十多种耐高温的色料调配以后，可获得上百种复色，大大丰富了釉下花的色彩。这个可贵的成就，成为醴陵釉下彩瓷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在发展釉下颜料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醴陵釉下彩瓷器，在装饰工艺上也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它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釉上彩装饰方法的有益经验，创造了釉下印花、刷花、喷花、丝网印贴花以及色釉釉下彩等。在画面题材上，传统的釉下彩，主要是双勾花卉，山水禽兽。现在，画面有山水人物、花鸟草虫、蜂蝶禽兽、秀丽风景、名胜古迹、神话故事，题材新颖，包罗万象。在表现技巧上，突破了块勾填色（即分水）的局限性，创造了工笔、写意、图案等新技法，使传统的醴陵釉下彩更加丰富多彩。丰富的釉下色彩，多种多样的装饰工艺，题材新颖的画面设计，再配以优美的造型款式，更兼良好的洁白瓷质和先进的制作工艺，造成了醴陵釉下彩瓷器“明如镜、声如磬、白如玉”的品质和明净简洁，淡雅清新的艺术风格。

醴陵釉下彩瓷器的高度成就，使它从一般用具，成了能给人以强烈美感的名贵艺术佳品。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瓷器，畅流五洲四海，六个年头夺得了两枚国家的金质奖章，无怪乎外国专家来厂考察时称誉这种瓷器为“东方艺术的精华，世界独一无二。”

釉下彩花，点缀着瓷城永不衰竭的春天；
醴陵群力瓷厂，展示出开拓前进的青春活力！

回顾国宴瓷的试制和生产

李 维 善

一九六四年十五周年国庆大典的日子里，庄严宏伟的首都人民大会堂全部用上了醴陵釉下彩瓷器。这是醴陵瓷业工人的光荣和骄傲。通过国宴瓷的试制和生产，推动了醴陵瓷业的发展，为后来醴陵釉下彩两次荣获国家金质奖章打下了基础。我参加和组织了国宴瓷试制和生产全过程的工作，现将前前后后的经过回顾于后。

一、国宴餐具试制工作从一九六〇年就开始了

一九六〇年初，国务院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1961年）大庆之前将人民大会堂原有国宴餐具进行更新。人民大会堂通知了景德镇、醴陵、唐山、福建、广东试制样品。醴陵瓷器公司所属陶瓷研究所承担了试制任务。一九六〇年六月四日和六月十五日大会堂集中各地送的样品组织了两次大型鉴定会。通过鉴定对所送样品均不满意，会上要求各地继续试制，并要求先试制小范围用的便宴餐具，以便在此基础上集中各产区优点，再生产水平高的国宴餐具。一九六一年二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当时国家

困难形势，决定延缓更新计划。但为了沟通生产与使用的关系，后来醴陵陶瓷研究所与醴陵艺术瓷厂合作继续试制和多次送过样品，使设计和试制水平不断获得提高。

二、一九六四年正式确定更新全部国宴餐具并由醴陵承担任务

一九六三年国家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这一年国庆节举行了五千人的大型国宴，暴露了瓷器不够用的矛盾。原有餐具坏了不少，只好从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借用，茶具的碟子也全部撤出代替了餐具，国务院将更新国宴瓷，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登榜局长为组长的筹备工作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形容更新国宴餐具成了当时人民大会堂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为此，还惊动了几位副总理的关注。这时并明确了由湖南醴陵承担任务。因为，第一，醴陵在一九五九年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生产了茶具，又为主席台生产了釉下胜利杯，这些瓷器获得过国家领袖的好评，主席台的胜利杯还得过周总理的赞扬。总理后来一直使用醴陵釉下彩胜利杯接待外宾；第二，几年来醴陵试制国宴餐具未停，到一九六三年前前后后送过十次样品，质量上有很大改进，许多品种规格及装饰图样已接近人民大会堂的要求；第三，北京各大宾馆饭店都是景德镇青花瓷，感到千篇一律。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人民大会堂通过湖南省轻工业厅请我去北京参加研究。我当时担任醴陵陶瓷研究所所长。从一九五九年起为人民大会堂试制瓷器所举行的鉴定会、审查会都参加了，互相熟悉了解。十月底我和研究所工程技术

人员林家湖、邓文科及醴陵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六奎四人携带新试制的样品近五百件赶到了北京。

三、专家、领导、群众不同形式的鉴定会

为了使国宴餐具达到理想水平，大会堂十分慎重地组织了多种形式的鉴定会。将醴陵、景德镇、唐山、福建、广东历年送的样品一一进行了陈列。十一月七日、八日邀请在京著名美术家田世光（工艺画家）、周令钊（装饰画家）、雷圭元（中央工艺美院院长）、梅健鹰（中央工艺美院教授）、张正宇（舞台设计家）、张镠（北京美术馆副馆长）、吴镜汀（国画家）杨亚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美术专家）以及湖南的张一尊（省美协主席）、陈白尘（省美协副主席）、李昌鄂（省工艺美学家）进行了两天鉴定。十一月十日又邀请湖南在京领导袁任远、曹瑛、张际春、曾三以及在京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孟旭，文教办主任黄滨等进行了鉴定。人民大会堂还穿插组织了大会堂厨师、服务员、工作人员以及北京饭店的厨师等对样品进行了广泛的鉴定。为了使生产者了解大会堂宴会特点，还安排醴陵赴京的同志以服务员身份到宴会厅作了临场实习。最后选定了国宴餐具、便宴餐具、高级便宴餐具以及茶具、烟具等规格品种54个，各种装饰画面35个。这些品种集中了全国各产区的优点。其中装饰画面大部分选用醴陵送样。国宴餐具画面经反复评定参照景德镇送样的青花牡丹缠枝图案进行修改并采用醴陵釉下海兰色调获得了一致通过。在以上鉴定活动中，大会堂工作人员就造型规格提的意见十分宝贵。

1、为了使用方便，将原来大型产品的规格改小了，热菜盘由34厘米改为30厘米，冷菜盘由34厘米缩小为28厘米。

2、强调了规格和质量，盘类产品不能过厚、过重，边部不能薄。所有产品一律改为灯蕊边。这对醴陵传统盘类产品造型的弱点是一次大的改进。

3、去掉所有的棱角和多余的线条。由于这些改进，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产品的适应性和耐用性。

四、最后完型和生产

根据十一月人民大会堂鉴定意见，醴陵陶瓷研究所参加试制的全体人员50多人下到艺术瓷厂和该厂职工一道奋战四十天完成54个品种定型修改试制任务，并于一九六四年元月上旬将所有品种配套成620件再次送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月九日，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进行最后审查。在听取了汇报后，嘱服务员当场关上窗帘，打开灯光，反复观看了瓷器的色彩效果。最后周秘书长表示同意，认为新试制的餐具瓷质洁白、规格整齐，特别对釉下海兰色装饰效果清新雅致表示满意。。周秘书长强调在人民大会堂活动的是国家领袖，他们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用海兰色调使人感到清新又富有活力。一月十日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由国家经委向湖南省经委下达了：“为庆祝国庆十五周年，要求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制作国宴餐具、茶具12万件”的正式文件。（后来落实为16万件，实际交货17万多件）醴陵瓷器公司在京参加审查会的党委书记解克锦、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副厂长吴铮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林家湖、梁六奎、丁华汉等连夜整理了审

查会议记录及定型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等文字资料和品种与装饰定型示意图，经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人民大会堂领导一一审阅认可后，于十一月十五日由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副处长马振峰和醴陵艺术瓷厂副厂长吴铮（代表醴陵瓷器公司）双方签订了正式生产协议。从此醴陵艺术瓷厂组织了三百多人全面开展了国宴瓷生产。醴陵陶瓷研究所全部试制人员继续留工厂参加了生产实践，使科研、试制顺利过渡到生产。醴陵瓷器公司从一、二出口瓷厂（今国光、星火瓷厂）抽调了优秀技术工人支援国宴瓷生产，现为群力瓷厂副总工程师的韩建国即为当时一出口瓷厂支援的优秀成型技术工人之一。省轻工机械厂、醴陵陶瓷机械厂为国宴瓷生产赶制了真空练泥机、球磨机、修坯车等机械设备。公司又帮助工厂建立了素烧炉，改善了车间工艺和环境，添置了坯板坯架。全厂上下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组织了技术培训，一个紧张而又有节奏的，热烈而又有秩序的国宴瓷生产从一九六四年二月开始在醴陵艺术瓷厂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委对国宴瓷生产给予了直接关注。省委领导听取省轻工业厅副厅长薛瑞同志关于醴陵承担国宴瓷生产的汇报后表示：“人民大会堂在中国只有一个，是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的地方，醴陵瓷业公司一定要发动职工以此为动力，生产出代表中国最好水平的瓷器。”当听到汇报说湖南新化、洪江有好陶瓷原料时，省委领导立即吩咐办公厅派小车责成醴陵陶瓷研究所所长迅速调查落实。要求用最好的原料生产国宴产品。后来在洪江瓷厂大力支持下，醴陵国宴瓷生产用上了优质的洪江泥（即叙浦、黔阳、怀化三县交界点

的青界岭泥)配方,使国宴瓷成为当时全国白度最好、透明度最高的产品。这种高白度产品加上海兰色调图案装饰,更显得晶莹润泽、光彩夺目,令人赏心悦目。

国宴瓷生产在各级领导重视和各方面支援下,艺术瓷厂全体职工发扬了高度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全部任务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底完成,实际交货品种和数量是:

1、为6000人宴会准备的国宴餐具18个规格,釉下海兰牡纹装饰,共104255件。

2、便宴餐具18个规格(16个与国宴品种同)釉下深兰色边花图案装饰,共6917件。

3、高级便饭餐具17规格(6个与国宴同),釉下深兰色边花图案装饰,共490件。

4、茶具4种1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兰草、松树荷花、牡丹、梅花、枫叶、菖兰八种画面装饰,共52585件。

5、胜利杯带托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松树、蝴蝶花、枫叶四种画面装饰,共4000件。

6、烟灰缸5种,共3470件。

7、长四方形烟盘1种,共400件。

8、扣碗(兰边)1种共6000件。

9、糖缸、奶罐各1种250件。

以上九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画面装饰计178367件。

参加国宴瓷试制和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员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

陶瓷研究所李维善、艺术瓷厂巢丰鑫、吴铮、刘绍才负责管理和组织。

陶瓷研究所罗正顺、邹高玉、李维善、张复森、李万香、姚道德负责原配方研制；

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元奎、干部刘金尧负责生产成型工艺，还有研究所梁明仁、艺术瓷厂韩建国、李雪钦、梁雪棠、杨海明等分别负责成型刀削、旋坯、注浆、制模等各工种工作。

瓷器公司技术科烧成工程师王盛开负责烧成工艺。

陶瓷研究所工程师林家潮、设计人员邓文科、艺术瓷厂设计人员丁华汉、唐汉初（已故）负责画面设计和釉下颜色调配。前前后后参加了国宴瓷画面设计和颜色调配的还有陶瓷研究所的吴寿祺（已故）、李丕雄、熊声贵、邓景渊、王德和、余华、罗修玉（已故）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仙、刘继纯（已故）、汤清海、长沙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扬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

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已故）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

艺术瓷厂杨大均、徐能文承担了釉下颜料统一配色及管理。

一大批老工人为国宴瓷生产贡献了力量，一大批青年工人通过国宴瓷生产得到了锻炼提高，他们中的许多积极分子

已成为今天群力瓷厂生产和技术管理中的骨干。

人民大会堂一九六四年国庆十五周年起到现在一直使用醴陵釉下彩瓷，在使用中获得了国家领袖和来宾的一致好评。醴陵釉下瓷器从此名声大震。人民大会堂也给醴陵瓷器公司发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上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邀请醴陵瓷器公司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座谈国宴瓷使用效果时特别邀请瓷器公司党委书记解克锦、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厂长巢丰鑫为代表于十一月六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厅参加了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袖出席的文艺晚会。这是代表醴陵瓷业工人、特别是为试制和生产国宴瓷的全体职工所享受到终生难忘的最高荣誉了。

银光晖映的醴陵出口瓷

中档厚胎瓷餐具，是醴陵国光瓷厂最新设计的旅馆用瓷。这种餐具，造型雄浑，瓷质洁白，釉面光滑，装饰素雅，它的底印，色边都是釉下颜料，使用时无铅毒之害。所饰色边，有三色、二色、单色多种形式；色彩有、黑、棕、黄、蓝、绿仿金等，其中绿宽边勾子莲金线纹样的彩饰，给人们以舒适名贵。富丽堂皇的感觉，内在质量的物理化学性能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它的特点是胎厚，不易打碎，便于机械洗涤，是优良的旅馆用瓷。这种产品，有76个品种，配套灵活多样，有2头、6头、8头、9头、15头、17头、19头等等。由于这种餐具质量高，白度、光泽度和吸水率等指标，都比部颁标准高，国外报刊倍加赞扬，1979年度国家质量奖评选中，荣获银质奖章。

白玉牌西餐具是醴陵国光瓷厂设计的又一种荣获国家银质奖的新型餐具。这种餐具，造型别致、鱼盘、鸭池、方中窝圆、奶盅、一端高耸，具有动势，平盘、底宽足小。整套产品的造型既富有变化，又协调和谐。美商说：“这是八十年代最新式样的产品。”产品的装饰，显得素雅端庄，乳白色的花纹，格外清秀，满花满而不繁，边花艳而不俗，既有欧美风味，更富有强烈的东方民族艺术特色。美国米卡莎公

司经理布莱克先生叹为观止。

国光瓷厂还生产了几种航空公司订制的六头餐具。这种餐具的造型，以抽象的几何图形组成，整体以直线为主，看上去显得平稳庄重，刚劲有力，再用鲜红的飘带和灿烂的金色彩装饰着富有线条美的器型，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感觉。美国TWA航空公司经理哥德伯格先生对这一产品备加赞赏。

醴陵牌45头餐具，是醴陵永胜瓷厂1984年荣获国家银质奖章的新产品。产品的造型优美，器型主体以弧线组成，清新秀丽，转折流畅，刚柔稳健。它的画面装饰，有色彩淡雅的边花，也有富丽堂皇的满花，别具韵味。这种产品，畅销美国，享有名气；美国天山公司要求该厂多生产这样的餐具，以满足客户的要求。

莲花牌茶具，是醴陵永胜瓷厂又一名牌产品。莲花牌茶具的造型，有出水荷莲之姿，瓷质有莲藕嫩白之美，釉色光亮，茶壶正身，形似莲子。茶杯和糖缸玉立，形如莲蓬，挺拔清秀，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贞节气质，与优美柔和的荷口泰盘、碟相配成套，再加上美丽纹饰的装点，统一协调，鲜艳夺目。

醴陵牌和莲花牌餐具的配套，灵活多样，有18头、20头、30头、36头、45头等多种形式。这种餐具和茶具，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香港吉帮洋行经理张学文先生说：“我就是靠莲花在国际市场打开销路的。”

(文汉民整理)

创历史水平的大花瓶

醴陵群力瓷厂在1977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陶瓷展览厅里，首次展出了该厂第一次试制成功的一对高2.23米，直径0.58米，重90公斤的釉下彩满花开窗松鹤莲子花瓶。

1976年12月5日到1977年1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湖南陶瓷展览展品中，两支高达1.32米的釉下彩满花开窗花瓶。

“喜鹊枝头颂东风”和“莺歌燕舞迎新春”的开窗画面，鲜艳夺目，受到了参观者的啧啧称赞。

1976年春季，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陶瓷展厅里，首次展出了两支高达2.23釉下彩满花开窗松鹤莲子花瓶，这是醴陵群力瓷厂创历史水平的新产品。

从1976年冬在北京展出，到1977年春季在广州展出的釉下彩瓷花瓶，造型一支比一支更高大，画面一支比一支更鲜艳新颖。花瓶形似莲子，质白如玉，在历代的玉器中，从未有过这样高大、巧夺天工的玉质花瓶。

1975年，醴陵群力瓷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抽调两名大学本科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任专职教师兼管理干部，由一位厂党委副书记兼任校长、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用自己的技术力量，脱产培训了工人技术队伍。入学的学员中，有在旧社会没有上过学的，解放后上夜校才摘掉文盲帽

子的老工人，也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这些学员虽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都有一顆为四化建设学好文化技术理论的雄心壮志。经过六个月的数理化基础知识的学习后，便进入专业理论教学阶段，由于理论教学与生产科研紧密结合进行，不仅为厂里攻克了大型产品原料方的技术难关，学员们在学了制图和机械知识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开展科研活动，设计制造了一台匣钵压底机。匣钵经过压底后，提高了耐烧能力，延长了匣钵的使用寿命，增强了窑车容量，不仅每年可为国家增产节约六万多元，而且解决了多年来匣钵质量不高的技术难题，为大生产扫除了因匣钵质量低，影响生产向前发展的障碍。

在教学实践中，学校师生在总结大件配方经验的基础上，准备试制注浆一次成型一米高以上的大花瓶，由两位专职教师和学员周利加一道，以地面当纸，用粉笔绘制器型图，经大家讨论修改定型后，即着手试制。为了不影 响生产，他们利用星期天车制模种，倒注模具，没有熟石膏自己动手把生石膏炒熟，没有盛泥浆的木桶，利用旧桶改装，因陋就简，克服了缺工具等困难。为了观察坯子在注浆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有的学员放弃轮休，到现场观察。经过三十多天的艰苦奋斗，高达1.32米的大花瓶试制成功了。

接着，试注2.23米高的大花瓶，整个石膏模具高达2.6米多，十块模子重达1200多斤，全靠手工搬来搬去，师生们搞得满身大汗，精疲力竭，连续注浆试验了五次，都在松模时垮掉了，第六次试验松模时，只有一个坯子剩下半部没有垮掉，两位专职教师组织全体学员到现场对模具一块一块作

了检查和分析，找出了脱模垮坯的原因，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2.23米高的两支大花瓶一次注浆试制成功。

过去，制造这样高大的瓷质花瓶，按照传统技艺，只能用手工分节拉坯成型后，再一节一节地接成整体，即使烧制成功，也会留下接口的印痕，给人美中不足之感！这次2.32米高的两支松鹤满花开窗莲子大花瓶试制成功，醴陵的瓷业职工为我国瓷业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1977年4月10，把这两支2.23米高的松鹤满花开窗莲子大花瓶送到广州春季交易出口商品展览会展出后，博得好评。一个观众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赞美这两支大花瓶：“历史长河工农造，千巧古艺数今朝，松鹤花瓶展雄翅，欲与天公试比高。”

（文汉民整理）

宋庆龄称赞醴陵瓷

李维善

一九五九年九月我和省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省手管局工程师夏纪慎等在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装饰布置工作。湖南厅紧靠人民大会堂万人会场的南面，有两个大门直通万人会场。与湖南厅相对应的是四川厅，会场后面分别是北京厅、上海厅。这些厅室都较大，湖南厅即有四百八十平方米，又紧靠万人会场和主席台，是国家领导人开会休息之地，也是接见国外大型团体活动之地。位置十分重要。湖南厅内部家具及装饰品全部由湖南负责。其中有著名的湘绣、邵阳的竹器、浏阳的菊花石、铜官的陶器和醴陵的瓷器等日用品和装饰品。醴陵陶瓷研究所和醴陵艺术瓷厂（今群力瓷厂）承担了全部瓷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日用品有釉下彩茶具、烟具等，装饰品有八十厘米高的釉下花瓶两件，瓷雕龙舟一件，瓷雕松、竹、梅盆景一件，一米对径的瓷雕挂盘两件。瓷雕龙舟和盆景的主要作者是陶瓷研究所的老艺人徐协和（已病故）和青年艺人唐锡怀（现为醴陵陶研所技师）、李顺梅。一米对径的瓷雕大挂盘的主要作者是研究所老艺人易湘扩（已病故）和工程师罗景所以及醴陵电瓷厂的罗同湘

等。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冀平在人民大会堂向我们打招呼要求下午早点到这里等着有事。后来知道宋庆龄下午要来参观。下午三点四十分宋庆龄一行在刘冀平陪同下缓步进入了湖南厅，只见宋庆龄身着黑色短外套，身体微胖，皮肤白晰，步履矫健，当时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看上去才五十岁年纪。宋庆龄等进入湖南厅后首先对湖绣屏风和挂屏赞不绝口。随同宋庆龄来参观的有二十多人。刘副局长招呼大家坐下稍事歇憩。服务员一一倒上茶水。刘冀平指着茶杯向宋庆龄介绍说，这瓷器是湖南醴陵的釉下彩瓷，非常光滑漂亮。接着要我简单的介绍了釉下彩特点。宋庆龄边听介绍边用姆指摸着瓷器连声说：“好，真光滑，好极了。”湖南厅的西墙挂的是两块一米对径的堆刁瓷盘。内容分别为湖南花鼓戏中的“刘海戏蟾”和湘剧“三女抢板”。毛主席很喜欢这些戏，曾邀请过花鼓剧团和湘剧团到中南海作过专场演出。宋庆龄走近瓷盘时停了下来，一边听介绍一边仔细观看。当她知道用高温烧制的瓷器时，不断地说：“这么大，雕的真好。”又问，“这也是湖南醴陵的吗？”，刘副局长说，这里瓷器都是湖南醴陵的。接着，宋庆龄等在刘副局长陪同下进入了北京厅。后来，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向我们介绍说，宋庆龄看了人民大会堂的布置非常满意。董处长说，宋庆龄到湖南厅看到了醴陵的瓷器，后来到主席台看到的盖杯（即胜利杯）也是醴陵的，对湖南醴陵的瓷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回顾赠缅甸礼品瓷的试验和生产

李 维 普

一九六〇年十月，为庆祝中缅两国边界协定生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访前，国务院特制一批瓷器随总理出访赠送给缅甸北部与我国云南接壤的腊戍边境地区居民作为纪念。醴陵瓷器公司第一、二出口瓷厂（今国光、星火瓷厂）光荣承担了以孔雀茶梅画面饰有“中缅友好”四个金字装饰的礼品瓷盘十万件。中央轻工业部于九月二十三日正式下达任务。要求十月二十五日完成并发运出厂。时间只有一个月，任务急，要求高。湖南省轻工业厅和醴陵瓷器公司接受任务后，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组织醴陵全公司通力协作，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战斗，在十月二十四日提前一天超额一万件胜利完成，获得轻工部电报表扬。这是醴陵瓷业工人在六十年代初期为加强我国的国际友谊作出的一项贡献，也是醴陵瓷业生产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

任务下达后，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王丕林带领三位处长直接深入第一、二出口瓷厂，他们以普通劳动者姿态置身于群众之中，参加制订方案和一线劳动。醴陵瓷器公司党委

书记解光绵、副经理刘均带领公司和陶瓷研究所主要技术干部和业务干部十多人在第一出口瓷厂组成了前线办公室，由我负责办公室工作。会同工厂领导将任务进行全面筹划、周密组织。第二天（九月二十四日）即制订了通盘计划，将工种之间的衔接、起止时间，按日按时分解到一、二厂和协作厂的车间、班组。并充分利用工种之间的时间差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在重大关键问题上采取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形式进行现场突击。为了保证质量，瓷器公司领导 and 研究所的技术干部与泥矿的领导、工人一道，四天之内即解决了平常要几个月才能解决的坯、釉配方，一个星期即加工了熟泥，保证了十月一日正式成型生产。在调整配方时，需添加距工厂三十华里以外的赤竹岭瓷泥，当时无汽车运输，也无公路通矿山，五十吨赤竹岭瓷泥靠临时组织起来的一百名瓷业工人用土车（每人每天一车，每车一百公斤），五天之内全部运到了第一出口瓷厂加工现场。公司所属泥矿、机械厂、木工厂、工业瓷厂、艺术瓷厂通力协作。第一工业瓷厂（现涿江电瓷厂）抽出了三十七名技术工人支援一、二厂参加成型和烧窑，并腾出四台球磨机负责加工釉料。陶瓷机械厂采取停人不停机的办法组织工人二十四小时连续作业，两天之内为一、二厂赶制了压饼机和钢模，木工厂从十月八日起突击十天到十八号止赶制了包装木箱七百个。公司前线办公室二十四小时有领导和干部值班，随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问题。一天晚上十点钟了，发现烧窑车间匣钵差额较大。按照当时规定的时间要求，今天的事不能延到明天，晚上的事不能延到白天。第一出口瓷厂的领导立即从宿舍临时召集起三

百多名职工到艺术瓷厂用手工搬回匣钵七千多个，保证了当晚两点装烧点火。在这支临时召集起来的搬运队伍中除工厂厂长、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外，还有省轻工业厅年近六十岁的副厅长王丕林，公司党委书记解光绵、副经理刘均等。在整个礼品瓷生产过程中，广大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投入战斗。大多数工人，特别是后工序贴花女工，他（她）们自觉地、不讲报酬地每天干到晚上十一点，第二天清早又赶来上班。十月八日晚上，第二出口瓷厂要按时将产品进窑，当时还是阶级窑，前面上火不久，窑内温度尚高，为了赶上时间，工人肖中传、黎汗云等身穿湿棉衣把窑内钵子搬了出来。厂长又带领十七名工人到其他窑上搬运匣钵，战斗一通宵，保证了凌晨五点发火。有一天装坯的饼子告急。工人杨海云夫妇把被子搬到车间，通宵轮流烘烤饼子，干一条贴一条，修一条涂一条（涂铅粉浆），按时保证了装坯的需要。看色鉴定按常规只能白天看，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在色房挂起五百支光的灯泡，把晚上当白天。正是广大职工在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带动下，不怕苦，不怕累，打破常规，使礼品瓷生产赢得了时间，迎来了胜利。

通过礼品瓷生产大大地提高和促进了醴陵瓷业生产的管理、技术和质量水平。生产礼品瓷必须时刻掌握动态，从那时起建立健全了一套完整的班组、车间日报表以及全厂日综合分析统计表制度。这种方法，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经过不断完善发展已成为今天管理工作中一项最基本的数理统计和生产信息的基础。为了迅速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在生产礼品

瓷过程中组织了广泛的操作表演、技术讲座和技术交流活动，有的班组通过技术交流，从班产九百多件提高到一千七百多件；第一出口瓷厂旋坯能手谭义犹（已故）为了克服半成品变形，围绕正确的打泥蛋、定刀和有控制地施水等操作，连续进行了十几次现场表演，使半成品质量普遍得到提高。通过礼品瓷生产为后来发展出口瓷生产练就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礼品瓷生产一开始就由研究所技术人员及成型工程师梁六奎、烧成工程师王盛开、公司技术室主任陈扬根等配合工厂技术人员分别把住原料、成型、彩绘、烧成几大主要关键。在原料方面，采取了人工精选矿石，配料时严格计量配兑，坚持原始记录、坚持干物质换算、坚持万孔筛控制细度，坚持泥浆、釉浆一律过150目筛，并三次吸铁，由于采取了或坚持了这些比较科学的方法，保证了坯釉料的均一性和稳定性，克服了制品的黑点、子屑等缺陷，礼品瓷质量（出口率）由大生产的百分之三十几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种控制原料行之有效的的基本方法为后来大生产广为推广采用，并在实践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当时，醴陵瓷业处于人力运输原料、燃料，单刀旋坯，煤烧倒焰窑和阶级窑的条件下，短短一个月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礼品瓷生产任务，这是瓷业工人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付出艰辛劳动的结果。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凡直接参加过这场战斗实践的同志每当回顾起礼品瓷生产的壮观情景，为自己能有幸为此付出了汗水时，无不感到自豪和骄傲。

礼品瓷生产从九月二十三日下达任务开始，按轻工部规

定，必须每天向北京发一次电报汇报。作为一种史料，这里照录当时最后一个电报稿作为本文结束语。

“北京轻工部，赠缅礼品瓷十万件，已于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全部完成，前电示增产一万件，于同日晚上十一一点完成，今日凌晨五点包装完毕，上午十一一点全部运至醴陵车站（发上海一仰光一腊戌）计688箱，110080件，经站方验收无误。1960.10.24中午11.30，醴陵瓷司。”

这是一个电报稿，也是瓷业工人用共产主义劳动汗水浇灌成的一个胜利小结。

建国后醴陵瓷业管理体制 的演变过程

朱方义

一、全行业合营前的管理体制

1949年7月25日，醴陵宣告解放。7月26日，成立了醴陵县人民民主政府办事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18师政治部主任赵更生兼主任，地下党县工委书记孟树德兼付主任。8月1日，南下县委醴陵工作队到达醴陵，与醴陵地下党胜利会师。8月4日，正式成立中共醴陵县委员会和醴陵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即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从接受城市的第一天起，首先要重视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精神，以地下党员李岳传同志为首，吸收劳资双方代表成立了瓷业复工促进会，接着又成立了瓷业工会筹委会和瓷业在成立上述机构的同时，还大力宣传贯彻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打消资方的顾虑，鼓励复工；同时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要求过高过急的情绪。通过培养典型，在八个比较开明的厂主带

动下，到九月中旬，先后复工的粗瓷厂达七十五家，就业工人1186人，细瓷厂二十家，就业工人1200人。为了打开销路，还由县工商科科长张步升为首成立醴陵瓷业联合运销社，张步升任主任，黄广舜、黎光冬任付主任，联合运销社成立后，即在武汉，青海等地开辟市场。这一年，虽然上半年有90%的工厂停工，但由于争取了后四个月的时间，全县仍产日用瓷1499万件，到年末，就业职工达3297人。

1950年，通过发放贷款和救济粮等办法，恢复生产的大小瓷厂达209家，就业职工达5474人，生产日用瓷2242万件，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11万元增加到200万元。

1951年5月，当时长沙专区曾在醴陵组建醴陵瓷业企业公司派傅杰任经理，张勋业、陈作民任付经理，将瓷业联合运销社并入该公司，并对城区私营瓷厂（除少数未参加外）按地区划分为五个厂，实行统一管理，管了一段时间，于1952年又将各厂发还给私营企业，联合运销社的资金拨给柴木泥公司。瓷业企业公司则转到湘江工矿公司去了。

1951年末，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瓷业生产，设立了瓷器购销委员会。购销委员会一方面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组织产销联营机构，以开拓市场；一方面依靠瓷业工会组织职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同时吸引外地商人投资办厂，如上海、无锡商人姚浩泉等六人投资10亿元（合新币10万元）由张勋业、李润生、刘锡威、胡雪棠等人作证立约，筹建民营工业有限公司。购销委员会实质上成了当时醴陵瓷业的管理机构。1952年2月，长沙专署在批复醴陵县人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进一步强化了购销委员会的职能，要求购销委员会

掌握价格，掌握客商情况和产销情况，控制买空卖空、哄抬物价或降低品质规格，强调了对瓷泥开采的统一管理，又将木柴交易所划归购销委员会领导（当时瓷业生产的燃料是松柴，年耗一亿二千万斤），以消除高价抢购和压价囤购现象。对购销委员会的经费也作了明确规定，按购销额千分之五收取手续费，特别强调所收手续费除作机关必要开支外，主要用在发展瓷业生产上，县政府不得挪用，专署也不得上提。在当时集中主要力量进行社会改革的情况下，能够如此明确坚定地提出与贯彻上述措施，是难能可贵的。1951年，日用瓷产量达3712万件，比1950年增长65%，产值达324万元，比1950年增长62%。到1952年末，有职工6189人，年产日用瓷4664万件，比1941年增长25%。

1953年，为了加强对城区瓷业的领导，由城关镇、县总工会、工业科、税务局、省土产公司醴陵瓷器公司、县工商联等六个单位联合组成领导小组，由镇委书记胡廷翥任组长，县总工会副主席袁明辉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后改为增产节约办公室），统一管理城区瓷业。农村则由区、乡管理。

应该指出的是：建国后，醴陵瓷业不但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和扩大。最早有国营醴陵电瓷厂；1953年新建地方国营醴陵瓷厂；1952年末，组建了九个瓷业生产合作社和147个合作小组。1954年，对私营刘祥纪瓷厂实行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醴陵建设瓷厂；1955年，对私营之同、日新、大公、泰丰瓷厂实行公私合营，之同、日新二厂合并定名为醴陵洲醴瓷

厂，大公、秦丰厂名未变，加上个体户，醴陵瓷业由此出现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由于所有制不同，各厂隶属关系也就各异，湖南电瓷厂（后改为醴陵电瓷厂）属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地方国营醴陵瓷厂和四个公私合营瓷厂属县工业科领导；瓷业合作社（组）属县手工业生产联社领导；私营瓷厂和个体手工业者则分别属所在地区、镇领导。

这一时期醴陵瓷业的管理体制有如下两大特点：一是行政管理上出现条块分割，二是生产经营由营商业实行订货，统购包销。除醴陵电瓷厂外，所有日用瓷厂，不论所有制和隶属关系，都由湖南省土产公司醴陵瓷器公司年初与工厂签订收购合同，并预付贷款。松柴、瓷泥也由公司统一收购，凭工厂收据，由公司付款，产、供、销的实际管理权统一在瓷器公司。由于有第二个特点，而当时条块分割的弊端暴露不明显。同时，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因此由政府有关部门分别管理，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推动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二、全行业合营后的管理体制

这一时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多元化向一体化转化。1956年，通过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醴陵瓷业，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1956年全县59户私营细瓷厂、44户粗瓷厂、5户电瓷厂、8户陶画加工厂及一百户个体户敲锣打鼓，申请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县人民政府于元月二十五

日一次批准，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利刀斩断私有制、开辟历史新纪元”的口号下，结束了醴陵瓷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同年二月，成立了醴陵县瓷业公司，属县人委会领导；三月，改为湖南省湘潭地区醴陵瓷器工业公司，属湘潭专区工业局领导。六月，省工业厅根据国务院1956年6月12日国四办习字第三号文件“关于原则上同意成立瓷业公司、统一管理醴陵瓷业”的批示，经请示省委同意，在原湘潭专区醴陵瓷器工业公司的基础上，改组成立湖南省工业厅瓷器工业公司，直属省工业厅领导。并责成公司按照国务院批示，不分经济类型，统一、直接领导和管理醴陵瓷业生产及与此相联的瓷泥、陶画、陶瓷颜料等全部企业。1956年7月至9月，醴陵县手工业生产联社所领导的32个瓷业生产合作社（组）2792人按照地理条件，全部就近并入公私合营企业。1958年4月，醴陵电瓷厂也下放给瓷器工业公司管辖。至此，醴陵瓷业的管理体制，实现了一体化。这种大统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成为醴陵瓷业发展史上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具体表现在：

1、全面规化，统筹安排，进行基本建设。公司将分散生产经营的手工业工场实行拆、迁、合、并逐步集中，并投资八百万元新建了六个日用瓷厂，还有瓷泥矿、陶瓷机械厂、陶瓷研究所等。整个企业的建筑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从而变半露天厂棚为正式车间，实现了生产工厂化，结束了瓷业工人“辘轳车下千滴血，半边棚里受折磨的历史。”

2、加快了技术改造的步伐，结束了醴陵瓷业“粉碎靠水碓、烧窑靠松柴、干燥靠太阳、成型靠手拉”的历史。在这

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全行业合营后，轻工业部部长助理李人凤亲自带队，组成改窑工作组，对醴陵120座阶级窑，全部进行改造，由烧松柴改为烧煤，这一着对发展醴陵瓷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按当时耗用量计算一年能节约松柴一亿六千万斤，不但改变了当时燃料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而且降低了瓷业烧成成本18%，特别是保护了祖国森林资源。

3、通过搞好人才开发和技术开发，釉下彩瓷焕发青春，并实现了“以细代粗”。在销售市场上，实现了由内销转出口的伟大转变。

陶瓷研究所请出了老艺人吴寿祺，在他的指导下，抢救了失传多年的釉下彩，培训了年轻的釉下彩工人二百余人，试制成功了桃红、海兰、鲜黑、骄黄、白色等多种釉下彩颜料，使醴陵瓷业的釉下彩恢复了艺术青春。1958年组建的艺术瓷厂（即现在的群力瓷厂）与陶瓷研究所通力协作，试制成功了大批新产品，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光荣地完成了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工人体育场的全部用瓷和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陈设艺术瓷的任务。1956年，公司成立后，即根据农民为了讲究卫生，要求消灭碗底无釉的圈圈的建议，将所有粗瓷厂全部转产细瓷，对城区基础较好的细瓷厂转产出口瓷。从此醴陵不但是祖国的陶瓷生产基地，而且是重要的陶瓷出口基地了。

总之，实现管理一体化，在搞好行业规划，推动行业的技术改造，密切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1957年，全县日用瓷产量突破一亿件，达11.62万件，出口达601万件，生产电

瓷4.777吨，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公司没有摆脱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产品经济的管理模式，过分强调集中，加上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因而给日用瓷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1958年和1959年日用瓷产量显著下降，1958年只产5.918万件，1959年只产5.144万件。通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才逐渐好转，1964年，日用瓷总产量回升到6.052万件。

第二阶段由一体化再向条块分割转化

1964年冬，公司撤销，改为湖南省硅酸盐工业公司醴陵瓷业办事处。这一时期，醴陵瓷业管理的特点是：

第一、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服务机构，没有人牵头组织专业化协作，企业被迫发展小而全和大而全，自搞运输，自炒石膏，有的还得自己开采瓷泥。比如同是由长岭炼油厂供应重油烧窑，为了联系供油问题，各厂都得派一个代表长驻岳阳。

第二：条块分割，由按行业归口改为按产品用途和行政系统的管理层次分别归口，形成多层次领导和多头领导，象横断山脉一样，人为地割断了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这样，既不利于共同性的资源开发和技术开发，也不利于人才和技术设备的充分合理使用，使整个产区不能形成拳头，发扬优势，协调发展。

上述情况，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给经过三年调整刚刚复苏的醴陵瓷业带来不少困难，自1966年到1979年的十多年中，醴陵瓷业只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地前进。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管理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醴陵瓷业的管理体制，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

1、恢复醴陵陶瓷工业公司，加强了原省属日用瓷的横向经济联合，逐步由小而全、大而全向专业化协作方面转变。

1979年初，省编委下达了一号文件，恢复醴陵瓷器工业公司。公司恢复后，即集中精力，抓企业的转轨变型，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当年即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产品质量、积累、创汇额均创历史最好水平。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急剧变化，根据扬长避短、发扬优势的原则，公司对各厂产品进行了合理分工，建立多层次的产品结构。特别是大搞产品更新换代和质量升级，使产品由小件单件为主向大件成套转化，由中低档向中高档转化，因而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销售地区由亚非拉转向欧美市场。1984年，对美出口瓷的数量和换汇额在全国八大陶瓷产区中都名列前茅，国光瓷厂对美出口的厚胎餐具、白玉餐具和永胜瓷厂的对美出口的醴陵牌餐具均获国家银质奖章。随着优质名牌产品的增加，醴陵瓷器在国际市场的声誉不断提高，永胜瓷厂对醴陵牌餐具，在美国市场被誉为醴陵的玫瑰。美国THC公司、米卡莎公司、天山公司、艾克瑟尔公司都争相订购醴陵瓷器。

群力瓷厂，发扬釉下彩的艺术特色，对产品精益求精，两次荣获国家金质奖。1984年，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的时

候，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天安门都是用的群力瓷厂的瓷器。尔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接待外国国家元首来访用的礼品也选用了不少醴陵瓷器。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大挂盘就是选用群力瓷厂的。

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搞好专业化协作，公司成立了汽车队和供销经理部，组建了年产8000吨到10000吨的石膏粉厂，不但供给本系统，而且可供应省内外瓷厂。1985年元月，公司下放到株洲市，六月，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将瓷器工业公司改为醴陵瓷业总公司，七月，国家经委、财政部发出关于下达1985年重点支持大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名单的通知中，把醴陵瓷业总公司列为309个大型骨干企业之一，要求在“七五”期间，基本完成技术改造任务。自1985年起，调整企业折旧率，将原由地区和部门集中的30%折旧基金全部返回给企业，返还给企业的折旧基金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减免调节税，对技术改造贷款给予优先考虑。上述优惠政策，对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陶瓷出口工业的完整体系，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瓷业总公司根据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搞好简改放权和党政分工，实行经理负责制。一方面抓理顺政策，搞活工厂一方面抓自身经营，搞活公司，把国家给企业的自主权全部下放给工厂，公司不截留，把国家给公司的优惠与工厂分享，公司不独占。公司对各厂实行优质服务和有效服务有偿服务。为了增强公司对各厂的服务能力，总公司分设了物资供应公司、产品销售公司、能源管理公司、

生活服务公司和陶瓷工业设计院，扩建了瓷业宾馆，筹办了实验工厂。这样，公司既不收各厂管理费，也不要国家行政经费，还可为国家上缴税利，使公司形成了经营型、服务型的经济实体。目前公司正根据国务院1986年36号文件精神，推动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向着紧密型方向发展，使醴陵瓷业的组织结构，形成大、中、小相结合、专业配套，门类齐全的大型企业群体，把更多的名优产品投向国际市场，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2、醴陵电瓷厂于1984年由省机械工业局下放给株洲市经委领导。

3、醴陵陶瓷机械厂由省轻工业厅下放给株洲市一轻局领导。

4、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有了新的发展。

至此，醴陵瓷业的管理体制形成了如下现状：渌江电瓷电器厂属电力工业局管辖；陶瓷研究所和轻工技校属省轻工业厅管辖；醴陵瓷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各厂由株洲市经委管辖；醴陵电瓷厂属株洲市经委管辖；醴陵陶瓷机械厂属株洲市一轻局管辖；全胜瓷厂、建中瓷厂、红旗陶器厂、石门陶器厂属醴陵市经委管辖；乡镇陶瓷企业分别属所在乡镇管辖，由醴陵市乡镇企业局归口管理；个体户则由醴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

醴陵国光瓷厂发展概况

醴陵国光瓷厂是一个生产日用出口瓷的大型企业。它位于湖南省醴陵市城郊凤凰山下，占地面积三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五平方米，现有职工二千九百六十六人。产品有餐、茶、酒具等五百多个品种，年产量三千万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东南亚和中近东等国家，一部分销售国内宾馆饭店。

全厂下设六个车间和一个八百余人的分厂。现有固定资产原值二千一百零七万元，其中有机设备五百八十八台，隧道窑四条，烤花隧道窑一条，烤花辊道窑四条，还有一条一点六公里长的专用铁路，总装机容量为一千零八十瓩。

该厂系一九五六年对资改造时，由三百四十五家私营小瓷厂小作坊合营组成起来的。其中资本家二十家、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二十九家、小业主三十六家、手工业者一百四十四家。他们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投资额共为三十四万一千八百八十一元六角八分，其中投资额一万元至三万元的有八家，五千元至一万元的有八家，二千元至五千元的有二十二家，一千元至二千元的有二十四家，一千元以下的有二百八十三家。这些厂家先后合并为建设瓷厂、华新瓷厂、陶画一厂、陶画二厂和瓷泥矿黄泥坳工区。一九五八年正式建厂，

后并为醴陵第一出口瓷厂，一九六四年终改为湖南省醴陵国光瓷厂，隶属省轻工业厅下设的醴陵瓷器公司。

合并、改称国光瓷厂后，企业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工人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落后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其主要表现：一是出口瓷生产逐具规模。有成型车间三个，彩绘车间、制泥车间和辅助车间各一个；有以煤为燃料的阶级窑一座，园窑六座，方窑二十四座；有真空练泥机二台、雷蒙机三台、球磨机二十三台、卧式榨泥机五台；还有其它机械设备一百三十七台。二是从生产内销瓷转为出口瓷。并厂前，主要生产销售国内的园器、琢器等传统品种。并厂后，主要生产出口瓷，品种有罗汉器和合半、二、三、四、五合壶。罗汉器造型庄重大方，花式新颖多样，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争相购买。三是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多。一九五六年与并厂后的一九五七年相比，出口瓷产量由一百五十七万件增加到一千九百五十五万件，增长一十一一点四五倍；出口合格率由百分之六十三点四三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点八六，一级品率由百分之九点九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利润由四十二点五三万元增加到二百五十五点零五万元，增长了五倍。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厂深受其害，造成企业管理混乱，领导班子基本瘫痪，以致产量低、质量差、成本高、利润少。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四年的九年间，平均每年实际利润只有六十万元，为历史最好水平的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一九七四年，产品出口率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一级品率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利润只有十一万元。

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发出九号文件，对各项工作开始进行整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国光瓷厂亦开始进行了全面的恢复性整顿。首先，增强了领导班子建设，上级委派罗廷保同志到厂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接着对十六个党支部和一百四十三个班组逐个进行考察，对班组长和中层干部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选拔了六十二名优秀工人和干部充实车间和科室领导。其次，党委为了端正党风，让党员干部约法三章（即请客不去，送礼不要，私情不搞，奉承不听，纪律不犯，便宜不沾），从而解决了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其次，在政治上抓扶正祛邪，肃清“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并开展记功评模活动，从而歪风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从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始，企业年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第三，狠抓了产品质量，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到一九七八年，全厂实行了产量、质量、消耗、设备保养、安全卫生等责任到人，同时开展了厂部、车间、班组三级经济核算。此外，每月还进行一次岗位责任制检查，按照贡献大小和表现好坏，将个人分别评为优、良、可、差四种岗位，按月张榜公布。由此，一九七七年开始跨入先进行列。

一九七九年，国光瓷厂认真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由单纯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及时作出了“以进入美国市场为目标，大打产品升级换代之仗”的战略决策，在外贸部门的配合下，先后派人考察了美国、日本和西德。在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一条多花色品种、多门类档次、多市场渠道；品种多不怕，批量少不嫌，难度大不推；花色品种以新取胜，生产交货以快取胜，产品质量

以优取胜的“三多、三不、三取胜”的经营方针，做到热情为国内外用户服务。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国外的销售市场由原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科威特、黎巴嫩、菲律宾、印度、缅甸、不丹、尼泊尔、叙利亚、伊朗、也门、荷兰、瑞典、瑞士、土耳其、埃及、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扩大到北美西欧。一九七九年打入美国市场。美国THO公司，米卡莎公司，艾克瑟尔·天山公司等陶瓷进口商分别与我厂签订了一订五年的专销协议或包销协议，每月出口到美国的瓷器达到一千万件，单件换汇额由老产品的一十三美分提高到四十美分，加上出口到其他国家的產品，每年为国家创造外汇六百万美元，成为国内对美出口创汇最多的陶瓷厂。在国内，国光的产品已进入南京金陵饭店，北京兆龙饭店、昆仑饭店、崇文门饭店，西藏拉萨饭店，广东珠海宾馆等高级餐厅和酒楼。

国光瓷厂在搞活生产和经营的同时，不断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开始，将“五到人”的岗位责任制逐步发展为以“一化三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一化”即技术业务标准化，“三制”即责任制、核算制、奖惩制。发动群众订“一等标准”，做“一等工作”，出“一等产品”。把企业经常需要的主要生产技术、业务活动都订成企业标准，即生产技术标准和工作标准，道道工序都制订了劳动定额、消耗定额、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安全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到一九八五年止，全厂已制订并执行各类定额有八千零四十一项，生产技术标准一万七千三百一十八项，工作标准三百五十六项。经济责任制是

根据标准化的要求，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总目标层层分解成若干个小指标，层层分管给车间、科室、班组和个人。全厂分管到车间科室的小指标有三百八十六个，分管给班组的小指标有五百五十五个，分管给个人的小指标有八千七百三十二个。经济核算制是按标准对层层分管的指标进行核算。为了做到按标准进行奖罚，于一九八〇年制订了厂规，明确规定八条纪律及奖励、处罚的标准，即“十奖、十罚、十不平”。为落实“一化三制”，全厂各班组普遍实行了“八有”的班组管理法，这“八有”是：有先进合理的定额，有明确的质量标准，有完善的操作规程，有科学的工艺参数，有健全的原始记录，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有严格的考核办法，有严明的奖惩制度。

二十多年来，各级领导给予国光许多荣誉称号。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湖南省工业学大庆会上被命名为“工业学大庆红旗单位”。

同年四月十八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上授予国光瓷厂“大庆式企业”。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在全国轻工业学大庆会上，轻工业部授予国光瓷厂“学大庆标兵”光荣称号。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光瓷厂被省评为“产品过得硬企业”。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在省工业学大庆命名表彰大会上，国光瓷厂被树为全省三个排头兵之一。

同年九月八日，在全国第二次“质量月”活动授奖大会上，国光瓷厂生产的销售美国的中档厚胎餐具荣获国家银质

奖章。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全国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国光瓷厂被评为“全国先进企业。”

同年十一月，在全国轻工业劳动保护经验交流会上，国光瓷厂被评为全国轻工业劳动保护先进单位。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日，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召开的颁发《国家著名商标证书》大会上，国光“G”字牌商标（国光牌）获得了《国家著名商标证书》。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国光瓷厂被评为“一九八〇年全国企业管理先进单位”。

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五次年会上，国光获得“一九八三年度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

同年九月，国光生产的45头白玉西餐具获得国家银质奖章。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省人民政府授予国光“一九八四年改革整顿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旬，在全国陶瓷产品质量评比会上，国光生产的浮雕厚胎餐具获得“优胜产品奖”。

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在湖南省企业管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国光获得“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杯”。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国光被轻工业部评为“经济效益显著”单位。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国光厚胎餐具再次获得国家银质奖章。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光被命名为“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光荣获“六好企业”光荣称号。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国光在庆祝荣获“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六好企业”会上，厂长邹凤楼建议将三月二日定为国光厂庆日。

（国光瓷厂宣传科供稿）

醴陵永胜瓷厂简况

永胜瓷厂是由轻工业部作为全国陶瓷行业样板厂投资创建的，一九六三年动工兴建，一九六五年建成投产。它是国内外瞩目的全国重点陶瓷厂家之一，一九七八年由轻工部、外贸部确定为制造对美出口瓷的专厂。

厂房座落在醴陵城区东郊的阳三石，濒临渌江，紧靠铁路、公路干线，景色宜人，交通方便。全厂占地面积十三万多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一千二百万元。现有职工一千五百人，年日用瓷一千一百万件，其中出口瓷九百万件，高档瓷三百万件。一九八五年，该厂由国家拨给技术改造费九百九十万元，全面进行技术改造。到一九八八年，年产高档瓷将达七百万件，总产值将达二千万元。

该厂厂房布局规整，生产流程合理，产品成龙配套。在生产规模方面，全厂设有生产车间五个，试制车间一个，附属工厂一个；在生产设备方面，拥有重油本烧隧道窑两座，烤花辊道窑四条，多种机械设备四百二十一台；在生产管理方面，设有二十二个科室。生产中，全部采用双头滚压成型，链式烘房干坯。

该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是西餐具、茶具、酒具、咖啡具和多种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的薄胎瓷和艺术瓷。一九六五年投产以来，其所生产的莲花餐具、金桃茶具、玉丰咖啡具和醴

陵牌、花城牌高档西餐具、鸟鸣酒具、葫芦酒具以及大小花瓶，畅销欧、美、港、澳和东南亚、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且多次获得省、部优质产品奖和国家质量银牌奖、金龙奖等。该厂还为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纪念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处和国际博览会、广州交易会试制成功一百零四公分釉下彩大瓷板、一百一十八公分十一层瓷雕宝塔、一百零八公分釉下彩挂盘和工艺美术瓷琵琶仕女、人物雕和熊猫、企鹅等等。这些产品均获得上级的嘉许和客户的赞誉。

为促进我国陶瓷的出口，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替国家大量创汇，该厂于一九七九年积极转产升档，创造名牌产品，做到质量高，花面新，交货快，服务优，其产品成功地打进了美国市场，其中“醴陵牌”高档西餐具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进入了美国高级百货公司和礼品商店的名贵瓷器，并成为美国新婚馈赠佳品。该产品于一九八〇年被评为湖南省优质产品，一九八一年获轻工部优质产品证书，一九八二年在全国高级成套瓷评比会上获一等奖，一九八四年获国家质量银牌奖。

该厂一直以“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为办厂宗旨，十分重视管理科学化、技术改进和人才开发。通过管理现代化的改革，引进设备和培训职工，企业素质不断提高。现在它既有一支懂业务、会管理、高效率的管理干部队伍，又有一支能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解决各种技术难题的专业技术队伍，还有一支上得快、拿得下、应变能力强的技术工人队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技术考试合格率达百分之百。现在新产品试制周期只要七天；从客户订货到履

行合同，过去需要半年，现在只需两个月，其中包括纸箱、纸盒生产周期一个半月。

为确保产品质量的优良、稳定、可靠，厂方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方案，现已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上千条工艺参数正指导着几百个岗位的生产活动，上万个数据正及时反馈到生产指挥机关，得以全面实现优质、适销、低耗、高效、安全等指标。

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该厂狠抓了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不断改进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一九八五年，在生产第一线推行了“直线组合，成瓷收帐，缺陷到人，高档计酬”的金额计件工资制。这一改革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好评。在一九八四年企业整顿中，又在科室部门和服务性工种中实行了“指标分管，系数分等，按日考核，奖罚兑现”的经济责任制，较好地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一九八四年企业整顿验收合格。

该厂自建厂以来，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三年为国家提供出口瓷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七万件，上缴利税二千七百五十五点二五万元，换回外汇四千三百多万美元。一九七九年转高档以来，年平均上缴利税二百二十四点五六万元，比前十四年年平均一百一十六点五万元增长百分之九十二。

目前，全厂干部职工决心加快改革步伐，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劳尔缇克”产品，为中国陶瓷的发展，为醴陵瓷业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永胜瓷厂办公室供稿）

醴陵群力瓷厂发展概况

醴陵群力瓷厂是湖南唯一从事釉下彩瓷生产的专业工厂。有着悠久历史的釉下彩瓷，是湖南独树一帜的名瓷，是青花瓷器的鼻祖。醴陵五彩缤纷的釉下彩瓷是继承湖南陶瓷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

唐代晚期，长沙窑创造性地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作呈色剂，成功地烧出了釉下褐绿彩绘。从此，瓷器装饰有了永不脱落、盛开不败的釉下彩花。它的彩绘图案，有些继承了我国汉代以来漆器上金箔贴花和魏晋以来的高浮雕装饰的艺术特点，显示了瓷业界前驱继承和创新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并以花卉、禽鸟、走兽等纹饰装饰产品，为以后同类装饰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长沙窑所采用的装饰方法，在工艺上独步一时，无论从原料或烧制工艺都可以说是青花瓷器的鼻祖。

独具风格的釉下彩工艺，自唐代相传至今，在醴陵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早在清末民初，醴瓷就将单色釉下花提高到了五彩的新水平，并曾获得国内和国际金牌奖。然而，由于政局多变和内乱外患的严重摧残，到建国前夕，釉下彩传统工艺已失传二十余年。

建国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釉下彩瓷的恢复。一九五五

年成立了醴陵陶瓷研究所，着手研究釉下彩瓷传统工艺的恢复和釉下颜料的研制，收集有关釉下彩瓷的资料，并将流散在农村落户二十多年的釉下彩老前辈吴寿祺先生聘请入所，传艺育人和从事釉下彩的研究试制工作。薄胎瓷是我国瓷器中的精品，一九五七年，醴陵陶瓷研究所试制釉下彩薄胎瓷获得成功。它的制作特别精细，原料要经过精选精制，先将精制好了的泥料放置做坯车上，用灵巧熟练的手工拉成五毫米厚的粗坯，使其干燥后，再慢慢用利坯刀精修到只有零点八毫米如蛋壳的厚度，然后给彩上釉烧成。它具有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万里无云瑕的特点。它一问世，就成了国家订制的出口展览瓷和外交礼品瓷。接着，丁汉华同志（现任群力瓷厂彩绘工程师）大胆创新，移植釉上粉彩接色方法，用于釉下彩画面中，成功地丰富了釉下彩绘工艺的表现形式。后来称它为套色法，也就是在同一花叶中，有红、有绿、有浅、有深，使釉下彩花增强了老、嫩、明、暗、生机勃勃的显真效果。丁工程师以草虫为题材装饰的釉下彩产品，色调明快，至今醴陵陶瓷研究所陈列馆还保存着他彩绘的一套草虫画面的方肩茶具。通过艺人们的奋发努力，釉下彩花重吐芬芳。

醴陵瓷业公司为了加速恢复和发展釉下彩瓷的生产，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将醴陵陶瓷研究所的人员一分为二，从领导到各工序的技艺人员划出一半，再从瓷业公司所属各瓷厂选调一批优秀技术工人，共一百余人，组成地方国营醴陵艺术瓷厂，厂址设在姜湾寨子岭下原光华电瓷厂搬迁后遗留下来的半边厂房和六间阶级窑，全部靠手工生产圆器和琢器。

产品的画面饰杯多种多样，画面有茶花、紫藤、水仙、喇叭花等釉下彩绘和釉下青花，还有少量的粉彩、刷花、人物、山水等釉上彩绘。此外，还生产水牛、吹叫子、毛巾姑娘等雕刻玩具和雕塑艺术品。由于产品比较精致，花色淡雅清新，投放市场后，深受群众欢迎。这年的产量达一十七点五三万件，完成产值一十六点零五万元，利润二点五二万元。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醴陵瓷器公司决定将东平瓷厂并入艺术瓷厂。东平瓷厂是一九五六年由安平瓷厂、东联瓷厂和四户家庭手工业者改组成立的公私合营企业。合营后有职工二百零三人，有两个成型车间和一个陶画车间，成型班组一十二个，彩绘组二个，辅助组五个。合并后，经醴陵瓷器公司批准，正式命名为地方国营醴陵艺术瓷厂。厂部设立在原艺术瓷厂，划为第一工区，东平瓷厂划为第二工区。此时，职工增加到五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式职工四百三十一人，家属工八十人，成立了党团支部，有党员一十九人，共青团员二十八人；脱产管理人员有：党支部正副书记各一人，正副厂长各一人，正副工会主席各一人（副主席不脱产），行政秘书、人事保卫、劳动工资、团支部书记各一人，工区主任二人，供销四人，财务三人，保管二人，事务二人，脱产管理人员共计二十一人。

地方国营醴陵艺术瓷厂的正式命名建立，标志着湖南有了独一无二的从事釉下彩瓷生产的专业工厂。一九五九年六月，这个厂便接受和承担了首都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和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休息室等全部国家用瓷的生产任务。在试制生产中，由于手工勾画线条的

技术要求高，而当时能勾画线条的技艺人员少，三馆瓷的任务时间紧迫，有人便提出了采用釉下皮印印线条的方法来提高功效的合理化建议。要把釉下彩绘手工勾画线条的传统技法，运用到皮印子上去，这也是釉下彩绘工艺上的改革和创新。这时，几位优秀技术工人杨玉丰、何波、刘济纯等敢想敢干，主动承担了这一工艺上的改革任务。这一改革一连进行了二十次试验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仍不灰心，认真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又接连进行了几十次的精心试验，终于找到了改进颜料的配方，把海棉上的布料改用绸料，印出来的线条清晰光滑，不仅质量符合要求，而且工效比传统的手工画线提高了四、五十倍。这一改革的成功，使釉下彩绘手工艺术与皮印线条相结合向大批量生产的发展前进了一步。经过艰苦努力，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全厂终于按时于九月份完成了国家用瓷三万多件的生产任务。其中军事博物馆用瓷的画面装饰，系根据该馆提供的牡纹花面纸稿和壶、杯样品各一件，由丁华汉同志精心翻稿放样搞成的。这些以牡纹画面成套装饰的釉下彩青花产品，整体和谐，庄重大方，色调明快，华贵高雅。工人体育馆用瓷的画面装饰，是由唐汉初同志根据他自己设计的釉下彩勾子莲装饰的。他运用深绿、浅绿描绘的勾子莲，纹样活泼秀丽，色彩柔和舒畅。民族文化宫用瓷的画面装饰，是由唐汉初同志根据自己设计的釉下彩三色茎装饰的。他运用深绿、浅绿和玛瑙红描绘的三色茎装饰的折边形中餐具，色彩雅艳，富丽明快。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休息室的用瓷，是由丁华汉同志设计的釉下彩兰草画面装饰莲子茶具和胜利盅。这些用瓷画面构图简练生动，

色彩淡雅清秀，流行至今，仍受欢迎。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用瓷，是由唐汉初同志设计的釉下彩蝴蝶花，装饰莲子茶具和胜利杯，画面秀丽，生动活泼，花头饱满，花叶粗犷，主题突出，神情并茂，色彩鲜艳，至今仍受客户欢迎。到一九五九年九月份，生产出绘有青花、月季花、勾子莲、三色槿等釉下彩绘的首都三馆用瓷，至此全面地完成了交货任务。

一九六〇年，在城区北郊黄泥坳动工兴建新厂；一九六二年，陆续迁入黄泥坳建成占地面积为七万平方米的新厂进行生产，并更新了生产设备，改善了生产条件。但是，在“大跃进”和“以瓷代钢”的“左”的思想影响下，该厂也走了一段弯路，盲目地生产酒精蒸馏塔、水龙头等瓷质机械产品，因达不到使用要求，造成了浪费和损失。这时，多数职工正处于技术练兵阶段，且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职工投入了突击新厂的基建工作，因而出现了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连续六年共亏损六十五点九六万元的困难局面。尔后，通过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端正了生产方向，全厂职工又心明眼亮地继续前进了。

一九六四年，轻工业部对全国日用瓷工业提出了“两赶（赶国内先进水平，赶国际先进水平）、三消灭（消灭亏损产品、亏损企业、低于历史水平的经济技术指标）”的任务，给职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国家经委批准由湖南省醴陵群力瓷厂承担试制生产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釉下彩瓷器的光荣任务。人民大会堂用瓷共计五十六个器型，一十二个花面，二

十二万三千九百一十三件瓷器，其中国宴餐具一十万〇六千〇三十六件，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一八，便宴餐具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七件，占百分之六点〇七，高级便饭餐具四百二十八件，占百分之〇点一九，茶具五万三千二百二十八件，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六，其他如烟缸、烟碟、咖啡具等一千〇六十二件，占百分之四点九。按当时价格计算计划产值为四十万元，实际完成四十八点七八万元，为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九五，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〇四，白度达到七十五度。

国宴瓷采用的原料，经过反复试验，最后确定采用三五十九号配方。这个配方的化学成份是含矽百分之六十点三〇，铝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九，铁百分之〇点一六，钙百分之〇点三二七，镁百分之〇点一〇，钾钠百分之四点〇二，灼碱百分之八点四〇。

国宴瓷的画面装饰，设计了各种画面五十六种，其中一十九个画面是由湖南四位名画家设计的。

国宴瓷的成型工艺制造，都以设计图纸为依据，试制的产品除实物外，都有与实物相应的图纸。这不仅打破了千百年来，只有一个差不多的尺寸规格和只凭技术经验造型的老传统，而且为达到产品的标准化、规格化，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国宴瓷的试制生产，陶瓷研究所成型工艺工程师梁六奎深有感慨地说：“经过为人民大会堂试制产品，我们探索、掌握了各种泥性对成坯、成瓷的收缩规律和达到产品规格划一的科学数据，从而为提高我省制瓷的技术水平培养了过得硬的技术力量。”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至九日，试制的瓷具样品陈列在人民大会堂黑龙江厅进行鉴定。陈列的产品有国宴餐具、高级便宴餐具、茶具、单人杯托、烟具等七个项目，四十七个规格品种，三十五个花色画面，六百二十九件瓷器。参加产品鉴定的人员有：国务院周代秘书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局长、装饰专家张振宇和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以及工作人员等。大家看了样品以后，一致认为样品中的一百三十九号兰色牡丹纹餐具具有清新、明快、舒畅，白天好看，晚上也好看等特点，可采用为国宴餐具。国务院周代秘书长看后，在肯定质量不错的同时，指出有些茶具的画面还须加以改进。他用“花大、叶粗、颜色杂”七个字形象地说明了醴陵某些瓷器在装饰上存在的问题。

鉴定后，中央正式将国宴瓷餐具订了下来。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醴陵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在北京签订了生产人民大会堂用瓷的协议后，醴陵群力瓷厂便全力以赴地组织生产。过去修制石膏模子只凭经验和心记，没有数据，而在试制国宴瓷时，则采用了一系列科学手段，对每个品种的模子，先测定好泥性收缩率的数据，再换算模子的规格才定型，使产品的规格划一。由吴景林设计绘制茶具中的松树画面，采取手工釉下彩绘与现代贴花技术相结合，为釉下彩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

按原订协议，人民大会堂用瓷，须按一、二等出口瓷合格率交货。但是，由于它代表着国家的瓷业水平，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在成瓷验收时，又将二等品的变形、掉渣、黑点等缺陷缩小，某些关键产品则要求比出口瓷的合格

质量更高一些。

国宴瓷从试制样品、鉴定审查到生产成瓷的整个过程，都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加以厂里对技术精益求精，对产品的质量规格严格要求，因此，国宴瓷的造型和画面装饰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并被国际友人赞誉为“陶瓷艺术国里的明珠，东方艺术的精华。”

釉下彩国宴餐具，从国庆十五周年到国庆三十周年前夕，各种瓷具仍然光彩夺目。在筹备国庆三十周年时，人民大会堂请专家鉴定，这套国宴中餐具，在器型、规格、画面，以及外观和内在质量，仍不失为一流水平，决定继续使用。

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等瓷器的制造成功，是湖南省独具风格的釉下彩瓷向高水平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一九七一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群力瓷厂生产了联合国用瓷。那饰以梅竹的釉下彩花，青竹玉立，红梅吐艳，春意盎然地飘香于联合国大厦，中国瓷器又一次蜚声国际。

一九七六年，醴陵群力瓷厂接受了敬制毛主席纪念堂釉下彩花瓶、茶具等用瓷一千〇九十一件的光荣任务。一十二个大花瓶的直径各为六十公分，高四十二公分，要求产品达到庄严肃穆，美观大方，万里无云瑕，以及大小、高矮、重量、颜色、线条、花型和白度等七个一致，不准有变形、黑点、灰砂、毛孔、釉子、擦伤、节缝和釉面不光等八种缺陷。根据上述要求，大花瓶的缸身保持着胜利盂外形的基本

面貌。胜利盅是按照毛主席生前提出的意见定型的，因此，花瓶的造型象征着湖南人民对毛主席无限怀念的深情厚意。大花瓶的坯制作是由以老工人陈月发和他的徒弟周谷良为主的制作组，采用一次拉坯整体成型的方法进行。运用这种方法成型，成坯丝毫不现节缝，突破了大缸必须分节拉坯成型的传统技法，这是制瓷史上还未有过的高超手工技法，也是拉坯成型的一项创举。花瓶的画面装饰设计，是以“芙蓉国里尽朝晖”为主题，以芙蓉花为画面的主要题材进行创作的。花瓶的器型和画面都是由现任副总工程师李 小年设计的，花瓶上朵朵兰色芙蓉花，有的朝阳盛开，有的含苞待放，象征着“芙蓉国里尽朝晖”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寓意着毛主席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和湖南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了湖南陶瓷展览，在展品中，两支高达一点三二米的釉下彩满花开窗花瓶，高大秀美的身姿，鲜艳夺目的画面色彩，受到了参观者的啧啧称赞；一九七七年春季广州出口交易会陶瓷展览厅里，首次展出了一对高二点二三米，直径〇点五八米，重九十公斤的釉下彩满花开窗松鹤 莲子 形花瓶。这对花瓶以挺秀之姿，引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的不已赞叹。

一九七九年，在全国质量奖评选中，群力生产的釉下彩餐具茶具荣获国家金质奖章。

继釉下彩餐具茶具获得国家第一枚金质奖章后，全厂职工决心百尺竿头，更求精进。一九八〇年新产品团凤四十五

头餐具获得轻工部一等奖；一九八二年生产的九十二头满花中餐具获得外经部荣誉证书；一九八三年生产的白兰餐具获得国家经委优秀新产品金龙奖；。一九八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旅游产品展览评比中，釉下彩笔峰花瓶获得二等奖；一九八五年全国陶瓷行业质量评比中，六十四头兰海棠中餐具评为总分第一名，第二次荣获国家金质奖证书。此外，还有二十七头满花餐具评为总分第五名，花钵、挂盘均获得轻工部优胜产品奖。从此，群力产品的声誉越来越高，近几年，生产任务连年饱满，生产记录年年刷新。

一九八一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群力瓷厂精工绘制了一个釉下彩雄狮花瓶，由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彭月泉专程送到北京向女排祝贺。花瓶的画面背景以古松瀑布衬托，配上“电闪金毛跨雪色，雄狮怒吼震千山”的诗句，突出东方巨狮威武传神，向征着女排所向披靡，锐不可挡。女排姑娘，争相摆设花瓶，最后，只好由袁伟明教练“裁决”一个宿舍轮流放一周，就这样新老交替传下来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女子排球队给群力瓷厂送来了一个全体队员都签了名字的排球，排球上还有袁伟明教练亲笔书写的“中国女子排球队敬赠”字样。中国女排姑娘以赠球方式表示祝贺群力瓷厂釉下彩在国内外的重大作用，她们还说：你们釉的下彩瓷，远销五大洲，获得了金质奖章，为社会主义祖国赢得了荣誉。你们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继续拼搏，振兴中华，为国争光。

一九八五年，群力瓷厂已建成为占地面积九千五百平方米，建筑面积六万一千一百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八百

二十三万元，净值五百一十八万元，职工一千一百人（其中全民职工八百五十人）的企业。拥有从釉下颜料、花纸、模具、匣钵等自行设计制造的成龙配套的生产手段，生产的品种有四百四十多种，花面三百七十多个，可称得上器型多样，品种齐全，配套灵活，从小到大，规格系列化的釉下彩瓷厂。为了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在上级部门的关怀下，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有关技术改造的投资总额将达七百九十四万元。这笔巨款将主要用于运用和推广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加强横向联营、联合扩散，扩大生产场地，提高生产能力，引进新设备和工艺，开发新产品，抓紧釉下彩软质高档瓷和氢气保健瓷的研制生产。职工们决心做到人无我有，独树一帜，并坚持三瓷并举（出口瓷、国内宾馆用瓷、工艺陈设瓷），巩固三大阵地（北京、上海、广州），开发沿海城市，打入西欧高级市场。

（群力瓷厂厂志办供稿）

醴陵星火瓷厂的历史和现状

星火瓷厂位于醴陵市西北郊的中和街，依山傍水长达三华里。从清朝末年官办湖南瓷业公司在文笔峰下开设第二厂起，迄今已有七十多年瓷业生产的历史。现有职工一千九百七十三人，厂房占地面积十五点二万平方米，年产量二千四百万件。主要产品有餐、茶、酒具等六十个品种，一百零八种花面。产品远销欧、美、澳，东南亚，中东和港澳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销除台湾、青海省外的全国各地。

全厂现有七个生产车间（含动力科），一个五百三十九人的附属厂，有固定资产原值一千另七十三万五千五百元，油烧隧道窑三条，油烧烤花辊道窑三条，机器设备四百七十一台，总装机容量九百九十二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组三台，大小汽车十二辆。

星火瓷厂是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由四十六户私人厂家和作坊，以及部分手工业者先后合并成为湘醴、协盛、劳动、顺昌四个公私合营瓷厂，隶属于醴陵瓷器工业公司。当时核定私方投资额共计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元，工人一千八百二十一人。一九五八年冬四厂合并为地方国营醴陵第一瓷厂。一九六〇年春改为醴陵第二出口瓷厂，一九六四年冬改为湖南省醴陵星火瓷厂，隶属于省轻工业厅。一九

八五年元月一日起划归株州市管。

合并为第一瓷厂后，由于企业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生产技术逐步改进，较快地改变了分散落后的生产面貌，总产值、总产量、产品质量、出口率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一九六三年春，鉴于中和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利于建设现代化企业，上级决定第二出口瓷厂与第二工业瓷厂合并，在阳三石以第二工业瓷厂为基地，引进日本设备，分两期工程投资新建一个出口瓷厂。建成后，第二出口瓷厂从中和迁往新厂。组成第二出口瓷厂基建办公室，由于第二工业瓷厂进行基建，至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工业瓷厂停产，除留少数安装人员外，其余绝大部分人员调第二出口瓷厂参加生产和实习，作新厂投产准备。

第二出口瓷厂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创优异成绩，一九六三年利润达一百七十六万元，在全省瓷器行业重点瓷厂厂际竞赛中评为出口瓷厂先进企业。同年还被评为全省“艰苦创业先进单位”。一九六四年利润达二百一十万零一千七百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在全国陶瓷行业中，产品质量、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均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上级重新研究决定新厂第二期工程停建。从星火瓷厂（原第二出口瓷厂）调五百人回永胜瓷厂（原第二工业瓷厂）。星火瓷厂在中和原址，继续利用原有厂房、设备，发挥企业管理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

星火瓷厂职工以主人翁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

筹资金，扩建厂房，更新设备，改进技术，发展生产。一九六五年上交利税二百六十八万九千八百元。在国家投资很少的情况下，经过长期努力逐步改造，终于成为现在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型日用出口瓷厂。出口瓷最高年产量达一千七百万件，比一九五六年增长四十六倍多；一九八五年总产值为一千一百三十六万六千元，为一九五六年的一点一八倍。截至一九八五年底累计向国家上交利税三千四百一十九万七千七百元，创外汇四千四百万美元。

“文化大革命”，星火瓷厂亦曾深受其害，两派对立，领导层和管理机构基本瘫痪，生产停顿，企业管理混乱。利润由“文化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百九十九万二千一百元下降到一九六八年亏损二十二万四千八百元；质量一级品率由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八九下降到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四；出口率由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一八下降到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四五。但由于星火瓷厂历史久，工人素质好，骨干力量强，生产停顿和管理混乱的局面持续时间不长。管理较早地进行了整顿，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九七二年湖南省《轻工简报》三十一期公布的全省轻工系统九月底止完成年计划的六十一个企业中星火瓷厂名列第二。十一月份产品质量全面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十二月份一级品率达百分之六十九点零九，出口率达百分之九十点五四，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提前二十八天完成出口瓷计划，还超产一百二十万件，出口瓷增加到一千六百二十万件，利润七十五万八千九百元。湖南省陶瓷公司一九七二年度先代会上，星火瓷厂被评为先进单位，并作了汇报发言。

一九七三年七月初，湖南省轻工系统“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上，星火瓷厂作了《依靠工人群众，加强企业管理》的发言，又一次被评为艰苦创业的先进单位。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以星火瓷厂为现场召开了“全省陶瓷玻璃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星火瓷厂作了：《我们在领导工作中的几点体会》、《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搞好经济核标》、《兄弟单位促星火、星火怎么办》等三个发言，及《坚持把产品质量摆在生产的第一位》、《我们是怎样降低成本，增加社会主义积累的》、《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提高产品质量》等十二个车间、班组发言。会后，从七月二十日至九月中旬，全省各地来厂参观人员达六十批，一百五十一个单位，共计三千一百九十五人次，平均每天五十多人次。

一九七九年，星火瓷厂提前五个月超额百分之八十完成利润计划指标，提前七天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一九八二年利润五十七万一千四百元，上交税金一百一十六万七千八百元，仍为醴陵瓷器工业公司的优胜单位。

一九八三年因国际市场不景气，出口任务剧减，而国内市场尚未开拓，造成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当时决定生产高档瓷，在厂房年久，设备陈旧，生产条件不能适应产品升级、换代的情况下，要求生产八十年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档产品，质量上不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时，在条件不相等的情况下参加竞争，导致亏损一百五十八万元。给国家造成损失，给职工的工资福利带来明显的影响。企业处于十分被动的困难境

地。

一九八四年三月，周政付省长带领省计委、经委、轻工、外贸等部门和株洲市的负责同志来醴陵实地调查，商讨发展湖南陶瓷工业的大计，研究振兴醴陵瓷业的方针政策时，主持召开的现场办公会议上，根据星火瓷厂的实际情况，为了促进扭亏，确定对星火瓷厂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承包”的特殊政策。面对困难处境，全厂职工采取外引内包，正确决策，以“效益争盈利，整顿争合格、产品争优质、指标争超额”为目标，和衷共济渡难关，奋力拼搏争效益。终于一九八五年摘去亏损企业的帽子，实现企业整顿全面验收合格。评为醴陵瓷业总公司的优胜单位。

星火瓷厂生产日用瓷历史长久从一九五六年七月开始试制出口瓷，是国内最早生产出口瓷的厂家之一，有生产技术方面的优势。曾经上级确定派遣技术人员于一九六〇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三次赴越南；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三年四次赴阿尔及利亚；一九八四年赴突尼斯进行技术援助。派出技术人员到全国许多省进行过技术支持。国内许多厂家曾先后选送人员来厂培训、实习。

一九七六年，省科委下达的“细瓷重油明焰无匣快速烧成”工艺研究专题，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星火瓷厂自行设计建窑试验，九月终于突破技术难关，产品质量合格。为我国陶瓷工业开创了使用重油实现明焰快速烧成的新途径。

一九八二年省经委指示进行“半水煤气烧瓷试验”，拨款二十万元由星火瓷厂与醴陵县氮肥厂组成试验小组，在醴陵瓷器工业公司领导下，一九八三年一月在星火瓷厂取得小

型试验成功。

曾为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邓小平主任访问日本制作礼品瓷。

传统产品星火英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经审定为省“优质产品”。

“六五”期间由过去的单一产品发展到中档莲花餐、茶具以及国际超级市场的新美餐具和高档次的凯娜西餐具。

一九八四年六月，全国陶瓷行业质量评比中四十五头凯娜西餐具由于造型别致，加工精细，釉面质量得满分，评为优胜产品，获轻工业部名优产品证书。

（醴陵星火瓷厂供稿）

醴陵新民瓷厂发展概况

醴陵新民瓷厂地处醴陵市王仙镇，是一个从原料加工到产品包装的省属重点日用内销瓷厂。原系省属企业，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划归株洲市管理。

醴陵东乡瓷土资源储量丰富，具有发展瓷业的天然条件。早在清雍正年间，就有广东人廖仲威在这里始制粗瓷，后经历代能工巧匠的采掘制作，流传民间的良大、良友、良三、川大、玉三、先中、先大、寿罗汤、灰可口、调羹、酒杯等具有民族特色的釉下青花瓷器，早负盛名。建国前，由于生产关系的制约，瓷业生产发展缓慢，瓷工饱尝失业痛苦。建国以后，东乡瓷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一年冬，组建集体性质的粗瓷生产合作社（组），一九五二年三月，东乡三社进入县手工业联社。一九五六年二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把原有一百零八家个体户中的四十五户并为协力、大林、建华、建力、新民五个瓷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大林与建华合并为公私合营醴陵建华瓷厂，协力、建力、新民合并为公私合营醴陵新民瓷厂。一九六五年元月建华又与新民合并为湖南省醴陵新民瓷厂，隶属省轻工业厅醴陵瓷器工业公司。

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轻工部部长助理李人凤配合湖南省轻工厅来醴陵搞以煤代柴烧瓷的改窑试点的成功和推广，随后又出现了脚踏旋坯机、精坯机、施釉机等木质成型机

械，到一九五八年冬，大型倒焰式煤烧窑窑便在新民建成投产。一九六〇年冬，开始使用电力，从此，生产工艺逐步实现了机械制泥、半机械成型和烘房焙坯，结束了两百多年来的落后状况。从此，新民瓷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是新民开始实施长远规划、更新设备的十年。先后完成对烧成、成型、制泥、制釉主要生产厂房的新建和改建工程，制匣、彩绘、制模、机修等生产厂房也进行了修建和调整。在此期间，有计划地开始兴建职工宿舍，改善了职工居住条件。主要机械设备也随之得到改造。

一九六六年冬，新建烧成车间落成，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第一条煤烧隧道窑建成投产，次年十月四日第二条煤烧隧道窑点火运行，在煤烧隧道窑投产的同时，又添置了一台五十瓩发电设备。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成型车间改建后，半成品实现滚压成型与链式干燥组合的自动流水作业。进入七十年代初期，制泥、制釉、制模等生产设备的机械化程度也有相应提高。到一九七四年冬泥釉车间改建竣工，长远规划的第一步业已完成。

设备维修能力，逐步改善，到一九七五年自己已经能够设计、制造和安装链式干燥机比较复杂的生产设备 and 控制电路。在此期间，已拥有汽车，并开办了附属工厂。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建立了两条煤烧辊道窑并投产使用。一九八三年三月，油烧隧道窑和蒸汽锅炉点火运行。从此，长远规划的第二步设想已经实现。

由于实现了机械制泥、半机械成型和煤质高温烧结等生产工艺，生产出的戈三大，法口三大，先大、先中、可二、可

中、中更、酒杯、桥壶、鱼八寸等细瓷产品的器型规格和瓷质都有较大的提高。一九六二年打破传统的手工画花，开始采用手工印花工艺。一九六三年已有釉上印花的套色产品，花面装饰工艺获得重大突破。同时，根据搪瓷花画的装饰原理，在先器、可器的成型流水作业中实现了釉下喷花、取得花面规格一致工效提高的效果。

在产品的设计试制方面，也有新的成果。每年均有三至五个花色品种进行试制生产。一九八〇年批量生产的十大产品中，就有四十四品种二十个花面。其中有九十二头芙蓉中餐具，三十五头工农餐具、梅竹五头茶具和双凤朝阳的六头酒具；有造型新款、独具一格的色釉新民杯、友谊杯和旅行杯；还有适合室内装饰的飞禽走兽、花草人物工艺品。在传统的碗类产品中，尤以戈型花三大茶碗，畅销上海、天津、广东、新疆、西藏等二十多个省市。一九八〇年在全省轻工产品展销会上，戈形贴花三大茶碗被评为优质产品；罗汤、十三公分饭碗和十六公分菜碗被评为一类产品。一九八四年冬，着手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开始试制并批量生产瓷质酒瓶，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初步成效。

新民瓷厂从一九五六年正式成立到今年已整整三十个春秋，目前已拥有职工六百多人，固定资产四百四十一万元，全厂占地面积达五万二千二百六十四平方米（建筑面积达三万五千一百零四平方米），总产量一万四千三百零七点二五万件，总产值三千四百三十六点七一万元。总之，现在的新民瓷厂已经由一个小厂，逐步发展为一个初具规模正向现代化迈进的日用瓷厂。

湖南省醴陵电瓷厂发展概况

醴陵电瓷厂创建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原名“中国电瓷厂”后改名“中华窑业厂”、“军管中华窑业厂”、“湖南电瓷厂”至一九五三年改名“湖南省醴陵电瓷厂”。创建迄今已整整四十年了。

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军委和南方局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工业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作为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并筹措活动经费的机构。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公开活动，公司按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了注册手续。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根据斗争的需要，我党决定由中央军委负责交通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率领孙友余等设立。“中原公司”上海办事处，以此建立联络浙赣、粤汉两路与香港分局的交通线，并为党的地下活动筹集和提供经费，同时决定在湘鄂等地设立秘密据点。据此，一九四六年由地下党员李文采、任中衍出面，邀集任大张、施龙、郁约瑟等合资开办制造电瓷的工厂，作为秘密据点之一。同年十二月四日在上海签订“合约”、成立“中国电瓷厂”，厂址选在醴陵姜湾。这便是醴陵电瓷厂创建的原委。

四十年来，醴陵电瓷厂走过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任大张来醴着手建厂并组织试生产；同年四月四日“中原公司”派戴凌翔等同志来厂参加管理。始创时，全部资金仅法币壹千万元，工厂规模很小，职员仅六人，工人仅二十多名，租赁醴陵姜湾知难职业学校约二百平方米的侧屋当工场，生产主要靠手工操作。由于生产条件落后，当时只能生产低压通讯绝缘子、开关及变压器小瓷套等四、五个品种，电压等级在6KV以下。

为了扩大生产，一九四七年六月买下已经倒闭的湘潭县白沙乡兴中实业公司办的渌口雷打石灰厂，十月工厂全部迁往雷打石，改名为“中华窑业厂”。从此，工厂规模有所扩大，厂房建筑面积达三千四百九十六平方米，职员增至十二人，工人增至一百二十多人，并建六间阶梯柴窑一座，改进和完善了制作机具，产品发展到三十个品种，且可达二十二至三十三KV电压等级。那时，除电瓷外还生产日用瓷，月产合格电瓷平均二至三吨，最高五至六吨，日用瓷1200—2400筒；但产品合格率仅20—30%。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由于时局动荡，货无销路，也由于经营不善，负债超过资产，工厂被迫停工。创建至此，工厂遵循办厂宗旨，较好地完成了隐蔽和转移地下党员以及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经费等任务。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先后隐蔽和转移过的地下工作人员有陈宗基、张国权、高正钧、岳建中、侯杰、刘德才等。工厂盈利除必要开支和任大张的股金及红利外，全用作党的地下活动经费。

全国解放后，醴陵电瓷厂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一九

四九年十月，党派戴凌翔同志回到湖南组织工厂复工，任大张以工程师身份也回厂工作（任到厂后仅两日便自动离厂）十一月一日工厂在雷打石正式复工，并实行军管，改名为“军管中华窑业厂”，隶属于湖南省长沙军管会经济接管部工矿处。戴凌翔任厂长，唐瑞为厂军事联络员（后任副厂长）。不久，工厂便走上了正轨。一九五〇年，工厂改由省财委直接领导。财委鉴于厂址紧靠湘江，地势低洼，洪水季节常遭水灾；加以场地有限，且工厂离原料产地远，产品外运也不方便，便决定迁厂。同年六月，经省军管会批准并拨款，由省工业厅直接组织领导，利用接管的原建设厅湖南瓷业公司、知难学校和民利公司，部分旧址建立新厂，定名为“湖南电瓷厂。”这就是现在的厂址。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新厂正式开车生产。由此，电瓷厂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一九五六年三月，工厂改隶中央电机部电瓷材料管理局。至此，工厂规模日益扩大，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五七年，全厂占地面积为七万九千二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一万八千零七十平方米，职工增至五百六十五人，生产方式绝大部分半机械化了，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年人平由一九五三年的二千七百九十六元增加到七千六百六十五元。这一年生产高低压电瓷达三千五百三十九吨，为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四点三倍。一九六〇年工厂改隶湖南省机械工业局，改名为“湖南省醴陵电瓷厂”，并成立了中共湖南省醴陵电瓷厂委员会。这一年年产电瓷七千五百吨，年产值达九百二十四点四三万元，产量和产值是一九五〇年的四十三点二倍和六十八点六倍，利税总额达三百五十五点四四万元，

职工猛增至一千九百一十一人，产品首次进入国际市场，外销量达三十点九七万件。一九六五年六月，产生了第二届厂党委会，工厂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年综合瓷检合格率达百分之九十一·六六，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都超额完成。此后，工厂经历了十年动乱和五年拨乱反正以及“六五”期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两千多个骨干企业之一，全国四个电瓷重点骨干企业之一。它已是我国生产各类高低压电瓷的综合性工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醴陵电瓷厂为国家生产电瓷产品共计一十三万六千六百零六点六五吨，总产值累计达二亿六千八百零七千六百七十八元，利润累计总额为五千零五十九万八千六百元，实交利润累计为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七千九百元，实交产品销售税金累计为三千一百一十五万五千一百元，折旧金额累计为一千四百六十五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二千九百一十九万一千元。

目前，工厂拥有正式职工二千一百七十八人（未含离退休职工三百四十人），加上附属一厂职工三百八十四人，附属二厂职工一百七十二人，共有职工二千七百三十四人，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二十一人，管理人员一百五十人。工厂占地面积三十二万三千九百零六平方米（未含泥矿五十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十六万六千零五百六十一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二千五百六十六点三万元，净值一千一百零一点五万元。主要机械、电瓷生产专用设备七百七十五台，动力机械总能力九千一百一十六KW 全厂设八个生产车间，一个电瓷研究所，二十六个科室，两个公司（生活服务公司和劳

动服务公司），两个附属工厂和两所学校（子弟学校、技工学校）。

工厂已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产品在国内外传誉，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仿苏，六十年代开始自行设计。目前除参加全国行业统一设计外，大部分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试制、投产，并已能按国际、澳标、美标、英标和IEC标准组织生产。产品品种有十三个系列，上千个型号、规格，年产量为六千吨。主要产品有35KV—500KV级普通型及防污型大瓷套，三十吨级及以下的高强度盘形悬式瓷绝缘子，五百KV级及以下的大棒型支柱绝缘子，五百KV及以下油纸短尾电容式变压器套管，二百二十KV以下的阀式避雷器，电流互感器等。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逐步自成体系，形成醴陵电瓷的独有风格。生产的重点产品约占全国电瓷重点配套产品五分之一。同时，工厂还是我国电瓷产品的主要出口基地，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向国外销售产品，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间，共出口和援外一万九千二百零八点二五吨，价值人民币三千一百零二点零二万元。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醴陵电瓷出口量在全国五大电瓷厂中一直居领先地位，仅一九八一年出口销售就达三千五百二十七点一八吨，占全国出口电瓷总量的五分之一。

工厂现拥有一定水平的科研力量和试验场地。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五年先后建立新厂区高压试验室和电瓷研究所。研究所下设产品设计和标准化、电瓷工艺，新材料研究、理化试验、情报资料等室和试制工场，集中了一批具有电瓷、电器、机械、高电压专业知识和经验比较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

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科研所及其试验场地占地面积为四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三千二百七十七平方米。目前研究所肩负如下任务:新产品开发和老产品更新换代、电瓷生产工艺管理与控制、电瓷生产用各种配方研究设计及新材料的研究、原材料及坯釉料配方的理化测试、新产品开发试制、高压电器产品的检验与测试方法的研究等,同时还负责收集整理国内外有关电瓷生产情报资料,出版《醴陵电瓷》期刊。科研和试验场地拥有较先进的各种仪器和机具。由于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设备比较先进,各项科研任务完成得好,成绩相当显著。

工厂还拥有较先进的工艺装备、设施和具有较高的工艺制造水平。原来全国各兄弟厂和国外电瓷厂的生产工艺大都采用传统制瓷工艺,即湿法制泥和制坯成型,醴陵电瓷厂亦然。这种工艺特点是工效高,劳动条件得到改善;但过程损失大,体力劳动比重大。国外通过采用机械化生产线,已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醴陵电瓷厂通过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的革新、改造和改进,部分工艺方法及工艺装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在引进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后,这个厂的工艺水平更有提高。

工厂还拥有多种生产技术和特殊工艺。当前它已有生产各类高、低压电瓷的生产技术;有大批量制造三十吨级及以下悬式绝缘子,五百KV级及以下的棒形、大瓷套、电容式变压器套管和二百二十KV级及以下的阀式避雷器,电流至感器的生产能力,有设计新产品,试制装备的技术力量,有对各类坯釉料配方研制和筛选的技术力量。其拥有的比较重大的专

门技术是：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 Kg/cm^2 高强度坯料配方，三百三十KV空气断路器高强度瓷套制造技术，五百KV普通和防污型大瓷套制造技术，五百KV普通和防污型大棒型支柱绝缘子的制造技术，三十吨级高强度悬式绝缘子制造技术，二至三米大瓷套整体成型技术，大瓷套横在成型技术，异型大瓷套整体成型技术，抽屉窑焙烧电瓷技术，油纸短尾电容式变压器至感器套管制造技术。

目前，工厂正从如下方面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①加强企业管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②质量保证体系；③加强工艺控制；④加强产品检验；⑤做好用户服务工作。

醴陵电瓷厂担负着国家电力建设中的重点配套任务，也曾为国家的电力事业的发展和电瓷出口创汇作过较大的贡献，因而“七五”期间被列入国家技术改造重点，其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它只要能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科研质量，大力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坚持“三上，一提高”的方针，深挖潜力，就能较好地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为加速祖国电力工业现代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彭显福整理)

醴陵渌江电瓷电器厂发展概况

湖南省渌江电瓷电器厂，位于醴陵城东阳三石，是一个隶属于水利电力工业部华中电管局和省电力工业局领导的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历史，专门生产高压电瓷、高压电器的中型电力铸造企业。全厂占地面积三十三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约十万平方米，职工一千一百多人，固定资产一千二百余万元，并建有电力专线，铁路专线等专门设施，年产电瓷四千吨。

湖南省渌江电瓷电器厂是由建国前的光华电瓷厂和醴陵瓷厂合并后发展建立起来的。

一九四一年，虞仕翔、任大张两位电瓷师付带领八个徒弟在荣庆祥经营的日用瓷厂烧出了一批300伏—6600伏针式瓷瓶。一九四六年底，曾因醴陵沦陷而出走的虞、任又回到醴陵创办生产电瓷的“中华窑业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两人另组织原在“中华窑业厂”工作的部分工人创办了私营光华电瓷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醴陵县共有私营电瓷厂十九家，其中三户商业联营，十二户生产，四户停业，一九五四年营业收入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三元，获利三万五千七百九十九元，一九五五年一至九月产电瓷总计五百五十七万二千一百一十七件，销售四百六十八万六千六百六十二件，

期末库存一百四十七万七千五百四十四件，折产值三万零二百五十八元。

一九五六年醴陵私营电瓷业全行业经社会主义改造后，合并组成公私合营光华电瓷厂。厂长虞仕翔，经理任大张，公方代表彭月泉。全部固定资产九点五八万元，一九五七年，全厂有正式职工二百七十四人，年产电瓷一千二百三十五吨，总产值一百六十七万元，利润四十三万元。

一九五八年，光华电瓷厂合并到地方国营醴陵瓷厂，光华电瓷厂由姜湾迁到阳三石醴陵瓷厂，日用瓷和电瓷生产并存。

一九五九年，醴陵瓷厂改厂名为醴陵第一工业瓷厂，由生产日用瓷为主转为以生产电瓷为主，并适当生产工业瓷、卫生瓷和日用瓷。年产总值五百四十三万元，总产量三千八百吨，利润总额三百三十七万元，产品质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二，跨入全国轻工系统的先进行列，并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受到轻工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表彰鼓励。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厂职工由一九五九年底的七百四十六人精简到一九六二年末的五百七十七人，由于国家处在暂时困难时期，生产一度处于低潮，当时醴陵瓷器公司所辖的十几家厂矿都处于亏损的情况下，我厂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两年时间里，仍然完成总产量五千二百七十吨，总产值六千九百六十万元，利润四百八十八点二万元。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电瓷生产仍未纳入国家计划，在经营上还是以销定产，自找门路。一九六四年，全国轻工业系统无锡会议后作出决定，撤销醴陵瓷器工业公司，设湖南省轻工

业厅硅酸盐公司醴陵办事处，将醴陵第一工业瓷厂改称为醴陵淥江瓷厂，仍是电瓷和日用瓷并存，以电瓷为主。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机部邀请该厂参加全国电瓷订货会议，该厂订货成交额达二百多万元，该厂电瓷生产计划，从此由一机部归口安排，原材、燃料由国家分配，电瓷生产正式纳入了国家计划，这年，全厂六百二十六名职工，完成年总产值二百八十点四八万元，利润总额一百二十六万元。

一九六九年，主要生产三十五KV以下的支柱，套管和少量X—4.5型悬式，针式绝缘子等全部是单机配套产品的基础上，又试制110KV的支柱和110KV的电流、电压互感器等新产品试制成功，受到了通报表扬。

一九七〇年，随着电力工业的不断发展，水电部邀过省机械工业局转轻工业局向本厂投资五十万元扩大电瓷生产，经本厂请求，省委同意，并报请国家计委和水利电力部批准，四月，正式划归省水利电力工业局领导，并指示要尽快生产110KV及以上的电压、电流互感器，隔离开关，熔断器，瓷质电缆终端盒等电器产品，并逐步走向系列化。到国庆前夕，两器一盒（即110KV电压互感器、110KV熔断器和10KV瓷电缆终端盒）试制成功，不仅为本省电器生产的发展立了头功，也使本厂开始在同行业中“崭露头角”。受到了水电局党组和湖南省委机关报的表彰和鼓励。同年十二月间，省局向本厂投资一百八十万元，建起了一栋一千六百平方米的电器车间，从此，进入了电瓷电器并行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七一年六月，本厂改名为“湖南省醴陵淥江电瓷电器厂”。并由省水电局下放到湘潭地区机械局管理。

一九七二年七月，本厂又上交省电力工业局主管。这年，试制成功并批量生产了220KV的电流互感器瓷套，为以后生产220KV电流互感器打下了重要基础，也是本厂生产电瓷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技术员邹平生与其他同志紧密配合，设计并制造了一个能容纳六台220KV电流互感器或三十台110KV互感器的真空干燥、浸渍罐，解决了110KV电流互感器大批生产所急需解决的真空干燥设备问题，也为以后生产220KV电流互感器扫平了道路。

一九七三年，先居派出电器车间的新老工人吴树华等赴西安学习制造110KV断路器、赴沈阳变压器厂学习生产220KV电流互感器，回厂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都试制成功并投入了生产。随后，又派电器技术员张俊峰（现任总工程师）等赴桂林电容电器厂学习电容器的制作工艺。回厂后，在没有一台设备的条件下，由张俊峰设计、工人配合，自行制造了切纸、卷纸、真空等十三台专用设备。并成功地试制出了110KV耦合电容器新产品，一年之内，本厂填补了电器产品的三项空白。自学成材的电瓷技术员胡新杰（现任总工程师）等研制出了适应大棒型及中型产品的统一配方（简称一号配方）烧成质量明显提高，这年，省水电局投资100万元，新购进了大批车、刨、冲、铣锻压设备，着手新建隧道窑、千吨重油池；还兴建了七千多平方米的职工住宅和办公室、招待所、体育场等，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一九七五年，全部固定资产增加到五百三十万元，开始进行五百KV大套管无机粘接试验，220KV卧式互感器瓷套试制成功，电器产品由一九七三年的“四器一盒”发展到110K

V至220KV的系列化生产。

一九七六年，张俊峰改型设计220KV卧式电流互感器获省科技成果奖被记二等功一次。

一九七九年，WDC瓷质电缆头也试制成功，并获得湖南省科技成果奖。这年，完成了三百万元的基建任务。

一九八〇年，以胡新杰为主研制XP—16D、XP—21D，XP—30D高强度大爬距盘形悬式绝缘子成功，填补了国家空白，荣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从此，电缆的发展又进入了高距瓷的新阶段。

一九八二年，在基本建设方面，对成型、制泥两个生产车间完成了全面更新改造工作，开办了瓷泥矿基地，新建了试制工场，新建了五栋共八千平方米的职工宿舍，购置了部分大型生产设备，机动车辆和环保净化设备，全厂固定资产增加到一千万元。

一九八三年六月至10月，完成了厂部和中层干部的机构改革工作。十月，全厂开始整顿了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加强了各项基础工作，整顿了劳动纪律，加强定员定额管理，有计划地进行职工培训，提高了职工的素质；加强了质量管理和新产品的开发；整顿了财经纪律，健全了财务物资管理制度。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这年，总产值完成了八百八十万元，为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总产量完成三千七百二十一吨，为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完成利润一百七十九万元，为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五；质量百分之八十八点三，比计划增长百分之四点三。一九八四年，经过近三年来的努力，由张俊峰等同志研

制出来的的220KV六线圈防爆型电流互感器为国内首创。以张俊峰为首，在技术干部吴冬青、吴修文、缪海平等同志的配合下，试制成功了DC—4型直流超高压线路悬式绝缘子，经部鉴定，确认为填补国内空白，并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被水电部评为部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并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列为湖南省八五年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DC—4型超高压直流绝缘，是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的重要部件，由于它对耐污闪特性，耐腐蚀性能和抗老化等方面的特殊要求，造成生产技术复杂，我国一直未能生产，这种直流绝缘子的试制成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这种直流绝缘子的历史，使我省电瓷生产跨进了一个新的领域，有能力向生产更高水平的电瓷电器迈进。

（醴陵淅江电瓷电器厂供稿）

建国初期醴陵瓷业产销概况

傅扬广 刘照乙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这段时间，我们在湖南省土产公司醴陵瓷器公司（后改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醴陵陶瓷批发站”）担任副经理工作。这个机构完全是为醴陵瓷业产销服务的。现就建国初期醴陵瓷业产销发展概况简述如下。

建国初期醴陵瓷业生产概况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醴陵人民获得了解放，瓷业工人翻身作了主人。一九五〇年，醴陵各瓷厂都相继恢复了生产，以刘伯祥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与工人配合，为发展醴陵瓷业努力搞好生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确有少数资本家，对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消极对待生产，有的甚至抽走资金，企图把厂子搞垮。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瓷业工人发挥了主人翁精神，积极搞好生产自救。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工人主动出来搞好生产自救的厂子，全县共有二十八家。有的还以工会组织出面指挥生产。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及时制订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在这

一方针指引下，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为发展醴陵瓷业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五一年成立了“湖南省土产公司醴陵瓷器公司”这一机构。虽属商业性质，但我们在工作上，采取一手抓恢复发展生产，一手抓产品推销的工作方法。

一九五〇年，全县共有大小瓷厂二百零九家，其中城区细瓷厂和个体户一百四十家，细瓷分圆、琢两器，图画、辘轳、模型“三班”。“圆器”产品有先大、先中、可二、戈顶二、戈三大、汉大碗、汉二碗、罗汤、正德汤、折七八九盘类、大二光中、汉令等；“琢器”产品有宝珠坛、东坛、帽筒、茶壶、乔壶、大白壶、马蹄盂、四合壶等。“三班”产品有羹匙、酒杯、茶杯、痰盂、艺术瓷等。粗瓷有川大、良大、顶二、三大、戈汤等品种。全县当时的粗、细瓷共有大小规格不同的二百一十多个品种。

一九五二年，县委和县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瓷业生产的领导，并要求区、乡领导都要抓紧抓好粗瓷生产工作。城区则由城关镇党委牵头，协同县总工会、工业科、税务局、瓷器公司、工商联等部门联合组成城区瓷业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由镇党委书记胡廷翥兼任，副组长由县总工会副主席袁明辉兼任，成员有城关镇委彭琪、县工商科科长杨藻润、税务局局长刘增龄、瓷器公司副经理傅扬广、工商联干部许伯秋等七人。许伯秋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当时办公室设在姜湾上正街二百二十号（现新胜居委会六联组），负责研究处理城区瓷业生产的一些重要问题。

湖南省土产公司醴陵瓷器公司，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

年设在姜湾新街（现理化瓷厂和姜湾居委会办公室这两栋房子内）。公司配备了二百多名干部和职工，设有五课一室（后改为科），负责醴陵瓷器的产销工作。其中业务课配备了五十名干部，其主要任务一是抓产品收购，二是抓瓷器推销。东乡和北乡共有五十五家粗瓷厂，所产瓷器全部用人力土车运至县城，每天有近百部土车子运瓷进城。当时城内的仓库不多，容量有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常常把瓷器堆放在姜湾新街和车顿桥的魏家湾一带的街道两旁，有时河边也堆放瓷器。船运不走时，一堆数月，无人偷盗。瓷器推销组配备了三十多名干部，到全国各地进行推销。在安徽省的芜湖、湖北省的汉口设有常驻推销组，每组配有一十三至一十四名干部职工，并在当地租赁画瓷器。在上海、沈阳、西安、郑州等地则派出流动性的推销员。湖北和安徽省是醴陵瓷器销售的大户，因为这两省水运方便，发往两地的瓷器，全部采用水运。当时，醴陵航运公司拥有三百多条船，大部分是承运瓷器的。姜湾的搬运队二百多名职工，大部分时间是装卸瓷器的。姜湾新街还有包装队、瓷器社等也都是为包装瓷器服务。姜湾的三角坪码头、河边经常驻停很多船只，河岸上人员车马来往川流不息，真是一派繁忙景象。由于瓷器打开了销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县的瓷厂发展到三百六十家（包括电瓷、陶画加工和“三班”生产的个体户）。瓷器公司的购销业务也逐年扩大，一九五二年的收购量由一九五〇年二十六万六千一百担增加到三十三万一千〇三十担（当时瓷器是用箩筐挑，按瓷器重量折担算，如三大碗以二十四同（十件为一同）折为一担，罗汤

碗四十同折为一担，大号羹匙一百六十同折为一担。这个计量方法商业收购部门一直沿袭到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经过协商报经上级统计部门核准才改为计件数的。生产单位便于核算成本，一直是按件计算。收购金额由三百零三千六百三十六元增加到三百八十万零五千五百五十三元，为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点七（其中细瓷收购量由一九五〇年的八万一千九百担增加到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一十七担，收购金额由一百一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六元增加到一百三十万零七千四百六十八元）。以上数据说明，醴陵瓷业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实行订购包销，瓷业产销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

随着瓷业生产的发展，从一九五三年起，瓷器公司对全县的瓷器实行了订购包销，使瓷业生产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年初与各厂家签订了收购合同，采取先付款后收购的办法，当年预付给厂方的资金达三百五十余万元，保证了各厂所需的瓷泥和松柴的供应，如瓷泥由公司垫款收购发至厂家。城区共有阶级窑四十三座二百六十一间，每年所耗的松柴达一点二亿斤以上，为解决如此巨大数量松柴的供应，公司在城内设点收购，即由点统一过称后发至厂家，再由厂家验收出具收据，公司凭据付款。当时所需的松柴主要是从本县的南乡和攸县送来。一九五三年春季，农村青黄不接时，送售松柴的土车子特别多，最多的一天有五、六千部（平均每天也在两千部以上）。

为了保护本县及邻近县森林资源，瓷器公司一方面减少

本地松柴的收购量，一方面向省财委写报告，请求批准到湘南的粤汉线和湘桂县沿站设点收购。给省财委的报告批准后，公司派出了几名干部带领一批雇请的临时工，共约三十多人，到湘南收购松柴，从铁路运到阳三石，再用船拔至各厂，平均每天有五六个车皮运柴，多的一天有一十多个车皮，耗柴量之大使人吃惊。采用上述办法解决了各瓷厂的主要原料和燃料后，工厂便能放手发展生产了；面瓷器公司也因与厂方签订了合同，保证了货源，向外供货也就可以做到有计划地安排了。

实行公私合营，促进了瓷业生产的更大发展

一九五四年，开始对私营瓷厂实行公私合营。首先将刘伯祥私营瓷厂作为试点，将刘祥记瓷厂改为公私合营建设瓷厂。当时的县人委会派出国家干部吴铮担任公方代表。一九五五年，又将口新、之同两家私营厂合营为湘醴瓷厂，县人委会派出国家干部朱方义担任公方代表；将原大公合营为华新瓷厂，县人委会派徐先桂担任公方代表；原大丰瓷厂合营后，厂名未变，县人委会派周迪均担任公方代表。由于对这些瓷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党和政府加强了对瓷业生产的领导，工厂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真正当家作了主，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产值大幅度上升。到一九五五年底，上述这几家合营企业的产值达七十七点零三二万元，占城区日用瓷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醴陵瓷业由于一九五四年以来实行了公私合营，一九五六年又成立了湖南省醴陵瓷器公司，从而改变了生产关系，

加强了领导，瓷器的产销数额大幅度增长。一九五三年收购总量为三十七万一千八百四十担（折合为五千八百一十三万件），一九五五年增加到一万零二百六十六点八万件（瓷器计量由担改为计件了）；收购金额一九五三年为五百三十五万六千五百元，一九五五年增加到八百一十八万八千一百七十六元。其中：细瓷，一九五三年收购量为一十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担（折合为二千一百一十九点三万件），一九五五年增加到四千一百零七点五二万件，收购金额一九五三年为三百六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元，一九五五年增加到四百九十一万二千九百零六元；土瓷，一九五三年收购量为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担（折合三千六百九十二万件），一九五五年增加到六千一百六十一·点二八万件，收购金额一九五三年为一百七十一万三千七百四十九元，一九五五年增加到三百二十七万五千二百七十一元。产品销售市场也日益扩大，远销全国二十七个省市。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醴陵瓷业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九十五万元，直接从事瓷业生产的人员发展到七千零三人，还有从事采泥、包装、运输、竹作业、铁作业等为瓷业生产服务的人员一千五百多。瓷业生产直接间接维持了全县人口中十万人的生活。由于瓷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大大地繁荣了醴陵的经济。

醴瓷在美国市场

胡建球

在国际陶瓷市场中，美国是进口陶瓷比重最大的国家，美国自己生产的厚胎瓷和日用细瓷很少，多数陶瓷是进口的。据一九八二年美国海关进口陶瓷统计：以FOB价计算，陶瓷总进口额达六亿七千五百三十四万美元。其中瓷器三亿三千零七十万美元；陶器五亿五千二百三十一万美元。

美国进口的陶瓷，主要来自日本、英国、西德、中国、法国、南朝鲜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一九八二年日本对美出口二亿七千九百八十万美元，占美国进口陶瓷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四三，不仅为各国之冠，而且种类齐全。据统计，美国进口日用瓷中：骨灰瓷二十五万九千七百二十一打，计七百三十七万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二五；日用瓷一千零四十四万八千二百八十七打，计一亿一千零九十三万美元，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四五；陶器一千七百九十八万一千八百打，计一亿二千零八十七万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八；炆瓷三千三百一十二万美元，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零。而我国对美出口陶瓷的金额和所占比率分别为：六百四十万零一千二百五十四打，计二千五百一十万美元，占美进

口日用瓷总额的百分之八点九三；陶器一百零六万一千四百六十打，计二百零三万美元，占百分之一点四五；炻瓷一百二十三万美元，占百分之零点零一；艺术瓷只有二十七万美元。一九七一年，联合国订购了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彩瓷器，湖南陶瓷在美国初露锋芒。一九七九年，釉下瓷成批飞过太平洋，进入美国市场，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据统计：我省一九七八年对美出口陶瓷七十万七千八百件；一九七九年增加到四百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件；一九八〇年便增长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万零一百件，占全国出口陶瓷总量一亿三千四百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件的百分之一十点八九。特别是醴陵牌、明冠牌四十五头餐具已经在美国赫赫有名，成为畅销货。海鸥牌一进入美国，经销海鸥牌的美商因海鸥牌的莹体玉质完全可以和明朝皇冠媲美，便将海鸥牌更名为“明冠”牌。

美国市场，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一、百货公司。这是美国的高级商店。它的场面布置和商品摆设都非常讲究气派，每个专柜有各方面都很讲究的营业员。由于这种商店百货齐全，而且都是质量好的名牌货，故有钱有声望的人一般都到百货公司买上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名牌货。因此，同一商品在百货公司的售价要比在其他商店的售价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所以，有人把百货公司称为既吃香又值钱的名气商店。如米卡莎和梅西（MACY）百货公司，都是我省的重点客户，一九八二年梅西百货公司订购醴陵的货就达十一万美元。该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公司，总部设在纽约，划分东、西岸分公司，仅纽约地区就有十六家商

店，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店。该公司是六十年代在新泽西州发展起来的，一九八一年的经营额达二十九亿美元。

美国天山公司陶瓷合资公司专销产品之一的醴陵牌四十五头餐具，是醴陵永胜瓷厂生产的高档瓷器。这种瓷器的造型优美，器型主体以弧线组成，新颖别致，它的花面秀丽，有色彩淡雅的边花，也有富丽堂皇的满花，瓷质洁白无瑕，釉面晶莹润泽。该公司宣传醴陵牌餐具的费用就达十万多美元，在百货公司的出售价比湖南其他牌号的同类餐具还高出百分之二十二。现在，醴陵牌餐具在美国市场已享有盛誉，天山公司要求多生产这样的餐具，以满足客户的要求。

二、折扣商店（又名大众商店），这是以薄利多销原则经营百货的商店，商店的规模大。为了减少费用，不设营业员，货由买者自选自拿，出门交货款。它所售出的商品要比百货公司价格低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打了折扣售给顾客。显然，高档商品一般不进入这种商店，因为商品的质量再好也卖不起价。但是，这类商店，面向大众，销售量大，如凯马（K MART）是美国最大的折扣商店，下有二千三百七十三家连锁商店。它是天山公司最大的一家客户，一九八二年进货建湘瓷厂“明寇牌”四十五头餐具六万套，合二百五十万美元，占天山公司销售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餐具在该店一千五百家连锁商店销售，受到好评。

三、专卖商店（又名超级市场），这类商店专门出售商品，兼售其他少量商品也多是厨房卫生用品。超级市场是关系到千家万户所需食品的大众商店，并非什么很高级的市场。陶瓷产品进入超级市场，是作为一种奖励销售的商品，

也就是借助名牌，优价奖励，招徕顾客，以推动食品的销售。

美国的家庭主妇，谁不希望家里有一套象样的餐具，如能弄到一套名牌餐具来招待客人，增添家庭的光彩，更是主妇们的心愿。但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又舍不得花高价到其他商店去买。专卖商店抓住主妇们的这种心理，采取借助名牌，优价奖励，吸引顾客，推销食品。

美国的居民，一般在每个星期六一次把一个星期所需的蔬菜食品买齐。如某一主妇第一个星期在这个专卖商店买上十美元的食品，店里发给他优待券，可以买到成套餐具中的十吋平盘两个，每件只需零点六九美元，有时为零点七九美元。每个瓷盘只相当于一杯咖啡的钱，这是极为便宜的了。因此，第二个星期这位主妇一定会来此店又买上十美元左右的食物，又可买到餐具中的其他瓷器品种，大约花八个星期左右才可以买齐碗、盘、碟等小件；一般再花七个星期左右就能买到一套四十五头餐具中的汁头、鸭池、品锅、鱼盘等大件。这些大件只比正常价稍微低一点，而最后一算帐，比在其他商店买一套餐具仍要便宜得多。虽然要花十五个星期才能买回一套四十五头的餐具，但主妇仍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抓住这个优待的机会。因为食品家家都要买，名牌餐具户户都想有，所以，这种优待奖励，借助销售的方式，在美国的超级市场非常盛行。

一九八三年，美国埃克西（EXCEL）进口公司，从湖南建湘瓷厂订货四百万件、醴陵国光瓷厂订货四百万件瓷器，总值近三百万美元。进入这家公司进口的瓷器多分散到全美

各地超级市场销售，因而，它是我省陶瓷进入美国超级市场的主要途径。超级市场具有批量大、单件包装、销售渠道稳定、产品花而四年更换一次、换汇成本低、对产品质量不过高要求等特点，非常符合我省现有的生产水平。

美国埃克西进口公司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总共销售铜官窑瓷一千万件，约值三百五十万美元。这样，我省陶瓷产品已进入了上述美国的三条销售渠道，而且产品的信誉日高，有的已成为畅销美国的名牌货。据统计：一九八五年湖南日用陶瓷总产量为五亿四千一百六十五万四千九百件，其中日用瓷为四亿七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六百件，而日用瓷的出口瓷为七千五百八十八万九千件，高级日用瓷为五十万二千五百件。

一九八五年，醴陵瓷业总公司日用瓷总产量为八千七百七十六万件，其中出口瓷为二千七百三十四万件，占全省出瓷七千五百八十八万九千件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一七，在出口瓷中的高级日用瓷产量为四十五万件，占全省高级日用瓷五十万二千五百件的百分之八十一。总产值为六千二百二十万元，其中出口瓷产值为二千零七十七万元，出口瓷换汇总额为八百四十七万美元。

北洋军阀张宗昌对醴陵瓷业的破坏

陆 承 裕

醴陵素以瓷业著称，清末明初的青花餐具的主要产地为浏山，细瓷及艺术瓷多产在姜湾附近，土碗则多产于王仙镇一带。当时姜湾为瓷器集散地，瓷商开设碗栈于姜湾者有十余家，收购各厂瓷器转销川、桂、黔、鄂诸省，所以瓷业对醴陵的经济繁荣起着很大的作用。斯时我的父亲陆仲山与浏山三家厂主合资开设“敦成裕字号”（即碗栈）于姜湾，将瓷器运销湖北新堤大冶、沙市一带，脱销后换回黄豆、棉花等农产品供应市场，做到货畅其流，产销两利。

一九一八年春，北洋军阀政府段其瑞执政，承袭袁世凯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派张敬尧率北洋军精锐数师南下，湘军不敌，退走湘南，北洋军阀张宗昌师进踞醴陵，军纪极坏，张宗昌累月扣发军饷，官兵向张索讨军饷时，张宗昌反骂道：“造你奶奶，老子发了枪支给你，你弄不到饭吃，还来向我要薪饷，真是蠢才！蠢种！滚！”张宗昌既如此纵兵殃民，所部就在城乡要道口到处设卡征捐，搜抢商贩财物，以致商旅裹足，市场萧条。更有甚者经常借口“剿匪”派兵下乡抓粮抓夫，敲诈勒索，强奸妇女，不及逃避者老少均难幸免，猪牛鸡鸭尽皆遭殃，如无所获则纵火烧屋，故当路居民

均外避山区，以致十室九空，田园荒芜莫此为甚，人民恨之入骨，组织自卫，以锄头、梭标、鸟枪为武器，抗击北军，因此四乡的大小战斗，时或有之，北军恐惧游击队之袭击，于是四城要道军警森严，层层盘查，城乡来往几乎断绝。

浏山、王仙等地瓷器，素来是用独轮土车运至姜湾交瓷商外销，而烧窑所需之松柴（又名碗柴），又是经柴商由山区船运至姜湾上岸后，也靠独轮土车分途运至各厂的。今城乡交通隔断，瓷器进不得城，松柴亦运不到瓷厂，迫使各瓷厂不得不停产倒闭，大部分瓷工被解雇失业，生活无着，来自江西瓷工不得下回江西求生，本地瓷工亦不得不转业谋生，也有一部分工人参加了醴陵游击队抗击北军，如在抗日战争中当过军长、副总司令的陶广就是。所以当时的醴陵瓷业濒临瓦解。

一九一九年夏，北军被南军击败，张敬尧撤出湖南，张宗昌在撤走前勒令醴陵商团上交“开拔费”十万银元，商团以数月闭市，商业陷于停顿，再三要求减为四万元，但强调非要八万元不可。商团无法，筹措银元四万元送去。张宗昌大怒，派军挨家搜查，北军士兵乘机闯进千家万户，翻箱倒篋，凡金银首饰钱钞衣物等尽被抢走，不要者满屋狼籍，在查抄姜湾时，见各碗栈堆集之瓷器，怀疑其中必藏贵重财物，遂取粗木杠撞捣，大堆瓷器立成瓦片，几无一家幸免者。张宗昌并声言不缴足“开拔”费款，就放火烧毁醴陵城，全城人民慌乱无措，纷纷乘夜逃出城外，次日，张宗昌遂四城放火逃遁，满城烈火三日始息，千年古城一片瓦砾，顿成废墟。迄至一九二一年才从废墟上逐步恢复城市建设，瓷业则在一九二二年才恢复旧观。

建国前醴陵细瓷业工厂和工人调查表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公司名称	所在地	旧有半厂	旧有工人	现有半厂	现有工人	
新记公司	文笔峰	13	104	7	56	
模范窑场	城 东	14	112	11	88	
德厚公司	城 东	7	56	5	40	原名烧窑场
楚利公司	青泥湾	7	56	3	24	
九如公司	青泥湾	7	56	7	56	
改良公司	洑 山	9	72	6	48	
德山公司	洑 山	11	88	6	48	
舜业公司	洑 山	11	88	5	40	
和记公司	姜岭上	9	72	5	40	
中和公司	文笔峰	17	136	12	96	
渌口公司	渌 口	6	48	4	32	
裕华公司	黄泥坳	11	88	全部工		
民利公司	姜岭下	10	80	5	40	原为模范窑业工场第一厂
模 范 窑 业 工 场	姜岭下	10	80	全部工		
总 计		142	1136	76	608	

上表见《实业杂志》一七二、一七三号合刊，百中的
《醴陵细调查》

注：旧有是指民国十九年七月以前。

（文汉民收集）

建国前醴陵细瓷业窑厂及搭装户一览表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

厂名	厂址	工场	工作	烧窑	产 值	出 品	搭烧户	
	姜湾	厂数	人数	次数	估计(元)	种 类	户数	工作人数
生和窑厂	姜湾	2	52	20	100,060	圆 器		
劳 资	姜湾 仙鹤桥	4	30	45	223,000	"		
德厚厂	姜湾 黄泥坳	4	25	45	225,000	圆 器 兼琢器	共 8	
裕华厂	"	5	106	52	260,000	圆 器		
改良工厂	醴北 东堡	4	80	45	225,000	"		
群力工厂	东门上	4	80	46	230,000	"	共12	
模 范 厂	"	7	136	56	330,000	"		
德 记 厂	"	5	120	56	280,000	圆 器 兼琢器		
刘德昌厂	洩山	4	95	48	240,000	圆 器		
丁恒利厂	东堡	2	54	20	100,000	"		
天 宝 厂	姜湾	2	36	16	60,000	"		
知难瓷社	"	8	167	80	400,000	"		
民利一厂	"	3	76	40	200,000	圆 器 兼模型		

续上表

民利二厂	姜湾	6	107	56	230,000	"		
民利三厂	"	3	76	42	210,000	圆 器		
鲁 记 厂	"	2	34	16	80,000	"		
裕 长 厂	"	4	85	46	230,000	圆 器 兼琢器	共49	
裕 丰 厂	"	3	70	40	200,000	圆 器		
产合作社	姜湾	3	75	42	210,000	圆 器		
民生工厂	文笔峰	4	25	45	225,000	"		
同和顺厂	"	6	120	51	270,000	"		
日新工厂	"	4	88	50	250,000	"		
合兴顺厂	中和	1	22	10	50,000	"	共 4	
吴瑞扬厂	"	2	55	21	120,000	圆 器 兼琢器		
黄云盛厂	"	2	41	20	100,000	圆 器		
张光明厂	"	2	45	20	100,000	"		
寿记工厂	"	2	60	31	170,000	圆 器 兼琢器		
吕千丰厂	"	2	52	21	100,000	"		
曾德盛厂	"	3	61	32	160,000	"		

续上表

屈荣盛厂	中和	3	52	20	100,000	圆器		
忠华昌厂	"	2	44	20	100,000	"		
傅义祥厂	"	2	25	10	50,000	圆器 兼琢器		
黄广兴厂	"	1	19	10	50,000	专造琢器		
胡金林厂	"	2	35	16	80,000	圆器		
广乾顺厂	"	1	32	14	70,000	"		
傅水清厂	"	1	26	12	60,000	圆器 兼琢器		
志和工厂	中和	2	22	20	100,000	"		
阜南工厂	文笔峰	3	76	40	200,000	"		
其他八家	涿口	18	410	240	1200,000	多是圆器 兼琢器		
合 计		133	3014	1532	7600,000		73	549

(文汉民收集)

醴陵土瓷窑厂一览表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

厂名	厂址	经 理	开 设	车位	工作	烧窑次数		本年出品 数量(筒)
		姓 名	年 数	部数	人数	28年	29年	
群 益	大林桥	蔡申秋	28	50	50	40	40	96,000
易和丰	"	易瑞吟	40余年	18	20	30	35	70,000
同兴泰	"	阙恩全	"	20	40	35	40	80,000
同兴福	小林桥	文广彬	18年	16	35	25	30	60,000
复生祥	"	汤正谋	"	16	35	25	30	60,000
立茂长	"	汤正良	30年	20	35	30	35	70,000
元茂和	"	李凡谨	"	20	35	30	35	70,000
元裕和	"	李昌福	"	10	20	20	20	40,000
元兴和	"	李昌来	"	10	20	20	20	40,000
元和盛	"	李凡枚	"	18	35	30	35	70,000
复兴祥	"	邓春林	"	20	40	40	45	96,000
元昌祥	"	李昌来	"	16	35	20	35	70,000

续上表

合和	小林桥	杨光早	40年	18	40	35	40	80,000
汤乾盛	"	汤正早	"	20	40	30	35	70,000
乾春生	小冲	张大群	"	15	25	25	30	60,000
潘生盛	"	潘翅生	"	14	25	25	30	60,000
罗美生	董家湾	罗思明	20年	18	30	20	25	50,000
发盛祥	大冲	林隆发	30年	16	30	30	35	70,000
兴益	漏水坪	卢运明	20年	16	30	30	35	70,000
同盛福	"	乔树春	"	16	30	30	35	70,000
黄生昌	汾山	黄进门	30余年	14	20	20	24	50,000
曾益昌	"	曾伯谋	30年	16	24	20	25	50,000
傅永昌	"	傅德财	40余年	20	36	25	30	60,000
全顺福	"	郭希荣	30余年	16	26	35	30	60,000
茂盛生	"	张正卓	"	16	25	25	30	60,000
连盛昌	"	张正望	"	16	26	25	30	60,000
合兴祥	"	肖子洋	1年	18	30	30	35	70,000
祥元兴	"	李培未	30年	18	30	30	35	70,000

续上表

福星公司	汾山	刘福陔	"	16	24	20	25	50,000
合兴工厂	"	陈国庆	1年	16	24	20	25	50,000
梁同兴	甌皮岭	梁友庚	3年	18	35	20	25	50,000
生顺祥	梯三坡	杨玉生	20年	30	35	25	30	60,000
福裕庆	中枫塘	丁文生	30年	20	40	30	35	70,000
祥 顺	崩山下	傅仲明	20年	14	26	20	20	40,000
裕丰泰	唐家坳	张昌杭	30年	14	26	20	25	50,000
福顺昌	严家冲	王裕隆	20年	14	26	20	25	50,000
益全顺	寨下	肖子塘	"	16	30	25	30	60,000
合顺生	寨下	熊洪生	"	16	35	30	30	60,000
文合顺	青泥湾	文家寿	"	14	20	25	25	50,000
其他	共99户			1584	2970	2475	2970	5,940,000
合计	138户			2241	4169	3500	4169	8,462,000

注：土瓷每千对（即两千筒）以时价计算共值
2090500圆。

（文汉民收集）

建国后醴陵国营和地方国营瓷业厂家基本状况一览表

厂名	建厂年月	现有职工总产值(万元)			备注
		工人人数	建厂初期	现状	
国光瓷厂	1958.9	2440	399.18	2084.59	
永胜 "	1958	1490	100	989	
群力 "	1958.4	1100	16.05	623.93	
星火 "	1956	2019	272	1136.63	
力生 "	1964.1	595	31.74	417.2	
新民 "	1956.3	600	18.45	407.7	
醴陵电瓷厂	1946.12	2230	7	2200	
渌江电瓷电器厂	1953	1130		1100	
市陶瓷厂	1958	294	22	121.18	
市陶瓷一厂	1958	251	38	126.64	
市全胜瓷厂	1969.3	478	22.13	172.66	
市建中瓷厂	1963	120	12.37	67.10	

(彭增信收集)

建国后醴陵市乡镇瓷业厂家发展概况一览表

厂 名	建厂年月	职工 人数	总产值 (万元)		备 注
			建厂初期	现 状	
神福乡陶瓷厂	1975.10	95	12	60	
茶山乡 坵塍瓷厂	1975.1	94	9.4	75	
转步乡一瓷厂	1971	80	15	40	
转步乡二瓷厂	1977	71	1.385	2.5	
均楚乡电瓷厂	1975.10	215	10	180	
石亭乡电瓷厂	1973.1	76	6	60	
长岭乡电瓷厂	1967.4	75	15	80	
高桥乡电瓷厂	1978.12	85	24	90	
板杉乡瓷厂					未提供数字
板杉光明瓷厂	1985				"
新阳乡瓷厂	1971.5	72	6.156	35.77	
板杉乡二瓷厂	1985				未提供数字
仙霞乡瓷厂					"
八步桥乡瓷厂	1977	77	0.6	50	

续上表

黄达咀乡瓷厂	1983.7	135	20	60	
黄达咀乡 新建瓷厂	1983.7	107	13.5	50	
小横江乡瓷厂					未提供数字
城关建筑瓷厂	1979.10	243	45	146	
城关现代瓷厂	1963.3	293	12	131.62	
浦口乡瓷厂	1970	407	5.1	210	
王仙电瓷厂	1966.4	339	1.05	250	
王仙陶瓷厂					未提供数字
大林乡瓷厂	1971.1	120	13.92	46.6	1986年1月 该厂分开为大林 日用化工瓷厂、 大林电瓷厂、华 冠瓷厂
黄沙乡电瓷厂	1961	185	10	140	
东堡乡瓷厂					未提供数字
东堡乡 美术瓷厂					未提供数字
涪江高频瓷厂	1969.10	213	0.4	153	
涪江出口瓷厂	1966	260	20	180	
涪江陶化瓷厂	1976.7	136	2.5	75	

续上表

淶江乡电瓷厂	1979.2	92	11	80	
淶江乡工业瓷厂	1965.1	470	10.08	255	
淶江乡工艺瓷厂	1983.5	62	7	15	
东富乡一瓷厂					未提供数字
东富乡二瓷厂	1980.8	102	4	60	
沈潭乡瓷厂	1972.4	216	10	150	
沈潭乡陶瓷厂	1976	90	3.5	50	
嘉树乡陶瓷厂	1966	240	1.16	54.7	

(彭增信收集)